

极权主义思想丛书

约思特 A. M. 梅尔洛

精神之蹂躏

思想控制、精神灭绝和洗脑心理学

THE RAPE OF THE MIND 精神之蹂躏
PSYCHOLOGY OF THOUGHT CONTROL, 思想控制、精神灭绝和洗脑心理学
MENTICIDE AND BRAINWAHSING [美国] 约斯特 A. M. 梅尔洛
JOOST A. M. MEERLOO 太乙真人 校对翻译

[美国] 格罗斯特与邓拉普出版社 1956 年

The rape of the mind: the psychology of thought control, menticide and brainwashing,
Joost, A. M. Meerloo, Gross & Dunlap, 1956.

格罗斯特与邓拉普出版社

1956 年纽约原版通用图书馆版

重印出版方：进步出版社

平装本首次再版，2009 年 7 月

电子书 ISBN: 1-61577-375-4, EAN/ISBN-13: 978-1-61577-375-6

平装本 ISBN: 1-61577-376-2, EAN/ISBN-13: 978-1-61577-376-3

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信息：

LC 控制号：56009252。LC 分类号：BF633 .M4

杜威分类号：131.33.

书名：《精神之蹂躏：思想控制、精神灭绝与洗脑心理学》

作者：梅尔洛，约斯特·亚伯拉罕·莫里茨，1903-320 页 22 厘米

主题词：洗脑

目 录

作者序言.....	1
本书评介.....	3
译者序言.....	7
第一部分 个体屈服技巧	
第一章 你也会认罪的.....	12
第二章 巴甫洛夫的门徒化身为驯兽师.....	22
第三章 药物催生顺从.....	24
第四章 为何屈服？虚假供述的心理动力学.....	46
第二部分 群体顺服技巧	
第五章 思想领域的冷战.....	61
第六章 极权主义及其独裁统治.....	68
第七章 极权思想的侵蚀.....	81
第八章 审判中的审判.....	92
第九章 恐惧作为恐怖的工具.....	106
第三部分 隐性精神胁迫	
第十章 童年造就成人.....	116
第十一章 思想传染与群体幻觉.....	125
第十二章 技术思维的侵蚀.....	135
第十三章 行政思维的侵蚀.....	142
第十四章 每个人心中的叛徒.....	151
第四部分 寻求防御之道	
第十五章 抵御精神折磨的训练.....	167
第十六章 纪律教育还是更高士气.....	172
第十七章 从旧勇气到新勇气.....	181
第十八章 自由——我们的精神脊梁.....	190
参考文献.....	197

作者序言

那杀死身体而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马太福音第 10 章 28 节

本书试图描绘一种荒诞的蜕变，即自由的人类心灵如何蜕变为自动反应的机器——这种蜕变既可能源自当代社会某些文化暗流的侵蚀，也可能源自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而故意为之的实践。

精神之蹂躏以及隐秘之精神胁迫，堪称人类最古老的罪行之一。它们或许可追溯至史前时代，那时人类初次发现，他可利用同理心与理解力等人性特质来掌控他的同胞。“蹂躏”一词源自拉丁语“rapere”，意为掠夺，该词亦与“狂热”（rave）和“贪婪”（raven）同源。该词还与身心崩溃、神态失常、入侵侵占、篡夺掠夺及偷取盗窃等意义有关。

现代语境下的词语如“洗脑”、“思想控制”和“精神灭绝”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理解这些概念，帮助我们认识这些真实存在的手段是如何摧毁人格的完整性。当一个概念被冠以恰当的名称时，人们便能更容易地辨别它——而正是这种辨别行为，为系统性纠错开启了契机。

本书探讨若干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些危险正威胁着自由文化的互动。书中特别强调了强迫性精神入侵这一议题所蕴含的深远文化影响。我们不仅需要关注那些明目张胆的人为胁迫手段，更要警惕那些悄无声息侵入我们情感与思维的隐形杀手。精神毁灭所造成的危害，其严重程度堪比原子弹战争带来的彻底肉体毁灭。事实上，精神毁灭和肉体毁灭两者既相互关联，又彼此交织。

我探讨强迫性精神入侵这一议题的方法基于这样的信念：唯有从多个角度审视该议题，我们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

根据玻尔互补性原理，物理学中看似简单的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描述物理现象需要不同且看似矛盾的概念。例如，在解释电子行为时，“粒子”和“波”概念都不可或缺。该原理同样适用于观察更为复杂的心理与社交互动。我们不能仅从简单的巴甫洛夫视角看待洗脑现象。本书尝试从临床描述视角和弗洛伊德心理学概念，并从精神胁迫可能存在于所有人类互动交流这一普遍立场出发，来审视洗脑现象。

任何形式的沟通都类似于投掷游戏中推倒一排玩偶的尝试。当我们投掷的球越多，击中所有玩偶的概率也就越大。我们对任何问题的探索越深入，就越有可能找到并触及问题的本质及核心。若不让文本出现某些重复，这种细致的阐述便无从实现。

本书将从有计划、有预谋的精神胁迫这一具体议题展开，延伸至现代世界中那些使人趋于机械化、自动化影响的这一普遍性议题。最后几章将回到精神胁迫这一议题的核心讨论上，作为迈向守护精神自由的第一步。

荷兰伟大作家——穆尔塔图利曾给友人写信致歉，称信件冗长是因为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写得更简短。这则悖论道出了所有表达与沟通面临的困境：若要追求将思想以精准且可传达的方式表达出来，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然而简明扼要的描述未必总能获得欣赏。尤其是现代心理学充斥着过度学究的气息——暗藏着令读者惊叹不已的隐秘意图。而那些试图用通俗语言表达、避开术语的人，往往被斥为通俗化且不够科学。尽管如此，我深知自己早已浸染于心理学术语之中，以致于无法完全摒弃心理学的语言来表达。心理清晰度的真正考验在于普通大众如何吸收并理解学术著作所要传达的思想。我的写作目标虽然面向普通大众，但并不是为了普及知识，而是为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混乱带来些许秩序。

人说的每句话都是从他人那里剽窃来的。作家的使命在于吸收、融合并转化其所处时代的知识与情感潮流，以个人独特的方式呈现，并以自身经历滋养其写作。我确实感激所有让我得以借用其思想的人，尤其感激那些激励我围绕这个有争议性话题进行思考并付诸笔墨的人。

约斯特 A. M. 梅尔洛

1956 年 1 月

本书评介¹

马滕·德克森博士指出：“深层而言，我们都曾被诱惑成为洗脑者，操纵他人的思想。”他揭示了“精神灭绝”这一术语的起源——该概念作为理解洗脑的替代性视角，由荷兰精神病学家约斯特·梅尔洛在1956年出版的《精神之蹂躏》中提出并广为流传。

在洗脑时期众多鲜活人物中，梅尔洛是我最钟爱的。他以炽热情怀撰写关于洗脑——或如他更倾向称之的“精神灭绝”——的论述。他同样易于陷入夸张修辞，正如1950年代将“洗脑”一词推向大众的埃德华·亨特。然而梅尔洛的思想比亨特更为广博、深刻且激进。前者研究领域惊人地多元，后者的人生与著作则被反共情绪所主导。

梅尔洛著作等身，涉及时间心理学、成瘾研究、心灵感应、自杀现象、创造力等众多领域。其渊博学识使洗脑研究著作远比亨特那般急促的新闻报道更具可读性。但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其激进的反乌托邦视角。他不仅指出所有人皆面临被洗脑的风险（亨特自然持相同观点），更揭示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着操纵他人思想的诱惑——我们皆可能成为洗脑者。

梅尔洛于1903年出生于海牙。二战期间，他开始自称约斯特，以免引起占领军的怀疑。其父母虽为犹太人，但父亲拒绝与犹太教产生任何关联，致使年轻的梅尔洛始终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他在莱顿求学，并于1927年获得医学学位。求学期间，精神病学家赫尔布兰杜斯·耶尔格斯马将他引荐给熟识的精神分析师菲利普·图伊特，后者正需助手。作为工作报酬，梅尔洛接受了心理分析治疗。他专攻精神病学，并于1934年开设私人精神科诊所。

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时，梅尔洛作为军医参与了对德军的短暂抵抗。1945年5月15日鹿特丹遭轰炸后荷兰投降，他加入抵抗组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竭力躲避德军追捕。虽曾被捕，但幸运逃脱后最终抵达英国。流亡荷兰政府任命他为陆军心理部门主管。1946年移居纽约后，他开设私人诊所，后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精神病学学院。

他对个体与群体心理影响机制的研究兴趣可追溯至战前时期。其思想形成于荷兰医学会战争预防委员会的工作背景下。该委员会创立于1931年，其理念认为

¹ 该评介为译者后期添加，目的帮助读者了解该书内容。书评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古典学与考古学系2018年1月26日一篇博客文章。若读者对原文感兴趣，可以电邮至 taiyizhenren2025@gmail.com

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治疗战争受害者，更在于从源头上预防战争爆发。既然战争预防是“其使命的逻辑延伸”，医学界就应主动承担起“启迪人类认识战争问题的心理层面”的责任。显然，精神病学家尤其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梅尔洛正是响应号召的医生之一，他主动向读者阐释战争心理学，撰写了关于领导力心理与反犹主义心理的论文。1939年，他发表了第三篇相关论文《战争与群体心理学》，该文收录于委员会出版的《战争医学见解》文集中。

梅尔洛对该手册的贡献较为有限。他强调研究社会心理因素对理解战争根源至关重要，但承认当时对此类因素的认知尚浅。在梅尔洛的分析中，群体心理学将关于群体易受暗示性的社会心理理论，与将人类视为具有被压抑倾向的心理动力学观点相结合。此外，梅尔洛认同委员会研究的核心理念：战争是一种集体性精神疾病。他宣称“战争精神错乱或战争疯狂的表述毫不夸张”。为探究这种“国际性疯狂”的根源，梅尔洛呼吁社会心理学积累足够知识储备，从而具备提供治疗性建议的能力。

梅尔洛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无论是在被占领的荷兰还是伦敦——进一步推动了他对军事冲突与心理关系的思考。其战时随笔集结成册，出版为《全面战争与人类心灵》。“影响”问题仍是核心议题，尤其是被称为思想控制的恶性暗示形式。1951年他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发表文章时，为此创造了新术语：精神灭绝。

随着对人类心灵的理解不断深化，梅尔洛指出，我们逐渐意识到“同样的人类心灵在不良审讯者手中，竟能如黏土般被随意揉捏”。当这种心理干预成为暴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时，便可称为“精神灭绝”。纳粹曾以此将抵抗战士变成叛徒，共产主义者则用它摧垮了明德森蒂枢机主教。这些属于个体精神灭绝案例，但他认为还存在宣传、暗示与群体催眠构成的社会性精神灭绝——例如戈培尔正是此类领域的专家。个体与社会层面的精神灭绝皆难以抗拒。自催眠训练或许能提供帮助——他本人在遭德军审讯时就运用过此法。接受精神分析也能抵御精神灭绝，但如同自我催眠，这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并不现实。梅尔洛最终主张联合国应尽可能将精神灭绝行为定为非法，但眼下最可行的方案是为其命名并引发关注。

梅尔洛在脚注中指出，“在新兴威权国家中”，“洗脑”一词被用于指代促使民众效忠新政权的技术手段。梅尔洛未提及亨特。多年后，亨特在其自传中宣称自己具有优先权，理由是其文章发表于“1951年2月8日”，而亨特的著作“晚了一年”。

尽管如此，梅尔洛仍是最早提出洗脑概念的人之一，尽管他提出的术语“精神灭绝”并未真正流行起来。梅尔洛超越了亨特对洗脑的定义，明确将精神灭绝与巴

甫洛夫式条件反射联系起来。正如他在《精神灭绝之罪》中所阐述的：当受害者的抵抗被瓦解后，个人精神灭绝的第二阶段便是迫使其接受供词如同“动物被训练表演把戏般”。1950年代，巴甫洛夫理论成为洗脑论述的核心，象征着该过程机械化、重复性、非理性的非人本质，以及由此制造的机器人般的人类——正如梅尔洛所言“卑躬屈膝的机械工具”。1954年，他在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案中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时，再次强调了这种机械化效应。施瓦布尔是遭中国俘虏并“供认”实施细菌战的美国飞行员之一。梅尔洛辩称法庭不应追究施瓦布的行为责任：任何人——包括法庭成员——若遭受此类酷刑都可能被迫认罪。精神摧残能使人沦为“施虐者的机械模仿者”。

梅尔洛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坚持认为机械化既是洗脑的根源，也是其结果。他在反乌托邦巨著《精神之蹂躏》中指出，人类对机械与现代科技的迷恋正在催生一个机器人社会：他预言观众可能被牢牢粘在电视机前，丧失自主意志与个性。我们创造来为我们服务的机器，正威胁着成为我们的主人。梅尔洛进一步指出，极权主义本质上正是技术统治的体现——这种对生活与思想的机械化操控。俄罗斯早已沦陷，而“精神灭绝力量”同样正威胁着我们的社会。

梅尔洛似乎对电视怀有特殊厌恶。早在1954年，他就曾在《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发表的众多短评与论文中探讨过电视成瘾问题。他写道，电视不仅是“时间窃贼”，更会引发真实的成瘾与精神麻木——他近期治疗的三名青春期早期病例便印证了这一点。更糟的是，电视凭借其“催眠般的诱惑力”阻碍个体发展，因为“个人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隔离，需要内心对话与审慎思考，需要自我反思”。

梅尔洛对心理的看法——包括他自身心理——始终围绕着影响与个性的对立展开。人们虽受社会群体与社会环境的种种影响和教导所塑造，但多数人内心都存在着“内在的舵手”，会为自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筛选并重塑这些素材。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我既是栖居于我体内的众生，亦是那个把握、理解、创造的个体，利用所有朋友成长为成熟的统一体。”梅尔洛描绘了一个技术社会，其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平衡已被打破，人们丧失了控制或抵抗影响的力量。在这个反乌托邦世界里，影响已然失控。机械的统治削弱了自觉的理性与个体性，使我们深陷由自身无意识恐惧与欲望驱动的影响游戏。每个人既是潜在的操纵者，也是无意识的自愿受害者。社会互动已沦为精神胁迫。控制无处不在，却无人真正掌控。

唯有个体性方能让我们挣脱这张影响之网。我们必须培养孩子独立、创造与批判的精神，必须追求智慧对话而非盲目消费，必须挑战自我以坚固意志，更要学会反思社会进程并觉察其内在逻辑。

《精神之蹂躏》作为对思想控制议题的深刻而令人忧虑的贡献，广受读者推崇，

确立了梅尔洛在此领域的权威地位。评论者指出其论述有时缺乏证据支撑。心理学家埃德加·谢因评价该书为“生动鲜活、洞见频现，却鲜少严谨论证的论述”。社会学家亚瑟·菲尔德盛赞其为思想控制领域“虽令人震惊却极具价值的近期案例描述”，但补充指出其理论框架“文献依据薄弱”。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梅尔洛的写作风格——他自由调用渊博学识、精神科医师的专业经验及亲身经历的极权统治，却鲜少考证文献或提供证据。他仅凭医学权威便足以支撑论述。

在1970年代初撰写的自传中，梅尔洛用最多篇幅记述了战争期间及战后的经历，但结尾处却插入了其1951年关于“精神灭绝”的论文译本。他补充道，文中关于精神灭绝危险性的警示在当下仍与1950年代同样紧迫，并遗憾公众关注点在1960年代已转向其他议题。

事实上，时至今日，梅尔洛的著作仍被某些反对各种思想控制形式的斗士热切阅读。进步出版社的“阴谋论现实主义者”称其思想“对于捍卫个人思想自由免受企业与权力结构无休止的攻势至关重要”，而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则视他为志同道合者。他曾被邀请为“巴拉克·H·奥巴马政权”的运作手法提供所谓“洞见”；亦有观点认为，若所有对抗山达基教的人士都能研读梅尔洛的著作，“这场信息战中，他们必将取得更大胜利，而我们为真理牺牲的优秀战士也将大幅减少”。我不确定梅尔洛是否会支持所有这些事业，他肯定会担忧他们对互联网技术的狂热运用，但无论谁在对抗邪恶势力的操纵，都能在《精神之蹂躏》中找到启迪与佐证。

译者序言

极权主义进行全球征服与全面支配的企图，乃是从所有绝路中产生的一条毁灭性道路。它的胜利恐怕会同时伴随著人性的毁灭；一旦它进行统治，就会开始摧毁人的本质。况且要想背向本世纪的这些毁灭性力量，对其视若无睹，终究也是无济于事。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序言

一

多年前本人在香港读博期间开始涉猎极权主义研究。在中国教育体系深耕二十多载之后，也终于明白了教育的政治含义，即作为国家或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传输渠道而存在，不是个体为了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存在。读书期间，图书馆的藏书极大丰富的我的视野，随后又拜读了波普尔、阿伦特、德斯梅特等极权主义思想著作。虽然这种不务正业的研究不能增加学术名誉，也不能改善经济状况。但让我更好地理解一直困惑我多年的两个问题：我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时代？我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环境中？虽然目前还未找最终答案，且仍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但是这种精神上的追寻是有价值的，它至少把我从内心的绝望和病态的社会中拯救出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极权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却很少人关注。2013年习近平掌权后的中国大陆是否处于极权主义时代，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而且敏感的话题，任何学术性讨论或者普通大众茶余饭后谈论此话题都有“掉脑袋”的风险，所以大多数国内学者和民众都避而不谈。然而，严密的铁幕背后还是闪现了一丝阳光。哈佛大学许成钢教授坦言，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存在着极权主义的制度性痼疾，有如癌细胞一般吞噬着这个国家健康的躯体。中国人民大学陈伟教授在一本书序言中隐晦指出：“活生生的极权主义政体在地球的一隅支配着那里国民的生活；意识形态、秘密警察、集中营，这些事情尚未完全成为历史，随着新型监控技术的发展及广泛运用…，政治力量对个人进行全面支配的威胁依然存在”。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臭名昭著的防火墙、新疆集中营、习近平修宪连任、互联网审查制度、大数据监控、2020年新冠疫情极端管控措施等等。从两位学者的真知灼见中，我们悲观地看到极权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关系如此紧密，它如魔鬼一直躲在现实阴暗的角落中，时刻等待当权者对它的召唤。

如今，生活在极权主义下的中国民众，多数普通民众已经被剥夺了法律人格、道德人格以及自我个性，他们被驱赶到精神上孤立无援的荒野。对于他们而言，公民权利与自由完全是一片禁区，在日复一日的政治运动中，已经沦为官方意识形态填满的行尸走肉而已。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行尸走肉，少数有良知、有反抗精神、有反思能力的民众依然顽强存活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对于这些人，他们需要一本生存手册，需要在良心的指引下继续生活，或许他们没有任何暴力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在这种被动生存状态下，“不作恶”也许是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这样的一本“生存手册”，也许是本书翻译的最有价值的目标之一，即为这些人提供一些行动和思想指南，帮助他们认识中共极权主义的真正面目，保存自身人性中最后一丝宝贵的亮光，并让这点亮光照亮自己和他人，这也是他们的自我救赎吧！

但该书却一直未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其主要原因也是该书揭露了中共在朝鲜战场上对战俘使用洗脑术，在上世纪 50 年代泰国贩卖鸦片毒害当地民众，这些论述无情撕掉中共意识形态运动的遮羞布。该书出版半个世纪，受到中共言论审查机制的限制，始终没有机会与中文读者见面。这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对思想控制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了。本人决心以该译本出版为契机，打破来自中共极权主义的恶毒诅咒，让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能深入到每个中文读者的内心，唤醒他们沉睡的良知、思考能力、反抗精神和历史责任。

二

该书从精神病学研究视角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极权主义这种政府形式对个体的伤害到底有多深？身体上的伤害尚且可以肉眼观察到，但是精神上的伤害却无法用具体的标尺来衡量。这是一个令人忽视的问题，但又事关每个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无论身处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有可能遭受极权主义风暴的肆虐。玛格丽特·卡诺凡警告我们：“极权主义可能卷土重来，政治巨变、社会游民、失业与人口过剩，都会引诱当权者采用极权主义方案去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极权主义的威胁？试想有一天你因为在网上发表违规言论被警方传唤，被警方强行拘押，被当地国安部门进行居住监视，被地方政府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你面对来自极权主义政府部门的骚扰、威胁、恐吓、拷打或拘禁，你如何建构心理防御机制来避免被洗脑？这是每个生活在极权主义制度下普通大众要面对的问题。

该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个体屈服技巧，作者以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朝鲜战场战俘洗脑、枢机主教监禁经历等事件阐明对个体的思想入侵和精神灭绝从古到今以及当今社会各种政治环境都普遍存在。这些思想控制手段与古老巫术、

宗教仪式、集体狂欢、现代精神类疾病治疗技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习理论有密切关系。最后作者总结战争或者严苛政治环境下极权主义者对个体实施洗脑和精神灭绝的四个阶段。第二部分谈到了思想入侵和胁迫的大规模应用于群体的技术，这主要指极权主义当权者运用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手段对其民众进行大规模洗脑，这些技巧包括暴力恐吓、思想灌输、文化渗透、人格机械化、人格标签化、领袖崇拜、阴谋论、间谍罪、封闭社会环境（社会子宫）建构、话语重新释义等，当权者通过广告、宣传、电影、艺术、文学作品等渠道对其民众进行全方位的长期渗透。这些技巧的运用在纳粹德国统治期、前苏联斯大林时代、中国延安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时期都有强有力的史料来佐证。

第三部分作者把焦点转移到精神胁迫的隐秘手段上，这些技巧包括极权当权者对民众进行人格重塑、父位角色强化、群体精神渲染、集体幻觉、先进技术运用、行政管理技术应用、对国家的忠诚和背叛等，这些技巧暴力性较弱、隐蔽性较强，当权者利用现有的道德、文化、教育、行政制度的“合法外衣”对普通大众进行洗脑。该章以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些细微的心理手段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精神世界。这些技巧与前两章一样，最终目的都是让普通大众放弃人格与精神独立，培养他们对极权主义制度的永久依赖。第四部分则是全书的重点，面对极权主义的洗脑和精神胁迫，建构个体心理防御机制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这些防御手段包括反洗脑精神训练、精神抗压训练、批判道德和纪律教育、鼓励人格独立和思考独立的精神等。作者强调对抗极权主义之“道”在于人格之成熟、精神之独立与思想之自由。而融入自由民主生活、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则是其“术”。

该书可视为洗脑、精神灭绝、精神胁迫技术的“厚黑学大全”。但作者并非站在极权主义当权者的罪恶立场，而是站在精神专家的立场告诉普通人如何辨别、分析和抵抗这些思想入侵技术，维护精神、思想和人格的独立。该书运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谴责了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卑鄙肮脏龌龊的精神胁迫手段。但在极权主义制度下，没有绝对的受害者，极权领袖和群众都是洗脑制度的共谋者！反抗极权主义的精神灭绝乃是时代赋予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绝不是旁观者——要么成为极权主义制度精神灭绝的参与者与受害者，要么成为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捍卫者。如果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成为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

三

本书翻译主要由机器翻译和本人校对两部分构成。原稿采用格罗斯特与邓拉普出版社 1956 年提供的原版影印手稿。机器译本由某人工智能公司提供，机器译本生成后，由本人对全书内容进行重新校订，涉及文字排版、梳理机器翻译表达模

糊、不准确和有理解歧义的地方，并撰写该书译者序言，最后形成人工译本。鉴于参考文献阅读价值不大，保留原英文版，方便感兴趣读者查阅相关文献。

校对机器译稿的过程繁琐而艰辛，最大的困难是对比原书手稿反复润色打磨，力求做到既符合原书作者意图，又要兼顾中文读者的思维阅读习惯。如机器翻译将原书书名翻译为“思想的强奸”，而本人翻译为“精神之蹂躏”。思想通常指认知过程及其成果，涉及理解、分析、判断等认知过程。而精神则是一个更宏大的整体性概念，除了包括思想，还包括情感、意志、生命等永恒主题。该书所揭示极权主义当权者如何利用各种思想控制手段，企图实现对其民众实施精神世界的完全控制，以“精神”为主题更能引起读者对其控制技术的广泛危害产生重视。“强奸”原指违背女性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暴力行为。作者借用这个词表达精神胁迫过程过于暴力并违背他人意愿。而“蹂躏”一词同样表达暴力欺压、摧残和侮辱的意思，比“强奸”涉及更多种类的暴力胁迫，同时还可以包括精神或肉体上的折磨。显然，“蹂躏”更适合该书精神层面的主旨。

鉴于当前中共残酷思想镇压和言论迫害，本人采用太乙真人（假名）发表译稿，这并非规避译者责任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校对翻译过程，本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弃了个人爱好和家人共度好时光的机会，力求提供一份高质量且可读性很强的译作给读者。然而，本书翻译的初衷并非单纯的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揭开极权主义的真正面目，帮助普通大众学会用精神病学角度去分辨极权主义的危害，从而避免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牺牲品。但本人同时承认，该译稿不可能是完美的，同样会存在各种表达上的问题。若读者能诚恳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本人将感激不尽！

考虑到国际版权法律相关规定，本人声明：该译稿版权归某人工智能公司和本人共同拥有，本译稿不用于商业目的，仅用于教育和学术交流，未经本人同意对该译本进行改动或出版均属侵权行为。尽管如此，本人期待有朝一日该书中译本（不管是本人译本还是他人译本）能在中国正式发售，这将见证中共极权主义的崩溃，中国民众迎来民主自由新天地的那一天。

太乙真人 2025 年 12 月于美国

第一部分

个人屈服技巧

本书第一部分致力于探讨各种使人类成为温顺的顺从者的技术手段，重点关注实验室中诞生的某些理念以及促进洗脑的药物技术。最后一章则深入剖析了精神屈服背后微妙的心理机制。

第一章

你也会认罪的

我们这个世界正发生着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如今，一个人不再仅因实际犯下的罪行而受罚。现在他可能被迫承认法官凭空捏造的罪行，而法官则利用这份供词达到政治目的。我们将那些居高临下审判者斥为邪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理解迫使虚假认罪的动因；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心灵的脆弱与易受伤害之处。

被迫认罪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弗兰克·H·施瓦布尔上校被中国共产主义者俘虏。经历了数月严酷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之后，他签署了一份记录详实的“供词”，承认美国对敌实施细菌战。这份供词不仅点名道姓，更列举了具体行动任务，详细描述了会议内容与战略部署。这份文件成为极权主义者手中极具价值的宣传工具。他们向全球电报通告：“美利坚合众国违反国际法，向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投掷携带致病细菌的炸弹。”

施瓦布尔上校被遣返后，发表了一份宣誓声明，否认其供词并描述了漫长囚禁岁月。随后他被移交军事法庭审讯。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作证道：“我始终不相信第一海军航空联队曾实施过细菌战。我确信我们没有，但其余部分对我而言真实存在——那些会议、那些飞机，以及它们执行任务的方式。”

“那些话出自我的笔，”上校继续说道，“但思想源于他人。最难解释的正是：一个人如何能坐下来书写明知虚假的内容，却仍能感知它、感受它，使其显得真实。”

美国著名医师兼政府代表查尔斯·W·梅奥博士在联合国官方声明中如此阐

释洗脑技术：“…所施加的酷刑…尽管其中包含许多残酷的肉体伤害，却不同于中世纪的伸展刑架和拇指钳等酷刑。它们更为隐蔽、更具持久性，其效果旨在造成更可怕的后果。其设计旨在瓦解聪慧受害者的精神，扭曲其价值认知，直至当事人不仅会脱口承认‘是我干的！’，更会成为自我人格彻底崩解与精心编织谎言的看似自愿的帮凶。”这些手段旨在瓦解聪慧受害者的精神，扭曲其价值观，直至其不仅会喊出‘我干的！’，更会成为看似自愿的帮凶——彻底摧毁其人格完整性，编织出精心设计的谎言。”

施瓦布尔案不过是众多案例之一，无助的囚徒被迫编织弥天大谎。若要作为自由人存续，我们必须正视这种政治驱动的精神胁迫问题，及其所有衍生影响。

自心理学家首次意识到人类思想极易沦为独裁权力的牺牲品，至今已逾二十载。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被焚毁殆尽。纳粹逮捕了荷兰人马里努斯·范德卢贝，并指控其犯下此罪。荷兰精神病学家早已知晓范德卢贝精神不稳定，他曾在荷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当他出庭受审时，其精神脆弱与失衡状态昭然若揭。审判消息所到之处，人们不禁质疑：“这个愚蠢的小家伙，竟敢自诩为甘愿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英雄？”

在法庭审理期间，范德卢贝表现得支吾其词、呆滞无神且漠不关心。然而荷兰精神病学家的报告却描述他是个开朗、机敏却情绪不稳的人，一个情绪瞬息万变、喜欢四处游荡、满脑子充斥着改变世界各种幻想的人。

审判进行到第四十二天时，范德卢贝的行为发生了剧变。他原先的冷漠消失了，显然他此前对庭审全程都了如指掌。他批评审判进程拖沓，请求接受惩罚——无论是监禁还是死刑。他谈及自己“内心的声音”，坚称能控制情绪波动，随后又再度陷入麻木状态。如今我们已将这些症状归纳为一种可称为“供述综合征”的行为模式组合。1933年时精神病学界尚不了解此类行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当今已极为常见，常出现在遭受极端精神胁迫的案例中。

范德卢贝随后被定罪并处决。当审判结束时，世界才逐渐意识到他不过是个替罪羊。纳粹分子自己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并策划了这起罪案和审判，以便他们能够接管德国。后来我们更发现范德卢贝是某种极其狡诈的医学知识与心理技巧滥用的牺牲品——他被改造为顺从的、被动的、温顺的行尸走肉，在多数庭审环节仅能以“是”或“否”回应审讯者。他几度险些挣脱强加的角色框架。即便当时已有传言称此人被药物控制，我们却始终无法证实此事。

1936至1938年间，世界日益意识到政治领域中系统化精神胁迫的切实威胁。这正是令人难忘的莫斯科大清洗审判时期。人们几乎无法相信，那些为革命事业奉献毕生的老布尔什维克，竟会突然沦为卑劣的叛徒。当被告们接连认罪忏悔时，世

人普遍认为这不过是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旨在向非共产主义世界进行宣传。然而更深重的悲剧正在上演。受审者曾是鲜活的人，如今却被系统性地改造为傀儡。操纵者掌控着旋律，操控着他们的举动。当消息不断传来，展示那些刚毅的革命者如何被塑造成温顺的自我控诉者时，全世界对苏联正在建设的自由社会最后残存的信念开始崩塌。

近年来，承认未犯之罪的忏悔场面日益常见。这份名单涵盖从共产主义者到非共产主义者乃至反共人士，其中既有捷克布尔什维克鲁道夫·斯兰斯基，也有匈牙利枢机主教约瑟夫·明德森蒂——两人可谓天差地别。

精神胁迫与敌占区

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在纳粹占领国的人们，我们都深切体会到人们如何被迫作出虚假供词，如何背叛所爱之人。我本人出生于荷兰，直至纳粹占领迫使我逃离才离开故土。占领初期，当我们首次听闻目击者描述纳粹审讯抵抗运动成员的惨状时，全城陷入恐慌与震惊。

盖世太保的首要目的，是通过酷刑逼迫囚犯出卖同志，并举报新的受害者以供进一步折磨。褐衫党人只顾索要名单，变本加厉地索要更多名单，根本不关心这些信息是否是在恐怖压力下虚构的。我清楚记得一次抵抗组织小规模会议，大家正讨论日益加剧的恐惧与不安。在场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被盖世太保点名抓捕。我们能否承受纳粹的折磨？抑或终将沦为告密者？这个问题在所有被占领国家的反纳粹人士中不断被提出。

在被占领的第二年，我们意识到彼此保持联系并非明智之举。超过两次联络便存在风险。我们试图寻找医疗和精神层面的预防措施，以增强自身抵抗纳粹酷刑的承受力。事实上，我本人曾进行过实验，试图验证麻醉剂能否增强我们对疼痛的耐受性。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麻醉剂虽能降低痛觉敏感度，但其麻痹作用反而使人更易受精神压力摧残。当时我们已与纳粹同知：摧毁人的并非直接肉体痛苦，而是持续的羞辱与精神折磨。我曾接诊过一名经历此类审讯的患者，他始终保持沉默。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最终纳粹放弃了审讯。但这场恐怖经历令他终生无法恢复。即使回到家中，他仍几乎不发一语，只是苦涩而愤懑地坐着——数周后便离世了。致命伤并非肉体创伤，而是恐惧与受创自尊的双重折磨。

我们多次讨论如何加强被俘地下工作者的抵抗力，或阻止他们最终背叛自己。

是否该给部分同志配备自杀胶囊？这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吗啡之类的麻醉剂只能暂时麻痹疼痛；况且敌人必定会搜查并没收这些胶囊。

我们曾听说德国人试图给飞行员服用可卡因和安非他命以对抗战斗疲劳，但这两种药物都不可靠。它们或许能通过降低痛觉敏感度来唤醒身体机能，却同时麻痹了思维。实验表明，若地下组织的俘虏服用此类药物，身体或许能抵御酷刑的折磨，但意识模糊的头脑反而会使他们更容易沦为纳粹的傀儡。

我们还尝试了系统性的心理放松和自我催眠练习（类似于瑜伽练习），以使身体对饥饿和疼痛的敏感度降低。当个体专注于培养对呼吸等自动生理功能的觉知时，大脑皮层的警觉性会降低，疼痛感知随之减弱。这种疼痛麻木状态有时可通过自我催眠训练达成，但我们团队中能进入这种麻醉状态者寥寥无几。

最终我们演变出这个简单的心理伎俩：当你再也无法智胜敌人或拒绝开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喋喋不休。其要义在于：保持阴沉神情，装作愚蠢；扮演懦夫，供出超出实情的内容。后来我们证实此法屡试不爽：那些心不在焉的傻瓜比沉默的英雄更令敌人困惑，后者纵使意志坚韧，终究还是被耗尽了体力。

一名警察警告我，我的名字在审讯中被提及，我不得不逃离荷兰。我曾两次被纳粹就琐事审问，未受肉体折磨。后来他们在比利时追上我——很可能是遭人出卖——我被迫接受长时间的初步审讯，期间遭到殴打，所幸伤势不重。审讯开始时气氛还算融洽。负责的纳粹军官显然以为能用友好手段从我口中套取情报。事实上，我们甚至就审讯方法展开讨论（因我身为精神科医生）。但当发现温和手段毫无成效时，军官情绪骤变，展现出我们预料中该类人惯有的虐待狂特质。所幸我当夜便逃离比利时，躲过了更系统、更残酷的审讯。

历经法国与西班牙的冒险旅程抵达伦敦总部后，我成为驻英荷兰部队心理部门的负责人。凭借这一官方身份，我得以收集数百万纳粹恐怖与酷刑受害者的遭遇资料。后来我审讯并治疗了数名从拘留营和集中营逃脱的幸存者。这些人已成为苦难的活体专家。地狱般环境下人类反应的千姿百态向我们揭示了残酷真相：多数人的精神终将崩溃，人类行为可沦为动物本能。施虐者与受害者终将丧失所有尊严。

我国政府赋予我调查叛国集团的权力，我也曾审讯过被囚禁的纳粹分子。当我回顾所有这些战争经历时，关于勇气与懦弱、叛国、士气和精神力量的种种困惑，我必须承认，直到研究了对纳粹头目的纽伦堡审判后，我的眼界才真正开阔。这些审判揭示了纳粹系统性胁迫手段的真相。几乎同时，我们也开始更深入地了解苏联及其卫星国所采用的扭曲心理策略。

巫术与酷刑

现代世界用于摧毁人的意志、榨取供词以达到政治宣传目的的具体手段，虽属新兴且高度精炼，但强迫认罪本身并非新鲜事。自古以来，暴君与独裁者便需要这些“自愿”供词来为其恶行开脱。人类心灵可被操控、驯服并摧毁至奴性屈从的认知，远比现代独裁政权强行灌输的理念更为古老。原始萨满祭司通过令人敬畏的仪式，将受害者置于恐惧催眠状态，使其对任何暗示都俯首帖耳。当巫医对土著施加厄运咒语时，受害者常因恐惧而陷入深度催眠，最终只能坐着接受命运，静待死亡降临（马林诺夫斯基）。

纵观历史，人类始终直觉地意识到心灵可被操控。为此，人们精心设计出种种策略：狂喜仪式、骇人面具、震耳声响、诡异咒语——皆用于迫使民众接受领袖的信条。即便普通人起初抗拒残暴的萨满或巫医，催眠般的仪式终将瓦解其意志。

更残酷的刑法也并非新鲜事物。当我们研读宗教裁判所的旧案卷宗，或是欧洲与美洲众多巫术审判的记录时，便能窥见诸多酷刑手段。浮水测试便是其中一例：被控施行巫术者会被双脚双臂捆绑后投入河中。若尸体浮于水面，受害者即刻会被拖出水面，押往火刑柱处以绞刑。浮起本身便是罪证确凿的明证。反之，若被告遵从万有引力沉入河底，溺亡的尸体便会被郑重打捞上岸宣告无罪。受害者根本别无选择！

人类在发明折磨同类的手段方面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他们怀着精致的狂热，设计出能让人体最脆弱部位承受极致痛苦的技法。刑架与拇指钳是古老的刑具，不仅被原始法官使用，更被所谓文明的独裁者与暴君所采用。

为更深入理解现代精神折磨，我们必须时刻铭记：自古以来，肉体痛苦与刑具折磨绝非仅为施加痛苦。中世纪的法官与刽子手虽未必能用精妙辞藻阐述，却深谙受害者与社群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精神纽带与心理互动。许多痛苦的酷刑和绞刑必须作为公开示众的仪式进行。经历极致痛苦后，女巫不仅会供认与恶魔进行骇人听闻的性淫乱，更会逐渐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最终带着对罪行的确信死去。整个审讯与酷刑的仪式最终迫使她屈服于审判者与控告者的幻想。至终她甚至渴求死亡——渴望被火刑柱焚烧，以驱逐体内恶魔并赎清罪孽。

这些法官和刽子手同样意识到，他们的巫术审判不仅旨在折磨女巫，更要折磨旁观者——尽管后者无意地将自己与受害者认同。这自然也是火刑与绞刑在公众场合举行，并演变为盛大游行场面的原因之一。恐怖由此蔓延开来，许多法官委婉地称此类酷刑具有“预防性作用”。从心理角度看，整个机制本质上是对人类同

情心及普遍认同倾向的勒索。

早在 1563 年，勇敢的荷兰医师约翰内斯·维尔便出版了其代表作《论恶魔的幻术》（论恶魔幻象），书中指出年长女性集体自愿的自我指控——这种行为使她们遭受宗教裁判所的酷刑乃至死亡——本身就是恶魔的灵感之作，是恶魔的诡计，其目的不仅要诛杀无辜女性，更要将鲁莽的审判者一同推入深渊。维尔是首位提出后来成为精神病学概念的“妄想”与“精神盲目”的医学家。其著作所及之地，女巫迫害便告终止——在某些国家，这比整个文明世界最终终结女巫迫害早了一百五十年有余。他的著作与洞见成为对抗女巫妄想与肉体酷刑的主要武器（巴施维茨）。维尔当时就意识到，女巫不过是审判者内心混乱与绝望的替罪羊，更是整个时代精神病态的映射。

枷锁的提炼

所有知识皆可为善或为恶所用，心理学亦不例外。心理学为人类提供了新的精神折磨与入侵手段。若要成功对抗这些手段，我们必须日益明晰其方法与技法。它们往往比刑具更令人痛苦，更具精神麻痹性。坚强的人格能承受肉体折磨，这种痛苦反而会激发顽强的抵抗。无论受害者体质如何，肉体折磨最终会导致保护性昏迷。但要抵御导致精神崩溃的心理折磨，则需要更强大的意志力。

我们所称的洗脑（源自中文“洗脑”一词）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仪式，通过系统灌输、思想转化和自我控诉，将非共产主义者转变为党的顺从追随者（亨特）。“精神灭绝”是我创造的词汇，源自拉丁语“mens”（心灵）与“caedere”（杀戮）。（此处我沿用联合国创造“种族灭绝”一词的词源学原理，意指对种族群体的系统性毁灭。）这两个词都指向酷刑架的同样病态改良——将其包装成看似更可接受的形式。但其实际危害性加剧千倍，对审讯者而言也高效千倍。

精神灭绝是针对人类思想与灵魂的古老罪行，却被重新系统化。这是通过有组织的心理干预与司法颠倒，使专制者得以将投机思想烙印在那些被他利用并摧毁的对象心中。受惊吓的受害者最终被迫完全顺从暴君的意愿。在法庭程序中，受害者机械地复述审讯者事先准备好的内心记录，公众舆论因此被麻痹并放松警惕。

“真正的叛徒已受惩罚”——人们如此认为。“此人已认罪！”其供词可用于宣传攻势、冷战博弈、播撒恐惧、诬陷敌方，或对他施加持续的精神压迫。

这一手段的重要效果，在于它在每个观察者——无论友敌——心中制造的巨大混乱。最终无人知晓如何辨别真伪。极权统治者要摧毁人的意志，首先需要制造

普遍的精神混乱与语言混乱，因为这两者既能瘫痪反对派，又能瓦解敌人的士气——除非对手洞悉独裁者的真实意图。自此，他便能着手构建顺从体系。

在明德森蒂案和施瓦布尔案中，我们均有记录显示，所谓“精神灭绝术”已被用于摧毁勇敢者的意志与精神。

让我们先看看明德申蒂枢机主教的案例，他被指控误导匈牙利人民并与美国敌人勾结。斯蒂芬·K·斯威夫特在其揭露明德申蒂枢机主教监禁经历的著作中，生动描述了对政治犯进行心理“改造”的三个典型阶段。第一阶段旨在逼供。受害者日夜遭受盘问轰炸，饮食供应不足且不规律。他几乎不得休息，被迫在审讯室里连续数小时接受轮番审问。饥肠辘辘、精疲力竭的囚徒在无遮挡的灯光下双眼模糊刺痛，俨然沦为受惊的野兽。

…当枢机主教站立了六十六小时[据斯威夫特记载]后，他闭上双眼保持沉默。连质问都未予否认。值班上校轻拍枢机主教的肩膀，询问为何不作回应。枢机主教答道：“结束这一切吧！杀了我！我已准备赴死！”对方告知他不会受到伤害，只需回答某些问题就能结束这一切。

…到周六上午时分，他已面目全非。他要求再喝一杯，这次却遭到了拒绝。他的双脚和双腿肿胀得异常严重，剧痛难忍，他多次跌倒在地。

受害者承受的外部恐怖之外，更要加上来自内心的恐怖。他被自己心智的不稳定所追逐，面对重复的问题却无法始终给出相同的答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被潜在的负罪感所纠缠——无论他曾经多么虔诚——这种感觉不断侵蚀着他对自身清白的理性认知。“洗脑者”的恐慌源于对所有概念的彻底混乱。他的评价体系与行为准则被瓦解，除却那些比他更强大者的指令性教条逻辑，再无客观事物可供信奉。敌人深谙人类生命的本质——在表象之下，内在矛盾构筑着生命根基。敌人利用此点击溃洗脑对象。审讯者的频繁更迭使连贯思维愈发难以维系。受害者刚适应一位审讯者，警觉焦点便需转向另一人。

然而，这种规范与概念的内在冲突，这种意识形态与信仰的内在矛盾，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病症的一部分！

作为社会性存在，枢机主教被良好人际关系与陪伴的需求所驱使。不断重申的罪责暗示迫使他走向忏悔。作为受苦个体，他内心深处渴求片刻独处与宁静，却反遭勒索。内外双重压力无情地将他推向签署迫害者拟定的供词。他为何还要继续抵抗？世间无人见证他的英雄气概。死后他无法证明自己的道德勇气与正直品格。精神灭绝的核心策略在于剥夺一切希望、期待与对未来的信念，摧毁维系心灵存续

的根基。受害者终将陷入彻底的孤绝。（注：这种通过无意识自我指控持续攻击人类良知与负罪感的手段，在弗朗茨·卡夫卡的《审判》中得到了精妙刻画。在这部小说中，受害者始终不知自己被控何罪，但内心的负罪感却将他推向定罪。卡夫卡预见了勒索供词的时代——这部作品创作于 1930 年代之前。西奥多·赖克在其著作《供述强迫与惩罚需求》中，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相同主题，参见第三章。）

若囚犯的意志过于顽强，便施以麻醉剂扰乱其思维：麦司卡林、大麻、吗啡、巴比妥类药物、酒精。若其身体在意志崩溃前先垮掉，则给予兴奋剂：苯丙胺、咖啡因、可拉明，这些药物皆能维持其意识直至供认。许多最终诱发精神依赖和强制性混乱的麻醉剂与兴奋剂，同时能引发记忆缺失——常导致对酷刑过程的彻底遗忘。这些刑讯手段虽达预期效果，但受害者却忘却了审讯期间的真实遭遇。从事治疗工作的临床医师使用安非他命衍生物时（该药物注入血液后可帮助患者回忆久远的经历），他们深谙其能带来安抚性遗忘的特性——患者在药物作用下接受审讯的时段会被彻底遗忘。

接下来，受害者被训练接受自己的供词，如同驯化动物表演把戏一般。虚假的供词被反复朗读、不断重复，直至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他被迫在记忆中一遍又一遍地重现那些虚构的罪行，那些虚假的细节最终使他确信了自己的罪行。在第一阶段，他被迫在他人面前屈服于精神控制。第二阶段，他已陷入自我催眠状态，开始确信那些捏造的罪行。据斯威夫特记载：“审讯中的问题开始涉及红衣主教‘供词’的细节。先向他宣读其本人供词，继而宣读其他被控同谋的囚犯供词，最后详述这些供词内容。红衣主教时而阴郁寡言，时而极度不安激动。但他始终主动回答所有问题，在被要求时会复述所有句子——一次、两次，甚至三次。”（拉西奥）。

在审讯与精神摧残的第三阶段——也是最终阶段，被告已被彻底驯化，甘愿背负强加的罪名，被训练成能对自身及他人作伪证的工具。他无需再通过自我催眠说服自己，只管复述“主人的声音”。他被精心准备赴审，彻底软化；变得悔恨交加，甘愿接受判决。在审讯者手中，他如同婴儿般被喂养，又如婴儿般被言语安抚。（关于精神摧残与洗脑不同心理阶段的更详尽考察，将在第四章末尾呈现。）

朝鲜的精神灭绝

现在让我们看看施瓦布尔案。其基本脉络与明德森蒂事件相似，仅细节有所不同。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他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时被敌军俘虏。这位上校本以为能受到国际法及各国公认的军官战俘条例保护。然而他渐渐意识到，自己遭

受的待遇与预期截然不同——敌方视其非为战俘，而是可供宣传利用的牺牲品。

他遭受着缓慢却持续的压力，这些手段旨在摧毁他的精神。羞辱、粗暴的非人待遇、贬损、恐吓、饥饿、极寒折磨——所有这些都用来瓦解他的意志，使他屈服。他们需要从他口中套取军事机密，并将他作为宣传机器的工具。他感到彻底的孤立无援。肮脏与虫豸环伺。他被迫长时间站立，承受审讯者抛来的连珠质问。关节炎引发的背痛与腹泻折磨着他，洗漱剃须皆被禁止。未来充满未知，而这种折磨已持续数周。随后，系统化重复的审讯与压迫愈演愈烈。他再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每日轮换的审讯小组不断指出他日益增多的错误，他彻底失去了睡眠能力。每日审讯者都告诉他时间充裕，他意识到至少在这点上他们说的是实话。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抵御那些诱人的提议。他们说，只要他卸下罪孽的担，就会得到更好的对待。审讯者虚伪地温和，却心怀叵测。他要让受害者在缓慢诱导的催眠中丧失意志，要一份详尽的供词——承认美军使用细菌战，承认俘虏本人参与了这种生化作战。这份书面供词将产生震撼世界的说服力，审讯者正为此精心布局。饥荒与瘟疫肆虐中国；这份供词将解释高发病率，并为民望低落的中国政府开脱。因此上校必须准备好系统性供述，在国际共产主义专家团面前完成。身心俱疲，共产党的“真理”日日烙印在他脑海。

上校实际上已被催眠；此刻他能为看守者复述出他们想要的供词片段。众所周知，被动记忆往往比清醒状态下学到的内容更能牢牢记住催眠状态下习得的事实。他甚至能将部分内容写下来。最终，所有碎片如同拼图般拼凑成完整有序的整体，构成一份实则由俘虏者预先拟定的文件。这份文件被交到上校手中，他甚至获准在签署前对措辞稍作修改。

至此，上校已彻底崩溃。他屈服了。现实感荡然无存；对敌人的认同已然完成。签署供词后的数周里，他始终处于抑郁状态。唯一的愿望便是沉睡，从这一切中获得解脱。

人常会竭力支撑到超越忍耐极限的时刻，只因他始终相信施虐者尚存基本道德，终将意识到罪行的滔天之重而放过自己，这不过是自欺。面对针对意志与精神的有组织攻击，唯一能强化防御的方式，是更透彻地看清敌人的意图并智取对方。当然，人可以发誓坚持到死，但即便是死亡的解脱也掌握在审讯者手中。人们会被逼至死亡边缘，随后又被刺激复苏，以便继续承受折磨。自杀企图早被预见并可被阻止。

依我之见，几乎无人能抗拒此等对待。一切取决于个体的自我意志强度与审讯者的穷尽手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忍耐极限，但临床证据表明，这个极限几乎总会被触及甚至突破。无人能预知自己受考验时会如何应对。美国官方关于洗脑的报告

承认：“几乎所有美军战俘都曾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作出过妥协，丧失了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数千人失去了生存意志”等等。英国报告则提供了关于其战俘遭受虐待的统计调查。据该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士兵吸收了足够的意识形态灌输，被归类为共产主义同情者。

该报告以更详尽的方式描述了敌军使用的某些虐待手段：

据这些人的讲述，如果囚犯接受共产主义理论，他的生活就会变得轻松些。但如果囚犯抵制共产主义理论，中国人就会视其为罪犯和反动分子，认为他们理应遭受任何残暴对待。施加于“反动分子”的酷刑包括：

让囚犯从凌晨4点30分到晚上11点保持立正姿势或双腿伸直坐姿，全程保持绝对安静，并在允许睡眠的短短几小时内不断将其唤醒。

将囚犯单独关押在约五英尺长、三英尺宽、两英尺高的箱形牢房中。格洛斯团一名士兵曾在其中度过六个月以上。

连续数日禁水禁食“以助自我反省”。

用绳索将囚犯悬吊于横梁：一端固定成绞索套住颈部，另一端捆绑脚踝。随后告知其若双膝弯曲或身体下坠，即视为自杀行为。

强迫囚犯跪在尖锐的岩石上，双臂伸直举起一块大石头悬于头顶。经历过这种折磨的人需要数日才能恢复行走能力。

某处营地里，北朝鲜狱卒将铅笔般细长的木棍或金属棒穿过牢门孔洞，逼迫囚犯用牙齿咬住内端。哨兵毫无预警地横向猛击外端，致使囚犯牙齿断裂或口腔两侧撕裂。有时金属棒会被猛力推入口腔后部或直抵咽喉。

囚犯们赤脚被押至冰封的鸭绿江，守卫将冷水浇在他们脚上，迫使他们双脚冻在冰面上长达数小时，以此“反思”所谓“罪行”。

众所周知，时间、恐惧与持续压力会催生一种精神毁灭性催眠。人格的自觉部分不再参与自动性供述。被洗脑者活在恍惚中，不断重复他人刻进他脑海的刻板印象。所幸另一事实同样为人所知：当受害者重返正常环境，恐慌与催眠的魔咒便会消散，他终将再度苏醒于现实。

施瓦布尔上校的遭遇正是如此。诚然，他承认了自己并未犯下的罪行，但当他重返熟悉的环境后，便立即推翻了供词。

在军事调查施瓦布尔案期间，我作为谋杀心理专家被传唤作证时，向法庭陈述了我的坚定信念：几乎任何遭受施瓦布尔上校所受待遇的人，都可能被迫写下并签署类似的供词。

“比如说，在座各位？”上校的律师问我，目光逐一扫过那些正审判这桩新近棘手案件的军官们。

而我凭良心可以坚定地回答：“在座各位。”

如今在技术上已能使人陷入精神奴役与屈从的状态。施瓦布尔案及其他战俘案例便是此类悲剧的例证，而我们对英雄主义边界的认知不足更令悲剧雪上加霜。我们才刚开始理解这些边界究竟为何物，以及极权主义者如何在政治与心理层面加以利用。我们早已识破捶胸顿足的忏悔与公开悔过是宣传伎俩；如今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极权主义者如何运用精神灭绝：蓄意、公开、毫无羞耻地将其作为官方政策手段，以巩固和维持权力——尽管他们给整个过程冠以不同解释：所谓认罪皆是真实叛国罪行的坦白。

然而，这种残酷的极权主义手段至少有一项优点。它显而易见且毫无掩饰，我们正学会对此保持警惕。但正如后文将揭示的，还存在更隐蔽的精神干预手段。这些手段可能与直接攻击同样危险，恰恰因为它们更隐蔽，因而更难察觉。我们往往完全意识不到它们的作用。它们以极其缓慢间接的方式影响心灵，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意识到它们对我们造成的改变。

如同极权主义的精神灭绝，某些不那么显眼的心理操控手段具有政治目的，另一些则不然。即便意图不同，它们可能产生相同的效果。

这些微妙的精神灭绝力量既作用于内心，也作用于外界。随着文明复杂性的增长，它们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大众传播手段将整个世界每日带入每个人的家中；宣传与推销技巧日益精进且系统化；面对持续不断的视觉与语言冲击，人们几乎无处可逃。日常生活压力驱使越来越多的人寻求逃避责任与成熟的捷径。诚然，抵御这些压力实属不易：对许多人而言，政治灵丹妙药的承诺极具诱惑；对另一些人来说，借酒精、毒品或人工制造的快感逃避现实的诱惑更是难以抗拒。

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不仅必须学会识别这种对精神完整性的隐秘攻击并予以抵御，还必须认识到：人类心灵中究竟存在着什么使他容易遭受这种攻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渴望逃避民主与成熟赋予他的责任？

第二章

巴甫洛夫的门徒化身驯兽师

在探究洗脑、虚假供述与沦为叛徒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之前，让我们先尝试站在极权统治者的立场审视问题。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如何描述囚犯的行为？他们究竟想要从施瓦贝尔和明德森蒂这样的人身上得到什么？

极权监狱看守从不提及催眠或暗示术，甚至否认逼供事实的存在。他们以更机械的方式看待人类行为与政权运作。要理解他们，我们必须更关注其对简化版巴甫洛夫理论的盲目崇拜。

垂涎三尺的狗

十九世纪后期，俄罗斯诺贝尔奖得主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用铃铛和狗进行了著名的实验。他知道唾液分泌与进食有关，如果狗感到饥饿，每次看到食物时都会流口水。巴甫洛夫利用这种有助于消化过程的先天反射机制，使实验动物对通常不会引发唾液分泌的刺激产生反应。每次喂食时他都会摇铃，而狗每次听到铃声都会流口水。经过多次食物—铃声联结刺激后，巴甫洛夫开始单独摇铃而不喂食。动物对铃声的反应与先前见到食物时完全相同——口水直流。由此科学家发现，狗能被诱导对任意信号产生非自愿性唾液分泌。它已被“条件化”，对铃声的反应如同铃声本身就是食物的气味与滋味。

通过这项及其他实验，巴甫洛夫提出了条件反射理论，该理论将学习与训练解释为条件反射的镶嵌式构建过程——每种条件反射都基于不同刺激间关联的建立。学习到的复合反应（亦称模式）越多，形成的条件反射就越多。在所有动物中，人类拥有最强的学习能力，因此也是最能适应此类复杂条件反射的动物。

巴甫洛夫的实验对研究动物和人类行为，以及神经症症状的形成具有重大价值。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关于人类心理机制的认知，如同其他知识一样，既可用于善，亦可用于恶。不幸的是，极权主义者将他们对心理运作机制的认知用于私利。他们以微妙复杂、有时甚至荒诞的方式应用部分巴甫洛夫研究成果，企图在受控的人类实验对象身上诱发精神与政治层面的条件反射及顺从反应。尽管纳粹在二战前就曾运用这些手段，但它们在苏联俄罗斯可谓达到了巅峰。通过持续的意识灌输、铃声刺激与食物强化，苏联人被塑造成条件反射机器，最终沦为精神奴隶，但其精髓却在苏联得以极致绽放。通过持续重复的洗脑、铃声与喂食，苏联人被塑造成条件反射机器，如同实验室中的狗般按预设模式反应。至少，这种简化的理念正盘踞在部分苏联领袖与科学家的脑海中（多布罗加耶夫）。

根据斯大林的一项指令，莫斯科设立了专门的“巴甫洛夫前线”（多布罗盖夫）以及“伊·彼·巴甫洛夫院士生理学理论问题科学委员会”（伦敦）。这些隶属科学院的机构致力于将巴甫洛夫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它们奉命强调巴甫洛夫发现中纯粹机械性的方面。此类理论视角可将人类所有情感简化为单纯的条件反射机械系统。这两个组织都是处理研究问题的控制机构，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探索如何像训练动物那样理论上对人类进行条件反射训练。由于顽固的极权主义理论家们将巴甫洛夫理论奉为动物和人类行为的福音，我们不得不与他们为证明观点而援引的事实、方法及理论解释进行斗争。

巴甫洛夫主义委员会试图达成的目标，是将心理学过度简化的产物。其政治任务在于对人的思想进行条件反射式塑造，使其认知局限于狭隘的极权主义世界观。这种将思维局限于列宁-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设想，之所以可能实现，基于两点原因：其一，通过反复灌输其简化版本；其二，彻底封锁对现实的其他解释途径。

这种观念基于一种天真的信念，即认为能够永久压制人类思维中的批判功能与验证机制。然而，在驯化与规训人们的过程中——期间必须不断纠正错误与偏差——批判意识却在无形中逐渐形成。诚然，与此同时，学生们也深刻体会到运用这种批判意识的危险性。他们深知异议的风险，但这种认知反而催生出更隐蔽、更精妙的批判意识。人类的反抗与异议终究无法被扼杀，只需自由之风拂过，便会再度苏醒。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这样的信念：通往真理的道路不止眼前所见。人或许能收窄研究与表达的道路，但对别处冒险新径的信念，永远盘踞在意识深处。

好奇的人类心灵永不满足于简单的事实陈述。一旦观察到一组数据，它便跃入理论领域提出解释，但一个人看待事实的方式，以及他如何将事实拼凑成理论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偏见与成见。容我率先坦承：自身的主观性始终影响着我。即便是语言本身也承载着隐含的暗示——以巴甫洛夫理论中至关重要

的“反射”一词为例，便是绝佳佐证。该词最早由十七世纪哲学家笛卡尔提出，其哲学体系将人体运作比作机械运作。例如在笛卡尔视角下，人体对特定痛觉刺激的自动反应（如手触火后迅速抽回），被类比为镜面反射光线的物理自动现象。神经系统，据笛卡尔所言，其反应恰似镜子映照。如此简化的行为解释，乃至描述行为的词汇本身，便立即否定了整个有机体参与该反应的可能性。然而人不仅是面镜子，更是一面会思考的镜子。旧有的机械论观点认为，行为仅与执行动作的身体部位相关，与有机体整体的有目的行为毫无关联。但人并非由独立运作的零件组成的机器，而是一个整体。其身心相互作用，既作用于外部世界，又受外部世界作用。这种手部缩回反应所体现的先天反射，实为适应性反应体系的组成部分，旨在协助个体作为整体适应环境变化。这些反应可被视为与生俱来的适应倾向所产生的结果。先天反射与后天反射的唯一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据称是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于整个物种中形成的，而后者则是在个体生命周期内，通过习得反应的逐步自动化而发展而来。若你剖析日常任何复杂行为（例如驾驶汽车），便会发现这些动作皆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然而在行为自动化之前，这些为达成特定目标而实施的动作，必须经过有意识的学习与控制。你并非天生就具备紧急刹车的本能反应。你必须通过学习掌握这项技能，而在学习驾驶的过程中，这种反应逐渐内化为自动行为。当你学会驾驶后，若看见孩童突然冲向车前，你便会不假思索地立即踩下刹车——这完全是反射动作。

人的条件反射

巴甫洛夫对心理机制的研究揭示：所有动物——包括人类——都是通过将生活中的征兆与身体反应相联结，学会适应现有局限的。当某种事物反复与某种反应同时出现时，大脑便会建立起关联，而身体则会对大脑形成的联结作出反应。因此，每次喂食时响起的铃声，便成为动物准备消化的信号，动物开始分泌唾液。

皇后学院的格雷戈里·拉兹兰博士近期实验表明，人类同样可能产生此类反应。拉兹兰博士邀请二十名大学生参加系列免费午餐会，期间播放音乐或展示图片。最终场午餐会结束后，这二十名学生与未受邀的另一组学生共同参与活动。如同午餐会环节，现场再次播放音乐并展示图片，所有学生被要求描述这些音乐和图片唤起的联想。音乐和图片普遍让第一组联想到与进食相关的事物，但第二组却没有这种联想。显然，午餐会参与者的大脑中形成了音乐/图片与进食之间的暂时性关联。

中国人采用更简易的方式实施群体洗脑。在持续数日教导囚犯书写各种荒诞

言论与政治谎言——置身于极度混乱与高压的环境中——之后，他们便被塑造成集体签署参与细菌战谎言的工具（维诺库尔）。

所有条件反射都是对压力产生的非自愿性暂时性调整，这种调整在刺激之间建立了表面关联，而这些刺激实际上可能毫无关联。因此，条件反射未必永久铭刻于个体记忆中，而是可能逐渐消退。若在犬类形成对铃声的条件反射后，持续摇铃却不提供食物，流涎反射便会消失。毫无疑问，拉兹兰博士的学生们听到音乐时，未必总会联想到食物。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描述条件反射：它是身心单元对特定刺激的特定反应。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联方式差异很大——它们可能因时间、地点、偶然性或共同目标而关联——因此可能在我们的身心态度中形成特殊的条件复合体。其中某些复合反应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具自主性，会像先天模式那样运作；另一些则具有灵活性且持续变化。例如对某些心身疾病的分析表明，内在情感态度如何能强化甚至改变条件反射。胃溃疡正是此类心身疾病的典型例证。当人体分泌过量盐酸时可能引发此病，盐酸对食物消化至关重要。胃溃疡患者常因强烈情绪反应——尤其是被压抑的敌意——导致盐酸分泌过剩。这种与生俱来的分泌反射机制，在饥饿时有助于消化，却逐渐演变为不利的条件反射——饥饿感与攻击性相互强化，导致胃酸分泌持续攀升。随着酸性液体持续过量分泌，患者最终罹患溃疡。胃部组织如同自我消耗。此种悖论在教育过程中亦屡见不鲜：母亲若对婴儿实施过于刻板的喂养时间表，可能将婴儿对饥饿的积极反应扭曲为顽固的拒食行为。

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条件反射贯穿我们整个生命历程，以最微妙或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发生。我们发现人格塑造可能通过千百种方式发生：幼年时期的饮食训练；他人言语的严厉或轻柔；环境中的匆忙氛围；家庭习惯的稳定或神经质父母的混乱；机器的噪音；朋友的拘谨；学校的纪律与社团的竞争。我们甚至受制于玩具的脆弱与居所的温馨，传统的不变与革命的动荡。艺术家与工程师，教师与友人，叔伯阿姨与仆役——他们都在塑造我们的行为。

隔离与条件反射中的其他因素

巴甫洛夫还作出另一项重要发现：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在干扰刺激最少的环境中，条件反射最易形成。每个动物驯养师都深谙此道——驯服野兽需要隔离环境与耐心的刺激重复。巴甫洛夫将发现归纳为普遍法则：学习速度与安静程度及隔离状态呈正相关。极权主义者正是遵循此则。他们深谙唯有隔绝囚徒才能最快完成政治

改造。在极权思想控制技法中，对个体的隔离同样施加于群体。这正是极权国家禁止平民自由出行、隔绝思想与政治污染的根源，也是单独监禁牢房与劳改营存在的缘由。

巴甫洛夫的另一项发现是：某些动物若每次做出正确反应时获得奖励（如爱抚、食物或抚摸），学习速度会更快；而另一些动物则在未学到行为时遭受痛苦刺激作为惩罚时，学习速度反而更快。用人类术语来说，后者可被描述为为规避惩罚而学习。动物的这些不同反应或许与早期父母的条件反射训练有关，并在人类身上找到对应现象。对某些人而言，奖励与奉承能激发学习动力，而痛苦则引发全部抵抗与反抗；对另一些人来说，失败后的惩罚与报复却能将其塑造成期望的模式。洗脑者要有效实施控制，必须先辨明受害者属于哪类。某些人比其他入更易受洗脑影响。这种反应部分源于先天特质，或与早期顺从性条件反射有关。

巴甫洛夫还区分了两种学习类型：较弱的非自愿学习类型，其习得反应一旦受到干扰便会立即消失；以及较强的学习类型，其训练效果能在各种变化条件下得以保留。事实上，巴甫洛夫描述的学习类型不止于此，但对我们而言，关键在于认识到某些人容易丧失条件反射学习，而另一些人——即所谓的“强型”——能持久保持。顺带一提，这再次印证了词语选择如何折射出我们的偏见。所谓“强”与“弱”的描述完全取决于实验者的目的。对极权主义者而言，“软弱”的战俘正是顽固拒绝接受新条件反射者。这种“软弱”实则可能是抵抗——源于早期对反极权原则的强烈忠诚条件反射。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条件反射与初始学习对人格的烙印有多深。僵化的教条行为根源于早期条件反射——而基于无知而非认知形成的顺从性同样可能由此而生。

巴甫洛夫还揭示了条件反射过程中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例如，当实验室引入新助手参与动物实验时，动物因对陌生人的情绪反应，其新习得的反射模式极易受到抑制。巴甫洛夫将此归因于动物探究性反射引发的干扰反应——这种反射促使它们对陌生人进行嗅探。当代心理学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动物与其训练师之间情感默契发生变化的结果。这种现代观点的启示可轻易延伸至人际关系领域。它揭示了某些人能瞬间建立强烈共鸣，使对方迅速放弃旧有习惯与生活方式以适应新要求。审讯者与调查者的个性有时会深刻影响受审者，致使后者迅速吐露秘密并完全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医生与患者之间情感共鸣的建立，是促成治愈的最关键因素。有些情况下默契能瞬间建立，有些则完全无法建立，多数时候它会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形成。心理学家测试一个人的“柔软度”和接受条件反射的意愿并不困难，事实上，巴甫洛夫学派已开发出简易问卷，可轻松判定个体的不稳定性及其对暗示和洗脑的适应性。

巴甫洛夫发现，无论条件反射曾多么强烈，都会因厌倦或信号过于微弱的反复刺激而受到抑制。当铃声重复过多或音调过低时，便无法再引发实验犬的唾液分泌。一种遗忘过程由此发生。这种条件反射的内在抑制及其丧失所导致的结果，便是睡眠。这种抑制会蔓延至整个大脑皮层活动，使机体陷入催眠状态。该抑制过程的解释是早期被广泛接受的睡眠理论之一。一个有趣的心理学问题在于：过度的官方条件反射是否会引发厌倦与抑制？这是否正是俄罗斯发起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应对民众生产力下降的原因？

我们可以将其与朝鲜战争中我方战俘的遭遇相比较。在每日重复的麻木例行问询中——每个字都可能成为巴甫洛夫式信号——他们的思维逐渐陷入抑制状态，警觉性持续降低。这使得他们暂时抛弃了原有的民主素养与训练。当他们忘却并压抑了民主方式后，审讯者便开始灌输极权主义哲学。唯有先摧毁旧有模式，才能建立新的条件反射。可想而知，单调重复的审讯会催生屈服欲，使人向敌人的挑衅言辞低头。关于洗脑训练中使用的负面刺激体系，我将在后文详述。

通过言语实现群体意识塑造

根据官方的巴甫洛夫心理学理论，人类语言同样属于条件反射活动。巴甫洛夫将刺激分为两类：直接作用于人类和动物的一级刺激，以及具有较弱且更复杂条件反射特性的二级刺激。在这个所谓的第二信号系统中，语言线索取代了原始的物理声音刺激。巴甫洛夫本人并未过多关注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尤其是在斯大林 1950 年发表关于语言学对群众灌输意义的论述（据多布罗加耶夫引述）之后，俄罗斯心理学家才开始在这个领域开展研究。斯大林在信中遵循恩格斯的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适应性工具。言语中的音调与声音具有条件反射特性，这一点可通过我们自身经验验证——无论是聆听或下达指令，抑或与宠物互动时皆可体会。即使词语的象征意义和语义内涵也可能具有条件反射的特性。例如“叛徒”一词，即便这种歧视性标签被不诚实地使用，仍会在听者心中引发直接的情感与反应。

通过俄罗斯著名心理学家多布罗盖夫撰写的关于言语反射的精深研究，我们得以相当透彻地洞悉言语模式与词语信号如何被用于通过宣传与灌输实现群体性条件反射。驯化者面临的核心问题其实相当简单：当政府执意对个人实施条件反射训练时，人类能否抵抗？个体如何守护精神独立性，抵御强势集体的侵蚀？是否可能彻底消弭内心抵抗的最后一丝痕迹？

巴甫洛夫早已阐明，人类与外部世界及同类的关联，主要受制于次级刺激——语言符号。人类学会用词语和既定的言语模式思考，这些模式逐渐塑造其对生活与世界的整体认知。正如多布罗盖夫所言：“语言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手段。”我们可将此论述改写为：人类与同类交流的需求干扰了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为语言本身——我们使用的言语工具——具有可变性而非客观性。多布罗盖夫进一步指出：“言语表现形式体现了人类大脑的条件反射功能。”简言之：掌控词语句式制定权者，掌控报刊广播者，即掌控思想者。

在巴甫洛夫式策略中，恐怖力量终将被新型传播手段所取代。现成的观点可通过报刊、广播等渠道日复一日地传播，反复灌输直至触及神经细胞，在大脑中植入固定思维模式。因此，按照巴甫洛夫理论家的观点，引导后的公众舆论是良好宣传技巧的产物，而民意调查则验证了巴甫洛夫式操纵对思维暂时成功的运作。然而，民意调查或许仅能统计人们假装的思想与信念——因为真实表达对他们而言过于危险。

这就是巴甫洛夫式装置的运作方式：机械地重复你的假设与建议，削弱表达异议与反对的机会。这是对大众进行政治调教的简单公式，也是某些公关机器的实际理想——他们由此企图操纵公众购买特定肥皂或投票支持特定政党。

公共关系中的巴甫洛夫策略，正使人们日益习惯自问：“别人怎么想？”由此催生普遍的集体错觉：人们被煽动去认同他人观点，舆论便如蘑菇般蔓延成群体偏见。

用精神分析术语来说，通过日常宣传噪音配合强力语言暗示，人们会日益被迫认同强大的噪音制造者。老大哥的声音在所有小兄弟心中回响。

据中立的印度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消息显示，中国领导人正利用这种公众声音调教来巩固政权。（《纽约时报》，1954年11月27日）全国范围内，收音机与扩音器持续播送官方“真理”。那些甜腻的声音占据人们心灵，文化暴政用扩音器牢牢禁锢他们的双耳，告知他们可为与不可为之事。这种麦克风的规整化早已被法国哲学家拉罗什富科预见，他在十八世纪曾言：“人如兔，捉耳而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同样展现出他们深谙语言的这种塑造力量。我在荷兰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策略运作：广播持续传播政治暗示与宣传，人们被迫收听，因为关掉收音机的举动本身就显得可疑。记得占领期间有天，我和几位朋友骑车出游。我们在一家咖啡馆歇脚，后来才发现那竟是纳粹的巢穴。自我们抵达起就持续播放的广播突然播报希特勒演讲，众人顿时肃立敬畏，必须接受元首的言语洗脑。我和朋友们也被迫站起，任那沙哑嗓音在耳畔噼啪作响，竭力抵抗这场对耳膜与心灵的冗长、枯燥、重复的攻击。

整个占领期间，纳粹印制了大量宣传品、大谎言和歪曲事实的材料。他们甚至将标语涂刷在房屋台阶和街道上。每周都有新编造的刻板印象向我们炫耀，企图让我们相信第三帝国的辉煌。但纳粹们并未掌握正确的巴甫洛夫策略。他们为满足自身辩论需求不断变换论点以显得更具逻辑性，反而激起了荷兰人民更强烈的抵抗。伦敦广播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抵抗——荷兰人通过电波听到了合法政府的清醒声音。倘若纳粹不曾如此喋喋不休地辩解辩护，倘若他们能彻底封锁所有书面、印刷及口头传播，漫长的无聊时光本会麻痹我们的民主意识，我们或许更容易被纳粹那些过度简化的口号所迷惑。

政治性条件反射

政治驯化不应与训练、说服甚至灌输相混淆。它超越了这些范畴。它是驯服，是掌控人类最简单与最复杂的神经模式，是争夺神经细胞的战争，是胁迫与强制转化。诱导者并非引导人客观面对现实，而是使其对口号、语言定式、标语、公式、符号产生条件反射。极权主义意义上的巴甫洛夫策略，即在精神崩溃者大脑中刻印预设的反射机制。极权者首先要从神经细胞获取所需反应，继而控制个体，最终掌控群众。该体系始于语言条件反射训练，通过将特定思维定式与负面或正面刺激（痛苦或奖励）结合实施。在朝鲜战俘营进行个体与集体洗脑时，常见的正负条件刺激便是饥饿与食物。士兵一旦顺从党派路线，食物配给便会改善：说“是”，我就给你一块糖果！

正如我们在施瓦布案中所见，负面刺激的全部谱系包括：身体压力、精神压力、疲惫、饥饿、枯燥的重复劳动，以及看似合乎逻辑的三段论所造成的混乱。许多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访谈中告诉我，他们在集中营中最令人不安的经历是丧失逻辑的感受，是被迫陷入的混乱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他们陷入了巴甫洛夫式的抑制状态，精神病学家称之为精神解体或人格解体。仿佛他们已遗忘所有既往反应模式，却尚未建立新的应对机制。但实质上，他们只是完全丧失了辨别能力。

巴甫洛夫理论转化为政治手段，作为统一思想的方式（纳粹称之为“同步化”），是极权国家的惯用伎俩。某些精神病学观点值得关注，因为我们发现巴甫洛夫式训练唯有在特定心理状态下才能奏效。要将人驯化成预设模式，必须使受害者丧失警觉意识与精神觉知。自由讨论与思想交流会阻碍条件反射形成。必须灌输恐怖感、恐惧感、绝望感、孤立感以及背水一战的绝境感。

朝鲜战俘营对美军战俘的处置正是遵循此模式：他们被迫聆听讲座并承受每日的语言轰炸。他们根本听不懂讲座内容，冗长的课程令其厌倦，反而阻碍了民主意识的培养，反而使他们被动吞咽苦涩的意识形态食粮——因为战俘不仅遭受政治训练，更被迫接受驯化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宣传讲座旨在重塑战俘思想。我方士兵尚能抗拒此类训练，但无休止的重复灌输与持续的口号宣传，加之俘虏承受的肉体折磨与物质剥夺，最终导致了无意识的驯化与条件反射。

我们的士兵有时会陷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反射陷阱，还有另一个原因。动物实验和人类经验告诉我们，威胁、紧张和焦虑通常会加速条件反射的形成，尤其当这些反应有助于减轻恐惧和惊慌时（斯彭斯和法伯）。战俘营生活的紧急状态和精神折磨，为这种条件反射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即使受害者完全不知自己正受影响，这些反应仍可能形成。因此，许多士兵发展出自身全然未察的自动反应（西格尔）。但这只是问题的单面，经验同样表明：在精神压力下预知可能遭遇的人，能发展出所谓的感知防御机制，从而免受影响。这意味着：人们对思想控制与精神灭绝的概念越熟悉，对针对自身的宣传攻势本质理解越透彻，便能建立更强大的内在抵抗力——尽管审讯者的某些暗示仍会突破意识防线的屏障渗入。

我们对条件反射过程的理解，也让我们得以理解集中营受害者及其他囚犯身上出现的某些矛盾反应。那些信念僵化而简单的人，往往比那些充满怀疑和内心冲突的灵活而复杂的人更能承受持续的精神冲击。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能赋予朴实之人远超复杂质疑的知识分子的内在抵抗力。精致的知识分子更易受内心利弊权衡的束缚。

在极权国家里，对巴甫洛夫式策略的信仰已达到荒诞的程度，独立思考、主观判断的人类已然消失。任何劝说或讨论的尝试都遭到彻底拒绝。个人自我表达成为禁忌。私人情感成为禁忌。

自由交谈中思想的平和交流将扰乱条件反射机制，因而成为禁忌。不再存在独立思考的头脑，唯有被训练的思维模式与肌肉记忆。在这样的驯化体系中，神经质的强迫行为被视为积极资产而非病态表现。精神上的自动机竟成了教育的理想范本。

然而苏联理论家们自己往往对此浑然不觉，其中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将人置于完全机械化条件反射下的严重后果。他们自己常常和我们一样，对完美运转的人类机器人的景象感到恐惧。一位苏联心理学家如是说：“这种对待人的方式具有彻头彻尾的反动本质，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人不过是可随意操控的自动机！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理想！看吧，全球资本主义的终极幻想——一个丧失意识的工人阶级，无法独立思考，其行为可随剥削者的意愿随意训练！正因如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堡

垒美国，将人视为机器人的理论才得以如此蓬勃发展，并被顽固地奉为主臬。”（鲍尔）

西方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虽承认其对行为理解的重要贡献，将巴甫洛夫视为伟大先驱，但相较于苏联巴甫洛夫学派，其对人的看法远非机械论。我们显然认为，他们对训练的简单解释忽视并排除了有目的适应的概念，也回避了训练所指向的目标问题。西方实验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条件反射的充分发展仅服务于满足基本本能需求或规避痛苦，即当整个有机体参与活动时才成立。正如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在复杂的对外界反应过程中，意识层面尤其是无意识层面的驱动力与动机都发挥着作用。

所有训练——条件反射只是其中一例——本质上都是将原本需要有意识学习和思考的行为自动化。西方民主心理学追求的理想，是通过在学习过程中调动人的自觉协助、觉知和意志，培养人的独立性和成熟度。而极权主义心理学的理想，则是驯服人类，使其成为领袖手中甘愿的工具。驯服与训练同样旨在使行为自动化，但不同之处在于它无需学习者的自觉参与。训练与驯服皆是节省精力与时间的手段，二者都将心灵的奥秘隐藏在行为的刻意性之中。人类功能的自动化虽节省了能量消耗，却可能使其在面对新颖意外的挑战时显得更加脆弱。

地方性规则与神话塑造的文化惯例化与习惯养成，使每个人都成为半自动的行尸走肉。民族与种族偏见在无意识中被演绎出来。当口号与标语被触发时，群体仇恨往往近乎自动地爆发。在极权世界里，这种狭隘的纪律化训练被执行得更“完美”，也更趋荒谬绝伦。

被塑造的渴望

本章无意传达的观点是：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本身存在问题。这种条件反射普遍存在于人们共同互动的任何场合。说话者影响听者，听者亦反作用于说话者。通过这种习得过程，人们往往学会接受并实践被允许的喜好与行为。群体越是封闭，其成员所经历的习得过程就越严苛。某些群体中存在着比他人更擅长传递暗示、促成习得的人。渐渐地，人们能辨识出那些更强势、更适应环境、经验更丰富、更善于喧哗者——他们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能力最为强大。每个群体、每个俱乐部、每个社团都存在着主导性的巴甫洛夫式铃铛。这类人将自身内心的铃声烙印在他人心，甚至能建立起单一的铃声体系：绝不容许其他有影响力的铃声与之抗衡。

另一个微妙的问题也属于此类困境。为何我们内心存在如此强烈的被塑造冲

动——渴望学习、模仿、顺从，并遵循家庭与群体的模式？这种被塑造的冲动，这种屈从于社群模式与家庭模式的倾向，必然与人类对父母及同类的依赖有关。动物之间并不存在如此深重的相互依赖。在整个动物界中，人类是最无助、最赤裸的存在之一。他始终如猴胎般，从未成长为成熟、毛发丰茂、全身覆盖的状态。这种持续的胎儿状态使他终生依赖母体照料与父辈教化。但在动物中，人类相对拥有最长的青春期与学习时间。至少路易斯·博尔克的胎儿化理论如此阐释人类的发育迟滞状态及其永无止境的社会依赖性。

困惑与怀疑，这些在训练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情绪，正是思想自由的萌芽。当然，初始的困惑与怀疑尚不足够。其背后必须存在对民主自由的信念，以及为之奋斗的意志。我希望在最后一章中，重新探讨这个核心问题——对道德自由的信念，与条件反射式的忠诚与奴性之间的区别。然而在极权国家里，困惑与怀疑本身已是罪行。敢于质疑的头脑必然敞开异议之门。极权体制必须扼杀那些质疑、探索与富有想象力的思想。极权奴隶只被允许死记硬背，在铃声响起时流口水。

在此我无意详述极权主义者如何偏颇地运用巴甫洛夫规则，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心理学的诠释都受制于我们对人类同胞及人类在自然界中地位的认知方式。倘若我们的理想是将人塑造成条件反射的行尸走肉，当下对巴甫洛夫主义的滥用恰恰能达成此目的。但一旦我们隐约意识到极权主义的人性图景中缺失了人类特有的印记，当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框架下，人类牺牲了本能欲望、享乐、目标、理想、创造力、自由本能以及矛盾特质时，我们便会立即反对这种对科学的政治性扭曲。此类巴甫洛夫技术的运用，其目的仅在于开发人的自动机属性，而非培养那能觉察道德目标与人生志向的自由警醒之心。

即便在实验动物身上，我们也发现情感性目标导向性会破坏巴甫洛夫实验。当铃铛喂食训练进行时，若狗最爱的主人走进房间，动物便会忘却所有先前条件反射，兴奋地吠叫起来。这恰是古老真理的简单例证：爱与欢笑能打破所有僵化的条件反射。僵化的自动机若无自发性自我表达便无法存在。显然，狗对主人自发的亲昵之情足以破坏所有机械计算与操作的事实，巴甫洛夫那些极权主义的学生们从未想到过。

第三章

药物催生顺从

正如前几章所述，不仅是政治与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使人陷入奴性顺从的深渊。诸多其他人类习性与行为同样具有胁迫性。

各种谣言流传甚广，谣言描述那些被洗脑者在向审讯者屈服前，曾被神秘药物毒害。本章旨在阐述医疗技术——不仅是药物——如何能直抵人类内心深处。实际上，思想控制者已不再需要药物，尽管偶尔仍会使用。

我还将触及该问题的另一层面，即我们对各类药物形成危险的社会依赖——成瘾问题使我们更易陷入顺从的模式。当你给酒鬼递上酒杯时，他便丧失了精神脊梁。长期服用镇静剂或其他药片者亦是如此。酒精或药物滥用可能导致化学依赖，削弱了我们在特殊情境下的抗压能力。

在实用医学领域，迷信思维依然盛行。尽管我们自诩在选择疗法时理性而逻辑，心底却明白隐秘情感与无意识动机正主导着开处方的双手。纵使过去五十年间化疗与抗生素的时代取得了疗法上的胜利，我们仍不可忘记：这些医学胜利的手段同样可能成为挫败我们初衷的利器。每日邮件如潮涌入医生办公室，充斥着临床实践的用药建议。我的办公桌上堆满各类器械与五颜六色的药丸，他们仿佛在宣告：没有这些药，人类便无法获得幸福。那些充斥我们医界眼与耳的宣传攻势，往往暗藏如此深厚的暗示。使我们在理应保持批判性思考、追溯病症根源之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分发镇静剂与兴奋剂。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现代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方法中同样显露相同倾向。

本章旨在通过以下问题探讨精神胁迫问题：医疗药物及医疗心理手段的使用能达到何种强迫程度？在先前关于精神灭绝的章节中，我已阐述了政治层面试图使人精神屈服与奴役的种种企图。药物及其心理等效物同样能使人沦为奴隶。

对药物提供者的依赖

不久前，我受邀为一对长期婚姻不睦的夫妇提供建议。尽管婚前夫妻双方情意笃，但各自对这场幸福冒险的投入都怀着错误的情感期待。妻子期待丈夫成为好莱坞式的英雄，永远绅士风度，且全心全意为她一人。丈夫虽被她孩童般的依赖所打动，却暗自期盼她能成为母亲、护士和伴侣。正如所料，双方都未能满足对方的期待。两人深陷失望泥沼——却无人觉察到症结所在。不久后，妻子变得喋喋不休、抱怨连连；每日争吵、指责与怨怼不绝于耳。丈夫则开始寻求婚外慰藉不久后，与婚前相识的女性往来。不久后，妻子发现自己陷入失眠，开始服用巴比妥类药物以换取睡眠和带来的麻木忘却。她逐渐依赖药物，退缩进各种模糊的身体不适中，但更多的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这些症状。丈夫初次发现此事时震惊不已。但渐渐觉察药物似乎能缓和他们不和谐的关系。在镇静剂的持续作用下，妻子不再是那个泼妇。事实上，妻子甚至对他失去了兴趣。丈夫发现自己获得了更多自由，只要能为她提供那些让家庭重归平静的魔法药丸所需的资金，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夜晚和假期。然而，某夜妻子服用过量巴比妥类药物，几乎看起来像是自杀未遂。这场险些致命的事件唤醒了丈夫所有的愧疚感，他寻求医疗与心理援助，试图探寻婚姻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对曾怀揣深厚初恋情愫与善意的伴侣，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这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安眠药与药物依赖往往掩盖着深藏心底、难以启齿的不幸。人们日益依赖于这种看似温和柔软的镇静剂带来的逃避与遗忘，借此轻松逃避现实——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恶习。安眠药使用量的普遍增长令人震惊，而巴比妥类药物导致的自杀案例正逐年攀升。我们更不能将此类现象简单归为医疗问题。对酒精、巴比妥类药物、毒品或其他催眠剂的依赖，昭示着潜藏与显现的社会恐惧与焦虑，以及逃避现实的迫切需求。对使用者而言，药物如同神奇药丸，能被动而神奇地解决所有问题，将他们带到现实世界的边界之外。若派头目若能为成员提供此类药物，便可确保其绝对服从。

通过药物寻求极乐

在各类吸毒者中，我们屡屡遇见对特殊狂喜与欣快感境的渴求——一种超越日常烦恼的生存体验。“你握有天堂的钥匙，啊公正、玄妙而强大的鸦片！”托马

斯·德·昆西在其《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中如是说。尽管狂喜状态因人而异，但瘾君子总会告诉我们，这种药物将他带往追寻已久的失乐园；它赋予他永恒的欣快感与自由的欢腾，使他超越了生活与时间的桎梏。

在狂喜状态中，人按照自身欲望重构宇宙，同时寻求与更高秩序的共鸣。但狂喜状态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它既可能体现瑜伽行者与宇宙合一的神秘体验，也可能意味着醉汉的慢性酩酊状态或某些躁狂症患者的病态激情。这种感受既可能源于专修团体中升华的精神体验，亦可能出现在私刑暴民与骚乱之中。狂喜形态纷繁——有审美狂喜、神秘狂喜，亦有病态的有毒的狂喜。

对狂喜体验的追寻不仅是个体行为，更蔓延至整个群体。当道德约束变得过于沉重，整个文明都可能沉溺于失控的狂欢之中——正如我们所见的古希腊酒神祭典中与中世纪具有传染性的狂舞之怒。这类集体性狂欢未必依赖人工刺激物，因为群体的催眠效应足以引发药物作用类似的失控感与外界隔绝感。在这些集体狂欢中，个体丧失了良知与自制力，性禁忌可能消失；深层挫败感与潜意识负罪感的重负得以暂时解脱。人们竭力重温婴儿时期的极乐体验——全然屈从于自身肉体需求与欲望的状态。

狂热地参与群体欢腾是世间最古老的心理剧。参与某种集体行动能为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带来巨大的情感释放与宣泄。这种参与魔法般全能群体的感受，与世界万物力量的重聚与共融的体验，常常令常人欣喜若狂，使弱者产生虚幻的力量感。善于为群众提供此类狂喜宣泄的煽动者，必能确保其臣服于自身影响与权力之下。独裁者尤热衷于组织此类群体仪式以服务其专制目的。

自人类具备自觉意识以来，便时常试图打破自身与外界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当精神警觉无法适时松弛，当世界过于沉重且持续压迫时，人便可能沉溺于遗忘的深渊。狂喜、药物催眠及其伴随的幻觉与精神亢奋的晕眩，能暂时将他从维持感官与自我警觉的沉重负担中解脱。药物可诱发此状态，任何成瘾行为皆然。狂喜、药物催眠及其幻境，以及精神亢奋时的昏厥，暂时将他带离了维持感官与自我警觉完整的沉重负担。药物能使人进入此境，任何成瘾行为皆可解释为持续逃避的需求。身体与心灵在此寻求逃避生命的过程中相互配合，药物逐渐成为身体需求，亦成为情感必需。

在犯罪团伙中，可卡因或海洛因等令人上瘾的毒品常被分发给成员，使其更服从于分发毒品的头目。提供毒品的人几乎成了团伙成员心中的神明。为了获取他们迫切需要的毒品，成员们甘愿为头目赴汤蹈火。

在强权暴君手中，这种药物若被用于制造依赖性将变得极其危险。一个邪恶独裁者可能企图利用成瘾性迫使反抗民众屈服，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1954年5月，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讨论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中国在禁止本国使用鸦片的同时，却向邻国大量走私鸦片。这些国家被迫持续开展两场斗争——既要对抗本国民众鸦片成瘾，又要对抗毒品滥用导致的麻木不仁。与此同时，泰国官员提出指控并请求联合国援助，他们称共产主义中国持续向泰国派遣各类颠覆性宣传人员。泰方指控中方正运用一切手段向暹罗民众灌输其意识形态：包括令人精神萎靡的鸦片成瘾、散发传单、广播宣传、秘密煽动等手段。

纳粹采取了类似策略。在占领西欧期间，他们通过停止向“劣等国家”出口常规治疗药物，人为制造了药品短缺。但巴比妥类药物却是个例外。以荷兰为例，当时许多药店无需医生处方即可轻易购得，这违反了荷兰的传统法律。虽然医疗所需的正确药物未能供应到位，但那些催生被动性的药物却被广泛流通。例如在荷兰，这些药物无需医生处方即可在药店轻易获得，这种情况违反了荷兰惯例法。尽管医疗工作所需的正规治疗药物无法获得，但那些使人消极、依赖和昏昏欲睡的药物却被广泛分发。

极权独裁者深谙药物可成为其帮凶。希特勒在所谓生物战中意图削弱并征服第三帝国周边国家，彻底摧毁其脊梁。饥饿与毒瘾正是他最珍贵的战略工具。

这一切与我国日益严重的药物成瘾和酗酒问题有何关联？我已提及巴比妥类药物致死率的惊人增长。但更需强调的是其心理与政治后果。当奴役与对毒品及酒精的屈从开始时，民主与自由便告终结。民主意味着自由选择的行为与认知；意味着成熟的自律与独立。任何通过酒精药物逃避现实之人，已丧失自由意志；无法掌控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更非负责任的个体。酗酒与吸毒所形成的心理顺服模式，为极权主义洗脑者所热衷的精神臣服模式铺就了道路。

催眠术与精神胁迫

自古以来，那些为施加压力而想窥探他人内心运作机制的人，便会使用人工手段探寻通往其最私密思想的隐秘路径。现代洗脑者同样尝试过各种药物以达成其阴险目的。原始巫医拥有多种方法迫使受害者丧失自我控制与戒备的方法——例如玛雅人使用具有麻醉效果的酒精饮品、有毒药膏或渗透性的圣烟，皆能使人陷入狂喜状态而丧失理智。受害者们喃喃念诵着神圣咒语时，常常暴露于自我指控的幻想，甚至吐露最深的秘密。中世纪时期，所谓的巫术药膏在自愿或胁迫下使用。这些药膏据称能使涂抹者与恶魔建立联系。由于这些药膏含有大量鸦片酊和颠茄成分，可经皮肤吸收，现代科学已能解释其引发的狂喜幻象——实为这些药物典型的致幻

效应。

医学赋予灵魂探测者最早的实用技艺之一，便是催眠术——这种强化心理暗示的手段能使人放弃自主意志，使其对催眠师产生奇特的依赖。三千年前的埃及医师已掌握催眠术，古代文献记载他们曾实践此术。

在诚实治疗师手中，催眠术能发挥极大功效。尤其在应对心身疾病与肉体痛苦——这个幻想与现实的私生子时，催眠术堪称善心人。但许多江湖骗子行医催眠，并非为治愈受害者，而是利用其潜意识中依附需求，以犯罪牟取暴利。催眠术中潜藏着与攻击者被动屈从相关的无意识性根源，江湖郎中正是借此宣泄私欲。我曾治疗过一名女孩——她曾拜访过这样的“治疗师”。直到最后关头，她才挣脱昏沉顺从的状态，成功抵御了对方的侵犯。

不久前我治疗过几名试图互相催眠的青少年。他们想掌握这项技术的精妙之处，以便增强对他人精神控制的能力。受漫画故事启发，他们幻想通过催眠术能操控女孩屈从于自己的性要求。他们期待成为超人，将他人变成满足自己欲望与意志的工具。

催眠问题中最引人入胜的方面之一，在于探讨人们在催眠状态下是否会被迫实施谋杀或叛国等犯罪行为。许多心理学家会否认这种可能性，并坚称无人能在催眠状态下被强迫做清醒时拒绝做的事。但实际上，一个人能被强迫做的事取决于催眠引发的依赖程度以及所谓后催眠暗示的重复频率。真正的精神分析学指出，甚至还存在其他几种方法让人活成他人的生活。诚然，催眠师无法立即剥夺人的良知与内在抵抗力，但他能通过持续暗示和不断刺激那些被深度压抑的欲望，唤醒潜藏的杀戮意愿——这些意愿可能在受害者潜意识中活跃起来。对洗脑与精神灭绝手段的实际认知证明，这一切皆可实现。若催眠师足够持久且足够狡黠，终将达成目的。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着诸多反社会欲望，若催眠术运用得当，便能将这些欲望唤醒并将其付诸行动。集中营看守的集体犯罪行为，部分可归结为极权国家及其犯罪独裁者施加的催眠式影响。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罪犯首次违反道德与法律准则往往是在其他罪犯强烈影响和暗示下发生的。这可视为催眠的初始形态——即强化版的精神暗示。

诚然，催眠状态下的犯罪煽动需要特殊有利条件，但不幸的是这些条件在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

近期司法界广泛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精神科医生利用其对暗示的特殊知识迫使被告供认罪行。此类行为已超越精神医学界公认的执业边界，更违背了精神医学伦理。医生滥用患者对医疗顾问及治疗师的信任，诱导患者供认罪行，随后将这些供词用于暂时对其不利的审判。此举不仅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唯患者福祉

为念，且永不泄露职业秘密”的承诺，更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被告的宪法保障，该条款保护公民免于自证其罪。

被告在催眠状态下透露的内容，取决于其对他人精神施加影响及心理侵入行为与潜意识态度。相对于律师或警察，人们在与医生打交道时通常较少坚持法律权利，因期待获得神奇治疗效果而表现出顺从态度。

最高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对此提供了生动例证。1950年，五十余岁的卡米利奥·韦斯顿·莱拉被警方逮捕，他被指控其在布鲁克林公寓残忍锤杀年迈父母（人民诉莱拉案）。面对警方长时间审讯，莱拉最初坚称对案件毫不知情，甚至否认曾踏足父母住所。后来，在警方进一步审讯时，他承认当天确实在受害者家中，但仍坚称自己没有杀人。他被关押在监狱里，一名精神科医生被请来与他交谈。他们的对话被录音记录下来。精神科医生自称是莱拉的“主治医生”，实则并非如此。在轻度催眠状态下，医生持续暗示若莱拉承认因一时冲动犯案将更有利，最终莱拉同意认罪。警方被召回现场，当场记录下这份供词。

法庭审理期间，莱拉推翻供词，坚称自己当时处于催眠状态。他虽被定罪，但判决因“供词系非自愿获取”且“剥夺其宪法保障权利”而被撤销。后来莱拉再次受审并被判有罪。最终此案上诉至最高法院，该院于1954年6月撤销判决，理由是诱供使用了精神压力和胁迫性精神病学手段。最高法院在此案中间接表明了对遭受洗脑的战俘应承担何种责任的立场。

对我们而言，莱拉有罪与否的问题远不如以下事实重要：他在精神压力下被诱使做了他通常会抗拒之事，且其对医生的信任——正是这份信任使他放松了面对其他调查者时必然会建立的心理防线——被用来瓦解他的意志。

暗示与催眠虽然可以成为心理疗法的福音，帮助患者解决意识意志无法解决的情感困扰，却也可能成为恐怖的开端。例如群体催眠便会对个体产生危险影响。精神病学家多次发现，公开展示群体催眠可能引发观众中许多人催眠依赖性和顺从性的增强，这种状态可能持续数年。正因如此，英国已立法禁止降神会和群体催眠活动。催眠可能成为受害者内心压抑的依赖性需求的触发机制，使其暂时沦为清醒的梦游者与精神奴隶。催眠指令使其摆脱个人责任，并将大部分良知交予催眠师掌控。正如前文所述，当代社会已为我们提供了太多例证：政治催眠、群体催眠乃至战争催眠如何将文明人转化为罪犯。

某些人格特质比其他类型更易受催眠影响。强大的自我意识能长期抵御精神入侵，但终究也有屈服的临界点。某些过度批判型人格对外部暗示的敏感度远低于对内在意象的反应。我们可区分异源暗示型与自我暗示型人格，尽管催眠与暗示的反应存在诸多差异。但即便是这类自我暗示型人格，若承受足够压力，也会逐渐在

内心构建屈服于精神胁迫的合理化依据。

那些轻易就能影响他人的“魅力型”人物，自己往往极易受他人暗示。某些天赋异禀的共情者能唤起他人倾吐所有秘密的渴望，仿佛天生具备神父告解的恩赐。另一些共情者则通过映射自身虚伪的内心世界，更易激发出受害者隐藏的谎言与幻想。还有些人则让我们彻底封闭心扉。为何有些人能激发顺从欲，而有些人却引发抗拒心，这正是人际交往的奥秘所在。为何某些人格特质能相互契合强化，而另一些却相互碰撞摧毁？还有些人则让我们彻底封闭心扉。精神分析学为解读这些奇特的人际关系与纠葛提供了全新视角。

探寻真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帮助因战场压力崩溃的士兵，所谓“真相药水”（即麻醉分析的俗称）技术应运而生。通过注射镇静剂进行麻醉分析，可促使士兵回忆并揭露那些将他们推入急性焦虑神经症的战争经历中极度情绪化创伤性的瞬间。逐渐发展出一种有用的心理急救技术，在患者受麻醉剂影响时帮助潜意识揭示其隐藏的秘密。

真相药水是如何起效的？原理很简单：注射后，处于半睡状态的意识无法控制其秘密，这些被压抑的挫折与痛苦可能从潜意识涌入半清醒的思维。在某些急性焦虑病例中，这种强制性刺激或许能缓解导致精神崩溃的焦虑与压力。但麻醉分析往往收效甚微。有时患者的意识会抵触这种化学侵入与强制干预，而这种状况往往阻碍了更深入、更有价值的心理治疗之路。

对意外精神侵入与胁迫的恐惧可能具有病理性特征。当我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精神控制与洗脑，收到数十封来信及来电，发信者坚信某些外部人员正试图影响他们并操控其思想。这种精神侵入妄想可能是严重精神病的早期阶段，受害者已退化至原始的魔法感。在这种状态下，整个外部世界都被感知为参与受害者脑中的活动。可以说，他们完全丧失了自我与外界的边界意识。这些被恐惧支配的人终日痛苦不堪，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遭受诸多无法抵御的神秘力量侵扰；他们时刻感到身处险境。从心理层面看，他们对外部入侵的恐惧部分源于对自身幻想从内部（即潜意识）侵入的恐惧。他们畏惧那些无法控制的、潜藏于无意识中的隐秘念头。

若将所有此类精神迫害感简单归为精神疾病标签，未免过于片面。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诸多外部精神压力，而许多完全正常的人，也持续感受到来自宣传、广告、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所有这些喋喋不休的疯子——不断轰炸其心灵的刺激，

并因此深受困扰。这些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一个冰冷机械、喧嚣的世界不断叩击他们心灵的门扉，侵犯着他们对隐私与人格完整性的感受。

更值得探讨的是，所谓“真相药水”所用的药物是否总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迫使患者吐露内心真相。1951年耶鲁大学（J. M. MacDonald）对九名接受静脉注射安眠钠（即所谓真相药水）的受试者进行的实验显示出耐人寻味的结果，这削弱了我们对该药物的信心。每位受试者在注射前均被暗示了一个虚构的历史事件故事，而后续提问将围绕该事件展开。实验者同时掌握真实与虚假故事两种版本。报告中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三位被诊断为正常受试者始终坚持其（被暗示的）故事版本。六名神经症患者中：两人立即透露真实故事版本；两人作出部分承认，其供述由幻想与真相的复合混杂而构成；一人将极可能属于幻想的内容当作真相陈述；而那位强迫症患者除了一次失误行为（错误或笨拙的动作）外，始终坚守其掩饰故事。”

美国法院在多起案例中，拒绝将真相药水测试结果作为证据采纳，主要依据是精神病学界的共识：真相药水治疗实属名不副实；事实上，麻醉分析法并不能保证揭示真相。在受害者不了解其作用局限性的情况下，该技术甚至可能被用作胁迫手段。

另一个更与我们主题密切相关的危险在于，刑事调查人员可能将自身思想与情感诱导并传递给受害者。因此，真相药水可能导致自我意识薄弱的患者屈服于干预者强行灌输的思想与解读，其机制恰似催眠受害者接受催眠师植入的暗示。

此外，这种药物审讯方法还存在某些身体危害。我本人亲眼目睹过因静脉注射巴比妥类药物而引发血栓的病例。

三十年前开始的麦斯卡林实验如今突然再度风靡。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新著《知觉之门》中描述了服用该药物（亦称皮约特）后体验到的人工化学天堂。它能激发各种愉悦的主观症状，但这些终究具有幻觉性质。我无意与这位我敬重的作家展开临床论战，但他自身对麦斯卡林产生的欣快狂喜反应未必代表他人体验。二十五年前我曾亲身尝试麦斯卡林，试图直接接触真正的病态思维。结果我几乎崩溃。只有极少数人经历过赫胥黎描述的狂喜体验。在非医疗监管下使用麦斯卡林极其危险。况且，赫胥黎先生为何要兜售人造天堂？

所有这些化学手段侵入心灵的方法都蕴含着极其严重的社会危险。诚然，它们可作为心理治疗的谨慎辅助手段，但在权力欲望膨胀者的手中，它们亦可能成为骇人的控制工具。更甚者，在我们这个阿司匹林泛滥的时代，这些手段强化了这样一种虚妄观念：唯有借助神奇药物，我们才能成为自由行动的主体。那些鼓吹化学兴奋剂、人工狂喜和伪涅槃体验的宣传，实则诱使人们沦为化学依赖者的陷阱——而

化学依赖者正是软弱之人任凭专制政权随意驱使。当前全科医生群体中盛行的宣传鼓动用新型药物治疗各类焦虑与精神障碍同样暗藏此等危险的隐忧。

测谎仪

催眠术与麻醉分析不过是当前可被滥用为强制侵入心灵工具的两种手段。测谎仪——这种已被用作精神胁迫工具的设备——亦属此列。这种装置在制造精神恐慌方面颇为有效，其运作原理在于：当受试者被要求说出真相时，仪器会显示其言行不一致；当受试者试图说谎时，仪器则会显示其言行一致。诚然，这种过度反应可能是说谎后的表现，但也可能是无辜者对情绪化情境的自然反应，甚至源于对不实指控的恐惧加剧。审讯者与受测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对情绪反应及电反应变化的影响，与内疚感和困惑感同样显著。该实验仅能揭示内心动荡与潜藏的压抑心理，连同其伴生的疑虑与模糊性。它本质上并非测谎仪，尽管常被如此使用（D. MacDonald）。事实上，病态说谎者与心理变态的无良知人格对此实验的反应可能比正常人更微弱。测谎仪更可能沦为某些人的胁迫工具——这些人总在每件仪器里寻找神奇魔力而非探求真相的手段。结果是，无辜者亦可能被诱使作出虚假供述。

治疗师化身为胁迫的工具

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是引导人类度过身心压力时期的精妙科学。正如训练需要学生与教师双方保持警觉而周密参与，成功的心理治疗同样需要患者与医生保持警觉而周密的参与。正如教育训练在特殊条件下可能沦为强制驯服，治疗也可能退化为医生将自身意志强加于患者的行为。医生本人甚至可能毫无察觉。这种治疗滥用可能表现为患者对医生观点的盲从，或发展为对治疗师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性——甚至日益增长的依赖需求——不仅可能远超常规界限，更可能在治疗结束后持续存在。这种依赖性甚至日益增长的依赖需求，不仅可能远超常规界限，更可能在治疗结束后持续存在。

我见过些江湖骗子，他们唯一的知识就是知道去哪里购买沙发。通过自称精神分析师，他们得以满足自己活在他入生活中的需求。最终法律必须制定标准，将这些危险的入侵者排除在心理治疗实践之外。但即便是诚实、尽责的治疗师也面临严峻的道德困境——其职业本身不断鼓励甚至迫使他让患者暂时依赖自己，这可能迎

合了治疗师自身对重要感与掌控力的渴求。他必须时刻警觉自己的言论和推论对患者产生的影响——那些常怀敬畏之心聆听医生话语的患者，眼中他如同全知全能的魔法师。治疗师绝不可纵容患者的这种顺从态度——尽管在某些治疗阶段这可能有助于疗效——因为优质心理治疗旨在培养人的自由与成熟而非塑造顺从的服从。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从业者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其职业赋予他们的责任。心理学工具若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便极具危险性。现代教育方法可被用于治疗，以优化人的思维模式，使其观念符合特定意识形态体系。医学与精神病学可能日益深度介入政治战略。正如我们在洗脑策略中所见，医学与精神病学可能日益卷入政治战略，因此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其所使用科学工具的本质。

对治疗技巧的过度强调，要求学生掌握所有事实与技巧，对心理治疗文凭和标签的过度重视，正将实际治疗导向与所需个人敏感性相悖的原则化与理性化。我们的批判与理性能力可能成为破坏性力量，摧毁或掩盖那些源于悲剧性绝望的基本疑虑与矛盾心理——正是这种绝望孕育了人类的敏感性。现代心理治疗（及心理学）的危险在于将人类直觉与共情形式化，将情感与自发性抽象化的倾向。试图将爱与美机械化实属矛盾。倘若此举可行，我们将置身于一个没有灵感与狂喜、唯有冷酷理解的世界。

每段人际关系都可能被用于错误或正确的目的，而心理治疗师与患者之间存在的微妙无意识纽带关系尤其如此。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整个医学领域；外科医生同样依赖与患者的紧密联系，以及患者对其手术技术的自愿服从。弗洛伊德首次清晰阐明了当人与人进行长期心理接触时心灵内部的运作机制。他揭示：在任何深度人际关系中，每个参与者至少部分会依据自身童年时期形成的期许与幻象作出反应。因此基于绝对表达自由原则的长期治疗，为医生与患者双方提供了同等机会，将私人情感投射至治疗关系中。若医生不够谨慎，或未能理解这种隐秘情感的相互投射，或因强迫性地解释一切的热忱而过于强势，他可能会迫使患者接受其观点，而非帮助患者形成独立见解。这可能演变为危险的精神侵扰。治疗经验告诉我们，不当的技术会让患者产生被束缚的感受。有时患者仿佛必须终生屈从于医生。我见过整个家庭或教派都对医生言听计从。治疗实践告诉我们，不当的技术会使患者陷入泥淖般的困境。有时患者仿佛必须终生屈从于医生的权威。我见过整个家族和教派对这类现代巫医顶礼膜拜。

难怪要接受扎实的精神分析训练，治疗师必须先将自己交由数年实践来锤炼即将施用于他人的技术，这样当他掌握了自身病态潜意识需求的认知后，便不会试

图利用职业身份来操纵他人的人生。

各类心理机构凭借其不同的心理概念与技术手段——诸如家庭咨询、宗教指导、管理咨询等——极易沦为权力的工具。人们对领袖、医生及管理者寄予的善意无比巨大，却可能反噬自身。即便现代脑外科手术，也可能被独裁者滥用，将竞争对手变成行尸走肉。心理学本身可能倾向于将心灵标准化，而不同心理学流派强调正统性的趋势，无意中增加了精神胁迫的可能性。（“若你不懂我的玄奥术语，我便要让你适应它”）操控他人思想远比避免操控更容易。

民主社会赋予公民作为自由主体行动的权利，同时要求他们承担维护自身自由的责任——无论是精神自由还是政治自由。倘若通过现代医学、化学及机械手段实施精神侵入，削弱人类自主行动的能力，便等同于颠覆自身信念，动摇民主制度根基。正如存在蓄意政治洗脑，同样可能存在以正义或治疗之名行暗示性侵入之实的手段。这种手段或许不如蓄意的极权攻击那般显眼，但其危险性丝毫不减。

药物驯服已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人类可以利用其对同类心理的认知，非为助人，反为伤害，使其深陷泥淖。巫师能通过加剧受害者的焦虑恐惧、利用其依赖需求、挑动其负罪感与自卑感来增强自身力量。

药物与医疗技术可使人沦为顺从的附庸。我们必须铭记此理，方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健康与自由。

第四章

为何屈服？

虚假供述的心理动力学

从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概念到更深层的心理理解之间，是否存在一座桥梁？唯有那些否认现代心理学深度的巴甫洛夫理论家，才会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冲突。巴甫洛夫本人就承认人类存在更深层的隐秘动机，也承认其动物行为研究存在局限性。

我们的任务是回到被洗脑者身上，不断自问：如何更好地传达对他所经历之事的理解？那些巴甫洛夫式的环境条件是什么？屈从于强制性政治洗脑的内在动机又是什么？是懦弱？是监狱精神病？还是我们这个世界普遍丧失了精神韧性？

在以下观察与实践中，我希望能运用现代深度心理学所提供的临床洞见。

失意的哲学家

1672 年某日，孤独的理性哲学家斯宾诺莎被朋友和邻居强行制止。他本想冲上街头向暴民呐喊抗议——正是这群暴徒谋杀了他的挚友扬·德·维特，这位荷兰共和国的杰出政治家却被诬陷叛国而惨遭杀害。但片刻后他平复了情绪，退回到自己的房间，照常研磨光学透镜，延续着每日从不间断的日常生活。劳作间隙，他反省自身行为——其非理性程度丝毫不逊于杀害德·维特的暴民。正是此刻斯宾诺莎意识到人性理性之下潜藏着情感野兽，一旦被激起，它便会肆意妄为并制造破坏，

还能自身行径编织出千百种辩解与托辞。

因为正如斯宾诺莎所感知到的，以及伟大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来所证实：人们并非他们自认为的那般理性。在潜意识中——这个深埋记忆、情感和追求的巨大仓库里——潜藏着许多幼稚而非理性的渴望，它们不断影响着有意识的行为。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受制于这个隐形的暴君，以及我们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冲突。

在我们成为不受约束的潜意识驱动力受害者的程度上，我们便在同等程度上易受精神操控。尽管这个想法令人毛骨悚然的幻觉——我们的精神抵抗力相对薄弱，那种区分个体与众不同的特质——独立的自我——竟能被心理压力深刻改变，但这种转变不过是日常生活中运作过程的极端表现。通过系统化的暗示、隐晦的宣传以及更显露的大众催眠，人类思想的表达方式在任何社会中都日复一日地被改变。广告诱使民主公民使用江湖骗术或选择某特定品牌的肥皂而非其他。购买欲望持续被激发。竞选中的政客既以政纲又以魅力影响我们。时尚专家催眠般地让我们周期性地改变审美标准与品味准则。

然而在精神灭绝的案例中，这种对人类心灵完整性的攻击更为直接且蓄意而为。通过利用潜藏于无意识中的非理性孩童，并加剧理性与情感的内在冲突，审讯者能迫使受害者彻底屈服。

所有蓄意精神灭绝的受害者——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铁幕国家独裁政权囚禁的“叛徒”、二战期间纳粹恐怖统治下的牺牲者——都是生活方式突然剧变的人群。他们被从家园、亲友身边强行剥离，抛入令人恐惧的异常环境。环境的陌生感使他们更易遭受价值观与态度的冲击。当独裁者在充满威胁、敌意与陌生感的世界中利用受害者的心理需求时，崩溃几乎不可避免。

铁丝网病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俘身上就已显现出奇特的心理反应——一种由冷漠与愤怒交织而成的状态，作为应对监禁生活的艰辛、无聊、饥饿、缺乏隐私以及持续不安的防御性适应。朝鲜战争中，敌人的残酷行径、持续的死亡恐惧、营养不良、疾病肆虐、对战俘精神系统的攻击、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人性尊严的彻底剥夺，使这种状况雪上加霜。

通常战俘通过接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来缓解困境。这种心理压力不仅导致他们与敌人产生共谋，更在战俘群体中滋生了相互猜忌。

正如我先前所述，铁丝网病症始于所有囚犯最初的冷漠与绝望。人们被动地向命运屈服。事实上，人会死于这种绝望；仿佛所有抵抗力都已消逝（参见第九章关于恐惧作用的论述）。在敌方企图通过辩论争论来瓦解你精神抵抗的集中营里，任何不冷漠不麻木的表现都极其危险。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麻木不仁、停止思考、放任自流——最终屈服于一种完全僵尸般的机械化生存状态，完全依赖于环境。任何愤怒或警觉的迹象都可能遭到残酷惩罚，这正是我们未曾见到一战二战早期战俘营中那种突发性暴怒的原因。任何愤怒与警觉的迹象都可能招致敌人的残酷惩罚；正因如此，我们未在战俘营中发现一战与二战早期营地常见的突发性暴怒。对朝鲜战争中获释士兵的心理测试结果表明，这种防御性冷漠与退缩式婴儿期依赖状态几乎普遍存在。然而当他们重返正常环境后，警觉性与活动能力往往很快恢复。战俘营的心理测试结果表明，这种防御性冷漠与退缩至封闭的婴儿期依赖状态，几乎存在于所有幸存者身上。然而重返正常环境后，警觉性与活动能力往往迅速恢复，甚至仅需两三日。少数持续焦虑、冷漠、僵尸化的人群则属于战争与战斗神经症的长期案例（斯特拉斯曼）。

哪些因素能使人背叛自身信念，沦为告密者、残暴罪行的供认者，或表面上的同谋者？

瞬间的投降

几位纳粹审讯的受害者告诉我，投降的瞬间总是突如其来且违背本意。他们曾数日承受审讯者的狂暴逼问，却在某一刻彻底崩溃：“行吧，行吧，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

随后便是数小时的悔恨、决心与绝望地渴望重拾先前坚定的抵抗姿态。他们想呐喊：“别再问了，我绝不回答。”然而潜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顺从本性正悄然苏醒。

这种突然的投降往往发生在意外的指控之后——某个令人震惊的指控、某种特别刺痛的羞辱、某种灼烧般的惩罚，或是审讯者提问中令人措手不及的逻辑攻势，让人无从反驳。我记得自己亲历过一次体现这种突袭效应的经历。

从纳粹占领下的荷兰监狱逃脱后，我经由维希法国抵达中立国瑞士。刚到时我被关进监狱，起初待遇还算宽厚。然而三天后，我被剥夺了军官的庇护权，并被告知将被遣返回维希法国。对此消息，看守们还冷嘲热讽地补充说，我该庆幸没被遣返到德国人手中。当我被押往边境时，他们要求我签署文件，确认所有个人物品（入狱时已被没收）已归还。我拒绝签字，因为看守递来的包裹里缺失几件物品——虽

无实际价值，却承载着我的情感记忆。一名卫兵蔑视地盯着我，第二名不耐烦地跺脚反复催促签字，第三名则用法语咆哮谩骂——那些词句对我而言完全是天书。我依然坚守立场。突然间，其中一名军官开始朝我脸上扇耳光并殴打我。面对他们因小事就暴跳如雷的行径，我震惊得不知所措，最终屈服签了字。（在被押往维希监狱期间，我获准向瑞士政府写了一封抗议信。至今我仍珍藏着收到的官方道歉函。）

这种从顽强抵抗到屈从的突然转变，必须归因于相互冲突的情感在潜意识中的作用。我们有意识地告诫自己要坚强，但内心深处却涌动着屈服与顺从的渴望，开始扰乱我们的思绪并影响行为。心理学将此现象描述为所有情感中固有的矛盾心理。

崩溃的渴望

精神病理学的词汇中包含许多描述屈服于心理压力的复杂术语，例如“退化愿望”、“依赖需求”、“精神受虐倾向”、“无意识死亡愿望”等等。但就本文目的而言，只需指出：每个个体都同时存在两种对立需求：独立自主、成为自我的需求；以及不做自我、不做任何人、不抵抗心理压力的需求。渴望隐匿、消逝、被社会吞噬的需求极为普遍。其最原始形态即为随波逐流的倾向，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常态下匿名需求与个性需求相互制衡，心理健康者正是能在这两者间游刃有余行走者。但在那些令人恐惧、孤绝的境遇中——精神灭绝恐怖的受害者身陷其中——这些境况如噩梦般处境，充斥着难以企及的巨大危险，因无人解释或安抚崩溃、放任、消亡的渴望几乎不可抗拒。

许多集中营幸存者都描述过这样的经历：他们踏入营地时，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未解的疑问：“为何这一切都降临在我身上？”他们对方向感的渴求，对目标与意义的追寻始终得不到满足，因而无法维系自身人格。他们任由自己陷入心理学所称的人格解体综合征——一种彻底丧失对自我及存在掌控力的普遍感受。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通过人为制造混乱来实现的效果，一次震撼性经历同样能达成。“为了什么？”他们自问。“这般苦难有何意义？”于是渐渐地，他们黯然沉入那种麻木的半忘却状态——我们称之为抑郁症：自我毁灭的欲望就此接管了身心。

纳粹利用这种崩溃需求时既狡猾又无所不用其极。集中营生活的屈辱，反复暗示盟军已近乎溃败——种种手段使合谋使囚犯深信：这无谓的苦难永无止境，战争不会迎来胜利结局，他们的人生亦无未来可言。当人意识到这种可悲的边缘化生存状态将永久延续，无法期待个人目标的实现，必须屈从于这种麻木堕落的生活时，

崩溃屈服的欲望便近乎无法抗拒。

当信仰与希望消失的瞬间，人便崩溃了。集中营受害者中有许多悲剧故事：他们将全部希望寄托于 1944 年圣诞节解放的幻想，将整个生命指向那个日期。当圣诞节过去而他们仍被囚禁时，许多人崩溃而亡。

这种崩溃的倾向也成为抵御危险的保护机智。受害者似乎认为：“如果施虐者不注意到我，就会放过我。”然而正是这种匿名感，这种丧失个性、沦为无用之物、遭人遗忘与唾弃，也导致了抑郁与冷漠。人类作为个体的需求永远无法被彻底扼杀。

陪伴的需求

人们对孤独心理的研究尚显不足，尤其忽视了囚犯强制隔离的深远影响。当日常生活中的感官刺激被剥夺，人的整体人格可能发生改变。社交往来——我们与同事的持续接触、工作、报纸、人声、车流、所爱之人乃至厌恶之辈——皆是滋养我们感官与心灵的日常养分。我们筛选感兴趣的事物，排斥不愿吸收的杂音。每个公民每日都生活在无数微型世界中——那里交织着满足的交换、微小的憎恶、愉悦的体验、烦躁的刺激与欢欣的时刻。这些刺激维系着人的警觉性。现实与记忆时刻协作，通过反复重现将生命中千万个片段整合为整体。

当人处于孤立状态，与世隔绝且无法获知外界动态时，其精神活动便会被截然不同的过程所取代。久被遗忘的焦虑浮出水面，长期压抑的记忆从内心深处叩击着他的意识。幻想世界开始膨胀，最终膨胀至惊人规模。他无法对照日常经历来评估或抑制这些幻想，很快它们便可能完全占据他的身心。

我清晰记得自己被囚纳粹监狱时的幻想。当时我几乎无法控制那些绝望的消沉念头，不得不反复告诫自己：“思考，思考。保持警觉，不要屈服。”我竭力运用所有精神医学知识维持头脑的松弛动员状态，但多数日子里都感觉这场战斗注定失败。

一些实验表明，即使在极短时间内剥夺所有感官刺激（无触觉、无听觉、无嗅觉、无视觉），人们也会迅速陷入一种幻觉催眠状态。当我们被隔绝于外界通常狂轰滥炸的众多感官印象之外时，便会产生怪异而骇人的症状。赫伦在麦吉尔大学对一组学生进行实验时，将每位学生置于独立的全黑隔音密闭舱内——舱内仅有过滤空气流通，双手被厚重皮手套包裹，双脚套着沉重的靴子。他观察到：“他们的脑部功能逐渐停滞或失控。”即使在二十四小时的极端感官隔离中，所有童年时期的恐怖幻影都会被唤醒，各种病理症状随之显现。人类的好奇的本能需要持续的刺

激；若得不到满足，内心深处的恶魔便会苏醒。

被隔离囚禁的囚犯，尽管其隔离程度远不及实验室实验中的极端状态，仍经历着剧烈的心理转变。看守与审讯者逐渐成为他与现实世界唯一的联结纽带，这些刺激甚至比面包更令他渴求。难怪他逐渐对看守发展出一种奇特的顺从关系。影响他的不仅是与社会接触的隔绝，还有性饥渴。潜藏于人类深处的依赖需求与潜在同性恋倾向，使他甘愿将看守视为替代性的父亲形象。审讯者或许残暴如野兽，但他承认受害者存在的这一事实本身，便让囚犯感受到些许被关爱的微光。传统忠诚与新生依附间产生何等尖锐的冲突！世间鲜有如此自足之人，能抗拒屈服的渴望，拒绝寻觅人际慰藉，以驱散难以承受的孤独。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俘最初饱受一种奇特的、灼烧般的思乡之苦，这种病症早被称为铁丝网病。对母亲、家园和亲人的记忆使士兵们重新找回了婴儿般的纯真，但随着他们逐渐适应战俘营生活，对家园和亲人的思念也创造了积极价值，帮助减轻了战俘营生活的煎熬。

即使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在杂乱无章的囚犯群体中也会感到孤独。他的狱友既可能成为朋友，也可能轻易变成敌人。他对狱卒的憎恨可能转移，进而转向同牢房的囚徒。受害者不再怀疑敌人，反而可能对同甘共苦的同伴心生猜忌。

在纳粹集中营和朝鲜战俘营中，常会滋生一种集体性偏执狂。囚犯们因猜忌与仇恨彼此隔绝，孤独感因而加剧。这种不信任感被看守们不断煽动。他们不断向受害者暗示：无人关心你的处境，无人在意你的遭遇。“你孤身一人。外界的朋友不知你生死，连同牢的囚徒也漠不关心。”由此扼杀了所有对未来的期待，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与绝望感令人难以承受。随后看守播撒猜忌的种子，散布骇人谣言：“你身陷囹圄只因那些自称朋友之人背叛了你”、“你的狱中同伴已告发了你”、“外面的朋友都抛弃了你”。通过挑拨人际旧情，使其深陷孤立无援之境，最终迫使其屈服崩溃。

每当我内心动摇，萌生投靠敌对势力的念头时，总是在经历极度孤独与深切渴望陪伴之后（我将在第十四章详述这些自我背叛的现象）。在这样的时刻，狱卒或敌人可能成为替代性的朋友。

通过过度负罪感进行情感勒索

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隐秘的负罪感——一种无意识的负罪感，这种情绪会在极端压力下浮出水面。唤起负罪感是母亲掌控孩子心灵最古老的手段。

她警告的指责、威胁的眼神赋予她神奇的力量，助长了根深蒂固的负罪感，这种感觉可能持续贯穿他们整个成年生活。童年时我们依赖父母，却也正因如此而怨恨他们。我们可能对至亲之人怀有隐秘的破坏性愿望，并为此感到内疚。毋庸置疑，多数人对家庭怀有深厚的忠诚，但其原始本性却憎恨着所爱之人，这种憎恨又令他深陷愧疚。深埋在他潜意识中的认知是：在那些充满敌意的幻想里，他曾感到自己足以犯下诸多罪行。西奥多·赖克曾提醒我们注意潜藏在每个人体内的未知原始杀人犯，当恐惧与抑郁交织时，其供认罪行并渴望受罚的冲动便易于被激发。这种关于隐匿的婴儿期敌意与破坏性的概念，常令外行人难以接受。但请想想侦探小说为何如此受欢迎。我们或许告诉自己，享受阅读这些故事是因为认同机敏聪慧的侦探，但正如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我们体内被压抑的罪犯也在运作，我们同样认同那个毫无良知的杀手。事实上，正是我们被压抑的敌意使阅读暴力行为对我们充满吸引力。

系统性地利用潜意识中的负罪感来制造顺从的方法虽不甚为人所知，但若结合我们对潜意识供认冲动及惩罚需求的探究，或许能更透彻地理解其本质。负罪感可能在童年早期便被灌输——当父母过早且过度地要求孩子为违抗行为道歉，或通过其他手段让孩子在尚未理解特定行为的不道德或错误本质时，便背负罪责感。教导孩子辨别是非善恶，本不应与对惩罚的顺从性焦虑预期相绑定。我曾接触的案例中，患者母亲对孩子每次小过失都哭喊着“看看你把我逼成什么样子！”耗费漫长治疗才使患者摆脱了对母亲的潜在杀意及其引发的负罪感重负。

在政治领域，许多此类早期养育方式被象征性地重演。持续的清洗与忏悔——正如我们在极权国家所见——唤醒了深藏的负罪感。较轻的叛逆或颠覆罪行必须被承认，以掩盖那些更深层的犯罪念头。那些持续遭受审讯和调查者的个人反应，为我们揭示了事件的本质。长时间审讯本身就能重新唤起受害者潜藏的无意识负罪感。在极端情绪状态下，经历持续指控与全天候审讯后，当受害者被剥夺睡眠并陷入绝望深渊时，可能丧失辨别能力——既无法区分被指控的真实罪行，也无法分辨自身幻想的无意识罪责。若其成长经历已使其背负近乎病态的负罪感，此时便将彻底丧失抵御精神灭杀攻击的能力。即使是常人，在如此悲惨的境遇下也可能屈服，不仅是因为审判本身的行动，更是因为种种削弱意志的因素。睡眠不足、饥饿与疾病会使人陷入彻底的混乱，使任何人都易受催眠影响。我们都曾经历过过度疲劳带来的精神恍惚。集中营的受害者深知饥饿尤其会导致精神失控。在极权监狱或集中营的虚幻世界里，这些效应被放大到极致。集中营的受害者深知饥饿如何诱发精神失控。在极权监狱或集中营的荒诞世界里，这些效应被放大到极致。（集中营里的谈话通常围绕食物与对纵情大食的美好回忆展开。思维无法运转：它完全被进食和

食物幻想占据。一个词由此诞生来形容这种对再次饱餐的执念：胃部自慰（Magen-onante）。这类谈话往往取代了所有智力交流。）

纳粹通过巧妙利用受害者潜意识中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源于他们对受害者心灵深处的窥探——往往能将勇敢的抵抗战士转化为温顺的帮凶。他们未能全面得逞的原因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大多内心已做好准备，面对纳粹施加的残暴对待。其二是尽管纳粹手段狡诈，却不及共产主义洗脑者系统化的伎俩那般令人无法抗拒。当纳粹暴行的受害者最终崩溃时，促使他们屈服的往往不是酷刑，而是针对家人的报复威胁。当尘封多年的童年创伤骤然爆发，混乱与疑虑便席卷而来。敌人突然将忠诚的悖论摆在你面前：父亲还是朋友？兄弟还是祖国？妻子还是荣誉？这残酷的选择令人窒息，而当审讯者利用你内心的矛盾时，便能轻易逼你屈服。忠诚之间的冲突使任何选择都成为背叛，这引发了令人瘫痪的疑虑。这种针对人心灵最脆弱之处、针对人的良知、针对其从犹太-基督教伦理中习得的道德体系的精心策划却微妙的攻击，瘫痪了理性，更轻易地将受害者引向背叛。审讯者巧妙试探受害者对父权形象、朋友及子女的原始负罪感。他狡黠地利用受害者与父母间早期的矛盾羁绊。潜藏的道德缺陷与负罪感骤然爆发足以使人泪流满面、彻底崩溃。受害者退化为婴儿般的依赖与顺从状态。

一位体格魁梧的前荷兰抵抗运动英雄，因其庞大的体型和惊人的力量被称为“金刚”。当纳粹掳走其弟弟并威胁要杀害这位青年后，他很快沦为纳粹的叛徒工具。从精神病学角度，金刚最终向敌人投降并成为其叛徒工具的行为，可视为一种防御机制——源于他对弟弟隐秘的攻击性情绪所引发的深刻负罪感（博里）。

另一个崩溃的例子出现在一位年轻抵抗战士的故事中：当纳粹威胁要折磨与他同囚的父亲后，他终于像孩子般嚎啕大哭，承诺会告诉他们交代所有的情报。随后他被押回牢房，次日将再次施以软化手段——这是审讯者惯用的套路。这些审讯者深谙在反复侵入负罪感时，持之以恒追问何其有效。尽管盟军扫荡比利时与荷兰西南部使两囚徒当夜获释，少年却长期陷于抑郁——他明知敌人的承诺无法保护父亲，却仍因差点为救父出卖地下组织挚友而备受折磨。在随后对男孩精神崩溃与抑郁症的心理探索中，他的梦境揭示了他长期压抑的攻击性幻想——他曾在梦中象征性地杀害父亲。这种无意识的幼稚敌意所引发的负罪感，比对战友的潜在背叛更沉重地压在他的良知上。对自身困境的清醒认知加上重返军事活动，极大帮助他化解了折磨他的内心冲突，但其他被迫背叛者却没那么幸运。当他们最终意识到背叛的严重性时，数人陷入精神性抑郁，甚至有人自杀身亡。

生存法则与忠诚法则

在朝鲜战场上，那些逐渐屈服于敌方系统性精神压迫的战俘，在敌方势力范围内的有限时间内，曾试探性地参与制作可用于共产主义宣传的材料——他们遵循着一种奇特的心理法则：当无法对抗并击败敌人时，就必须加入敌方阵营（A. 弗洛伊德）。后来，其中部分人被极权主义宣传彻底洗脑，选择留在中国并投身极权体系。还有些人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因背叛战友而遭受的惩罚。后来，其中少数人竟被极权主义宣传彻底蒙蔽，选择留在中国及极权体系内。有人这样做是为了逃避背叛战友后的惩罚。

人若不为背叛行为自我辩解，便不会成为叛徒。1940 年荷兰向德军投降时，我目睹数位坚定的反纳粹人士展现出这种心理投降的普遍机制。当他们目睹德国展现的强大力量时，便自我安慰道：“纳粹主义或许也有可取之处”。那些因最初的精神投降而需要自我辩解、无法及时止步自省的人，最终沦为叛徒的合作者。他们完全被敌人所迷惑，那些最初在心理上投降并需要自我辩解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及时制止自己，无法对内心说“等等，冷静思考”——最终沦为叛徒与帮凶。他们完全被敌人的力量展示所迷惑。同样的自我辩解与为敌人开脱的过程，在战俘营中也悄然开始。

集中营的经历让我们得以窥见这种对敌人的被动屈从能发展到何种地步。由于人类对关爱的深层渴求，许多囚犯只为一件事而活：守卫的一句友善话语。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会强化他们对恩典与接纳的幻觉。当这些囚犯——多为长期滞留集中营者——获得看守认可后，便轻易沦为纳粹的心腹爪牙。他们开始效仿残暴的狱卒，对同营囚徒施以酷刑。这些被称为卡波的傀儡囚犯，其残暴与报复心甚至超越官方监工。由于被误解的内在需求，洗脑者与施虐的集中营头目极度渴求帮凶。他们不仅充当宣传机器的传声筒，更成为狱卒洗刷罪责的挡箭牌。

当一个人必须在饥饿、死亡行军和酷刑之间选择，或是暂时屈服于敌人的幻象时，他的自我保护机制往往像反射动作般运作。它们助他为屈服于心理压力寻找千百种辩解与开脱。在朝鲜战俘营因与敌军合作而受军事法庭审判的军官之一，为其行为辩解称此举是为了保全自己和部下的性命。这难道不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辩解吗？尽管未必属实，但这种辩解恰恰凸显了自我保护机制通常远比意识形态忠诚更强大的事实。未曾直面此般痛苦困境者，绝无可能客观断言自身在该情境下的抉择。身为精神科医师，我认为当威胁与心理压力足够强烈时，多数人终将屈服妥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纳粹地下组织中，曾有体格强壮的青年自认能抵御一切压力，绝不会出卖战友。然而他们甚至无法想象精神摧残的阴险手段。反复的纠

缠本身，比肉体折磨更具毁灭性。正如我们所言，肉体折磨带来的痛苦会使人暂时失去意识，从而遗忘痛苦，但当受害者苏醒时，预期的折磨便开始了：“还会再发生吗？我还能承受吗？”这种预期感令意志彻底瘫痪。自杀念头与对死亡的认同无济于事——敌人不会放你死去，而将你从濒死边缘拖回。对酷刑重启的预期加剧了内心焦虑：“凭什么我得承受这一切？为何非要当英雄？”抵抗力终将崩溃。

心灵向新主人屈服的过程并非在胁迫与疲惫的冲击下立即发生。审讯者深知，在压力暂时松弛的阶段——此时受害者会反复在脑海中重演酷刑经历——最终的投降正在酝酿。在这段沉思与预期的紧张状态中，屈服的深层渴望悄然滋长。那些愚蠢问题的持续重复，日复一日地循环，直至耗尽心智，迫使它给出审讯者想要的答案。除了精神耗竭的武器，他还利用感官的肉体疲惫。他可能使用刺耳的、令人痛苦的噪音，或持续的强光手电筒使眼睛失明。闭眼或逃离噪音的本能使受害者的精神定位陷入混乱。他丧失平衡感与自信心，渴求睡眠却别无选择，只能屈服。那份孩童般的渴望——渴望成为威胁性巨型机器的一部分，渴望与远超囚犯自身的力量合而为一——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毫无保留的投降：“随你处置我吧。从此刻起我就是你。”泰勒通过一项涉及 350 名男性志愿者的实验证实：唯有剥夺睡眠才能引发多种精神异常反应。他让受试者连续 102 小时不眠。四十四人几乎立即退出实验，因他们感到过度焦虑与烦躁。在四十小时无眠后，70%的受试者已出现幻觉、妄想、错觉等异常体验。出现真实幻觉者被终止实验资格。第二夜过后，所有受试者均出现间歇性思维紊乱。当事后被告知自身行为时，参与者们感到尴尬。

情绪反应的变化最为显著——欣快之后紧随抑郁；消沉与躁动；对其他嫌疑人的异常行为漠不关心。实验表明，持续清醒会导致某种毒性物质影响大脑与精神。

唯有少数坚强、独立、自给自足的个体，那些已征服自身依赖需求的人，才能承受如此压力，或甘愿在压力下赴死。

自我控诉、捶胸顿足、无条件臣服于长者规则的仪式，是古老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它基于对至高无上且全能力量的或多或少无意识的信仰。这种力量可能是单一的政党国家，也可能是神秘的神祇。它遵循古老的内在机制——*Credo quia absurdum*（“正因荒谬，我才信”），即对超越现实的超世界虔诚臣服，那超世界比我们感官所及的现实更为强大。

为何极权主义与正统教条意识形态会固守如此僵化的态度，禁止对基本前提进行探究？这实为复杂的心理命题。其根源或与对变革的恐惧相关——恐惧改变习惯的风险，恐惧自由本身，这种恐惧在心理层面或许与对死亡终极性的恐惧相连。

对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否定，将威权主义者凌驾于凡人之上。其暂时的权力与全

能感，使其产生永恒的错觉。在极权主义中，他否认死亡与短暂的存在，从未来借取力量。他必须创造并确立终极真理与保护性教条，以证明自己对抗死亡与短暂的斗争。自此，新的根本性确信必须被锤入信徒与奴隶的脑海。

在身心遭受严重攻击的极端情境下，人类心理内部的运作机制，由安娜·弗洛伊德在其论述人类普遍心理防御机制的著作中予以阐明；此前，我本人也曾在多篇著作中尝试分析人们抵御恐惧与压力的各种防御方式。

在洗脑与精神灭绝的末期阶段，受害者自我贬抑式的屈从实为一种内在防御机制——它以魔幻方式消灭了审判者的存在。他们越是自我控诉，审判者的存在就越缺乏逻辑依据。屈服并加倍残酷对待自我，恰似令审判者与法官丧失力量，昭示着控诉体制的荒谬本质。

我们可以说，洗脑与精神灭绝会激发与忧郁症患者相同的内在防御机制。通过精神上的自我鞭笞，他们试图摆脱恐惧并逃避更深层的负罪感。他们预先惩罚自己以克服某种隐秘、未知且更严重的罪行终将受到最终惩罚的念头。精神灭绝的受害者通过对自己施加比审判者更残酷的折磨来征服施虐者。以这种被动方式，他消灭了敌人。

神秘的受虐契约

在阿瑟·科索勒的杰作《正午的黑暗》中，他细致描绘了审讯者与受审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心理博弈、逻辑推演与辩证较量。老布尔什维克鲁巴绍夫受昔日对党的忠诚所制约，承认自己策划了反对党和党的路线的阴谋。他部分动机源于想尽最后一份力：这份供词是他献给党的最终牺牲。我更愿将这份供词解读为审讯者与受审者之间神秘的受虐契约——这种契约在其他洗脑过程中亦屡见不鲜。（“受虐癖”一词原指从痛苦惩罚中获得性满足，后泛指通过痛苦与屈辱获得的任何满足感。）这是受刑者献给施刑者的最后礼物与诡计。仿佛在呼喊：“善待我吧。我认罪。我屈服。善待我，爱我吧。”历经种种暴行、催眠、绝望与恐慌后，他仍渴求着人性的陪伴，但这份渴求充满矛盾，掺杂着深沉的鄙夷、仇恨与苦涩。

受刑者与施刑者逐渐形成奇特的共生体，彼此相互影响。正如治疗过程中患者认同精神科医生的情形，每日审讯与对话中无意识的情感移情悄然发生——囚徒认同审讯者，审讯者亦认同囚徒。囚徒被囚禁于陌生、严酷且陌生的世界，其认同敌人的程度远超敌人认同他的程度。他可能不自觉地接纳敌人所有的生活准则、价值判断与态度。这种对敌方意识形态的被动投降由潜意识过程决定。此类精神共鸣

的危险在于最终所有道德评判都消失了。我们曾在德国目睹过这种情形。纳粹主义的受害者们竟也接受了集中营的理念。

在精神灭绝中，我们面对的仪式如同中世纪猎巫行动，只不过如今这套仪式已变得更为精致。控诉者与被控者相互扶持，共同参与这场自白与自我贬抑的仪式。通过合作，他们攻击那些认同他们的旁观者，使后者产生罪恶感、软弱感和顺从感。莫斯科大清洗审判令许多俄罗斯人产生罪恶感；聆听忏悔时，他们必定暗自思忖：“我本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本可能取代那个人的位置。”当英雄沦为叛徒，他们内心潜藏的叛逆念头便使自己感到软弱恐惧。

这种解释或许显得过于复杂纠结，甚至自相矛盾，但它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灭绝的运作机制。施虐者与受虐者皆是自身无意识罪恶感的牺牲品：施虐者将罪责投射到外部替罪羊身上，通过攻击受害者来赎罪；而受害者同样怀有源于童年压抑敌意的罪恶感。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感觉被控制着，但在无休止审讯和宗教裁判所式的精神灭绝氛围中，被压抑的敌意被唤醒，化作来自遗忘过去的恐怖幻象，受害者能感知却无法把握或理解。与其承受被指控为叛国和破坏的罪名，不如承认这种令人恐惧的罪恶感——受害者公开的自我指控实为消灭内心控诉者与迫害审讯者的诡计。自我控诉愈甚，审讯者的存在理由愈微薄。受害者的走向绞刑架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杀死了审判者，因为双方存在着相互认同：当受害者开始自我指控时，控告者便丧失了权力；而明日控告者自身也可能被控告并送上绞刑架。

理解了控诉者与被控者之间这种奇特的受虐契约，我们便能简单解答两个问题：为何人们渴望控制他人思想？为何他人会坦白屈服？答案在于受害者与审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他们本质相同。在此情境下，双方都无法掌控内心深处那些隐秘的罪恶与敌意。本质区别。他们本质相同。在此情境下，双方都无法掌控内心深处那些隐秘的罪恶与敌意。

显然，扮演审判者比扮演受害者更轻松——不仅因审判者能暂时免于精神与肉体摧残，更因惩罚他人——那些我们内心深处视作罪恶的存在——远比直面自身隐秘的罪恶感更为简单。实施精神灭绝是较轻的侵略罪行，它掩盖了更深层的罪恶：那些未被化解的隐秘仇恨与毁灭欲望。

洗脑与精神灭绝涉及的心理过程综述

在本章结尾处，在描述导致屈服于敌方战略的各种影响因素之后，有必要简要概述其中涉及的心理过程。

第一阶段：人为崩溃与去条件化

审讯者试图削弱囚犯的自我意识。尽管最初采用的是肉体折磨——饥饿和严寒至今仍极具杀伤力——但肉体折磨往往反而会增强人的顽强意志。酷刑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对旁观者（民众）想象力的威慑。当敌人需要利用民众的脆弱时，他们对酷刑的狂热想象反而更易引发其崩溃。（当然，偶尔也有施虐成性的敌人会从酷刑中获得个人快感。）

敌人惯用的手段包括：威吓暗示、戏剧性劝说、群体催眠、羞辱窘迫、孤立隔绝、持续审讯、压垮脆弱心智、不断激化自怜情绪。审讯者凭借耐心与时间，终能软化顽固灵魂。

正如许多古老宗教通过羞辱受难者为新信仰铺路，此处亦是为使其接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此阶段中，受害者可能出于纯粹的知识机会主义而自觉屈服。

第二阶段：向敌人屈服并主动认同

正如前文所述，投降的时刻往往来得猝不及防。顽固的负面暗示性仿佛在关键时刻骤然转化为屈服与认同。审讯者所称的“内心顿悟与皈依”，实则是受害者内在策略的彻底逆转。从这一刻起，用精神分析术语来说，寄生性的超我便盘踞于人的良知之中，而他将开始复述新主人的话语。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突然投降常伴随着歇斯底里的哭笑爆发，如同婴儿在顽固发脾气后投降。审讯者若采取父辈般的态度，更易促使受害者进入此阶段。事实上，许多战俘正是被某种父辈式的善意所笼络——生日礼物、糖果馈赠，以及对更多欢欣之事的承诺。

莫洛尼将这种突然屈服比作某些神学仪式所描述的神显或虚己（内在转化）。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屈服是无意识的纯粹情感过程，已脱离被洗脑者的理性控制。我们也可称此阶段为自我催眠阶段。

第三阶段：新秩序的再塑

通过持续训练与驯化，新唱片必须被刻出沟槽。此过程可比作主动催眠式转化。任何对旧思维模式的偶发性倒退，都需如第一阶段般予以矫正。受害者每日协助其为新意识形态寻找合理化依据。审讯者向其灌输新的论据与推理。

这种对长期逃避强化灌输者的系统性洗脑，构成了洗脑的实质性政治层面，象征着此刻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冷战。

第四阶段：摆脱极权主义的魔咒

当被洗脑者重返自由民主环境时，催眠魔咒即刻破除。随之出现暂时性神经反应，如哭泣发作、罪恶感与抑郁情绪。考虑到其曾屈服于敌方灌输，对敌对祖国的预期可能强化这种反应。洗脑时期化作噩梦。唯有原先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坚持到底，但即便如此，我亦目睹敌人施加的精神压力过于有效，竟将昔日同志转化为

对该政权永世仇恨者。

第二部分

群体服从技巧

本书第二部分旨在揭示各类用于改变群体行为和思想的政治与非政治策略，从简单的广告宣传起步，继而考察心理战与冷战实例，进而剖析用于内部整饬人类思想行为的手段。第二部以对情感操控与攻击工具之一的精妙剖析——恐惧武器如何运作。及其在人类中引发的反应。

第五章

思想领域的冷战

唯有盲目的一厢情愿，才能让我们相信自身社会免受第一部分所述的阴险影响。事实上，这些影响无处不在，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非政治层面，其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威胁程度，与侵略性极权政府本身同样危险。

每种文化都会将某些行为模式制度化，这些模式传递并鼓励特定的思维与行动方式，从而塑造其公民的品格。当个体成为持续精神操控的对象时，其程度便显现出来——这种操控可能削弱智力与精神力量，将心智知识用于驯化与塑造而非教育，使文化机构倾向于弱化个体的思想力量。个体成为持续精神操控的对象，文化机构便可能削弱智力与精神力量；当对心灵的认知被用于驯化与塑造而非教育时，文化本身便会催生倾向于接受威权生活方式的男女。缺乏独立思想者，极易沦为独裁者的棋子。

令人不安的是，即便聪明人往往也缺乏独立思考的头脑。思维模式——无论是趋向顺从还是其他——在人生早期便已定型。

阿什在针对学生的关键社会心理学实验中发现：简单测试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试者会向错误的多数意见妥协，75%的实验对象在不同程度上附和多数观点。对许多人而言，权威的分量远比权威的质量重要（参见第十章）。

若要学会在各个层面守护心灵的完整性，我们不仅需审视当代文化中直接涉及权力斗争的层面，更要警惕那些通过钝化我们的精神觉知或利用我们的易受暗示性，最终将我们引向极权主义精神死亡——或称精神麻木——的文化发展。持续的机械化大众传播带来的暗示与缓慢催眠效应，助长了思想的同质化，可能诱使公

众步入调整、整合与均等的“幸福时代”，在此期间个人观点完全被定型化。

清晨醒来，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与天气预报。接着传来权威般的声音，建议我服用阿司匹林缓解头痛。我偶尔会“头痛”（世界亦然），而我的头痛，如同所有人的头痛，源于生活强加于我的种种冲突。收音机却告诫我：既不要思考冲突，也不要思索头痛。它反而建议我退缩到那古老的魔法行动中——吞下一颗药丸。尽管我听着这位素未谋面的播音员远程开出的处方不禁发笑，尽管我短暂沉思人类对化学魔法的奴性，我的手却已开始向阿司匹林瓶伸去。毕竟，我确实头痛。

逃离日常生活中机械重复的暗示极其困难。即便批判性思维予以拒绝，它们仍会诱使我们做出理智认定愚蠢的行为。

现代生活的机械化已使人变得更被动，更倾向于顺应现成的规范。人类不再依据个人价值观、良知与道德判断思考，而是日益接受大众传媒灌输的价值观。晨报头条塑造其暂时的政治立场，广播向耳中轰炸建议，电视则使其持续处于惊骇与被动凝视的状态。纵使意识层面抗拒这些无名之声，其暗示仍悄然渗入其精神体系。

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影响往往并非源于人类的破坏性，而是源于改善世界、丰富生活的愿望。人类为自我助益而建立的制度、为提升生活而发明的工具、为掌控自我与环境而取得的进步——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毁灭性武器。

舆论工程师

我国正日益形成一种共识：无论是为政治理念还是冷冻食品策划精心设计的宣传攻势，都能成功向公众兜售任何想要推销的思想或商品，让民众选举任何指定的政治人物。近来，某些选举活动由所谓的舆论工程师操盘，他们运用现代大众传播的所有技巧与当代心理学知识，诱使美国民众投票支持那些支付公关人员薪酬的候选人。此类高压广告的危险在于：出价最高者——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至少在短期内，都能左右民众购买或投票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可能根本不符合民众的真实利益。

那些精通说服术与舆论塑造的专家们，正试图用所有可用的传播工具揉捏民众的思想面团：小册子、演讲、海报、广告牌、广播节目和电视秀。他们将思想的自发性与创造力稀释成僵化的流线型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在引导我们思维的同时，却让我们仍沉浸于自以为独具匠心的错觉之中。

所谓人民意志或群众意志，唯有当集体行动启动之后，当民意通过投票箱或愤怒反抗得以宣泄之时，我们方能知晓。这再次昭示了掌控舆论工具与机器者何其重

要。

在这种宣传与共识工程的冲击下，公民对领导者的信任可能动摇，民众也可能逐渐习惯于官方的欺骗。最终，当民众对任何政策主张丧失信心，丧失理性判断能力时，便更易受煽动家或独裁者操纵——这些人的力量正源于民众的迷茫与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这种理念营销最险恶之处或许在于：即便购买专家意见者，乃至意见专家本身，往往也浑然不觉自身行为。他们同样被当下的思潮所裹挟。口号“舆论管理”，他们再也无法评判自己雇佣的工具。

目的永远不能证明手段正当；在这条路上走得足够远，终将渐次滑向极权主义。

此刻我国正开展一项精密的动机研究，旨在探究消费者为何购买及购买何物。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们？其终极目标是突破消费群体的心理防线。这种刺激人类需求、煽动民众欲望的操作，恰恰是我们矛盾文化哲学的体现。商业化的心理研究旨在向公众——尤其是潜在消费者——兜售远超其真实需求的物品。为此必须唤醒某些幼稚的本能冲动：手足竞争的嫉妒、邻里嫉妒、对甜食的贪婪、色彩的诱惑、奢侈品的无尽渴求。商业心理学家教导销售者如何在广告中规避负面联想，如何隐晦地激发性暗示，如何让一切显得简单快乐、成功稳妥！他们指导商家如何抬高顾客的自我价值感，如何巧妙奉承消费者。营销工程师发现，大众渴望产品传递力量与阳刚之气。汽车必须拥有更强马力，以平衡车主内心的脆弱感；汽车必须彰显社会地位与声望，否则缺乏这种象征的人便会感到空虚。广告公司痴迷于构建“广告大学”——这个闪耀着虚假理念的世界，歌颂“世人渴望被欺骗”的本质，强化势利眼吸引力，彰显庸俗的炫耀心理，而这一切只为将更多商品推入贪婪的消费婴儿之口。在这个广告世界里，勤勉的买卖双方共同编织着人造需求。虚妄世界的构建正悄然威胁着我们的思想疆域，其影响之深远堪称危险。

这种状况凸显了公众病态的贪婪——他们甘愿牺牲对真实价值的认知，沉溺于私欲幻想。大众逐渐被虚饰的价值所驯化。当然，自由的公众终将建立起抵御口号的防线，但欺诈与猜疑仍会穿透我们意识的屏障，留下令人焦灼的不满。毕竟，广告的本质正是让人对现有事物心生不满的艺术。与此同时，人类显然仍能抵御某些诱惑，但那些诱惑往往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最终在我们内心深处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在这个喧嚣过剩、挫折丛生的时代，许多“自由”思想者已放弃对体面与个性的抗争。他们向时代精神投降，往往浑然不觉。舆论每日塑造着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不知不觉间，我们可能沦为固执己见的机器人。虚伪的缓慢胁迫，文化中具有同质化效应的传统——这些都在改变着我们。我们渴求刺激、惊心动魄的故事、感官享受。我们寻找制造表面恐惧的情境来掩盖内心焦虑。我们热衷逃避到非理性世界，

只因厌恶自我审视与独立思考的挑战。我们的闲暇时光日益被自动化活动占据：被动接收广播词句，凝视电视屏幕。我们乘车匆匆赶路，靠安眠药入睡。这种生活模式反过来可能为思想遭受新的偷袭打开大门。当无聊侵袭时，任何诱人的暗示都可能被欣然接纳。

心理战作为恐怖武器

人类的每一次交流，要么是客观事实的陈述，要么是试图暗示虚构的情境。这种对事实的扭曲与篡改，直指人类交流的核心。针对人类真理观与思维的语言攻势似乎永无止境。例如，若我能在潜在敌人尚未准备战斗时，就使其心生恐惧、陷入绝望，甚至预感即将失败——那么这场战役便已胜券在握。

人类以恐怖面具配以嘶吼谎言来操纵敌友的策略，其历史与人类本身同样悠久。原始人运用恐怖面具、魔法魅惑或自我欺骗，正如我们用高声言辞说服他人或自己。他们施展魔法彩绘，我们挥舞意识形态。诚然，我们身处广告、宣传与公关的时代。但唯有在独裁与极权统治下，这类人类习性才膨胀为系统性的心理攻势。

独裁者用以对付本国人民的武器，同样可能指向外部世界。例如那些转移臣民视线、使其远离现实困境的虚假供词，还具有另一重效果：它们旨在（有时确实成功）恐吓全球公众。通过强化独裁者无所不能的神话，此类供词削弱了人类抵抗的意志。若能在和平时期软化未来敌人的抵抗力，极权军队便可能在战时赢得廉价而轻松的胜利。极权主义心理战主要为此目的服务。这是企图通过宣传与催眠使世界屈服的努力。

早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就组建了“公众舆论局”，旨在影响法国人民的思想。但将舆论操控发展成庞大而组织严密的机器，却是德国人的功劳。他们的心理战在和平时期——即所谓的“战争间隙”——演变为进攻性战略。正是纳粹对欧洲民族精神的打击及其对邻国的心理战，促使世界各国开始组建自己的心理战力量，但直到战争后期才取得一定成效。德国人拥有漫长的先发优势。

希特勒的心理炮兵主要以恐惧为武器。例如他建立的第五纵队网络，其核心任务就是在未来交战国民众中散布谣言与猜疑。民众不仅因间谍体系本身而惶恐，更因间谍传闻而惶惶不安。这些第五纵队散播着失败主义和政治混乱的口号：“法国为何要为英国赴死？”恐惧开始主导人们的行为。整个欧洲不再直面德国入侵的现实威胁，不再为此做准备，而是沉溺于间谍故事的惊悚，讨论无关紧要的问题，无休止地争论替罪羊和少数群体。希特勒正是利用这种蔓延的模糊恐惧模糊了真实

议题，通过打击敌人的战斗意志来削弱他们。

希特勒不仅满足于对欧洲自卫意志的战略性打击，更试图用恐怖威胁瘫痪整个欧洲——不仅是轰炸、破坏和占领的威胁，更包含他自诩残暴所暗含的心理威胁。对不共戴天之敌的恐惧，使人尚未开战便更愿屈服。希特勒在国内的罪行——集中营、毒气室、大屠杀、遍及德国的恐怖氛围——既是其恐吓宣传机器的得力工具，亦是他妄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极权主义者还有另一件重要武器，用于恐吓世界屈服——心理冲击武器。希特勒让敌人始终处于混乱与外交动荡中，他们永远无法预知这个不可预测的疯子下一步会做什么。希特勒从不讲逻辑，因为他深知世人期待他如此行事。逻辑可被逻辑反驳，而荒谬却无法辩驳——它令理性思考者陷入混乱。在冷战中，大谎言与单调重复的胡言乱语比逻辑与理性更具情感感染力。当敌人仍在为首个谎言寻找合理反驳时，极权主义者已能用另一个谎言发起新一轮攻势。

战略性心理冲击是纳粹在 1936 年进驻莱茵兰以及 1939 年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使用的手段。斯大林在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该战争由其策划）采用了相同策略，而中朝两国指控美国进行细菌战时亦是如此。通过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动，极权主义者将注重逻辑的敌人置于混乱之中。敌人被迫否认宣传谎言或解释真实情况，这些举动立即使其陷入弱势的防御地位。因为奔腾的谎言永远无法被追上，只能被推翻。

心理冲击技法还有另一重效应：它可能彻底扰乱普通公民的思维，使其停止独立判断，转而被动依附于他人观点。希特勒在 1940 年停战后摧毁华沙与鹿特丹——此举完全违反国际法——使法国陷入瘫痪，并震慑了其他民主国家。在道德愤慨的麻痹状态下，它们在心理上丧失了应对纳粹暴行的能力。

正如现代科技进步使物理战争武器日益精良，人类对舆论操控的理解深化，同样催生出日益精良的心理战武器。

思想灌输的密集轰炸

当辩论与宣传的锤击声持续侵入我们的思维，可能引发两种反应：或导致冷漠无视的“我不在乎”态度，或激发更强烈的求知欲。遗憾的是，前者更为普遍。在这个向个体投射过多混乱图景的世界里，逃避学习与觉醒的现象实在太过常见。为了捍卫基于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不断重拾学习的信念。否则，我们终将成为精心策划的言语攻势的牺牲品——那些直指心灵与良知的攻击。

我们永远无法充分意识到感官与思维所承受的持续胁迫，那些潜移默化的暗示性攻击可能突破洞察力的认知屏障。重复与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会耗尽个体意志，最终诱使他接受自己最初抗拒和鄙夷的所谓真理。

极权主义者极具巧思，通过反复渲染西方世界如何残暴对待无辜和平民众，来唤醒我们潜藏的罪恶感。他们利用人们对所有领导者潜藏的批判态度，通过嘲弄手段瓦解我们对领袖的认同。有时他们采用乏味策略使民众昏睡。他们企图让整个西方世界沉溺于和平共处的幻觉中，陷入催眠般的沉睡。更精妙的策略是迫使我们斩断与过去的所有忠诚纽带，远离亲属与父母。你越是抛弃他们及其所谓过时的观念，就越能配合那些企图精神控制你的人。凡是旨在煽动恐惧与猜疑的政治策略，往往将不安的个体孤立至彻底投降——投向那些在他眼中比昔日友人更强大的势力。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切莫忘记在论战中，那些掌握最精妙有力言辞策略者往往胜出。极权主义者会对臣民进行密集的辩证法训练，以防其疑虑占据上风。他们正以更隐蔽的方式对世界其他地区实施同样的操控。

我们必须通过更完善的训练与更深刻的理解，来应对极权主义者令人精疲力竭的言语攻势。若试图逃避这些心理防御问题或否认其复杂性，冷战终将因言语的缓慢侵蚀——以及更多言语的侵蚀——而逐渐失守。

共存之谜

与一个永不停歇地动用心理炮火的极权体制共存是否可能？自由民主制度能否强大到足以容忍极权主义对自身权利与自由的寄生式侵蚀？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曾在保障宽容与正义的共同法则下共存。教会不再焚烧背教者。

在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这两种对立力量能在监督性法律和相互善意的庇护下共存之前，必须建立起更深厚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当前的实际冷战和心理战显然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对极权主义者而言，“共存”一词的含义与我们截然不同。极权者可能将其视为空洞口号或绥靖手段。危险在于，和平共存的概念可能沦为伪装，麻痹人们对必然互动的警觉，从而使心理优势方获利。列宁曾谈及战略喘息期（peredyshka）旨在削弱敌人。过于热衷的和平运动可能意味着对问题的表面安抚。此类呼吁必须反复斟酌，以免导致防御力量危险地松懈——面对冷酷无情的敌人，防御必须始终保持动员状态。

共存可能意味着令人窒息的从属关系，如同囚徒与狱卒的共处。其最佳状态或许只能模仿动物界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那些彼此需要却又永恒寄生的物种，抑或婴儿依赖母亲的幼年时光。

对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们而言，共存必然意味着自由与互惠。极权主义的非自由理念无法与自由共存。某些概念和思想注定无法共生，彼此之间绝不容忍。

要实现共存与合作，必须建立起融合的理念与可比拟的图景——即思想的同质性、归属感、全人类的相互依存，尽管种族与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否则，军事实力更强的意识形态终将扼杀弱者。

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双方都深刻理解单纯共存的难题与复杂性，理解相互妥协与限制的必要性，理解人格的多样性，尤其要理解每个个体内心矛盾且不可调和的思绪与情感并存的状态，理解人类与生俱来的矛盾心理。它要求我们既要尊重个人权利，也要维护集体权益。若将共存作为口号，我们可能模糊其中涉及的问题，甚至发现这个词正被当作遮掩渐次向强势战略家投降的旗帜。

第六章

极权主义及其独裁统治

大规模洗脑技术确有其事。若审判者足够强悍狡黠，此技术便能在国度生根。纵使只是暂时，他仍能我们将多数人化作牺牲品。

社会结构中究竟存在何种缺陷，使人类如此易受群体性精神操控？这与洗脑现象同样具有深远影响。近年来我们日益意识到人类相互依存的复杂性及其伴生的困境。

我深知，随着时间推移，对精神胁迫与思想控制课题的探究愈发令人不安。因为这可能对当下现实构成更直接的威胁，我们对中国和朝鲜问题的关注不得不让位于家门口更迫切的需求。极权主义倾向能否在此蔓延？哪些社会征兆可能催生此类现象？严酷的现实将我们置于一场普世精神斗争之中：思想控制（及其衍生现象）正与我们的道德准则、个人意志、独立思想以及具有自主性与尊严的个人良知展开搏斗。

未来的社会科学家将更能阐明极权主义思想与行为在人类中滋生的根源。我们知道，战争与革命之后，这种精神退化更易趁虚而入，尤其在某些心理变态者的助推下——他们恰恰在人类的苦难与混乱中如鱼得水。同样真实的是，下一代人往往会自发纠正前代的罪行，因为残酷的体制已对他们构成致命威胁。

然而我的任务是描述极权主义进程（即思维与行为的退化）在当代的若干症状，须知这种制度是对人类精神持续发展的最暴力扭曲。没有极权主义思维，洗脑便无从谈起。

当代政治实践的悲剧性事实昭示：应用心理学技术足以洗脑整个民族，将公民

降格为某种无意识的机械化存在，并使其视此为常态。或许通过考察一个虚构国度——为便于阐述，我们称之为“极权国”——最能揭示这种恐怖现象的成因。

人的机械化

首先需声明：切勿将任何具体国家与这个假想国度完全等同。本文探讨的特质可能在现实中显现。极权主义特征固然存在于纳粹德国，今日亦可见于铁幕之后，但世界其他地区亦或多或少存在。极权主义国度，即政治理念沦为纯粹宣传工具的荒谬教条之地；即某个团体——无论左派或右派——攫取绝对权力，自诩全知全能之地；即异见与分歧皆成罪行，彻底顺从方能苟活之地。

极权主义——即利维坦式国家——是我们委婉称之为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的归宿，而系统化的暴政正是其组成部分。这种体制既非源于社会主义，亦非源于资本主义的任何真诚政治哲学。极权主义领袖或许会宣扬各种意识形态，但这些不过是为政权辩护的口号。必要时，极权主义能一夜之间改变其口号与行为。在我看来，极权主义本质上是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独裁者统治世界的野心。正如“民主”一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概念同样可能成为暴君狂妄意图的伪装。

由于极权主义本质上是每个人格中某种心理现象的社会表现，最好从催生、滋养并维系它的内在人性力量来理解。人具有双重面貌：一面渴望成长为成熟自由的个体，另一面潜意识中的原始孩童渴望全然庇护与逃避责任。成熟的自我学会应对日常生活的束缚与挫败，但同时，内在孩童却渴望向这些束缚发起攻击，将它们击溃摧毁——无论对象是物还是人。极权主义正迎合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困惑幼童；它看似为人类双重渴望引发的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我们虚构的极权国度是一个一元绝对的体制，怀疑、困惑与冲突皆被严禁显露，因为独裁者声称要为臣民解决所有问题。此外，极权主义还能为人类最反社会的冲动提供官方认可。潜藏在我们体内的野蛮孩童或许会欣然接受这种摆脱道德束缚的解放。

另一方面，我们自由、成熟、社会化的一面却无法在极权主义中获得幸福；它们会反抗个人冲动受限的状态。

极权主义的心理根源通常具有非理性、破坏性和原始性，尽管披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外衣。正因如此，这种制度本身带有某种梦幻、难以置信甚至噩梦般的特质。当然，精英阶层与大众在心理体验上存在差异：前者得以实现对权力的渴求，后者则被迫屈从；但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当独裁者深层的神经质权力渴求恰好满足本国民众某种深沉的情感需求时——尤其在苦难时期或革命之后——他便更易夺取梦寐以求的权力。例如国家战败后，公民会陷入羞耻与怨愤。颜面尽失对被征

服者而言绝非政治抽象概念，而是切身而真实的创伤——每个个体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与故土命运相连。若国家长期遭受饥荒或经济萧条，民众便会陷入愤懑、抑郁与怨怼，更易接受野心勃勃的独裁者描绘的图景与承诺。当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令个体公民感到无力、困惑与无用，当他无法感知自身参与支配日常生活的力量，或当这些力量显得如此庞大而晦涩以致无法理解时，他便会抓住极权主义的救命稻草。归属的机会，参与的机会，一个能解释并合理化他无法理解之事的简单公式。当独裁者最终掌权时，他便将自身病态幻想、狂怒与怨恨轻易地投射到臣民身上。民众的愤懑滋养着他的暴戾，他的伪装力量鼓舞着他们。幻象相互加固的过程就此展开。

极权主义作为社会现象，是人际关系的病态表现。如同其他疾病，人类唯有通过知识与训练建立免疫力，方能抵御其侵蚀。若不幸染上极权主义病毒，则须调动心灵中所有正向力量予以击溃。他体内那个不负责任的孩童与成熟的成人之间，持续着激烈的内战，直至一方彻底消亡。只要任一方尚存一丝火花，战斗就永不停止。只要人还活着，对成熟的追求就永不止息。

文化对极权主义的偏好

在这场对抗可怕疾病的斗争中，社会因素同个人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若我们分析整个文化理想如何影响其公民对极权主义的脆弱性，便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西方文明的伦理观是我们抵御这种病态的最强防线，因为这种伦理的理想在于塑造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男女，他们主要依据自身良知来评判事态。我们致力于培养公民的自我责任感，使其勇于直面现实世界，并能通过自身感受与思考辨明是非。这类人行动的驱动力源于个人道德标准，而非外部群体强加的正确标准。除非群体评价与个人信念一致，或经过民主讨论达成共识，否则他们绝不轻易接受。这类人对社区负有责任，因为他们首先对自己负责。若持异议，他们将组成忠诚的少数派，适时行使说服他人的权利。

其他文化则强调截然不同的态度与价值观。东方理想中的“人”——如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所体现的——首要追求的是合一：与家族合一、与祖国合一、与宇宙合一——即涅槃境界。东方心灵通过难以言喻的共情与直觉，寻求与现实的直接审美接触。永恒真理隐于现实之后，藏于幻象帷幕之后。人乃宇宙之部分，其理想是顺从的服从与不易激怒。其和平理想在于静止与放松，在于冥想，在于摆脱体力与精神劳作。东方心灵的幸福，在于与宇宙万物合一的狂喜。禁欲、自我救赎与贫穷，

在东方文化中比在西方社会更具理想实现力。经典东方文化模式最恰当的描述是参与模式。在此模式中，个体被视为群体、家庭、种姓、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独立存在的个体。这种文化中，对集体规则的高度顺从与接纳被视为理想境界。东方儿童自幼便可能被训练成服从权威与群体规则的模式。许多原始文化也呈现这种模式。在这些文化中成长的人，最能被接受的标准、最理想的思想与行为，皆是经群体认可的范式。相较于西方个人主义者，参与型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更易理解极权主义的集体行动与思想模式——对我们而言难以忍受的规训与权威主义，于他们却是令人安心的秩序与规律。

人类学家 E·P·多齐尔曾对强化型参与模式及思想控制有过详细描述（《纽约时报》1955 年 12 月 11 日；《科学通讯》1955 年 12 月 3 日）：里奥格兰德地区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认为，部落中任何人的不当行为或错误思想都会影响全体成员。他对任何同伴的恶意都可能破坏宇宙平衡。村落的道德准则以群体为中心。任何违背者都危及全体福祉。瘟疫、歉收、旱灾。皆被视为群体中某成员“背离正道”的后果。村民们时刻被监视与窥探，只为找出罪魁祸首或“巫师”。流言蜚语与巫术指控甚嚣尘上，普韦布洛人不断审视自身良知，揣摩是否存有有害思想与态度。这宛如我们在极权国家目睹的清洗仪式（参见第七章）。

在任何群体中，当对非主流观点的包容性消失时，我们便会看到此类集体主义和参与主义的悄然蔓延。凡是教条主义党派意识盛行的地方，思想便受到压制。即便在某些科学界，我们也能察觉到这种侵蚀性趋势——那里过度强调集体研究、团队合作、会员资格，却轻视个人见解。

一个人所诞生的文化环境与其心理构造相互作用，塑造其人格特质，正如其身心相互作用决定其行为模式。我们个人自由的文化或许能让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病症产生部分免疫力，但与此同时，个人的不成熟与被压抑的野性又可能使我们易受其侵蚀。参与型文化总体上可能使人更易受极权主义影响，尽管个人对成熟与个性的追求也能提供某种程度的防护。

由于社会力量与个人力量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完全免于极权主义的内部侵蚀及其可能造成的精神摧残。正如我先前所言，我们的“极权国”是虚构之境，但残酷的真相是：任何国家都可能沦为极权国。

我们这个虚构国家的统治者们，其目标表述得极其简单：专制统治，对人类及全人类的绝对掌控，以及在独裁权威下实现全世界的统一。乍看之下，这种统一理念极具诱惑力——简化到极致，就是各国在中央强权统治下形成兄弟般团结的构想。当世界合而为一，战争似乎将不复存在，我们面临的紧张关系将被消除，地球将成为人间天堂。但这种对普世独裁的简化构想是错误的，它暴露了极权主义目标

的内在危险——人类本就各不相同，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生命的伟大、丰富与创造性灵感，同时也催生了社会交往中的张力。极权主义的均等化理念唯有在死亡中得以实现——当支配我们所有人的主宰众生的化学与物理法则彻底接管。死亡确是终极的平等者。

人生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的身心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并与外界互动。每个人的个性都是独一无二的。诚然，我们与人类其他成员共享某些基本的人类特质，但个性差异之多之广，使得世界上任何地方、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这种独特性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身上同样存在。作为人类，他不仅与我们不同，也与他的同胞不同。然而，通过抹平差异、追求均等来塑造极权主义模式的人，实质上是压制了他身上本质的个人特质与人性光辉——即独特性与多样性，最终造就的将是一个由机器人而非人类组成的社会。著名社会科学家 J·S·布鲁纳在鲍尔所著苏联心理学专著的序言中，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这一思想：“人类对人性本质的认知不仅是客观探究的对象，它始终是社会与政治控制的首要工具。塑造这种认知者，其行为将对所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极权主义营造出全民皆政府成员、皆选民的幻象；无人能成为弃权者或反对派。个人内心深处的权衡与疑虑不再属于个体私事，其思想归属于国家、独裁者、统治集团、政党。内心思绪必须受到管控。唯有掌权者知晓国家政策的真正意图。普通公民变得如孩童般依赖顺从。以放弃个性为代价，他获得某些特殊满足：归属感与被庇护感，摆脱个人边界与责任的解脱感，在狂热失控的集体情绪中被吞噬的狂喜，以及作为无名齿轮融入全能国家机器的安全感。

现代极权主义的专制与古代那些奢靡异域的个人暴政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禁欲的、冰冷的、机械力量，旨在实现汉娜·阿伦特所称的“人性本身的改造”。在我们的理论国度里，人不再拥有个体自我，没有个性，没有自我。一种均质化机制正在运作，凡是高于普通水平的事物都会被践踏压制。

极权领袖

极权主义的领袖是国家中最诡谲的人物。这些人的精神结构如同所有人类般独一无二，因此我们无法对驱动其行为的精神疾病作出笼统的精神病学诊断。但我们仍可提出若干概括性结论，以助理解极权领袖的本质。例如，他们显然饱受控制他人与行使无限权力的压倒性需求折磨，这种需求本身即属心理异常，根源常在于深植于心的焦虑、屈辱与自卑感。此类人物宣扬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他们企图实现

彻底统治他人的最终目标时所采用的战术与战略工具。这种统治或许能帮助他们弥补病态的恐惧与自卑感——正如我们通过对某些现代独裁者的心理研究所能得出的结论。

所幸我们不必仅凭对极权独裁者心理病理学的纯粹假设来理解。曾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研究纳粹德国部分领导者的 G.M. 吉尔伯特博士，为我们揭示了这些扭曲心灵的真貌——其价值尤在于揭示了极权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希特勒的自杀使其人格结构的临床研究成为不可能，但吉尔伯特医生从希特勒的亲友和合作者处听闻了大量关于其行为的目击报告，这些报告勾勒出纳粹主义核心人物的惊人形象。希特勒在亲信中被称为“地毯啃食者”，因为他常像癫痫发作般扑倒在地，又踢又叫。吉尔伯特博士由此推断出这位病态“天才”病态行为的根源。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偏执敌意部分源于未解决的亲子冲突；犹太人很可能象征着他憎恨的酗酒父亲——这位父亲在未来元首幼年时便虐待他和母亲。希特勒的偏执思维、狂热的偏执、对“雅利安血统纯洁性”的执着追求，以及最终毁灭自我与世界的疯狂行径，显然都源于病态的心理。早在 1923 年——即夺权近十年之前——希特勒便确信自己终将统治世界，并耗费大量时间设计胜利纪念碑，企图在胜利降临之际于欧洲大陆各处永恒铭刻其荣光。这种妄想症般的执念持续至他生命终点：在亲手掀起的战争中，当败局已定、死亡逼近之际，他仍在不断修订完善自己的建筑蓝图。

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为逃避绞刑而自杀，其心理结构截然不同。他病态的攻击性冲动源于家族所属的德国容克阶级所承袭的古老军事传统。自幼年起，他便表现出强迫性且公开的攻击性。作为专制腐败的玩世不恭者，他抓住纳粹制造的机遇谋取纯粹个人利益。他对“平民民众”的蔑视毫无边界——此人可谓丧失了道德价值的感知能力。

鲁道夫·赫斯则截然不同，他以被动却狂热的犬儒式忠诚侍奉，仿佛借他人之身活着——元首的意志。他内在的精神脆弱使他更容易通过代理人而非自身人格来生存，并驱使他成为某个看似强悍之人的影子，借此汲取力量。纳粹意识形态让这个受挫的男孩产生了与光荣日耳曼民族血脉相连的幻觉。在疯狂飞往英国后，赫斯显露出明显的精神病特征：迫害妄想、歇斯底里发作和间歇性失忆，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临床症状。

还有一类人物是汉斯·弗兰克，这位魔鬼代言人堪称过度野心勃勃的潜在同性恋者原型，轻易就被引诱陷入政治冒险，即便这与他残存的良知相冲突。与戈林不同，弗兰克尚能辨别是非。

吉尔伯特博士还提及希特勒参谋长威廉·凯特尔将军，此人沦为元首顺从的

传声筒，将军事荣誉与个人野心混为一谈，终究服务于自身渺小的存在。

而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数百万人的元凶——党卫军上校霍斯，则属于另一类人物。此人病态人格结构昭然若揭。霍斯终生孤独寡言，具有分裂型人格，毫无良知，沉溺于充满敌意与毁灭性的幻想。正因其孤绝疏离、缺乏情感羁绊，希姆莱才本能地选中他担任纳粹最野蛮的职务。他成了实施兽行最得力的工具。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未能获得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清晰的精神病学画像。多份报告指出，其晚年深受迫害妄想症折磨，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深怕自己会成为大清洗的牺牲品。

对这些人的心理分析清晰地表明，某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神经质者能够构建出病态文化——一个疯狂的世界。贪婪的政治人物甚至无需理解其行为的社会与政治后果。驱使他们的并非意识形态信念——无论他们如何自我说服——而是人格的扭曲。他们并非出于标榜的为国为民的冲动，而是被一种压倒性的需求与强迫所驱使：通过扭曲自身人格来满足欲望。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并非真实目标，而是这些病态之人企图获取个人价值感与权力的冷酷手段。微妙的内在谎言诱使他们越陷越深。防御性自我欺骗、洞察力停滞、逃避与他人情感认同、同理心退化——心灵拥有诸多防御机制来蒙蔽良知。纳粹领袖在纽伦堡审判席上在纽伦堡审判席上通过持续自我辩解与推诿来为自己开脱。这些凶手因遭受指控而愤愤不平、痛心疾首，俨然一副委屈的无辜者模样。

任何形式的领导权若缺乏制衡，都可能逐渐演变为独裁。身居高位者肩负着掌控他人命运的巨大权力与责任，这对于人类心理而言是场严峻考验。软弱的领袖是无法应对挑战者，他们简单地放弃责任。独裁者则是用日益膨胀的个人威望和权力取代现存的正义与道德标准，最终将自己与人类社会彻底隔绝。他们的猜疑日益加深，孤立状态不断加剧，由此形成导致偏执心态的恶性循环。

独裁者不仅是病态之人，更是冷酷的投机者。他视他人毫无价值，对曾受的帮助毫无感恩。他猜疑狡诈，坚信个人目的可为所用手段开脱。奇怪的是，每个暴君仍在寻求自我辩解。若没有这种安抚良心的手段，他便无法生存。他对他人采取操纵态度，视其为推进自身利益的工具。他拒绝承认怀疑、内在矛盾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矛盾心理，否认人类通过摸索、试错、矛盾情感的交织而走向成熟，这是心理学的客观事实。独裁者因拒绝允许自己摸索、拒绝通过试错学习，永远无法成为成熟的人。但无论他是否承认，内心冲突始终存在，某种内在混乱始终折磨着他。这些内在的“软弱”被他严厉压制；若任其浮现，恐将阻碍目标达成。然而在暴怒的攻击中，他日渐衰弱的力量昭然若揭。

正是因为独裁者潜意识中畏惧自身内在矛盾，他才会同样恐惧他人的内在矛

盾。他必须不断清洗、恐吓再恐吓，以平息自己内心狂暴的冲动。他必须杀光所有怀疑者，摧毁每个犯错之人，囚禁所有无法证明绝对忠诚的人。在极权主义社会里，独裁者将人类潜在的攻击性和野蛮性培养到足以爆发成群体犯罪的程度——正如希特勒迫害少数群体时所展现的那样。最终，整个国家呈现出真正的病态——毁灭性与自毁性倾向的彻底统治。

机器人的最终投降

普通人在此类文化中会遭遇何种命运？我们该如何描述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或许最简明的答案在于：他已被降格为机械般的精密状态，如同昆虫般。他无法发展任何温暖的友谊、忠诚或归属感，因为这些对他而言可能过于危险。今日的友人终将成为明日的敌人。生活在永恒猜忌的氛围中——不仅对陌生人，甚至对亲族亦然——他不敢表达自我，唯恐被集中营或监狱吞噬。极权国度的公民之间从无真正对话。他们开口时必先踮脚偷看身后，确认无处不在的间谍后才低声耳语。这种内在的沉默与官方的言语轰炸形成鲜明反差。极权社会中的公民或许会制造噪音，吐露客套的陈词滥调，或许互相复诵口号，但他们从不真正言说。现有文献显示，以H·G·威尔斯、赫胥黎和奥威尔为首的作家们，日益忧虑着机器人化人类的骇人未来——这些人被训练成机械般的顺从标准。他们为我们诠释了对机械化文明的普遍恐惧。

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公民已然迷失了心灵真实核心。他不再觉得自己是“我”，是自我，是个体。他只是官方炮轰和精神胁迫的对象。丧失自我人格的他，既无独立良知，亦无个人道德，更丧失了清晰而诚实的思考能力。他机械地死记硬背，吞吐着成千上万灌输的事实，每一次呼吸都吸入教条与口号。他蜕变成唯命是从的学究，而这种学究气将人塑造成装满信息的容器，而非拥有自由成长人格的个体。变得更睿智更自由意味着选择性遗忘与思想转变。这点我们接受，那点我们抛弃。敏锐的适应需要改变思维模式，需要摆脱条件反射的能力，需要解构与忘却，才能为新模式做好准备。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机会通过忘却来学习，没有机会通过个人经历成长。官方的过度简化诱使受困的听众接受灌输。集体狂喜与集体狂热取代了个人沉静的思辨。希特勒教导民众行军作战，最终他们却不知为何而行、为何而战。民众沦为受洗脑的痴迷群羊——先沉醉于热情与美好期许，继而沉溺于恐惧与恐慌。个人人格在极权主义中无法成长。庞大的公民群体被驯化为陷入个人与政治的梦游状态。

将个体病态状态的经验与社会现象相比较，并通过类比实际精神错乱案例来分析极权主义下自我意识的部分崩溃，这种做法在科学上或许值得商榷。但事实上，极权国度公民及其整个文化的怪异反应，与内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反应存在诸多可比性。尽管个体与群体中精神分裂行为的问题极其复杂，无法在本书范围内充分探讨，但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影响。

共同逃避现实的倾向

此次病理世界的探访并非单纯描述疾病与政治体制的偶然相似性。其核心在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极权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或个体内心世界中，人们都可能以官方理由和个人幻想为借口进行自我退缩。许多学者认为文化衰败与精神分裂症式的退缩存在关联。

让我们简要阐释个体精神分裂症患者完全内在自动化与精神退缩的反应——这本质上是个人无法适应其感知中充满不安全与危险的世界所致。往往些微的情感事件便可能引发此类精神分裂式退缩——例如童年时期强加于心的日程安排与习惯侵扰，或是对过度活跃且冗余的文化环境的狡黠敏感。许多孩童因过度强迫的父母被迫陷入精神分裂式退缩。有时外部接触的缺失会使人陷入彻底孤独与隔绝的状态，有时则是其自身对独处的偏好所致。所谓精神分裂式退缩的某种倾向已被证实具有先天性。然而这种状态可能在任何人身上被诱发。无论成因如何，精神分裂症患者终将沦为脱离社会的人，迷失于孤独深渊。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幻想世界开始取代对现实的清醒直面。最终，那些诡谲的幻想对患者而言竟比现实更真实。现实世界。他愈发躲藏在自己筑起的铁幕之后，沉溺于那片虚构的梦境与避难所。这便是他的极乐净土，所有幻想在此得以实现。惰性与狂热交替涌动。患者退化至婴儿般的植物性行为模式，拒绝社会赋予的一切教化。在幻想中，他栖居于永远服从其命令的世界。他拥有无上神力，世界随其神圣意愿运转。现实世界因需持续调整与验证，便成了迫害者，不断冲击着他神力无边的幻觉。任何对妄想世界的侵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会以极端攻击性、构建次级妄想来保护初始妄想，或两者兼施来应对。患者对现实世界及其代表者展现出强烈敌意；现实既剥夺了其全能妄想，又摧毁了如同母体般被完全庇护的幻觉。

临床经验表明，精神分裂症常始于消极抵抗——这是抵御外界影响的防御机制，是持续对抗精神入侵的斗争，是对过度敏感心灵遭受侵犯的抗争。这种对世界的防御态度逐渐演变为对万物的敌意，不仅针对外部影响，更指向内在的思绪与情

感。最终患者被自身的敌意与否定主义彻底麻痹。其行为举止宛若行尸走肉，能数小时一动不动地坐着，需强行喂食穿衣。精神分裂症患者如同提线木偶，唯有受人驱使时才勉强活动。临床医学称此为木僵状态——死亡姿态。

退缩至自动化状态

内向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宁愿沉溺于疗养院自动化的日常，也不愿面对外界生活——前提是能放任其私密幻想肆意蔓延。他们彻底向自我毁灭主义投降，从不结群聚集，鲜少彼此交谈；即便偶有交流，也毫无实质性互动。每个人都栖居于自我封闭的茧房，各自守着自己的精神牢笼。实质交流。每个人都栖居于自我构筑的隐遁之地。

在极权主义神话中——例如第三帝国——在我们神话国度的心理传说里，对技术完美子宫的模糊幻想、对理想极乐世界的憧憬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需要持续警觉地调整与再调整，极权主义便构筑出全能奇迹的幻境——在终极形态中，物质需求将全然满足。万物皆受规制，恰似胎儿在母体中那般，置身于安宁祥和的乐土，亦如精神病院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里没有社会斗争，没有思想冲突；世界运转如钟表般精准。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真实互动，没有观点或信仰的碰撞，这些子宫中的同伴之间没有情感纽带；每个人都如同编号实体，被归入相同的档案系统。在极权主义中，不存在对同胞的信任，没有仁爱，没有爱，因为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并不存在，正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也不存在。唯存对供养体系的信仰与臣服，每位公民都怀揣着被驱逐出体系的巨大恐惧——那份彻底迷失的惊惶，恰似精神分裂症患者被抛弃的感受与对现实的恐惧。在精神孤寂与隔绝的深渊中，更深的孤独与更剧烈的隔绝如影随形。若失去外部规制的庇护，内在的炼狱便会爆发。强有力的机械化的外部秩序必须用来掩盖内在的混乱与即将崩溃的危机。

战后岁月里，我们曾接触过若干来自极权世界的难民，当他们被迫适应需要个人主动性的自由世界时，便精神崩溃。对自由的恐惧使他们陷入恐慌。他们已不再拥有足够强大的自我意识，无法在自由民主的现实中建立并维持抵御竞争压力的心理防线。正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拥有灵活独立的自我意识，极权体制下同样不存在可运作的个体自我。精神分裂症患者因自我退缩而萎缩，极权体制则使人不断融入群体情绪而消亡。倘若萎缩的自我试图成长，发展出批判性思维、对事实求证的渴望及理解欲，便会被斥为叛逆与不顺从而遭到打压。

极权主义要求公民完全臣服于领袖并与之认同。正是这种领袖统治使人们近乎丧失自我，如同精神分裂症患者。这又可能导致对敌意与破坏性冲动的失控。心理学家在集中营心理中反复观察到这种现象：当受害者初抵这座以逐步灭绝为宗旨的营地时，多数人呈现彻底的自我消亡、完全的去人格化，伴随麻木与意识丧失。在朝鲜战争中的我方战俘身上也观察到相同现象。部分集中营幸存者重返正常社会后立即康复；另一些人则持续呈现这种自我丧失的精神分裂反应，如前所述，有时甚至发展为真正的精神病态。

子宫状态

极权主义是人类逃避生活恐怖现实，投身领袖虚拟子宫的避难所。个体的行为皆由这个子宫——这个核心圣殿——所支配。神秘的中心位于万物皆受掌控；人无需再为自身生命承担责任。胎前世界的秩序与逻辑统治着一切。这里有宁静与沉寂，是全然臣服的安宁。子宫国度的成员们并不真正交流；他们之间充斥着沉默，那是可能背叛的沉默，而非成熟的缄默与克制。极权主义加剧了表象交流与内心秘密之间的鸿沟——人们向外展现的与内心深处暗藏的梦想形成割裂。它催生出政治沉默的人为分裂心态。残存的个人情感与见解皆被严密封存。在极权主义的分裂世界里，没有自由的交流，没有对话，没有激情的宣泄，没有情绪压力的释放。这是沉默共谋者的世界。事实上，猜疑氛围才是精神自由的最大敌人——它迫使人们抱团取暖，共同对抗神秘敌人：起初来自外部，继而蔓延至彼此之间。

在极权主义国度，每个公民都处于持续监视之下。神话般的国家塑造着个体的良知，使其几乎丧失自我意识。邻居、邮差、子女都在监视着他，他们皆代表着惩罚性的国家机器，正如他自身必须代表国家监视他人。不告发他人即是犯罪。

寻找阴谋、发掘迫害者与罪犯的迫切需求，是另一种精神分裂的表征。这在心理层面关联着孩童般对全能感的渴求。神秘的秘密氛围更易滋长狂妄自大的情结。秘密与阴谋助长权力妄想。正因如此，许多人热衷窥探他人生活，沉迷扮演间谍角色。

这种阴谋论的感受同样潜藏在病态的虚构迫害者斗争中——这种斗争既存在于精神病患者身上，也存在于我们神话般的极权主义中。“它就在那里！”“它正在追赶我们！”所有对失去涅槃般母体幻觉的内心恐惧都肆意蔓延。神秘的幽灵与秃鹫将人们驱逐出涅槃与乐园。

在这些幻想中，父权者、独裁者、偶像既是普世的威胁，又是全能的救赎者。

即便极权国的公民也并非真心爱戴这残酷巨人。对哺育之乳与指引禁令之手的猜疑，常出现在精神分裂症儿童的幻想中——他们将养育者视为敌人，是胁迫成长中的心灵屈服的统治恶魔。

病态个体对父母形象的深沉憎恨无法直接宣泄，便转嫁至自我或替罪羊身上。替罪羊机制亦是极权策略的组成部分。如前所述，替罪羊能暂时承接个体全部的内敛怒火与狂暴。富农、黑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资本家、投机商与战争贩子——任何或所有群体都可能充当此角色。对极权思维而言，最大的威胁或许在于智力运用、意识觉醒以及“书呆子”对自由验证性思考的诉求。如同疯人院的囚徒，极权国度的公民宁可选择精神错乱与扭曲，也不愿承受疲惫的智力控制。

在极权恐惧与幻想的中心，矗立着食人神祇与偶像。他不可战胜，利用人类卓越的适应天赋将人奴役。每个人的情感与思想核心都必须归属于领袖。

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是否对此有所觉察？恐怕未必。现代心理学已向我们揭示了心理否认机制的强大作用——当意识拒绝接受某些现实时，视觉便会绕过外部事件。为支撑并解释这种否认，人们会构筑次级合理化与幻想。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我们发现对现实事实的蔑视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如出一辙。否则又该如何解释希特勒的军队在纸面上仍在调动的事实——尽管它们早已溃败？

极权主义策略通过警察国家的严密秩序掩盖内部混乱与冲突。强迫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亦通过内在的固定程序与日程安排达到相同目的。这些程序与日程实为抵御外部现实痛苦事件的防御机制。这种内在的机械化运作甚至可能延伸至对内在现实与需求的否认。极权国度的公民压抑并排斥内心对自由的渴求，甚至可能将奴役视为解放。他们可能更进一步——渴望逃离生命本身，沉溺于通过彻底毁灭获得全能的妄想。党卫军士兵称之为“血契”的魔力——这血腥罪行的纽带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为他们通往瓦尔哈拉的道路铺路。凭借这种魔力般的统一，他们得以勇敢而平静地赴死。无政府式的绝望与对伟大的渴求在他们心中交替涌动，如同精神病患者的内心。同样地，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也在追寻“英雄”地位，纵使代价是灭亡与毁灭。

许多士兵——厌倦了正常生活的刻板——回望战争经历中的暴力时刻，尽管伴随着饥饿与恐惧，却视之为人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巅峰体验。在那战斗兄弟的联盟里，他们初次且唯一地体会到幸福（迪克斯）。

这听起来像是一出苦涩的喜剧，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想告诉我们：当恐惧笼罩日常生活时，心灵会退缩至妄想之中。在此情境下，幻想开始凌驾于现实之上，并很快获得现实从未有过的有效性。极权主义思维如同精神分裂症思维，对现实充满蔑视。试想李森科理论如何否定遗传影响。极权主义思维不观察也不验证对现

实的感知，而是命令现实如何行事，强迫现实屈从于幻想。

将极权主义与精神病症相类比绝非偶然。妄想思维必然渗透于各种暴政与专制之中。无意识的倒退力量开始运作，远古时代的邪恶势力卷土重来。一种自我毁灭的自动冲动由此滋生——用新的错误掩盖旧的错误，不断扩大恶性循环的范围。病态循环的恶性循环成为生命的终极目标。被无法理解的文化所压垮的惊惶之人，退缩进野兽般幻想无限权力的幻境，以掩盖内心的虚空。这种幻想始于领袖，最终被他们压迫的群众所接管。

当人类被困在名为极权主义的巨大机器中时，还能做什么？思考——乃至大脑本身——都成了多余之物，即仅为精英阶层保留的特权。人必须放弃独特性与个性，屈从于所谓整合与标准化的同质化模式。这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野蛮孩童般的空虚，唤醒了机器人那无意识渴求毁灭的空洞。

第七章

极权思想的侵蚀

为探究那些阻碍人类思想自由发展的社会力量，我们必须审视政治生活的多个方面。作为临床医生与多元实践者，我不愿拘泥于特定政治体制或思潮，而致力于描述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当人类思维与行为习惯正经历重塑时，往往处于剧烈政治动荡的影响之下。在某些国家，这种重塑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在另一些国家则更为缓慢。心理学家的任务正是观察并描述这些进程对人类心灵的冲击。

当一个民族一旦沦陷于极权主义的枷锁，当民众屈服于独裁者企图的极端简化与甜言蜜语，统治者如何维系其权力？他运用何种手段使同胞成为血腥政权的顺从追随者？

由于人的成熟自我会抵抗极权主义，独裁者必须不断运作和策划，以控制臣民并扼杀他们对个人发展、反抗和健康成长的需求。通过剖析其手段，我们将更深入理解极权主义本质，以及独裁者手段与臣民人格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亟需这种认知，因为必须清醒认识到：极权主义中那些将鲜活生命塑造成无趣机器人的力量，同样可能在所谓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悄然滋长——尽管这种滋长往往是无意识的。

恐怖策略

恐怖武器自古便是暴君的惯用手段，人类被改造成温顺的工具。在极权主义国度，这种武器的运用已出神入化，成为能彻底扼杀一切反对与异议的科学手段。极

权统治者以威慑手段施政，宁可依靠恐惧换取忠诚，也不愿通过信念赢得效忠。恐惧与恐怖冻结思想与意志，可能引发全民精神麻痹。在极权恐怖制造的恐慌中，人们仿佛被不可逾越的真空隔绝，彼此疏离，最终沦为孤独恐惧的灵魂。即便惊惶地聚集在一起，也可能被怀疑为阴谋叛国。因内心孤立而与同胞失去真实情感联结的极权公民，日益丧失抵抗非人化影响的能力。

极权主义政权时刻警惕着社会罪人——体制的批判者，而异议指控在公众眼中等同于定罪。诽谤、诬陷与告密是极权策略的常规手段。整个国家奉行“人人皆为政权潜在敌人”的信条，无人能逃脱恐怖统治，无论地位多高都可能遭受迫害。

秘密警察在国内制造恐惧与恐慌，军队则在境外制造威慑。恐怖暴行的阴影——哪怕只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恐怖——便足以令人们不敢表达意见、不敢暴露立场。这种普遍恐惧笼罩着极权主义国家及其邻国的公民。这种恐惧麻痹在现实中如何运作，可从1948年便可见一斑：当时西欧人深感极权主义占领的阴影逼近，竟认为批评攻击美国盟友比指责可能突然无预警入侵的极权敌人更为安全。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成批的监狱和集中营被建造出来，旨在向民众灌输恐惧与敬畏。它们或许冠以“惩戒”或“改造”之名，但这不过是掩盖真相的廉价借口。在这些恐惧中心，无人真正得到改造；他们如同被逐出人类社会，被消耗殆尽，被杀害——但不能太快，以免削弱威慑效力。真相是：这些监狱并非为真正的罪犯而建，而是为了对旁观者——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施加恐怖效应。监狱象征着永久的威胁，持续的威胁。它们给那些至少暂时身处铁丝网外的公民施加了近乎难以承受的压力，考验着他们的同理心与想象力。除了对遭受同样残酷对待的恐惧，对屈尊、屈辱与死亡的恐惧之外，集中营的概念本身便唤醒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害怕自己被驱逐出社群，害怕孤独，害怕成为沙漠中的流浪者，害怕无人疼爱、无人需要。

存在着若干较温和的群体性恐怖形式，例如“无政治闲暇”策略。在极权主义社会中，人永远被某种官方规划所束缚。他时刻感知着监控与监视，感知着潜伏的窥探力量随时准备追捕与惩罚。就连闲暇时光与节假日也被官方计划占据——必须学习的事实、必须参加的政治集会、必须列队的游行。宁静与独处已不复存在。没有时间冥想、沉思或追忆。思想被困在官方思维与规划的网中。连自主选择的寂静之乐也被禁止。极权主义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必须加入合唱与口号呐喊。人们被持续不断的活动裹挟，逐渐丧失了觉察自身处境的能力。

对个人、工厂及农业企业增产的强调，同样可能成为加剧控制与恐怖的武器。俄罗斯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以不断提高生产指标为号召，对许多人构成了威胁。工人必须加快劳动节奏和生产速度，否则将遭受严厉惩罚。对速度与效率的强调，使

人日益沦为极权主义机器中没有灵魂的齿轮。

恐怖几乎永无止境；它以顺从为养料，在真空环境中滋长。恐怖作为手段，终将蜕变为恐怖本身的目标——但恐怖实为自毁性策略。即便在绝对独裁统治下，人类终将反抗。当极权主义将人贬为傀儡时，他们终将对所有威胁免疫。恐怖的魔咒终将失效。极权公民首先会对恐怖麻木，甚至视死亡为寻常。随后少数将发起最终反抗，因为依靠恐惧与恐怖统治的极权政府，反而会在少数不可摧毁者心中滋生内乱。即便在纳粹德国的统一思想体系下，抵抗运动依然活跃。

清洗仪式

清洗政府高层人员是历史悠久的惯例。父子之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斗争，早在史前时代就已仪式化。弗雷泽的经典著作《金枝》对此有过详尽阐述。古代异教祭司通过杀害前任者获得高位。后来在历史中，新登基的国王会在加冕之日献上罪犯作为祭品献给神灵。

在极权主义国家，杀戮与清洗仪式已成为政府运作机制的一部分，对独裁者而言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承载着切实功能。他必须清除所有在残酷夺权过程中被其绕过或背叛的对手，以免积怨与挫败的怒火爆发，危及自身地位乃至性命。

清洗还折射出极权国度的另一特征：它将“政党时刻保持纯洁”的虚构理念戏剧化呈现。精神病学已证实，神经质个体强迫洁净的行为实为转移性防御机制，用以压抑内在的愤怒与敌意。这种机制在群体中同样发挥作用，当它被提升为官方认可的仪式时，便将公民降格为婴儿状态。它使极权国度的居民宛如襁褓中的婴儿——仍在艰难学习如厕训练，仍在聆听父母反复的训诫：保持清洁，保持清洁，保持清洁；表现良好，表现良好，表现良好；保持忠诚，保持忠诚，保持忠诚。这些指令的持续轰炸不断强化着每个公民的罪恶感、幼稚感与羞耻感。

极权主义的清洗总是伴随着精心设计的忏悔仪式，被指控者必须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行，这与中世纪女巫的忏悔如出一辙（利阿）。其通用公式如下：“我承认自己的怀疑。感谢同志们的批评指正，我得以净化思想。我谦卑地接受同志们和党的意见，并感谢这次纠正错误的机会。正是你们使我能够摒弃错误思想。”我得以净化思想。我谦卑地接受同志们和党的意见，并感谢有机会纠正错误。你们使我能够摒弃偏离路线的问题。我承认自己欠无私的领袖和人民政府一份情。”

这种公开羞辱策略具有双重效果：既像清洗仪式本身那样激发民众孩童般的顺从感，又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应对自身深层心理问题与罪恶感、自卑感的防御机制。

极权国度的公民内心深处明白自己已放弃成熟与责任，而公开清洗缓解了他的羞耻感。“有罪污秽的是他人，而非我，”他暗忖，“是他们不断密谋勾结”但那些他怀疑他人的特质，同样存在于自身。他畏惧他人背叛，只因无法确信自己不会背叛他人。于是内心矛盾愈发激烈，而清洗仪式便成为周期性的血祭——献给恐惧之神与威胁之神。

这种胁迫性供认与清洗的仪式必须一再重演的事实，恰恰表明人们内心已对此形成了心理防御机制——手段运用得愈频繁，其煽动罪恶感与恐怖情绪的效果就愈发减弱。正如极权国度的公民对官方持续干预私生活的恐怖行径逐渐麻木不仁，他们对叛国与破坏的指控也几乎免疫。

同样地，当清洗作为驯服工具的效力减弱时，暴君反而会更频繁地使用它来安抚自身的恐惧。历史中不乏革命最终沉溺于血腥恐怖统治与清洗的案例。法国大革命中最忠诚的英雄与领袖，竟在他们亲手缔造的共和国断头台上丧生。

荒诞指控与黑魔法

荒诞的指控与黑魔法，如同极权主义的所有驯服工具，并非新鲜事物，但在原始文明与史前时代，黑魔法的技艺相当简单。萨满只需摧毁或毁损被控罪犯的小雕像，用特制法杖指向或刺向当事人，或以狂暴言辞与手势诅咒辱骂，便能令受害者崩溃而亡。受害者因盲目信奉魔法仪式而恐惧交加，往往自投罗网，最终死去（马林诺夫斯基）。

这种魔法杀敌具有多重心理意义。魔法咒语的受害者常被视为部落神灵的化身，即内在化的权威与父亲形象。必须将其处死，因为他的存在本身便唤起族人的罪恶感与悔恨。他的死亡能压制每个人内心警示即将到来的厄运的呐喊。有时受害者来自指控者所属部落之外。此时受害者更容易成为替罪羊，对其惩罚能平息杀戮部落成员内心矛盾情感的冲突。对局外人的憎恨，能抑制并转移每个成员对自身群体及自身的仇恨与攻击性。社会恐惧愈深重，个体负罪感愈强烈，对内部替罪羊与外部敌人的需求就愈迫切。内在的混乱终将在外部战争中寻求宣泄。

在极权主义社会里，空气中弥漫着流言、诽谤与谣言。任何指控——即便纯属捏造——对民众的影响力都远胜于事后的澄清。针对无辜者的罪状书往往凭空捏造，尤其针对那些曾在亲友追随者中建立起个人威望与忠诚度的前任领导人。针对我们的捏造指控总会唤醒潜藏的罪恶感，令我们战栗不已。在剖析战俘及其他政治受害者被迫认罪背叛的心理机制时，我们已见识到：当压力袭来，每个人心底隐秘

的愧疚与疑虑会如何强烈地驱使他屈服于敌人的要求与意识形态。这种机制在极权国度的公民中持续运作着。对他人指控的控诉，唤醒了人们不敢公之于众的内心叛逆与敌意，于是被告人即便清白，也成了民众私密罪恶感的替罪羊。懦弱使我们这个虚构国度的其他公民对受害者避而不见，唯恐自己遭殃。

人格毁灭的可能本身，便暴露了人类同情与共情能力的脆弱与敏感。即便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政治运动也常在夸张指控乃至更疯狂的反诘问的氛围中展开。当充满辱骂与诽谤的恶毒指控策略启动时，我们便会忘记言辞背后的战略意图，反被喧嚣与辱骂所左右。“或许”我们暗自思忖，“此事确有几分道理。”这正是诽谤者所期待的效果。政客们心中仍存有“目的正当化手段”的幻觉。但诽谤攻势往往产生悖论性后果——无端指控本身的存在，恰恰削弱了听众与指控者双方的道德感。

间谍狂热

在极权主义国度里，这种恶性诋毁的循环达到了极致。极权主义国度的公民深陷猜疑的统治之中，饱受可怕的迫害妄想症——间谍偏执症的折磨。他时刻保持警惕，监视着身边的同胞。那位友善的邻居随时可能变成破坏者或叛徒。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极少审视自身灵魂的混乱与缺陷，反而将这些投射到替罪羊身上——直至最终自己也沦为他人间谍妄想症的牺牲品。每个公民都在竭力窥探他人的内心深处。当人们将自身隐秘的念头投射到邻人身上时，思考本身便成了敌人。这种对同胞内心世界的极度恐惧，源于恐惧与极权思维引发的普遍性偏执性世界观重构。邻人身上，思考本身便成了敌人。这种对同胞内心深处的极度恐惧，与恐惧和极权思维导致的、对世界进行偏执狂式重新评估的普遍过程密切相关。在否认人类忠诚、持续妄想叛国与破坏的行为中，极权主义整个幼稚的神话体系及其对成熟人际关系的否定，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通过审讯、人格毁灭、羞辱、精神恐吓与意志瓦解——正如个体与集体洗脑所为——人可被彻底摧毁意志，至使甘受任何政治体制。他已然虚无；何必抗争？极权主义世界没有公开政策、自由讨论、诚实异议；唯有阴谋与告密，及其对大众的震慑效应。

这种疯狂指控的策略不仅针对极权公民，更指向整个外部世界。极权主义需要借助外部敌人的形象——那些散播瘟疫与疾病的虚构残暴怪物——来为自身的内部困境寻找借口。通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偏执攻击，公民个体残存的良知被安抚并加以控制。“敌人正在毒害我们的食物，向农作物投放甲虫和细菌。”这种虚构的世

界阴谋论，旨在让极权主义社会的恐惧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不存在的危险。与此同时，它掩盖了导致农作物减产和粮食短缺的内部失误。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强化了每个公民对极权共同体的归属感，也压制了内心那个要求他作为负责任个体行动的谴责之声。外部阴谋论更加深了公民的依赖感与不成熟感——如今唯有独裁领袖能保护他免受外界邪恶侵袭，而这个被描绘成原子巨龙与氢气怪兽栖息的广袤世界，恰似一座巨大的动物园。

犯罪化策略

如前所述，极权主义公民可能通过屈从于极权奴役来满足某些非理性本能需求。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为我们提供了典型范式：公民（及党员）被鼓励背叛亲友——这恰是其内心愤怒挫败的婴儿期自我长期渴望的行为。他得以通过行动宣泄深埋的攻击性与复仇欲望。他无需再压抑或排斥自身某些原始冲动。体制承担起全部罪责，并提供现成的数千条正当理由与开脱借口，为其施虐冲动的释放开绿灯。诸如“历史必然性”之类的华丽口号，助长个人将不道德与邪恶合理化为道德与善行。我们在此目睹文明标准遭受的巨大腐蚀。

在犯罪化的策略中，极权独裁者摧毁追随者的良知，正如他早已摧毁了自己的良知。想想那些学识渊博、举止优雅的纳粹医生，他们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开启职业生涯，承诺成为人类的救赎者，却在后来冷血地对集中营受害者施加最骇人的酷刑（米歇尔里希）。他们屠杀成千上万无辜者，只为探寻人类承受力的统计极限；又将数千人当作实验品感染疾病，只因元首如此要求。他们彻底丧失个人准则与道德底线，将所有罪行归因于元首意志。政治口号煽动他们将良知完全献祭给独裁者。系统性犯罪化的进程需要对民众进行去文化化改造。正如希特勒党徒所言：“每当听到‘文明’二字，我就准备好枪。”此举旨在持续激发残暴本能。人们被要求抛弃理性与客观真理，唯听从摩洛哥国家、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独裁者的主观谕令。

犯罪化是通过刺激民众反抗文明桎梏来实现的。向他们展示鲜血与血淋淋的替罪羊，千年的文化积淀便会瞬间崩塌。这意味着要向民众灌输歇斯底里，煽动群众情绪，使情感趋于同质化。所有这些都旨在唤醒人类内心野蛮的尼安德特人的野蛮心理。用种族优越论的华丽教条为罪行辩护，你就能确保民众追随你。

希特勒深知自己在做什么，当他将德国集中营交由冲锋队成员肆意妄为时，其策略正是“任其杀戮屠戮”——“既然他们已随我走得如此之远，就必须一路杀戮

到底。”这种犯罪化策略不仅旨在碾碎极权体制的受害者，更要让精英刽子手——统治集团——沉溺于那种毒化的权力快感，使其与人性情感渐行渐远；受害者沦为丧失人格的空壳，沦为只会说话的面具与无自我的行尸走肉。犯罪化策略本质上是对人性低级欲望的系统性组织，尤其针对独裁者必须倚重的直接帮凶。

在极权思维的压迫下，几乎每位公民都认同统治集团，许多人必须通过谋杀杀戮来证明忠诚，或至少表达对杀戮的赞同。极权主义自动化的生活模式带来的倦怠使受蛊惑的民众欣然拥抱战争、罪行与自我毁灭的冒险。每一次新的酷刑与罪行都铸就新的忠诚纽带与不择手段的服从，尤其在统治集团内部。最终，犯罪与罪恶感驱使统治者抱团取暖——因为体制崩溃将导致整个团伙覆灭，无论首领还是追随者。犯罪世界亦是如此：一旦有人迈出第一步，背弃社会法则加入犯罪团伙，便与外部世界及其道德评判处于战争状态。自此，团伙便能勒索他，驯服他。

在极权主义中，公民犯罪化的恶性循环——手段本身成为目的——逐渐演变为披着体面理想主义外衣的冷酷阴谋。该国国家领导人使用“普世和平运动”这类简单词汇，而公民们为这些词汇欢欣鼓舞、深感自豪。其中只有少数人知道华丽辞藻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欺骗行径。

这些扭曲的观念被编织进宏大的民族主义神话——第三帝国、新帝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渴望英雄主义的愿望，逐渐与暴力犯罪行为产生认同。鲜血被赋予魔力，溅洒他人鲜血竟成了美德与生命力的象征。

极权体制中肆意杀戮的行径，根源于深层的无意识恐惧。任何社会中的懦弱者与精神病态者皆因恐惧而杀人，企图通过某种魔力汲取死者力量与幸福——当然还有他们的物质财富。纳粹毒气炉中数百万人的死亡，正是这种古老杀戮神话的体现。或许“优等民族”的信徒们以为，屠杀犹太人能确保德国人承受与受害者同等的世纪之痛！这源于原始迷信：通过杀戮来强化并延长自身生命。切莫忘记，人类理性和理解的力量何其脆弱。一旦引爆的冲动之火被点燃，便难以一旦引爆的冲动之火被点燃，便难以控制。

极权主义必须杀戮、屠戮、发动战争。极权主义鼓吹仇恨，其喉舌是孤独、迷妄、强悍的“超人”，煽动仇恨与不公，激起毫无道德感或悔意约束的狂热。他的战斗口号强化了独裁者对臣民的控制，因为每个公民都通过自己的罪行学会憎恨受害者——而受害者的苦难反而更强烈地唤醒了罪犯深埋心底的罪恶感。

言语统治与语义迷雾——用话术使民众屈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开始更清醒地认识到对语言的态度。这种态度正在悄然转变。我们对官方口号、陈词滥调和理想主义标签的信任日益消减。我们愈发意识到：真正关键的是——哪些集团与势力隐藏在言辞背后，他们暗藏着怎样的意图。但我们惯于随遇而安，常忘记追问本质，终究或多或少会沦为喧嚣反复的词语所迷惑。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炮制宣传性谎言与欺诈性口号有着明确的目的，语言本身已然获得服务于权力的特殊功能，我们可称之为“言语统治”。大谎言与虚假口号先是迷惑听众，继而麻痹其思维，使其甘愿接受任何被灌输的幸福神话。极权宣传者的任务是在民众心中构筑特殊图景，最终使他们不再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感知世界，而是透过官方口号的迷雾观察现实，并发展出符合极权神话体系的自动反应机制。

双重话语中词语的多重运用，实则是对我们逻辑的攻击——即对我们理解真正一元化独裁本质的攻击。听听这番胡言乱语：“和平即战争，战争即和平！民主即暴政，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美德即罪恶，真理即谎言。”——乔治·奥威尔在阴郁的小说《1984》中如此描述真理部的宣言。而当我们的士兵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战场时，我们目睹了这场噩梦般的幻想成为现实。在朝鲜劳改营度过漫长岁月后归国的人们，竟用“人民民主”这种欺骗性陈词滥调来描述极权主义的中国。特定词汇的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迫使人们产生与这些词汇紧密相连的自动思维。我们使用的语言影响着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更决定着我们的思想。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事实被幻想与歪曲所取代。人们被系统性地、蓄意地教导说谎（维诺库尔）。历史被改写，新神话被构建，其目的双重：强化并奉承极权领袖，同时迷惑国家不幸的公民。整个词汇体系沦为是一套缓慢催眠的口号集锦。在弥漫于空气中的语义迷雾里，词语丧失了直接的交流功能。它们沦为纯粹的指令符号，激发恐惧与惊骇的反应。它们是战斗号角与巴甫洛夫式信号，再不代表自由思想。语言，这个曾被视为人类自由创造的最初象征，已沦为机械工具。在极权主义中，词语或许具有诱惑力，能抚慰或迷住听众，但它们被剥夺了内在意义。它们是情感诱导器，旨在将预设的反应模式烙印在听众心中。

人类精神上的惰性，对艰苦思考的抗拒，使极权独裁者能相对轻易地让臣民接受“大谎言”。起初公民或许自诩：“这全是胡言乱语——纯粹的双重话术”，但就在试图置之不理的瞬间，他已沦为内在暗示力量的俘虏。这正是双重话术的诡计：一旦人们放弃分析与验证，便会迷失其中，再也分不清理性论证与自我辩解的界限。

最终他们丧失信任能力，退缩于阴郁的麻木状态。当极权国度的公民接受了统治者的“逻辑”，便不再容忍任何讨论或辩论。唉，在我们的西方世界，这种回避语义清晰的现象屡见不鲜。切莫忘记，词语之战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冷战的组成部分。

某种东西已悄然渗入我们机械化的沟通体系，导致我们的思维模式日渐退化。人们获取思想和概念的方式过于随意。他们不再为清晰理解而努力。通俗化的画面取代了概念的正反辩论。人们不再追求真正的理解，而是听信不加思考的重复，这使他们产生了理解的错觉。

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而言，沟通更具幼稚的魔幻色彩。词语不再承载可理解的意义或思想，反而将公民束缚在对统治者的绝对依赖中——正如婴儿被父母的词语图景所禁锢。

词语灭绝

拜菲尔德在其论述语言灭绝的小册子中指出，词语常被用作社会革命的工具。追求权力的政客必须创造具有情感号召力的新标签和新词汇，“同时允许旧有实践和制度继续存在……诀窍在于用新词替换令人不快的意象，实质却保持不变。因此极权主义者必须编造仇恨语言来煽动群众情绪。我们都曾体会到和平一词已不再代表和平，它沦为安抚民众、掩饰侵略的宣传工具。”

极权思想中的词语专制与煽动者的官僚辞藻，旨在扰乱并窒息公民的自由思想。可以说，词语专制将人们转化为心理学所称的“符号不可知论者”——这类人仅能机械模仿，丧失了催生质疑与理解、塑造个人思想与理想的客观探究精神。换言之，个体公民沦为鹦鹉学舌者，机械复述现成口号与宣传术语，既不理解其真实含义，亦不知晓背后隐藏的势力。个人思想与理想。换言之，个体公民沦为鹦鹉，机械重复现成口号与宣传术语，却不理解其真实含义或背后势力。

然而这种鹦鹉学舌或许能给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带来某种幼稚的情感愉悦。海尔！海尔！——领袖！领袖！——这些有节奏的呐喊，恰似孩童通过牙牙学语、尖叫嘶吼获得的声音快感。

在极权主义国家，语言的滥用和宣传的奉若神明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明显。但这种弊病无处不在。在日常对话中比比皆是。许多发言者通过言语炫耀掩盖思想空洞，煽动情绪，使人们对本质上空洞无价值的事物产生崇拜与迷恋。口若悬河的虚伪行径正威胁着成为当代的理想范式。

极权主义国度中，信息管制加剧了语义迷雾。这个虚构国度的公民无法接触事实与观点的源头，无权验证所闻所读。他们沦为领袖“标签狂热”的牺牲品——所有事物与人物皆被官方标签定义，人们的判断由此被彻底操控。

标签狂热症

过度执着于物体或机构的标签意义，而对其内在价值仅流于表面关注——这种现象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且似乎愈演愈烈。我称之为“标签狂热症”：人们对那些听起来颇具科学性的名称——标签、学派、学位、文凭——抱有夸张的敬畏，却对其背后的实质价值出人意料地漠不关心。我们周围的人都在追逐固定公式、学分、分数、排名和标签，因为他们相信若想获得声望或认可，这些标识必不可少。为求被接纳，人们甘愿接受最不切实际且程式化的训练与塑造——更不必说高昂的代价——在那些专门培养特定标签、文凭和精致外表的特殊学校与机构里。那些专门学校和机构里，这些机构推崇特定标签、文凭和精致的外表。

不久前，一位精神科同事任职的诊所采用不同术语体系，他昔日师承的理念因表达方式与诊所规范相悖而遭批判甚至污名化。这位同事本是优秀的实践治疗师，却因每日接触那些娴熟运用异类术语的攻击性同行而陷入彻底混乱，最终不得不寻求心理治疗——其境况恰似从朝鲜战俘营获释的士兵。

凡事皆需套用既定陈词滥调与标签来表达评判，这种需求本质上令人不快。它贬低了相关工作或思想的价值，否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现象的微妙差异。在极权主义社会里，人们深陷焦虑，极度恐惧偏离既定观点与思维模式，以致只能用独裁者提供的术语表达自我。对极权主义公民而言，被认可的标签竟比生命永恒的变幻更重要。

当言语丧失其沟通功能时，便愈发显露出令人恐惧的规制与驯化功能。官方话语必须被信奉，必须被遵从。异议与反对既是肉体上的奢侈，也是情感上的奢侈。辱骂及其背后的权力，成为唯一被认可的逻辑。违背官方路线的事实遭到歪曲与压制；任何思想妥协皆被视为叛国。在极权主义国度里，不存在对真理的追寻，唯有对极权教条与陈词滥调的强制性接受。最令人恐惧的是：随着通讯手段的日益发达，人类的相互理解却在衰退。语义混乱与过量言语噪音，已使政治与非政治领域陷入巴别塔式的混乱。

极权主义国度的背叛罪

极权主义国度将思考者视为罪犯，因在这个神话国度里，公民因错误思想受罚的程度不亚于因违法犯罪受罚。由于秘密警察的监视无处不在，政权批评者若想与信任之人进行安全对话，便不得不采取阴谋手段。我们曾称之为“纳粹式手势”的行为，实则是与友人交谈前谨慎环顾四周的姿态。

在极权主义国度，罪犯可能只是官方敌意的偶然替罪羊——而这种替罪羊往往不可或缺。从一天到另一天，公民可能成为英雄或恶棍，这取决于政党的战略需求。

在极权主义国度里，人类几乎所有成熟的理想都成了罪行。自由与独立、妥协与客观——这些皆属叛国罪。极权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罪名：背教罪，可定义为顽固拒绝承认被指控的罪责。反之，极权主义的英雄则是悔罪的罪人，是捶胸顿足的背叛者，是自首的罪犯，是告密者，是线人。

极权国度里，守法的普通公民非但算不上英雄，反而潜藏着数百种罪行的嫌疑。若他固执地捍卫自身观点，便是罪犯；若他拒绝陷入困惑，便是罪犯；若他未能高声热烈地参与所有官方活动，若他保持缄默、保持克制，意识形态上的退缩即属叛国。若他面露不悦便是罪犯，因这构成纳粹所称的“面相叛逆”。他可因关联或疏离而犯罪，可因替罪羊机制或投射效应而犯罪，可因蓄意或预判而犯罪。若拒绝充当告密者，他便是罪犯。任何可想象的主义都能将他定罪——世界主义、地方主义；离经叛道、机械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军国主义；客观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平等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只要他存在，便时刻背负罪名。

在极权主义国度里，公民唯一的通行证，便是彻底放弃精神上的独立性。

第八章

审判中的审判

在华盛顿海军陆战队特别调查法庭审理某洗脑案件时，我作为专家证人被问及：为何部分美军军官会轻易屈服于敌方的精神压力？

当时我国国会调查正盛行。我必须坦诚回答：此类调查背后的强制性暗示，有时会对易受影响的头脑施加顺从压力。人们在日常政治氛围中，其思维早已被诸多心理机制所塑造。

尽管我们早已知晓极权主义手段对心灵的危害，但某些国内问题可能引发的价值观崩解，仍值得我们警醒。

极权独裁者成功地将其“司法”机器转化为威慑与统治的工具。曾经被公认为最崇高的文明人的崇高理想，如今却被希特勒、戈培尔之流的愤世嫉俗者嘲弄为一种合成情感，仅用于震撼或安抚民众。于是正义在极权审判者手中沦为闹剧，沦为抚慰民众良知的宣传工具。调查权遭滥用——煽动那些因混乱而无法辨别是非的旁观者心中的偏见与仇恨。

极权主义者向我们昭示：法庭与司法体系可沦为思想控制的工具。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探究研究自身制度如何被蓄意或隐蔽地利用，以扭曲我们对民主自由的认知。

正义的陨落

对心理学家而言，1936至1938年间莫斯科大清洗审判最耐人寻味之处，或许在于它引发了全球民众深刻的道德震撼——正是这份震撼，摧毁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关于审判的讨论，往往关注的不是被告的有罪与否，而是审判本身所呈现的令人发指的司法丑闻。人类灵魂深处始终存在着这样的信念：法官天生就是公正无私之人，诉诸法庭即是通往真相之路，法律凌驾于腐败、堕落与扭曲之上。当然，我们深知法官与我们同为凡人，他们会犯错，正如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甚至愿意接受暂时的司法不公，因为我们坚信终将迎来正义的昭彰，法治与公义终将胜利。当司法程序沦为闹剧，成为威吓民众的表演，人类灵魂深处便遭受重创。当正义女神不再蒙眼，转而紧盯利益机会，我们便心生恐惧与警觉。若无法在法庭寻得正义，人该向谁求助？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有位患者被选为陪审员。这次经历令他深感不安，因为本案检察官显然更热衷于定罪而非追寻真相。尽管陪审团拥有最终裁决权，其判决结果否定了检察官的策略，但这位陪审员仍深受困扰。“其他案件会怎样？”他问我，“倘若陪审员看不透律师的诡辩？倘若他们被律师持续的暗示和坚持所蒙蔽？”。

诚然，任何审判都可能沦为威慑武器；它能以隐蔽方式震慑陪审员、证人乃至全体公众。在极权体制中，某些高等法院的存在仅为履行威慑职能——其目的在于向本国公民及全世界证明：存在一股掌控政府、充满惩戒与威胁的力量，且这股力量能将司法体系化作其工具。

看似客观的官方调查，仅凭其必然伴随的暗示便可能沦为政治控制的工具。被调查者几乎自动背负污名与指责——因我们的怀疑被强加于他。他正遭受审查这一事实本身这使他受到怀疑。因此，即便是所谓的“民主调查权”也可能沦为毁灭性力量。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危险！审讯中赞许或谴责的态度，早已改变了人们对事实的认知。

任何司法行动——无论是法律审判还是调查程序——一旦广受关注，便会向公众施加心理压力。不仅行动参与者会关注最终结果，全体公民也可能在情感上卷入诉讼进程。官方调查既可能是权力的炫耀，也可能是追寻真相的行动。当专制政府或无良煽动者将其作为权力展示时，后果往往令人胆寒。德国国会纵火案、莫斯科大清洗审判、以及中国对美军战俘的法庭审判，都是“合法”行动的典型范例——它们助长了暴君的政治权力，旨在让无助的民众陷入混乱。其额外意图还在于震撼世界舆论。若从参与者的视角审视司法调查，我们将更清晰地看到必须防范的危险。

检察官化身煽动家与催眠师

我国近期的事件清晰表明，满足权力渴求的手段具有普世模式。古代用以恐吓民众的魔法面具，或许已被“英雄”的过度自信的武力展示所取代——这些英雄是人为塑造的，成为幼稚心灵崇拜与认同的对象。但宣传的喧嚣依然存在，经由广播电视放大千倍，持续威慑并催眠着警觉性较低的当代人。全球观众目睹煽动家扮演各种角色——正义的控诉者、受难的牺牲者、良心的代言人——却因威胁、指控与陈词滥调的单调重复，陷入半惊恐的恍惚状态，疲惫地丧失了注意力。

煽动家与极权独裁者一样，深谙如何对民众施加精神控制，如何制造群体性暗示与群体性催眠。个体催眠与群体催眠本质上并无区别。在催眠状态——这种暗示作用最极致的形式中——一个体会暂时陷入身心自动化的状态。这种完全精神服从的临床状态在儿童和原始人群体中极易诱发，但同样也能在文明社会成年人身上制造出来。朝鲜战俘营中的部分美国战俘，正是被催眠至此种境地。

个体越是认同群体归属感，就越容易沦为群体暗示的牺牲品。这正是社会融合度与认同感极高的原始部落对暗示如此敏感的原因。巫师和魔法师常能令整个部落臣服于其咒语之下。

多数人群都相当容易受到影响和催眠，因为共同的渴望与向往会增强群体中每个成员的易受暗示性。每个人都倾向于认同群体其他成员以及领袖，这使得领袖轻易就能掌控众人。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言，领袖可以指望大众日益增长的顺从性。

突如其来的惊吓、恐惧与恐怖，是诱导催眠的古老手段，至今仍被独裁者与煽动家沿用。威胁、突如其来的指控，甚至冗长的演讲与沉闷氛围，都可能压垮心灵，使人陷入催眠状态。

另一种简易技巧是运用特殊暗示词，以单调的语调反复念诵。激发自怜！告诉民众他们遭到了“背叛”，领袖们抛弃了他们。煽动家还需时不时穿插几句玩笑话。人们喜欢欢笑，也热衷于惊悚，尤其痴迷于诡异诡谲之事。讲述血腥故事，让他们在惊悚氛围中聚拢。他们很可能对这个令他们恐惧的人产生巨大敬畏，并愿意给予他带领他们走出情绪恐慌的机会。渴望摆脱一种恐惧时，他们可能甘愿彻底臣服于另一种恐惧。

广播与电视强化了声音、影像与语言的催眠力量。大多数美国人至今仍清晰记得1938年那个惊魂时刻——奥森·威尔斯播报的火星入侵剧集让数百人惊慌逃窜，如同逃离森林大火的惊惶动物般奔离家园。威尔斯的广播堪称大众传播媒介催眠

暗示力的鲜明例证，更揭示了权威播报的荒诞内容对理智正常人群的巨大冲击力。

这些媒介的催眠效应不仅源于其暗示力。我们的技术传播手段将人群凝聚成庞大的参与群体。即便我独自收听广播，技术上也与无数听众紧密相连。我在脑海中看见他们，无意识地认同他们，聆听时便与他们融为一体。然而我与他们之间并无直接的情感联结。正因如此，广播电视往往削弱人与人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摧毁个人思考、评判与反思的能力。它们直接俘获心灵，剥夺人们与自我、友人或书籍进行冷静辩证对话的空间。来自太空中空的声波扼杀了自由对话与讨论中激发自主性的互动性，从而催生出更深的被动接受——如同催眠状态。

许多人天生易受催眠，终生渴望沉溺于白日梦与白日酣眠；这类人极易沦为群体暗示的牺牲品。冗长的演说或枯燥的布道，要么削弱听众意志使其更易受群体催眠，要么激起他们更强烈的愤懑与反抗。长篇大论是极权主义灌输的惯用手段，因为最终倦怠感会突破我们的心理防线，使我们屈服。希特勒曾将这种通过单调重复实现群体催眠的技巧发挥到极致。他喋喋不休地演讲，在演说中加入冗长乏味的统计数据陈述。

持续用言语恐吓民众的喧嚣，是极权主义公认的手段。煽动家不仅运用这种暗示性技巧，同时更狡猾地攻击那些通常被认为清白的对手。此类操作常与重新煽动自我怜悯相配合。“十四年的耻辱与屈辱”——希特勒用此口号诋毁 1918 年停战协议至其掌权期间极具创造力的历史阶段。“二十年的叛国行径”，我国不久前使用的口号，听来令人毛骨悚然地相似，对任何目睹希特勒兴衰史的人而言都再熟悉不过。

背后捅刀的谎言将所有受其蒙蔽者贬低至多疑的童稚状态。这种煽动性言论旨在激起他人混乱而激进的反应。煽动者并不介意自己遭受暂时的言语攻击——甚至诽谤也能令他欣喜——因为这些攻击能让他持续占据头条新闻和公众视野，甚至助长人们对他的恐惧。与其被人遗忘，不如被人憎恨畏惧！煽动者靠着人们对其行为的漫长而混乱的讨论而肥硕起来；这种讨论麻痹了民众的思想，彻底掩盖了他那些红鲱鱼背后的真实问题。若持续足够久，人们便会厌倦、屈服、渴望沉睡，甘愿让那位伟大的“英雄”接管一切。其后续发展往往是极权主义。事实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曾押注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此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

我们这个国家近期经历的现象——尽管绝非蓄意为之——却与极权主义通过口号和猜疑对思想发动的蓄意攻击初始阶段惊人相似。喧嚣的暴力声浪会激起激烈的情绪反应，摧毁理智控制。当煽动者开始狂妄叫嚣时，其爆发往往被大众解读为真诚奉献的证明。但这类宣言大多恰恰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不过是权谋者争夺权力的手段。

现存一份极权主义的《恐怖主义文件》，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精心策划、反复叠加的恐怖浪潮迫使民众屈服。每轮冷战式的恐怖攻势都会在喘息之后更易产生效果——咒语——比之前的更有效，因为人们仍受先前经历的困扰。士气日益低落，每轮新宣传攻势的心理冲击力愈发强大；它们冲击的公众早已被软化。每个异议者都愈发恐惧自己可能暴露。渐渐地，人们不再愿意参与任何政治讨论或表达观点。内心深处，他们早已向恐怖的独裁势力投降。

我们必须学会像对待冷战中的外部敌人那样对待身边的煽动家和独裁野心家——用嘲讽作为武器。煽动家本身几乎丧失了幽默感，若我们以幽默相待，他便会开始崩溃。幽默终究关乎视角认知。若我们能洞悉事物的本应模样，便能看清它们可能扭曲的程度，从而在面对扭曲时予以辨识。将煽动者的言论置于正确视角下审视，便会发现其扭曲程度何其荒谬。我们怎能认真对待或严肃回应？我们肩负着生死攸关的重任——这关乎个体存亡，更关乎整个民族的命运。煽动者的效力根植于民众会严肃对待其荒诞指控；会将虚假议题当作现实问题讨论；或因其控诉陷入恐慌，从而放弃独立思考与验证的权利。

事实上，煽动者并非诉诸人类理性成熟的一面，而是迎合最不理性和最不成熟的潜能。试图用逻辑回应其狂言实属徒劳。首先，此举等于接受其争论前提，使我们陷入由对方设定的论战框架。在自身领域内选择规则击败对手，向来更为容易。此外，煽动者要么确实缺乏要么佯装缺乏那种能促成讨论与澄清的逻辑能力。他擅长转移话题。与这类人陷入无休止、无意义且必然恶语相向的争论，远比犯罪更可恶——他们对真理、社会福祉和实际问题漠不关心，却热衷于为自己争取无限的关注与权力。问题，却更热衷于为自己获取无限关注与权力的家伙进行无休止、无意义且必然恶语相向的争论，简直比犯罪更可恶。

在抵御自由遭受的心理攻击时，民众首先需要幽默与理性。对任何恐吓策略的默许或沉默纵容，终将导致民主制度的崩溃。混乱会瓦解信心。在像我国这样需要选民辨明真相的国家，全民必须洞悉煽动者欺骗或麻痹民众的手段。

审判作为威慑工具

人的易受暗示性可能成为自身及社会的沉重负担。民主自由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同样受到影响。即便没有蓄意操纵舆论的企图，报纸头条和党派专栏中对法律行动（如政治或刑事审判）的无节制讨论，也会助长集体情绪氛围。这使得直接参与者难以保持亟需的客观性，难以依据事实而非暗示和主观体验作出裁决。

此外，任何广受关注的司法程序都会对公众施加心理压力。因此，不仅参与者，全体公民都可能在情感上卷入诉讼进程。任何审判既可能是权力展示，也可能是真相揭示。看似客观的审查，仅因其必然伴随的暗示效应，便可能沦为控制工具。当审判成为极权政府行使权力的手段时，其后果令人不寒而栗。莫斯科肃反审判与德国国会纵火案便是典型例证。

当然，我国并未出现如此骇人的司法闹剧，但我们惯于将法律行动变成报刊、广播和电视的狂欢盛宴，这削弱了我们追求正义与真相的能力。若能推迟审判在判决作出之前，不得讨论任何法律案件的案情。

正如我们所见，任何人都可能在胁迫下认罪。残酷的“精神谋杀”并非唯一手段——仅凭指控便可定罪，尤其当当事人无力抵御集体愤怒与舆论压力时。

在恐惧与偏见异常猖獗的境况下，人们寻找替罪羊的欲望比平时更为强烈。因此，人们极易被满足其归咎需求的虚假指控所蒙蔽。我国私刑暴民的受害者正是如此沦为群体狂热的牺牲品，某些与叛徒与合谋者亦是如此。在舆论场中，审判本身便成了“有罪”的判决。

国会调查

首先我要声明，我坚信国会基于调查结果进行立法提案的权利，是我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保障之一。但如同任何人类制度，国会的调查权同样可能被滥用。调查权可能演变为摧毁权——不仅摧毁被调查者，更会摧毁那些以各种形式参与调查的证人的精神完整性。当前这波国会调查浪潮，或许正以微妙方式对公民施加胁迫效应。某些独裁者性格者怀有病的调查癖，国会调查恰是为其量身定制。凡是不认同他们、不卑躬屈膝者皆成嫌疑对象，遭受铺天盖地的诋毁与辱骂。公众往往倾向于不相信煽动者对手的任何言论，却不加批判地吞下那些或屈服于其威吓、或因认同其伪装主张而附和者的说辞，因为他们相信煽动者假装支持的目标。

从心理层面看，关键在于理解接受问询调查本身就具有胁迫效应。当一个人陷入交叉盘问时，往往会因程序而陷入瘫痪，被迫承认从未做过的事。在调查风气蔓延的国度，怀疑与不安便会滋长。当调查冲动蔓延的国度里，猜疑与不安便滋长蔓延。所有人都会被审讯者无所不能的威压所感染。例如窃听同样具有这种力量——它本质上是窥探他人的秘密。

心理学界如今正高度关注审讯对人的心理冲击。心理审讯者自身必须意识到各种此类沟通涉及的人际互动过程；若他未能做到，便无法探明真相所在。相反，

他得到的答案往往隐含于自身提问之中，这些答案可能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访谈双方皆怀有恶意时，即便双方怀着善意，仍可能出现此类情形。因为每个人带着其所有过往人际关系的总和进入访谈。在最初的语言“试错”阶段——可称为试探期——双方都在竭力探查对方的期待与弱点，同时试图掩盖自身弱点并凸显优势。被突然采访的普通人往往倾向于给出他认为提问者期待的答案。

每段对话、每段语言关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在重演孩童与父母早期语言互动的模式。对受审者而言，审讯者便化身为父母——无论善恶，皆成为怀疑或顺从的对象。由于审讯者自身往往未察觉这种无意识过程，结果可能演变成一场混乱的无意识或半意识倾向之战，其中言语往往只是双方人格深层之间充满猜忌的对话的掩饰。

所有经历系统性审讯的人——无论在法庭、国会听证会，甚至求职面试或体检时——都会感到自身暴露无遗。这种暴露本身便会引发特殊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些机制有时具有保护作用，但有时却可能对个人造成伤害。例如求职者为争取职位，他可能过度热切，在“留下好印象”、“展现最佳状态”的热忱驱使下，反而造成负面印象并引发怀疑。因为不仅言辞本身，表达方式同样能揭示我们的诚实与从容。紧张的声调、手势、停顿、沉默或结巴都可能暴露破绽。过度的热忱更可能诱使我们言过其实。而过度拘谨则可能导致我们言语匮乏。

在法庭诉讼或调查中，被告不仅对指控和质询采取防御姿态，更对自身潜意识中的罪恶感以及对能力的怀疑抱有强烈的防御心理。许多曾作为专家证人出庭的医学和精神病学同行告诉我，当他们接受交叉质询的瞬间，便感觉自己成了被告，几乎要被定罪。在他们看来，交叉质询往往与其说是探求真相的途径，不如说是情感胁迫的手段，这既损害事实也歪曲真相。正因如此，任何调查权力都极易沦为胁迫工具。让证人与被告陷入剧烈的舞台恐惧，实乃极权主义的恶毒武器。

正因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深谙此理，如今业内正兴起一种被动式访谈技术。当提问者不指向特定答案时，受访者会出于自身沟通意愿主动回应。中性提问“之后你做了什么？”能引发比“之后你回家了吗？”更自由坦诚的回应。

证人与主观证词

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大量证词翻供的现象那些曾坦率公开讲述过往经历的共产主义者。如今，我们又迎来另一种游行队伍：那些反复无常的悔过者。在这片相互矛盾的证词泥沼中，我们如何辨别真伪？面对那些言行矛盾的男女证人——他们

的言论竟能左右国家行动方向——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困惑？我们该如何学会评判他们的言论？从心理层面，他们的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无论是友善还是不友善的证词？

总体而言，那些言辞最恶毒者往往最不可信。其中许多人曾因内心深处的不安而投身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直至某天意识到所信奉的理念已背叛他们。尽管该意识形态曾长期严酷禁锢其思想，此时他们却能彻底挣脱桎梏。这一转变源于对旧有观察与信念的内在重构。然而他们抛弃的仅是僵化的意识形态规则体系，多数人并未随之摆脱潜藏的仇恨与早年的不安全感。他们或许已放弃了曾为其提供庇护与辩护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怨恨依然存在。

这类人往往急于投身其他严密组织机构寻求庇护。由于认知视角的转变，旧有事实与概念被赋予了新意义。然而，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我辩护与自我开脱冲动始终存在——正是这种冲动曾驱使他们效忠。如今他们必须证明自身清白，并向新信仰宣誓效忠。情感虽披新衣，终究指向自我辩护的目标。

在皈依者眼中，这种崭新的视角——即内在需求及其满足方式的新型重组——与他过往的期望体系和满足机制同样合乎逻辑且理性。此刻他重新审视若干久远的经历：昔日友人沦为敌人，其中某些人被视为阴谋家（无论事实是否如此）。他自身已无法区分真相与幻想、客观事实与主观诉求。由此可能导致感知与记忆的彻底扭曲。他会曲解自身记忆，而这种过程往往连皈依者本人也浑然不觉。我清晰记得一个典型案例：二战期间的此类行为。一名纳粹党徒转而成为反纳粹地下组织的勇敢成员。他不仅通过对抗纳粹来弥补过往罪行，更散布各种令人不安的谣言诋毁昔日同伙。通过将他们描绘得更加残暴，他以为能彰显自身更高的忠诚度。

同样地，皈依者在法庭或国会委员会面前的否认与误述，往往并非刻意造假，而是内心新格局的产物。针对叛徒过往的每项指控，都可能被他扭曲成自我辩解的新工具。极少数人具备道德勇气承认自己曾犯下真实错误。善意的谎言与选择性遗忘压抑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我在调查纳粹囚禁过的抵抗组织成员时亲身验证了这一点。我发现几乎不可能从他们口中获得关于酷刑后向敌人透露信息的客观陈述。当描述被迫背叛的经历时，他们总会立即用善意的谎言和二次扭曲来粉饰叙述。根据内疚程度的不同，他们要么过度自责，要么完全找不到自身行为的瑕疵。

保持沉默的权利

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行动近期引发了一场严峻的法律攻势，试图剥夺证人因信

息披露违背良知而保持沉默的权利。这种攻势可能严重侵犯个人隐私与精神禁地。破坏人格尊严与私人良知价值的行径，对民主制度的存续构成的威胁，不亚于极权主义的侵略。

我们必须认识到，证人往往难以在藐视国会与背弃人性之间作出抉择。行政当局或许能通过胁迫证人出卖旧友而发现少数所谓“叛徒”，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迫使人们背弃友谊。友谊是我们人类最珍贵的财富之一。任何政府或机构若以“藐视国会”为名，既可逼供逼供，亦可迫使背叛旧日忠诚。这难道不与专制暴政的行径如出一辙？代价又有多大？我们得到的不过是虚假的清算——源于意志薄弱的虚假清算。更甚者，这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信条——尊重人的精神力量。我们始终坚信宁可错放十个有罪之人，也不该错杀一个无辜者——这与极权主义理念截然相反，后者宣称宁可错杀十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或许能用这种策略惩罚罪犯，迫使良知要求沉默的人开口，但同样必然的是，我们摧毁良知的同时也摧毁了无辜者。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与布莱克在关于 1954 年《豁免法案》合宪性的反对意见书中（《纽约时报》，1956 年 3 月 27 日。参见第十四章）强调，沉默权是第五修正案赋予的宪法权利——既是个人良知的保障，亦是个人尊严与言论自由的守护。

即便承诺豁免，国会亦无权强迫任何人自白罪行个人不背弃昔日忠诚的诉求——即便其在认知尚浅的年岁曾犯政治判断之错——在道德层面的重要性，与协助国家追查颠覆分子的需求同样不可或缺。切莫忘记：背叛集体的根源在于自我背叛。当强迫一个人违背内心感受与自我时，我们实际上为其未来背叛更大集体埋下伏笔。若法律迫使人们背弃友情带来的内在道德感——即便这种情感源于年少时的忠诚——那么该法律本身便在侵蚀人的完整性，胁迫与思想扼杀由此开始。在忠诚反对与被动顺从的选择中，个人良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必须同时保护个人免受其个人道德标准的侵犯；否则，在个人良知与法律权力的较量中，人类良知终将败北。道德评判始于个体，而非国家。

精神勒索

洗脑的概念已引发若干法律问题，进而催生出想象犯罪的新维度。由于关于朝鲜和中国对战俘实施共产主义洗脑的报道在报纸上广泛刊载，引发了普通民众的焦虑。正如第三章所述，若干精神分裂症患者及边缘型人格障碍者抓住这一相对新颖的“洗脑”概念，将其作为解释自身特殊妄想的依据——即遭受精神操控的妄想。

这些人仿佛感受到自己的思维被彻底剖开，仿佛有来自外部的力量通过无线电波或其他神秘通讯手段，在远程操控他们的思想。

近年间，我收到数封此类患者来信，诉说持续遭受洗脑的感受。政治性精神胁迫的新概念恰好契合了他们的妄想体系。数位律师曾向我咨询，其委托人欲起诉想象中的洗脑者。

上述解释病态猜疑的概念，同样可被恶意利用来指控和起诉任何以专业身份提供建议或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就在此刻（1955年秋季），多起诉讼正在进行，被告被指控犯有第三方洗脑罪。他们被控以专业身份建议他人采取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无良律师如今能将微妙的人际关系扭曲为腐败案件。这正是利用同理心制造敌意而非共情、发动攻击的古老恶习。控告者既可滥用当事人公开人际关系的犹豫心理，又可利用美国司法体系的特殊漏洞——即便胜诉的无辜者 also 需承担法律援助费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在复杂司法案件中，当事人至少需支付三万美元才能上诉至最高法院——若属最高法院管辖案件——并向我国最高司法机构申诉。

由于过去几年洗脑现象中出现的新角度，精神病学界医疗行为更易遭受不合理的攻击。某案例中，第三方因心理治疗使患者在原本屈从的商业困境中获得独立而感到受损。另案中，医生因帮助患者摆脱屈从式恋爱关系及模棱两可的婚约承诺而遭起诉。第三例中，患者在治疗期间更换了曾对其恶劣相待的商业代理机构。所有此类案例中，受挫方均可基于所谓“洗脑”与“恶意影响”提起诉讼。在若干此类敲诈勒索案件中，当事人选择庭外高额和解，因诉讼程序将导致更高昂的成本。

遭受此类攻击的执业精神科医生不仅承受着不满方与恶意律师施加的经济压力，在某些州甚至连其职业保密誓言都不被法庭承认。希波克拉底誓言明言：

无论在行医过程中或日常生活中，凡目睹或听闻不应外传之事，我皆守口如瓶，因深知此类机密理应保密。

部分法院认为，仅身体检查与治疗属于不得泄露的医疗范畴；而心理治疗的核心——私人谈话——则不被视为医疗行为。以职业保密为由拒不披露信息，将被视为藐视法庭。更棘手的是，此类由第三方（而非患者本人）提出的医疗事故指控——通常的医疗事故保险并不涵盖此类指控。

此类针对心理关系的背信攻击——尽管目前案例数量稀少——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其他多种精神勒索形式开辟了道路。这意味着，仅因第三方感到被排斥、被忽视或遭受经济损失，微妙的个人关系便可能遭到攻击并在法庭上被起诉。我无法因经纪人提供错误财务建议而起诉他，却能以“洗脑”客户为由控告心理咨询师医疗事故。

精神勒索与阴险指控的新可能由此敞开！我们终将使恶意揣测、非主流建议、

最终甚至单纯真诚的人际影响与个性表达——这些在极权国家早已被视为罪行的东西——都成为可惩罚的对象。

“敲诈”一词源于英格兰与苏格兰边境战争。当时海盗与农民达成协议：以金钱或牲畜为代价，承诺不掠夺骚扰。该词源自中古英语“maile”，意为言语、租金或税赋。

法语对应词“chantage”更贴近精神胁迫的本质。其意为迫使对方“开口”——通过身体惩罚威胁或揭露秘密，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认。究其本质，正是精神胁迫。

我们不妨将日益盛行的逾越人性底线与尊严的倾向称为精神勒索。这种倾向利用对灵魂深处隐秘的洞悉，肆意伤害并羞辱他人。当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之时，精神勒索便已滋生。为羞辱受害者而搜罗丑闻与猎奇的行径，在黄色新闻界屡见不鲜。这不仅是在渲染不道德行为，更在同时侵蚀人类的判断力与公论。其煽情手法更会阻碍司法公正，预先定罪。

弱小婴儿以泪水和嘟嘴达成的目的，如今可由呻吟抱怨的控告者凭借恶意影响与洗脑的幻想实现。自杀倾向的患者亦能施加同类压力。

我深信最高法院未来必须制定规则来约束这些新型指控；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这个转型时代中人类日益增长的猜疑。我们用过多的安全措施、秘密档案勒索人们的思想；用流言蜚语勒索，用政治压力集团内部的微妙施压勒索，用游说团体内部的游说勒索，甚至用拒绝友谊的方式勒索。

法官与陪审团

那些肩负着辨明真伪、作出公正无私判决使命的人们又当如何？法官与陪审团本身也会受到案件其他当事人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外部因素和内在需求的左右。然而他们理应超越自身背景、个人需求与欲望，仅依据证据作出判决，不受任何偏见或主观意愿的干扰。须知，对案件作出裁决的不仅是官方相关人员，还包括所有知情者。你我这样的公众，同样是法官与陪审团。

法官和陪审团面临着仅凭事实作出裁决的艰巨任务，然而即便在他们身上，在强烈群体情绪的影响下，记忆中的事实也可能发生情感性的重组。

法官和陪审员会受到争议性问题所引发的集体情绪氛围影响，难以保持其亟需的客观性。正如数起种族迫害审判所证明的，普通陪审员在审判开始前就已屈从于大众的情绪诉求。

近期两位法律权威人士对陪审团审判制度提出质疑：佩克批评其延缓司法进

程，纽曼则认为这是过时的司法手段。陪审团审判是十三世纪的遗物，旨在取代由神谕和偶然决定罪责的魔法审判，改由人类的技巧和权力较量判定双方的胜负。由熟识被告及案情的同辈组成的陪审团，在结构简单的社会中长期发挥着作用。但在当今复杂社会，人们彼此了解甚少，千头万绪的信息充斥心智，情况已然改变。“普通陪审员常受其遗传特质与成长背景中的情感偏见所左右。”（纽曼语）我们的陪审团未必能厘清是非曲直的复杂脉络，亦难精于事实解读。更何况，许多诉讼律师深谙如何俘获陪审团的心智，如何牵引其思维并施加影响判决。除此之外，陪审员的遴选过程正日益拖延司法进程。

为说明个人、社会条件如何影响陪审员当下反应，不妨以“叛徒”一词引发的普遍内心困惑为例。这个情感充沛的触发词意味着：当某人基于无可辩驳的事实被指控为叛徒或颠覆者时，任何试图从科学心理角度解释其行为的尝试，都会被视为背信弃义的知识分子行径。社会共识是：叛徒理应受罚，此等社会渣滓死有余辜。即便法庭上为其辩护的律师，也可能被指控为叛国同谋。

我们都深知诸多触发词汇，它们会立即扰乱客观认知与判断，因其触及未解的潜识情感。例如“共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这类词汇，便可能成为引发混乱的触发词，唤醒深藏的阴暗情绪。煽动者热衷于运用此类词汇煽动群众情绪——尽管他们无法掌控这些情绪，却认为其恰好契合当下策略需求。然而这如同玩弄炸药。任何人都可能被“无风不起浪”或“偷过一次就是终身小偷”这类暗示性陈词所左右。我曾在激烈辩论中目睹过最耐人寻味的例子：有人因被斥为“肮脏的一夫一妻制者”而遭众怒。指控一经提出，舆论瞬间倒戈相向。

即便是法官也可能受自身情绪困扰的影响，尤其当证人试图误导时，其偏颇证词易左右裁决。在英国，法院对陪审团偏见态度的影响更为警惕。该国审判程序受到全面保护，主要通过禁止庭前讨论与商议来实现，无论被告是否不得人心。

电视审讯

公开的官方审讯会影响观看者——而这种影响本身可能左右审讯结果。例如本国多起刑事听证会曾通过电视向公众直播。远离现场的市民安坐家中现场，目睹辩护律师如何操纵事实或指导当事人（其中不乏知名犯罪头目）塑造有利形象。尽管这些操作如同预先安排的摔跤比赛般漏洞百出，却导致部分神情凝重的受害者显得滑稽可笑，而犯罪者沉着自信的姿态反而更具魅力。受害者往往难以承受聚光灯下的压力，感到局促不安又难堪。而罪犯们则要么以义愤填膺的语气否认所有指

控，要么在供述中演变成歇斯底里的求情。所有匿名旁观者产生的魔效应——因证人或被告想象着他们的赞许或谴责——影响着听证会的结果。我们所有观者都带着自身的主观期待参与了这些听证会。

电视将此类听证会变成一场大众审判，不知不觉间，法庭氛围中充斥的并非正义，而是公众善变的情绪。每项证据都蒙上谣言与情感的色彩，震惊的旁观者最终只留下怀疑与深深的忧虑——这场听证会并未真正触及定罪的关键事实。

追求超然

人类对正义的追求蕴含着微妙的深意。当正义女神与权贵眉来眼去或彻底屈从时，人们便感到不安，焦虑随之加剧。但人类对正义的渴求不仅需要安全感来获得满足，更需要正义感是一种内在态度，旨在实现能够激励社会、提升道德境界的理想法则。它不仅要求法律强制执行的最低限度体面行为，更要求最大限度的个人主动性和相互公平。它追求个人与社会正义，要求人们在彼此关系中、在人与政府关系中相互约束诉求，以维护互惠原则。任何理想的正义感都需牺牲精神，蕴含自我约束。情感主义是其天敌。这种正义理想不仅适用于个体，更应成为社群与国家的治理准则。唯有在自由互让权力的氛围中，民主才能茁壮成长。

人们能否学会客观观察，摆脱个人情感的束缚？答案是肯定的。固有的认知方式和观察习惯可以改变。许多人已意识到，当人们屈从于集体激情与偏见时，会对自身及他人造成伤害。这些人通过敏锐的探究与观察，学会如何减少偏见，如何以不断调整思维与视角的方式审视事件，并追寻真实本质。

集中营或战俘营中的囚犯，因不断遭受谣言和暗示的轰炸，其观察又因必要的自我保护而扭曲，几乎无法对同伴的行为作出客观陈述。当下的群体态度主导着他们的观点。那些沦为替罪羊的人，其存在意义在于为其他囚犯宣泄共同的愤怒，他们永远无法消除后来关于自己的所有传言——仅仅因为所谓客观见证者的数量对他们不利。要区分谣言与事实，消除根深蒂固的心理偏见，实属不易。人类存在一种本能需求：追随多数派，顺应强者意志。这种需求植根于生物性的安全渴望。正因如此，战俘营中的士兵们才滋生出强烈的集体参与感，最终导致对事件真相的完全无意识篡改。个体观察在群体舆论的强大冲击下彻底消亡。

在未来的心理学时代，当人类行为的洞察力得到更广泛的理解与应用时，我们将更深刻认识到可靠证人的重要性。每份报告、每段证词——无论支持或反对——都将基于其心理与历史背景接受审视与权衡。未来的公民回望当下，必将对审判中

因未揭示一方显而易见的事实来挑战另一方同样明显的事实而浪费的时间嗤之以鼻。他们将明白，我们当时的行为不过暴露了彼此的敌意与恐惧不安——正是这些情感驱使我们以微妙而强迫性的方式，对记忆与印象进行主观重构。记忆与印象进行主观重组。他们将指出，客观思维在那时尚处于襁褓之中。

第九章

恐惧作为恐怖的工具

生存之惧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际关系引发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惰性与精神死亡往往比精神警觉与生命更具吸引力。古典心理学常将死亡恐惧与未知恐惧视为诸多焦虑的根源，但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对生活的恐惧才是更巨大、更深邃、更令人胆寒的存在。

生活常超出我们的掌控。从相对安全的孩童式依赖走向自由与责任，既充满风险又危机四伏。生活需要行动与自发、尝试与错误、沉睡与觉醒、竞争与合作、适应与重塑。生活牵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每段关系都蕴含千丝万缕的关联与纠葛。生活将我们从受庇护的梦境中唤醒，要求我们每日向世人展露弱点与力量，直面他人敌意与善意。它迫使我们建立防御机制，又因目标与关系不断变化而需持续更新。它要求我们在孤独中寻求自由协作，既要臣服又要征服，既要顺应又要反抗。它剥夺了童年满足的酣眠，湮灭了婴孩时期无所不能的梦幻。生活需要给予与索取的互惠。最重要的是，生活即是爱。而许多人畏惧承担爱的责任，害怕在他人身上投入情感。他们只求被爱与庇护，惧怕受伤与被弃。

我们清晰可见：如此多人热切拥抱生活赋予的种种局限与挫败——无论是偏见造成的神经质束缚，还是权力政治强加的极权桎梏。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精辟阐释：当自由的压力缺乏责任与理解的平衡，便会将人驱入极权思维的牢笼。迫使人们放弃来之不易的自由。这种放弃无异于一场缓慢的精神死亡。

极权主义领袖——无论右翼还是左翼——比任何人都深谙如何利用这种生存恐惧。他们以混乱与迷茫为滋养，在国际政治动荡时最为得心应手。恐惧策略是他们最有效的战术之一。随着文明及其管理日益复杂，权力政治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增强。当极权主义者将我们已讨论过的种种诡计——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反复暗示、通过厌倦与肉体摧残实现脱敏——融入其战术体系时，他们便能赢得控制人类思想的战争。

本书前几章已详述将人改造为极权主义机器人的技术手段，以及即便在自由国家中也存在着侵蚀人精神完整性的倾向。我们必须认识到：对顺从的强调与对自发生活的恐惧，其破坏性几乎可与极权主义对思想的蓄意攻击相媲美。从众心理与对生活的恐惧，剥夺了自由生活方式在对抗极权主义斗争中最宝贵的资产。

人类的力量源于思想的多样性与独立性，源于对非顺从的接纳，源于对不同观点进行讨论与评判的意愿。当我们否认生命的多元性、人心的复杂性与个体性，当我们宣扬僵化的教条与自以为是时，便在悄然接纳我们所痛恨的极权主义态度。幻觉从来不是任何国家、阶级或群体的专属，而极权主义的幻觉——它本身就是思想灭绝的推手——能从多方侵袭我们：来自右翼或左翼，来自富人或弱势群体，来自保守派或叛逆者。

恐惧与威吓不仅是精神胁迫的结果，更是其手段。尽管目前尚未形成关于恐惧与焦虑的统一理论，因此我们尚不明确这些情绪产生的具体原因及这些情绪的发展如何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恐惧和恐慌何等有用的工具，并通过描述揭示这些压倒性情绪对人的影响。

多数人将恐惧反应视为歇斯底里的绝望宣泄。但本章将阐明：恐惧与恐慌同样以矛盾的形式显现于冷漠与麻木之中——正因这些反应较少被认为恐惧所导致的，其对个体的危害往往远胜于一场痛彻心扉的歇斯底里。正是这些隐匿无声的恐惧，深刻塑造着我们的社会政治行为。

恐惧与惊惶不仅是对显性危险的反应，更是对令人不安的宣传缓慢渗透、以及我们无时无刻承受的暗示浪潮的回应。恐惧无处不在，常在我们最意想不到之处投下阴影。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恐惧驱使行事；我们或许认为自身行为完全正常理性，而心理学却警示我们：潜移默化的恐惧早已悄然侵蚀心灵。

恐惧与灾难强化了人们对强大领袖认同的需求。它们促使人群聚集，人们不再愿成为独立的个体细胞；他们更愿成为庞大神秘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在与领袖的合而中抵御威胁与苦难。这种寻求庇护的本能反应同样针对异议与个人主义，针对个体自我。我们由此看到一种回归原始群体参与状态的退化。诚然，这种自我萎缩的过程是回归群体反应的负面体现，却也激发了人们对合作与互助更深切的需求

认知。在历次战争及普遍遭遇的危机中，许多人首次意识到与邻里间的情感纽带。与此同时，焦虑可能滋生猜疑与寻找替罪羊的冲动。恐惧的悖论在于：它既能传播未成熟情感纽带的温暖，又会播撒冰冷的猜忌。

尽管全球范围内存在着有意识地克服恐惧与不安全感趋势，却也存在着更隐蔽的逆流，不断催生新的恐惧、焦虑与不安。无论是否意识到，现代人正生活在一种恐惧氛围——对战争的恐惧、对氢弹的恐惧、对极权主义的恐惧、对非主流思想的恐惧、对异议的恐惧。当我们意识到恐惧时，它早已开始影响我们的行为。一旦恐惧渗透心灵并激发幻想，它便开始主导我们的行动，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无法消除现代世界中成千上万的压力与恐惧诱因，但可以学会识别并理解最常见的恐惧反应模式。如此便能部分释放它们造成的紧张感，并掌握更有效的应对之道。

关于危险的幻想

我清晰记得二战期间在荷兰的一个晴朗午后。当时正与友人打网球，我们沉浸于运动带来的畅快挥洒，却被隔壁球场的球员们破坏了兴致。他们说着令人憎恶的占领者语言，尽管穿着与我们相同的白色运动服，却显然是暂时忘却征服世界妄想的纳粹军官，正试图普通人般放松身心。突然，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和防空炮火的响动。接着，一群低空飞行的喷火战斗机——来自英国的盟友——呼啸而过。我和朋友们停下球拍挥手致意，目送战机翻飞盘旋。邻近球场的德国人反应截然不同——他们惊慌失措，有人甩开球拍逃窜，有人扑倒在球场边沟里。客观而言，英军战机扫射的威胁对所有人同样存在，但对德国人而言那是敌机，对我们却是盟友。

想必不必多言，此事之后我的荷兰同胞们便被禁止在这片球场打网球了。

一年后，我机缘巧合来到伦敦，每当夜间德军飞机掠过时，我总会重现当年网球场上那些德国军官的疑虑。仿佛每一颗子弹、每一枚炸弹都直指我而来。恐惧中幻想的作用何其巨大——敌方炸弹对我们的意义可能与友方炸弹不同。

恐惧可以简单定义为对危险的内在反应。这个定义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一旦提出，我们便面临新问题：何谓危险？炸弹、火灾、地震和瘟疫等危险显而易见。肉体折磨、极权主义的直接攻击、经济突然崩溃亦然。但情感危险同样隐秘，它们常引发恐惧的幻想与预期，伴随着内心对厄运与灾难的预见。正如后续案例所示，不同个体面对这些危险的方式各异。我们对生活与人类的个人态度，决定了某种境况在我们眼中是值得迎接的挑战，还是不可战胜的危险。有些人享受严密控制与机械化规训。对他们而言，极权主义与思想控制并非威胁，反而带来一种永恒的

无责日间沉睡。于此类人，自由是危险，依赖才是愉悦的安全。另一些人则憎恶任何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侵犯，时刻警惕着抵御外界压力——无论真实或虚妄。

悖论性恐惧

即使人们经过充分准备和训练以应对预期的灾难（如监禁和洗脑），危险的实际冲击仍可能引发各种防御行为。过度训练甚至可能削弱个体，因为漫长的预期会让各种潜藏的幻想肆意滋长。在少数人身上，这种反应可能表现为病态恐惧，例如彻底的神经崩溃或完全瘫痪。每个人对危险的心理抵抗阈值各不相同，且该阈值会随身心状态日复一日地变化。通常情况下，缺乏经验的士兵不会在战斗中立即显露病态恐惧；此类行为需要时间酝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恐惧反应与脆弱时刻往往在真实危险消退后才显现。当战场的紧张或战俘营的日常压力结束，不再需要隐藏恐惧、控制行为时，许多人便彻底放任自我，将所有焦虑尽情宣泄。

1944 年，在英国多佛尔，当地居民经历了一场集体性精神崩溃。历经四年德军持续轰炸的紧张状态后，当他们突然听见一片寂静时，许多人崩溃了。盟军胜利横扫比利时海岸线后，炮火骤然完全停止。那一刻，多佛尔的许多居民崩溃了。仿佛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将他们推入了震惊状态。

这种危险消逝后的矛盾恐惧反应值得我们深思。极权主义策略家深谙：当紧张局势暂时缓和，人们警觉性下降时，更易陷入极权思想的控制。他们在恐怖统治中刻意利用这种“喘息期”的心理效应——当我们卸下抵御危险的防线，便会不自觉地接受任何强力暗示。极权主义者在其《恐怖主义文件》中，将利用这种松懈的技法称为“碎片化恐惧战略”。在尖锐紧张局势间的平静期，他们能轻易操控受害者的思维。希特勒正是如此利用慕尼黑绥靖时期——此时他的宣传攻势效果加倍。

无论恐惧与危险引发的反应是即时还是延迟，多数人在压力下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可归为以下几类：

1. 退化——已习得行为的丧失。
2. 伪装与掩饰——即所谓的“佯装或昏厥”反应。
3. 爆炸性的恐慌——通过“战斗或逃跑”机制进行防御。
4. 我们的心身条件反射——身体接管一切。

退化

尽管多数人或多或少了解退化现象，即文化时钟倒转的概念，但当目睹稳重成熟的男女在灾难恐慌中丧失文明习得的行为模式时，仍会感到震惊。

我曾治疗过一位在国外遭遇地震的工程师。震后他完全像婴儿般行事。尝试过各种疗法均告失败，始终无法改变其幼稚行为。他再也没能回归正常、恰当的举止。自那命运之日，他便蜷缩在逃避的洞穴中。仿佛一瞬间遗忘了毕生所学，不再是成熟的科学家，而是襁褓中的婴儿——咿呀学语，需要人喂食。我认识的另一位地震受害者是位数学教授，震后被发现赤身裸体在花园里玩着儿童玩具。他完全拒绝承认自己身处紧急状况，退化到婴儿般的无责任状态。

作为一种防御机制的退化行为在动物界随处可见。当生物面临危险时，它会降低自身复杂性，退化为更简单的生存形态。当生存环境过于危险时，某些易受侵害的多细胞生物会蜕变为防护严密的简单单细胞生物。这种称为囊化的退化过程，可能发生在生物体遭遇异常温度或异常干旱时便可能发生。

人类同样受制于这种生物防御法则。当生活过于复杂时，人们常会倒转文明时钟，重归原始状态。功能的突然瓦解崩溃可能随之发生。这种退化行为在儿童中尤为常见：受惊时他们常会说起婴儿语或出现尿床现象。二战轰炸区里，许多十几岁的少女重新玩起洋娃娃。即便是看似成熟世故的男女，在恐惧侵袭时也可能显露出千百种回归幼稚的症状。这些症状未必如上述例子般戏剧化，但本质上仍是恐惧的体现。当成年人开始结巴、丧失日常仪态，当他们随身携带特殊护身符，当他们编造关于自身魔法般不可侵犯的故事，当他们更爱炫耀、吃更多蛋糕糖果、吹口哨、喋喋不休、哭泣不止，并抛弃了拘谨刻板的正式举止——这些行为皆源于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俘营和防空洞里，人们真正地相互了解起来，就像游戏围栏里的孩子们那样，他们天生具备一种简单的直觉能力，知道谁值得信赖。在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我们被同样的可怕阴影所困扰，这些阴影曾困扰着石器时代的人类，而我们可能会像那些更单纯的祖先那样来应对它们。

伪装与变装

另一种模式则是伪装与变色——与命运玩捉迷藏。这种实用的保护性欺骗手段常见于低等动物，它们能暂时获得与环境相符的形态或色彩，恰似军事伪装。变

色龙的色彩变化众所周知，还有许多动物能在危急时刻改变皮肤或身体形态。然而许多人未曾察觉，人类皮肤也存在原始的伪装机制。鸡皮疙瘩现象类似受惊猫咪竖毛的反应；而突发性毛发灰白或皮肤变色（医学上称为恐惧性黑变症）则改变了我们的外在色泽。

二战期间，我随医疗队前往遭重创的鹿特丹。初见当地民众时，我们以为他们全都戴着面具——皮肤褶皱呈现典型的伪装反应，每个人仍深陷惊恐之中，仿佛仍在躲避那场倾泻而下的烈焰地狱。

这些生理反应存在心理层面的对应现象，即所谓的“装病或昏厥”模式。心理学将装病与昏厥两种反应都视为逃避现实的被动退缩。这种反应类似于炮弹休克或战斗神经症，其研究是医学领域最引人入胜的课题之一。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可能陷入精神麻痹状态。此时受害者变得麻木不仁，无法言语也无法行动。危险的现实对他而言已不复存在。他看似死亡，唯有那双惊恐灼灼的眼睛透着生机。这种死亡姿态或僵直性反应常令旁观者毛骨悚然。在拥挤场所，再没有比昏厥更具传染性的现象了。

必须深刻认识到：在理应全力应对的危急时刻，人类竟可能变得如此被动、麻痹、冷漠与屈从。极权主义者正是利用人类面对恐怖时的消极反应，将囚犯关押在仅有少量看守的巨大集中营中——他们赌的是这种消极反应能使受害者放弃反抗或逃亡。正如蛇影逼近时僵立不动的鸟儿，人类为摆脱预期中的紧张感，可能被屈服于恐惧。窃贼因无法承受随时暴露的焦虑与不安而向警方自首，便是明证。

情感冲击与沉默恐慌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心理伪装反应——当人们无法应对所处境况时，精神麻痹便会降临。面对突发危机，人类最常见的反应之一便是被动屈服于恐惧；这种现象并非病态人格的专属，其发生频率远高于狂暴显露的恐慌，且通过诸多微妙行为机制显现。人们可能借抱怨身体不适逃避现实，也可能躲进“极其重要”的伪任务与爱好中寻求庇护。人们以看似自保的自满否认真实危机。他们变得固执抗命，毫无行动力，声称对政治毫无兴趣。有人试图向自己和他人兜售绝望的麻痹理论与末日的必然性。但千万别提核弹！另一些人则沉溺于酗酒的忘我状态，或躲进冗长而无意义的会议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马奇诺防线——一座自认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我们曾称之为鸵鸟政策，而鸵鸟政策堪称世间最危险的策略之一。当心那些鼓吹和平的极权主义者，其意图或许正是将世界推向被动屈服于恐惧的深渊。

崇尚消极与所谓放松的思潮，堪称当代最危险的思潮之一。本质上，它同样可能是一种伪装模式——既不愿直面生活的危险与挑战，也不愿暴露自身。我们无法逃避周遭的种种压力，它们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学会妥善应对，并将闲

暇时光用于更有创造力、更令人满足的活动。寂静而孤寂的放松——借酒精、甜食、电视屏幕或悬疑小说——可能将心灵抚慰至被动状态，使其逐渐沦为某些可畏敌人的诱人意识形态的猎物。通过消极态度否认极权主义的危险，可能使最初恐惧它的人们逐渐屈服于其甜言蜜语。

爆炸性恐慌

相较于其他恐惧反应，大众对我们称作恐慌与踩踏的爆发性运动反应更为熟悉。这便是所谓群体歇斯底里，即各自为政的反应。婴儿会发脾气，成年人则会陷入失控的狂怒与“战斗或逃跑”反应。尽管我们通常将“恐慌”一词用于描述剧院火灾中的歇斯底里式逃亡或民众集体恐慌性逃离等现象，但从面临威胁时产生的最初不安征兆，到严重恐慌中出现的哭喊奔逃、争斗厮杀等大规模爆发，其间存在诸多微妙过渡阶段。人类展现出多种恐慌性狂乱行为模式——癫痫发作（如战壕或战争性癫痫）、狂怒、暴怒、自毁行为、犯罪性攻击、暴走、逃兵、暴动、失控冲动、疯狂驾驶。处于恐慌状态的士兵可能表现得像个愤怒的孩子。他可能攻击战友或向己方部队成员开枪。平民在恐慌中可能开始哭泣、尖叫、无目的地走动并搓手。也可能高声斥责或呼救。惊惶者会传播恐慌；每次呐喊都煽动他人逃窜。恐慌从来不是粗暴力量或精力衰竭的问题，而是内在结构崩塌、组织能力瓦解的体现。惊惶的领导者会犹豫不决，不敢动用所托付的权力。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易怒的孩子。危险越是神秘莫测，我们的反应就可能越原始。

暴乱、狂热的群众运动与犯罪浪潮，皆助长恐惧与恐慌，因而可被利用来加深人类的不安全感，使其更彻底地屈从于极权环境。任何恐怖统治都迫使受害者压抑反抗与愤怒的本能。这种压抑愈深，受害者内心积蓄的狂怒就愈猛烈，终须等待时机，以某种社会认可的形式爆发。战争往往是这种普遍性恐慌的代表——积蓄已久的内在愤怒大规模爆发。在此，人类内心的恐惧也通过大规模毁灭得以宣泄。

身体接管

尽管心身反应并非神秘现象，但其机制却更难阐释。让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阐明此现象：二战期间，我位于荷兰的家乡经历数次轰炸后，爆发了膀胱疾病流行——

一至少这是最初的解释。人们因频繁尿意而睡眠受扰，几乎无人能安睡整夜。泌尿科诊所一度生意兴隆。后来精神科医生揭示：这种尿意正是恐惧引发的首批生理反应。患者只需回溯童年记忆，想起考前身体的紧张反应，便能理解其中缘由。尿频可视为身体释放压力的机制之一。

身体可能通过多种生理症状应对危险与恐慌：出汗、尿频、心悸、腹泻、高血压仅是其中几例。我们知道，这些反应大多与身体调动特定防御机制对抗威胁有关。恐惧焦虑引发的躯体疾病具体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人生经历，尤其是童年发展历程。那些早期紧张与渴望被牛奶和糊状食物淹没的婴儿，长大后一旦遭遇威胁便会试图再次填满口腔。暴食对他而言已成为一种消除恐惧的手段。渴望被牛奶和糊状食物淹没的婴儿，长大后一旦遭遇威胁便会试图再次填满口腔。暴食对他而言已成为一种消除恐惧的手段。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无意间训练了孩子某些器官对生活压力作出反应。

由于人体拥有众多器官，面对内外威胁时，其生理与情绪反应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心身医学依据不同器官对外部压力或危险的反应，将人格类型划分为：溃疡型、哮喘型、结肠炎型、心力衰竭型。这些类型在对抗恐惧的同一场战役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模式。社会紧张感可能通过多种器质性疾病表现出来。但在急性惊恐状态下，某些器官的反应更为普遍。正如先前案例所示，尿频几乎是惊恐的普遍反应：“胃部不适”则是另一种近乎普遍的恐惧反应。

二战期间，一支医疗队曾竭力寻找导致美军士兵患上未知肠道疾病的病原体，这些士兵正准备登陆太平洋某敌方岛屿。医生和生物学家反复搜寻却一无所获。当登陆作战开始后，士兵们得以在实战中释放等待进攻的紧张情绪，这种神秘疾病便如它出现时那般突然消失了。这些士兵在任何方面都并非怪异或异常。即便有人自觉接受危险挑战并做好应对准备，体内反制力量仍可能压倒心理意志。心灵渴望勇敢，身体却逃遁于疾病。童年养育的一致性、家庭情感的安全感、以及终生接受生活挑战的条件反射——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们在面临考验时的反应模式。

在二战期间治疗惊恐士兵时，精神科医生曾花时间向他们解释这些危险反应机制。当患者开始理解自身反应并意识到其普遍性时，便迈出了康复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们不再对恐惧如此畏惧恐惧本身，也不再因怯懦而战栗。他们终于明白，将自己降至无助孩童状态的反应，实属人类普遍防御行为模式的一部分。理解这点后，他们不再因私密恐惧而战栗羞愧，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反应与多数人无异，从而重新获得平静履行职责的能力，并能更好地掌控自我。坚韧与机敏既取决于自我认知，也依赖于他人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在压力与灾难时期，人们开始探查朋友与敌人的脆弱点和弱点。这种试探在热

战期间持续不断，冷战时期同样存在。冷战对人类的想象力和精神毅力施加着持续压力，并引发诸多奇特的逃避反应或生理反应。

每当恐惧与危险逼近，人类必须作出抉择：是放任狂怒肆虐？是专注自我保全？抑或承担应尽之责？我们描述的恐惧反应揭示了原始自我保护冲动（尽管可能误入歧途）如何突破所有文明防线。唯有通过训练与对内外危险的自觉准备，才能赋予人抑制这些反应的力量。这种训练始于家庭核心，并由和平自由的社区典范所支撑。在内心恐惧与外部危险的持续博弈中，这些才是最初的导师。

对于那些面临被洗脑风险的人，只需让他们熟悉事实真相即可获得帮助。预先知晓具有部分保护功能，这是我们能给予他们的最佳保障。它消除了焦虑与神秘预感带来的消极影响。借助这种援助，他们精神上的脆弱性将通过与生俱来的内在力量、良好教养的榜样，以及社会赋予的挑战与机遇得到进一步强化。

第三部分

隐性精神胁迫

在对思想控制、精神灭绝与洗脑的调查过程中，一个日益清晰的结论是：必须更关注那些悄然促成精神屈服内在准备的手段。个人发展及多元文化影响，能悄然削弱人类抵御暗示和意识形态攻击。在第三部分中，我呼吁读者注意技术与官僚主义如何悄然侵入我们的思想，以及特殊形式的偏见与群体性幻觉如何在我们尚未察觉时便占据心灵。最后一章对叛国与忠诚进行探究，再度警示我们群体思维对个人忠诚观的巨大影响。

第十章

童年即人生

此刻我们必须自问：在自身成长过程中，是否存在某些因素使我们更易遭受精神侵蚀乃至最终洗脑？例如，我们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的胁迫需求？那些传递给孩子的信息与教导，是否会使其沦为环境的精神囚徒？

这些重要问题需要深入的哲学与教育学探究。但就实践目的而言，我们可将关注点聚焦于两个发展领域：父母的影响与特定社会习惯的影响。后者已在本书第二部分探讨过。根据我的经验，必须重申：所有在过度严苛的服从与顺从规则下受教育者，在压力下更易崩溃。

社会习俗的影响。后者已在本书第二部分探讨过。我必须重申：根据我的经验，所有在过度严苛的服从与顺从规则下成长的人，更容易在压力下崩溃。二战期间，那些被俘的所谓强悍党卫军军官接受审讯时，轻易就交出了军事机密。在极权统治下生活多年，他们对新的命令同样唯命是从。有时我们只需模仿其主子的吼叫声，他们便会抛弃旧主投靠新主。对他们而言，任何命令都已成为触发顺从服从的自动开关。

在处理本国共产党成员时，我们也有类似经历：这些成员在政治上唯命是从，莫斯科一声令下，他们便立即放弃阻挠策略，转而采取截然相反的行动方针。

极权主义者可能的发展路径

越来越多的关注聚焦于那些在民主氛围中成长，却主动选择投身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男女身上——探究促使他们走向政治极端主义与极权思维的各种心理动

机。接触过极权主义态度并研究过相关现象的心理学家发现，那些易受其影响的人，普遍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选择极权主义几乎总是由内在人格因素决定——若你愿意，可称之为挫败感。使人成为极权主义者通常既非贫困也非社会理想主义，而多是内在因素：一方面是极端顺从与受虐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对权力的渴求。未解决的兄弟姐妹竞争关系也起作用；我曾治疗过数名纳粹帮凶，其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身为长子的身份——他们无法忍受与弟弟们的竞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为何各地极权主义者都能利用暴力宣传来煽动怨恨、仇恨、种族主义和政治狂热。他们深谙只需挑动这些未成熟的匮乏感与不满情绪，便能使人陷入幻觉。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惊奇地发现政治选择的基础往往多么不切实际。极少有人是通过研究比较各党派原则后才选择民主或极权政党的。人们选择政治归属的动机往往源于冷漠、家族传统、经济利益的期待或其他无关因素。正是这种理性动机的缺失，使人们更易受极权主义的蛊惑——即便身处民主社会亦然。例如我清楚记得一位荷兰医生，我们曾同窗医学院。他爱上一位共产党员的女儿并最终与之结婚。起初他因原则与爱慕的冲突而困扰，但渐渐地原则让步了，他开始为党的路线辩护。后来我偶尔遇见他，他是个出色的医生，也是位开朗的伙伴，对我们半开玩笑的讽刺也坦然接受。但一旦进入严肃讨论，他便蜷缩在官方的防御阵地里，瞬间判若两人——刻薄、机械，总在抛出现成的论点。战争期间，我们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频繁相遇。斯大林与纳粹的协定曾令他彻底茫然，但俄罗斯遭入侵成为盟友的瞬间，他便重拾那套咄咄逼人的机械论调。他不仅是反纳粹的坚定斗士，更坚称唯有他的方式才是正途。他在一次地下组织的危险任务中牺牲，而我始终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恰恰迎合了他潜藏的自杀倾向而言，某种程度上的解脱。

在其他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身上，我目睹过诸多戏剧性案例：超越真实不公之苦的个人怨恨，如何将人推向反抗阵营。其中有人纯粹是被动顺从于比自身更强大的运动——这些男女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映射出最早俘获他们的阵营；另一些人则迫切需要宣泄个人愤怒与怨恨，遂借政治行动满足此种需求。

但若要真正理解促使一个人接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因素，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关注这一问题的根本根源。

塑造人格的摇篮

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发现之一在于：许多成年人的态度与问题根源，其实深植于看似平静的婴儿与童年岁月。婴儿的生活看似平静无波，但自降生那一刻起，他便

同时接收着来自内心与外界的万千声响。在母体中他不知冷热，如今肌肤却将这些感知传递给他。当他安卧在母亲体内时，无需自主呼吸、进食或排泄，如今却必须独自完成这些功能。他需要帮助完成这些，需要庇护，而这份庇护与帮助只能仰赖那些成年巨人——母亲与父亲。他全然依赖他人，无法独自满足自身需求。看吧，他仅凭那可怜的有限适应能力，带着最基础的本能行为模式。温暖、食物与爱——维系生命的必需品——唯有当他做出“正确”行为时才会降临。而所谓正确，是后天习得的文明准则，而非本能的原始本能。那些巨人般的父母向他提出要求——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塑造他。婴儿必须顺应自身习惯，并屈从于所有外部要求才能获得所需。他必须遵循数百条微妙而难以理解的教育规则，才能换取赖以生存的关爱与庇护。这一切将他塑造成或多或少顺从的存在。父母的道德观如同被吸纳般融入其内心，成为永恒的力量。各种习性在他身上烙印，将他塑造成父母与社会认为有益的特定适应形态。成年后的行为模式，早已在父母行为的轮廓中显现：耐心母亲将忍耐烙印在孩子身上；焦虑强迫的母亲则将紧张烙印在孩子身上。

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内心会形成爱的图景，更能接受父母对自由的种种限制与规则。即使自身需求与社会要求相悖——比如按作息表该饱腹时却仍想吃——他也能接受作息安排、如厕训练乃至父母的混乱状态，内心不会产生强烈抗拒。根据他的作息表，此时他可能并不感到困饿，却偏偏想要进食。或是他可能想睡觉时父母却要求他保持清醒。社会要求他学会延迟满足，而他的反应方式则取决于父母对其关爱所产生的安全感。等待食物、停止吮吸、控制排泄需求——排泄——所有这些都需要孩子进行全新而艰难的适应。他追求即时且无条件满足需求的冲动，必须转化为更为复杂的形态——一套完整的习得性反应模式。

在此无需赘述孩童如何履行这些早期文化义务的具体方式。但必须认识到：摇篮与育儿室改变并重塑了原始孩童与生俱来的自然反应，将其塑造成成年人——而这个塑造成本可能为其童年留下挫折的遗产。虽然个体问题源于个体化的养育模式，但这些模式或多或少根植于该儿童所处文化传统与社区生活习俗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社会强加给儿童的挫折与限制——无论是生理还是情感层面都尚未准备好承受——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化就在为成年后的行为问题和屈从或攻击性等神经质态度铺路，这些态度可能表现为对某个极权团体的效忠。

例如，当父母僵化地向婴儿灌输自动行为规则时，便可能开始塑造其奴性顺从的性格。他们可能将孩子变成时间狂魔或清洁机器人，强迫其过早开口说话，或在喉咙痒痒想喊叫时保持沉默，又或在身体因清醒能量而跃跃欲试时强制入睡。这类父母使孩子始终背负罪恶感——每当违背要求，他便陷入不安与痛苦。与此同时，他们强迫孩子即使面对令人厌恶的父母也要表达爱意。他们可能迫使孩子为自认

无可指摘的行为道歉，要求他承认在该年龄段根本不存在的“罪行”。某些洗脑手段在摇篮时期便已显现：父母可能盘问孩子、束缚其自由，或时刻监视其举动。他们以过度关怀剥夺孩子独处时获得安全感的机会。身处此境的无助孩童逐渐丧失情感安全感，为换取更多借来的安全感，变得愈发顺从屈从——尽管这种顺从行为掩盖着巨大的内心抗拒与敌意。

当父母禁止孩子公开直接表达本能需求时，便迫使他另寻途径宣泄。若在早期训练中——这种训练可能始于出生当日——婴儿的直接需求遭遇层层阻挠，他便会通过紧张、躁动和哭泣等间接方式传递需求。孩子无法通过自然途径释放本能冲动，反而被允许并训练成只能通过压抑和控制冲动来行动。在努力控制冲动以取悦父母的过程中，孩子的自然表达方式可能发生扭曲。与其说是在表达，他习得了压抑。这正是成年后卑躬屈膝的顺从与盲目从众的根源所在。这种受虐式的屈从模式，其根基早在婴儿期便已奠定。在那个令他无力招架的世界里，屈服与认罪是孩童唯一可行的生存策略。内心的反抗、敌意与憎恨必须以矛盾的方式宣泄——孩童僵化的沉默恰恰证明他渴望哭喊呐喊。他可能通过魔幻手势、滑稽举止甚至癫痫发作，间接谴责并攻击这个充满敌意的矛盾的方式表达。孩童僵硬的沉默恰恰证明他渴望哭喊。他可能通过魔术手势、滑稽举止甚至癫痫发作，间接谴责并攻击敌对的世界。被迫压抑本能需求及其满足途径时，他甚至会向自我隐瞒这些欲望的存在。表面顺从成为唯一的沟通方式，此时言语与动作皆具掩饰功能——他从不直抒胸臆，最终连自己都迷失了本心。

此类养育方式对成年生活的延续效应显而易见。被训练成顺从者的孩童，长大后极可能欣然接受极权领袖的专制要求——这不过是旧模式的欢迎式重演，无需耗费新的情感能量即可遵循。先前被训练将攻击性转移至替罪羊身上，如今他可能将对父母规则的隐秘怨恨投射至整个社会。亦或在暴民私刑或希特勒冲锋队式的狂暴爆发中，为积压的攻击性寻找宣泄出口。

其他形式的父母行为同样会影响孩子。若过早培养孩子本应在稍长年龄自然形成的习惯，其天性行为可能出现各种扭曲。过早如厕训练的影响便是常见例证，但还有许多其他父母指令同样可能产生相同影响。例如对衣着的要求，或父母不断要求孩子保持安静、入睡、一动不动等，都是同样有效的例子。当任何指令在孩子尚未具备应对能力时被过度严格执行，就会产生巨大的挫败感。那些由外部力量强加于孩子的行为规范，会逐渐内化为内在的自动规则，形成强迫行为。让我们暂时回到如厕训练的例子——尽管它只是整个训练模式中的一个环节。过早接受排泄控制训练的孩子，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身体清洁和便秘状态。他的身体学会了自动控制，但内心深处却对那些强迫他这样做的人充满鄙夷。他可能成长为一个

长期怀有敌意的成年人，容易受到某些敌对意识形态的吸引。在较轻微的案例中，外部禁令与内在释放需求的冲突可能形成持续的内心不安模式。亦可能催生出永无休止的抱怨式怨恨，这种情绪极易被任何潜在的独裁者所利用。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父母与孩子之间最早的沟通网络，发生在心理学所称的语言前阶段和无意识层面。这种交流无需言语。母亲的情绪会直接传递给孩子；孩子能感知并捕捉她的感受。婴儿同样将自身情绪传递给母亲；她几乎能与孩子同步感知其痛苦与喜悦。这种敏感性使婴儿产生强烈反应——他们深刻感知着父母的情绪。父母的焦虑、不安全感、幼稚行为、相互不和谐、病态爱恋、贫困、生存斗争及强制性专制等负面因素，都会对孩子产生巨大影响。不久前我曾治疗一名拒绝母亲抚触喂养的婴儿。这孩子“知晓”母亲对其怀有深层敌意，能感知她的厌恶与排斥。但婴儿却能接受其他人提供的食物与关爱。父母态度与儿童发展的互动关系自出生便已启动。

二战期间我曾受托对一名涉嫌与纳粹合作的男子进行心理评估，此案或许是最清晰的扭曲成长案例。这位当时身处英国的男子声称，他因无法认同德国占领者而逃离被占领的荷兰。抵达英国后，他按惯例被安置在间谍嫌疑调查收容所。不久因行为异常被转送精神病院——虽非精神病患者，却存在与他人交往存在巨大障碍。当我去采访他时，明显感觉到他完全处于混乱状态。他喋喋不休地胡言乱语，几乎令人无法理解。我询问他的童年经历。他谈论起来很困难，但最终还是透露了一些背景信息。他是独生子，母亲是家庭中的主导者，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父亲是个软弱模糊的存在，常年在外奔波——身为大公司经理的他频繁出差。父亲难得归家时，患者记得父母间总有漫长的沉默，父亲仅偶尔抗议母亲滔滔不绝的指令。有时男孩会附和母亲批评父亲的疏离冷漠，有时又向父亲寻求关爱，抗拒母亲的过度干涉。但在家中他大多时候都感到迷失与孤独。少年时期他曾产生过同性恋倾向，在关系中扮演被动顺从的角色。直到某位朋友强迫他参加法西斯集会后，他的精神才真正苏醒。那场力量与侵略性的展示令他极度兴奋，甚至唤醒了他体内涌动着性欲。他加入法西斯组织，令父母深感失望，但他从未积极参与党务工作，因为该组织未能给予他渴望的指引与关爱。

纳粹入侵占领后，党要求他更积极地充当德军帮凶。此刻良知开始折磨他，他病倒了，患上各种胃部疾病——精神科医生显然认为这些病症源于情绪的疾病。然而他仍无力彻底脱离党派。他深陷两难境地——既要面对党派的束缚，又担忧背叛的罪名。童年时的挣扎再度重演，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令他感到不安。于是他决定逃离祖国，隐约觉得这能帮助他摆脱内心冲突。

抵达英国的精神病院后，他竟感到无比满足。他完全不明白针对自己的指控有

多么严重。当我谈及国际时局时，他陷入沉默。他完全记不起自己政治行为的任何细节。仿佛自逃离荷兰那一刻起，他就活在梦境之中。敌人很可能将他当作工具利用，但当时我见到的只是个近乎精神崩溃、被恐惧吞噬的年轻人。整个战争期间，他都留在这家精神病院里。

在这个案例中（除了其作为病理现象的复杂性之外），有一点尤为突出，那就是这位年轻人持续寻求男性权威的状态。这种对精神支柱的追寻，在那些发展出极权主义依附关系的人群中极为普遍。

父亲剪断脐带

心理学研究反复揭示：孩童对父母权威的态度——连同其所有微妙的内在复杂性，在决定他如何处理自身敌意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处理敌意的方式——是学会应对，还是将其导向破坏性目标。正如前文所述，在生命最初几年里，父母与家庭几乎构成了孩子的全部环境，奠定了其未来性格的基础。而在家庭中，父亲的影响力决定着孩子是否继续维系与母亲的天然紧密纽带——包括依赖需求和保护需求——还是走出母性领域，与新人建立新的联系。父亲是首个介入母子生物性联结的存在。精神分析学称其为“最初移情对象”——孩子首次将满足期待、亲密感、愉悦感与恐惧感投射的新原型。这种与父亲巨人的初次试探性关系，可能成为后续所有社会关系的条件性原型。

孩童最初与母亲的关系纯粹是生物性的共生关系。子宫被婴儿床取代，母亲成为全知全能的存在。精神分析学将孩童与母亲的关系描述为口腔依赖关系，因为无助的婴儿完全依赖母亲提供的食物、照料与温暖。这个小生命对依赖的需求持续着比其他动物更长。正是这个事实使人具有群居性，依赖于与他人的合作。

父亲将第三者引入孩子的生活——这个在生物依赖关系中本无份的人。当他介入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时，如同医生在分娩时剪断脐带，他正在剪断心理脐带。起初，他让孩子有机会将情感与期待转移到自己身上；后来，他更主动地将孩子带离母性领域，并逐步教导孩子认识社会关系。父亲作为移情原型的特殊角色，远比许多父亲想象的复杂。父亲绝非偶尔跟孩子玩下玩具而已，孩子需要认同这个与母亲同住的巨人，渴望熟悉巨人，渴望巨人融入自己的世界。孩子的渴望不止于此——他期待获得父亲的满足感，从而像爱母亲那样爱父亲。但唯有当孩子在父亲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时，才会将部分爱意与情感投射转移至父亲身上。父亲若能像母亲那样喂养、安抚、照料孩子，便能让孩子对这位第三者保持感恩与亲昵。然而这种情

感转移的前提是父母关系本身必须平和。当父母持续冲突时，孩子又如何认同并爱他们？

当然，这种图景多少有些过度简化。有些母亲表现得像冷漠疏离的父亲，有些父亲表现得像温暖亲昵的母亲。祖父母或养父母可以接替这个角色。世间存在着许多母亲或父亲的替代者。但这并非我的论点。我的观点在于：在任何情境中，都必须存在某个个体，成为孩子与新生命建立关系时的行为范本。这个首选者通常是父亲，正是他将孩子的生理依赖转化为心理联结。当父亲形象缺失，或父亲过于软弱、忙碌，或对孩子采取否认与专制态度时，结果便是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与依赖过于过久。因此，孩子对社会参与及与他人建立群居纽带的需求，可能演变为一种吞噬其生命的渴求。成年后，他可能倾向于加入任何承诺给予支持与安抚的群体。抑或将潜意识中对未能助其成长独立的父亲的怨恨，转移为对社会等权威象征的敌意。无论哪种情况，孩子都可能走向适应障碍与困境，最终成长为不成熟的成年人。

在关于“代理生活”的研究中，我曾描述当父亲未能履行职责或缺席时，儿童情感发展受阻的现象。在情感缺失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会持续寻求强势人物来替代本应在生活中建立的正常关系。我曾治疗过若干同性恋及其他发育停滞案例，无论男女，这些问题几乎都可直接归因于此类环境导致的与母亲过度紧密的共生关系。

在建立独立自我意识、培养与同辈轻松自在相处能力的过程中，父亲作为家庭天然的首领与守护者扮演着关键角色。他剪断脐带，塑造着后世依赖与独立的模式。他的潜在的心理支配力可能成为福也可能成为祸，因为孩子对父亲的情感态度将成为其未来对待领导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态度原型。

我们从那位“间谍”身上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一生从未拥有过强大的男性引路人。我调查过的许多选择认同攻击性极权团体的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对这些人而言，极权政党既是接纳他们的慈父，又是宣泄所有隐秘挫败之恨的代理载体。政党仿佛解决了他们内心的矛盾。

童年时期的亲子冲突、父母态度反复无常、以及充满威胁与冷漠的养育方式，为日后叛逆与顺从的模式埋下伏笔。渴望挣脱家庭模式的冲动可能催生叛逆行为，但叛逆的具体形态取决于哪些政治运动能改造并引导个体的怨愤情绪。

当然，这并非否认存在一批极权主义思想的硬核分子——他们自幼在极权父母的教条中成长，因从未接触过其他世界而全身心投入党务。阿尔蒙德指出，这类人尤其存在于西方世界的高层极端分子中。他们像吮吸着母亲的乳汁一样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极权形态，正成为日益壮大的世袭极权顺从者群体。这类人无需经历父辈叛逆，便能成为极端革命者。

但在民主社会中，绝大多数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人，其实是因自身未曾察觉的内在情感因素而被这种毁灭性生活方式所吸引。我二战期间与共产主义者及纳粹分子的亲身经历，一次又一次印证了这个事实。在荷兰及其他纳粹占领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虽与我们成为临时战友，却始终在地下组织中英勇抗争。即便在国家危难与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他们对我们从未停止过尖锐的指责与怨恨。他们坚称自身意识形态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时而公开时而隐晦地表明：待纳粹败亡后，必将重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斗争。容我举一例说明：有位极为勇敢的共产党员医生（非前文提及之人）曾刺杀纳粹头目，最终自己却惨遭杀害。这位成年人始终未能摆脱某种青春期的自以为是与攻击性。就在他冒着生命危险躲进我家的当晚，仍执意与我展开漫长而充满怨恨的政治理论争论。他轻蔑地指责其他抵抗组织不认同其政治观点。他的理念与理想，我必须公正地说，他对我似乎很真诚，但他对祖国政府怀有如此深重的未解仇恨，以至于随时准备推翻它。我发现他谬误推理的核心，在于对社会正义斗争中目的与手段的混淆。对他而言，战术和战略已比人类在地球上和平共处的最终目标更为重要。他杀害一名党卫军军官后惨遭暴力死亡，部分原因正是他执意推行超越当下战略需求的战术。诚然，他最终为理想与祖国献出了生命，但直至生命终点，他仍对所有不完全认同其思想情感者怀揣刻骨仇恨。正是这种个人恩怨与敌意，导致他决策失误并招致最终厄运。

我们大多数人并未清晰而彻底地意识到：在渴望成为良善顺从公民的愿望之外，我们内心还潜藏着背叛所属社会结构的隐秘渴望。这些渴望并非基于理性与智慧，而是纯粹的情感驱使。它们根植于我们的成长方式、与父母的关系、教育体系、我们对自身及权威的态度。但所有僵化恪守政治信念者——尤其是信奉极权主义者——都坚信自身立场源于理性信念，是正常智力发展的产物。他们坚称持异议者固守陈腐过时的思维模式，却无法看清自身将复仇心与不忠行为视为反社会与异常的倾向。

对心理学家而言，这些态度的根源显然并非源于理性信念，而是某种深层的情感需求。我屡屡目睹这样的案例：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盲目僵化效忠，实则是对内心迫切成长、转变与成熟需求的叛逆抗争。这些人选择特定政党，不过是依赖需求的替代品。意识形态顽固往往充满悲剧性，因其可能掩盖导致自我毁灭的基本神经症反应。我曾接诊一位年轻女性，其极左思想实为抵御对反动父亲隐秘乱伦情愫的防御机制。历经长期治疗，她才逐渐理解自身困境的本质，并意识到那些试图通过政治行为掩盖的幼稚爱恨交织情感，并无可耻或令人作呕之处。

当对权威的需求未被理解时，混乱的反抗便成为滋生极权主义态度的根源。每当父亲-领袖角色失效，便为未来与权威的冲突埋下伏笔。孩子长大后无法建立成

熟的人际关系，被迫选择专制极权的束缚来压制内心矛盾。

每当父母关系冲突时，成长中的孩子便背负着矛盾的重担，可能急于接受极权主义提供的简单解决方案。每当父母施加强制，剥夺孩子形成独立态度与判断的机会，成长中的孩子便会成为盲从的成年人，其整个人生可能都在寻求外部权威，等待他人告诉他该做什么。

第十一章

精神传染与群体幻觉

值此动荡时期，众人的思绪皆聚焦于各政治会议上的外交博弈。值得探究的是：各国领导人是否可能通过言语交锋、思想碰撞及条约谈判达成共识。然而，世界各国文化迥异，意识形态各异，不仅语言不通，甚至在价值观上存在根本分歧。悄无声息间，我们的个人经历与文化环境悄然渗透进思维习惯。情感与思想皆受社会力量的塑造与约束。

人们彼此间的某些幻想与偏见，如今已能浮出水面。可以说，人们成长的特殊环境与形成的习惯，滋养着潜藏于个体心中的微妙幻觉与妄想，而当事人对此往往浑然不觉。通过实地研究，人类学与心理学得以观察儿童、群体、部落乃至民族中健康与病态的成长轨迹，从而比较不同人群的意识形态差异。这些发现警示我们：在缺乏沟通理解共同基础的情境中，辩论艺术何其艰难。在探讨精神胁迫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追溯那些塑造人生态度的群体心理影响。

自我谬误的自我肯定

我十次重复的谎言，渐渐在我心中成了半真半假的真理。当我继续向他人讲述这个半真半假的真理时，它便成了我珍视的幻觉。

在我们称之为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人际关系大实验室里，我们每天都在重新发现这种现象。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完全健康的女孩某天突然决定不去上学，因为功课似乎太难了。于是她告诉母亲自己头痛，母亲便同意让她留在家中。于是女孩既逃避了令她恐惧的学业，又获得了母亲悉心照料带来的额外满足

感。

下次小女孩想逃学时，假装头痛就更容易了——第三次就更轻而易举。渐渐地，女孩自己也开始相信这种反复发作的病症。初次说谎时她还心怀愧疚，但此刻最初的谎言已在她心中化作天真的真相。待到这位女主角长大成人时，她终将不得不向医生倾诉自己反复发作的头痛。医生与患者将耗费数小时梳理那些半真半假的谎言、隐晦的暗示和自怜的抱怨，直到患者重新认识到：她的头痛始于那个谎言。医生探讨她反复发作的头痛症。医生与患者将耗费数小时梳理这团由半真半假、蓄暗示与自怜抱怨编织的迷雾，直至患者重新发现：所有头痛的根源，都始于那个她不愿上学的日子。

妄想症般的头痛正折磨着整个世界。政治煽动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我国的问题。这种煽动主义的具体形态不过是过渡阶段，待到我们当前的恶龙与内心幽灵皆已消亡，永恒的煽动者或将再度崛起。他将指控他人阴谋以彰显自身重要性，试图威慑那些既无其铁腕亦无其冲动之人，并暂时将某些人卷入其妄想的网罗。或许他会披上殉道者外衣，煽动怯懦者的泪水。凭借煽情与猜疑，他将摧毁公民间的互信。其狂妄妄想会侵蚀那些不安灵魂——他们妄想沾染些许独裁者的光环。

遗憾的是，妄想症的研究几乎完全局限于其病理表现。过去，精神科医生在面对患者的自大妄想时，往往缺乏必要的哲学与社会学背景，无法将患者的妄想体系与现实中的群体性妄想进行对照分析。在治疗狂妄症或迫害妄想症患者时，他们过度依赖将病理性妄想归因于个体大脑解剖结构变化的假说——个体大脑的解剖学变化所致；却未充分关注这些现象是否与生理正常者的异常思维方式存在关联。

随着近几十年来人类学与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群体情感与集体妄想的研究领域已焕发新光。显然这些现象无法通过病理学家的显微镜观察，其研究需要融合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所有涉及人际关系与集体思维的研究成果。

要将此课题提升至临床研究阶段，必须摒弃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主导科学思想的诸多固定哲学观念。例如“所有思维过程具有同一性”及“人类理解力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学说，其本质根基在于相信人类皆以相同方式思考。但哲学家们彼此难以达成共识的现象，恰恰反驳这一假说。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个体拥有迥异的思维方法与标准。数世纪以来，科学界奉行亚里士多德的信条：绝大多数思维活动遵循既定的逻辑规则，其普遍性如同自然法则。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其偶像理论中率先指出：尽管逻辑法则与清晰思维确然存在，但人们未必会运用它们——思想常如戏幕般遮掩着个人激情与反应，其运用与否取决于情感境遇。这位生活于莎士比亚的时代几乎是在抨击现代煽动家们看似合乎逻辑的言论。因此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便承认人类情感与个人倾向塑造并引导着思想，而这种观点很早就通过斯

宾诺莎和帕斯卡的作品获得了最动人的表达。

当我们面对集体狂热与群体幻觉的现象时，无论从哲学还是政治角度审视，都无法回避现代心理学的影响。因为探讨此问题时，我们立刻会遭遇这样的疑问：群体生活中这些导致诸多相互误解的令人不安现象，是否源于源于群体处于心理与政治发展中特殊的、未成熟的、青春期的阶段？

若我们简要考察个体意识从婴儿期到成熟期历经的成长历程，或许能为解答此问提供启示。事实上，个体成长阶段与人类群体的发展阶段存在平行对应关系。

思维与妄想的阶段

心灵时刻与外部世界相遇并进行交流，而在个体发展的每个阶段，对这个世界及其事件的体验都截然不同。尽管不同学者对各发展阶段及其意义得出相异结论，但对个人视角变化与成长的认知本身，却是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并获得所有心理学家的共识。我在此简要阐述人类心理学的发育理论。这并非唯一理论，但足以说明不成熟和妄想思维对我们最终观点的巨大影响（此处部分沿承 S. 费伦茨的分类体系及笔者在妄想症有关论述）。

发展心理学——正如对儿童与原始人群体的研究——认为个体与种族的思维起源都存在一个幻觉阶段：此时尚未区分内外世界，自我与外界的心理分离尚未形成。心灵被感知为无所不能——自我内部的一切体验都被归因于宇宙，并被想象为宇宙的一部分。发展心理学指出，婴儿以这种方式感知世界，某些精神疾病患者成年后会重返此幻觉阶段。然而即便是成熟的人类，也未能完全将内在幻想与外部现实分离，常误以为私密的主观情绪源于外部现实。

在随后的万物有灵阶段，自我与世界仍存在部分统一感。个体的内在体验——恐惧与情感——被投射到外部世界看似具有因果作用的实体上。外部世界成为持续的恶魔威胁笼罩着他。撞上桌子的孩子将敌对的活生生力量投射到那张桌子上，并对此给予反击。被猛兽追猎的原始部落成员，将自己恐惧的动物赋予神圣力量——敌对之神的威力。整个外部世界或许都充斥着人类的恐惧。在恐慌与恐惧的时刻，我们都可能在邻里间虚构出不存在的叛徒或第五纵队。我们的万物有灵思想始终忙碌着，将自身内心发生的种种现象归咎于他人。如今树木野兽中已无鬼怪妖魔，它们转而栖身于独裁者与煽动家制造的各类替罪羊之中。

第三阶段是魔法思维阶段，此时人与外部世界仍存在着亲密联系的感知。然而人类更多地将自己置于与世界的对立而非融合之中。他渴望与周遭的神秘力量周

旋。魔法实为人类最原始的生存策略——他发现可通过符号手势，或实际行动与改变来操控世界。他竖立图腾柱与祭坛，制作护身符与奇药。他将语言作为改变世界的强大符号，发展出仪式来满足与外部世界达成和解的需求。我们当中有谁不曾突然萌生数石板的念头？又有谁不是某件护身符或其他秘密信物的嫉妒占有者？若其存在被他人知晓，那份力量便会消散。

这些信物虽显稚嫩，却能积聚幸福与美好生活。我们仍栖居于魔法世界，深陷操纵自然的幻想中。现代部落驾着机械化汽车驰骋，化身为轮毂旁的狂妄巫师。因深藏心底的幻觉——狂乱疾速能延年益寿——数百万生灵被献祭于速度之神。引擎与机械装置取代了昔日更神秘的护身符。知识仍服务于权力而非理解。

在精神发展的最终阶段，人类与外部世界彻底割裂。他不仅与万物共存并试图操控它们，更与之对抗。于成熟的现实对峙中，人类成为自身生命的观察者。他洞悉存在深渊，将身心与世界割裂。凭借双手、双耳、双眼来掌控他的思想，他直面现实。他退后一步观察世界。事实上，他是唯一直立行走、正直面世界的动物，也是唯一将双手与感官作为验证工具的生物。渐渐地，他的身心成为可供选择的工具——那些本能驱动力可被接纳或拒绝。唯有能人类能辨别本能的危险性与实用性。人类不仅知晓外界强加的恐惧，更深知内在的恐惧——对失去以高昂代价换取的自我控制的恐惧。人类伸展双臂与双手，不仅向外探寻（如同婴儿曾试图以魔术般的手势征服外界），更自觉地向内触及内在世界。成熟的人类栖居于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

在艰难地意识到内在与外在现实分离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悲剧性。随着成熟，人类从甜蜜的原始梦境中苏醒——在那梦境里，他曾是整体的一部分，是涅槃般平静世界的组成部分。与宇宙失落的统一感依然萦绕不去，在群体紧张的时刻或危机时期，他便向往着那种古老的体验：超脱个体的、无需承担责任的极乐。彻底的消极或自我毁灭、借助药物获得的人工狂喜、渴望永眠的自杀念头——这些都是人类试图满足永恒渴望的手段。

在人类经验发展的哪个阶段，我们可称之为妄想？当原始部落成员通过向图腾动物祈祷来安抚神秘而敌对的世界时，我们不称之为妄想；但若一个达到更高思维阶段的人退化至此类原始思维习惯，则这种倒退（退化）便可称为妄想。

可验证现实的丧失

因此我们可暂且将妄想定义为：丧失独立可验证的现实性，进而退化至更原始

的意识阶段。正如前文所述的年轻女子因相信头痛而受其折磨，同样地，当某人先将私人幻想包装成谣言兜售，继而将其作为事实真相逐渐使他丧失了对最初言论实为欺骗的认知，其妄想最终凝固成原始一厢情愿的永久石化。

存在若干助长妄想思维的因素。退化与原始化可能源于躯体疾病，尤其是脑部病变——精神科医生所处理的正是此类妄想症。许多脑部疾病会使大脑皮层功能失常，而作为进化过程中最后形成的器官，大脑皮层正是赋予我们意识并掌控思维的中枢。当这种功能紊乱发生时，遗传上更原始的脑部运作模式便会接管控制权。

然而，妄想症的成因大多并非纯粹生理性。催眠与群体催眠同样能引发退化效应——通过瓦解高级警觉意识，将主体降解至集体参与与合一体验的原始阶段。

若意识与现实的对照变得僵化机械，若人类不再主动寻求对世界认知的警觉性反复验证，便可能滋生妄想——即与现实情境脱节的观念。显然，人类唯有持续与现实各维度进行对照验证，方能保持生命活力与警觉性。当经验凝固为教条，教条本身便会阻碍新的验证与真理的诞生。自诩为“天选之国”的国家所陷入的幻觉，使其更难与其他国家合作。

思想控制的运作机制究竟与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形成的一般规律，可通过以下经历得以印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结识了一位德国哲学家，他致力于本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当时德国正经历创造性阶段，关于兄弟情谊与世界和平的新思想应运而生。这个战败国将展现其精神力量。假期里我们共同漫步于提契诺阳光普照的山间，哲学对话聚焦于人类对和谐与友谊的永恒向往。我们成为挚友，通过书信交流彼此的研究，直至极权主义的阴影笼罩他的祖国。起初他对纳粹主义持怀疑甚至批判态度。我们的书信往来日渐稀疏，当他逐渐被思想统一化并加入党派时，最终的精神裂痕就此形成。我再未听闻他的消息。

太多哲学家在强大群体情绪冲击下放弃了理论思考。原因不仅在于焦虑与顺从，更深层是情感机制的运作——人们渴望说出祖国与故土的语言。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认同周遭的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精神上他们无法独立。斯蒂芬·茨威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道，这种随波逐流于沙文主义声浪的内在过程，令他深陷精神冲突：“*Ich hatte den Willen nicht mehr gerecht zu sein*（我已无意对他人秉持公正）”。

群体妄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讨论政治宣传问题时，“制度化群体妄想”这一现象被

频繁提及，但该术语迄今尚未获得充分的科学论证。当这种集体精神异常现象与当代事务相关时，科学界往往回避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而诸如巫术和某些群体歇斯底里现象等历史案例，却得到了详尽的研究。

在意识形态交锋的时代，在争夺人心的思想战场上，这个问题亟待关注。何谓群体妄想？它如何形成？我们该如何对抗？

通过将极权主义思维模式与精神分裂症（即精神退缩性疾病）进行类比，我认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妄想性质，而极权主义心态则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病态扭曲。当我们暂且将妄想定义为丧失独立可验证的现实认知，进而退化至更原始的意识状态时，便能理解极权主义现象本身如何被视为妄想症。

将人视为服从的机器，实属妄想（脱离现实）。否认人的动态本质，企图将人的思想与行为永远停留在屈从权威的幼稚阶段，同样是妄想。认为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存在简单统一的答案是妄想，认为人的结构如此僵化顽固以至于毫无矛盾心理、毫无疑虑、毫无冲突、毫无内心冲动的对抗也是妄想。

当思想被孤立，无法与其他头脑自由交流而无法拓展时，幻觉便可能滋生。每当思想被隔离在帷幕之后与之间，持续警觉地直面事实与现实的过程便受阻。体系随之冻结、僵化，最终死于自我欺骗。

此类现象可见于与世隔绝的微型社群。在长期航行的渔船上，曾爆发过传染性宗教狂热伴随仪式性谋杀的事件。小村落中也存在集体妄想的案例，往往源于某个痴迷者的影响。在与世隔绝的庞大极权社会中同样如此。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不正是如此吗？那里禁止自由验证与自我修正。事实上，我们能证明历史上所有封闭文明皆是如此。若缺乏与外界交流，文明便会退化，沦为自身妄想的牺牲品，最终走向灭亡。

我们可从另一角度阐释妄想概念：这是群体或个体受限视角所产生的原始扭曲思维。妄想思维本身并不知晓“妄想思维”的概念。若苦行僧在第五大道展示钉床修行，会被视为妄想者；但在其族群中，此举却被奉为圣行与至善。原始部落成员不会将驱魔仪式或复兴聚会中看到集体妄想的迹象。但那些经历过精神发展阶段、达到更高认知层次的人，会意识到这类仪式背后潜藏着妄想观念。

我们能否识别幻觉的出现，完全取决于环境——取决于所处的文明状态，取决于所属群体与社会阶层。因为幻觉与倒退这两个词本身就蕴含着特殊的社会与智识认知层面。正因如此，我们才难以察觉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的迷信与原始仪式。当代文明充斥着群体性迷信、偏见与集体谬误——若从高处俯瞰，这些现象显而易见；但身处其中时，却难以辨识。尽管巫术迷信已被驱散，我们却始终未能摆脱文化优越感与种族优越感的幻觉。中世纪的群体狂热——如塔兰托舞症和圣维图斯

舞症——如今在西方国家已鲜为人知；取而代之的是政治集会中人声鼎沸的狂热，人们以迷信般的狂喜宣示对某种政治幻觉的归属。舞症等集体狂热在西方国家已鲜为人知；取而代之的是集会中嘶吼的人群，在迷妄的狂喜中宣示对某种政治幻觉的归属。取代舞蹈狂热的，是汽车引擎的癫狂轰鸣，或是电视屏幕上被动窥视的传染病。

正如我们在本书极权主义章节中所见，群体性幻觉是可以被诱导的。这仅仅是通过恰当方式组织和操纵集体情绪的问题。若能将群体孤立起来，禁止自由思考、自由交流、外部纠正，并能每日用喧嚣、报刊广播电视、恐惧与伪热情催眠群体，任何妄想皆可植入。人们将开始接受最原始、最不合时宜的行为。外部事件往往是触发人们内心潜藏歇斯底里与妄想情结的导火索。集体狂热为每个个体压抑的个人疯狂提供了正当性。正因如此，人们才如此轻易地被口号煽动至战争的群体歇斯底里。那些被恶毒口号攻击的外部敌人，不过是受压迫民众内心积压的愤怒与焦虑的替罪羊与代偿对象。

精心植入的妄想难以纠正。理性思考已失去价值——因为低级、动物化的思维模式对更高层次的思辨充耳不闻。若试图说服被官方陈词灌输的极权主义者，他终将退守集体极权思维的堡垒——那滋养其归属感、伟大感与全能感的集体幻觉，远比个人认知更令他珍视。

在极权主义的囚禁营中，当囚徒自身部分幼稚思维已被调适为屈从于强烈的暗示力量时，孤独的囚徒便更容易被迫逐渐向看守者的集体思维投降。他不得不与看守者沟通，否则便会陷入自我封闭的妄想。在这场英雄般的抗争中，仅有少数人能保持真实的自我。

若不考量群体性幻觉的氛围，便无法真正理解那些在朝鲜被囚禁数月乃至数年的战俘处境。在充斥谣言却无从核实真相的环境中，思维虽时刻警觉，观察却已扭曲。持续宣传构成的集体洗脑过程，使个体难以客观审视战友。此类环境下，极易将无辜者塑造成群体苦难的替罪羊——在集体感染的氛围中，事实更易被幻化成幻觉。

在某战俘营中，我曾为一名因粗暴同性恋行为遭驱逐甚至攻击的男子撰写报告。调查期间，既无确凿事实亦无受害者可供记录。营中流言四起，皆指向那个孤独、刻薄、不合群的存在——他激起了其他俘虏潜藏的同性恋倾向，从而侵犯了他们的男子气概。

任何被控通敌的战俘，在未对营区内肆虐的谣言进行调查前，都不应被定罪。

在极权环境中，几乎无人能保持思想不受感染，几乎所有人都会成为幻觉的受害者——纵使只是暂时的。

思想传染的危险

诚然，精神传染的危险始终存在。人们之间持续进行着精神交流。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警惕来自国境彼端的危险精神污染。

请允许我明确表态：我绝非对当前面临的极权颠覆与侵略威胁麻木不仁。亲历纳粹暴政的惨痛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这些危险绝不可轻视。作为心理学家，我更深切意识到极权宣传的传染性本质，以及自由国度中的自由公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自我保护的事实。但我们必须学会以民主方式对抗这些危险；而我担心的是，在对抗过程中我们往往会效仿极权主义者的手段。仅举一例说明：

纽约州为保护儿童免受危险政治宣传侵害而颁布的《范伯格法》（引自《纽约时报》，1952年3月4日），部分基于这种精神传染的概念。该法旨在防止颠覆思想对学校的隐秘渗透。乍看之下这似乎是简单解决方案：只需在颠覆思想影响孩子可塑性思维前将其扼杀。

但事实是，这种做法引发了种种心理困境。在恐惧被污染的心理驱使下，我们制定了衡量非正统思想可接受性的规范与标准，却忘记了少数派思想的存在——无论是否被接受——恰恰是我们抵御顺从性多数思想在内心蔓延的重要屏障。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莱克在对《费恩伯格法案》的反对意见中指出：

这是又一项迅速增多的立法举措，使得思考或言说任何超出当前多数人认可范围的内容都变得危险。

这类法律本质上建立在政府应当监管并限制思想流入民众头脑的信念之上。此类政府政策的倾向是将民众塑造成统一的思想模式。截然不同的政府政策则基于这样的信念：政府应当让人的思想和精神绝对自由。

此类政策鼓励多元思想，坚信最佳观点终将胜出。在我看来，这种自由政策已通过《第一修正案》确立，并经《第十四修正案》适用于各州。

基于此原则，公职人员不得被赋予宪法权力来筛选民众可思考的思想、审查民众可表达的观点，或决定民众可结交的对象。拥有此类权力的公职人员并非人民之公仆，而是人民之主宰。

我们不能通过强制推行一种思想传染来阻止另一种思想传染。赋予人类抵御思想侵蚀力量的唯一途径，是给予思想交流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必须学会提出

问题而不要求立即得到解答。自由之人，是懂得与问题共存之人——怀着希望，期待问题终将解决，或在其有生之年，或在后世。人类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必须被激发出来。我们必须对抗人们日益增长的恐惧——害怕独立思考、害怕标新立异、害怕为信念奋力抗争。另一方面，我们亦须学会抵御思想侵蚀。政府不仅可能被暴力推翻，更可能遭思想暴力颠覆——通过向年轻心灵灌输暗示性思想、实施精神阉割，以及采用僵化的条件反射训练、军事化管制和压制异议等手段。

解释性幻觉

最具胁迫性的幻觉当属解释性幻觉——因怀揣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执着于为万物赋予解释与诠释。此类幻觉的受害者不自觉地披上全知全能的魔法斗篷，令那些急需为未知现象寻找合理解释的人们心生敬畏与臣服。例如江湖术士以全知姿态施展法术，将受害者推入某种虚无境地，使其在世界浩瀚奥秘面前感到自身日益渺小。正是这种强迫性需求——渴望成为通晓一切答案的智者与魔法师——在极权世界中屡见不鲜，而无人能完全免于抓住这些过早答案的诱惑——包括本文作者在内。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尤其是那些热衷于玩弄思想概念却不真正参与同时代文化交流的人，他们退守于知识孤岛与象牙塔哲学，却招致了诸多敌意与猜忌，主要来自那些承受着知识建构而非理解之迫切需求的人们。知识分子在民主世界中肩负着传播思想的特殊使命，但所有教导本质上都是情感联结，是源于对学生的热爱。这意味着要融入他们之中，参与他们的困惑，共同踏上探索未知领域的冒险之旅。

矛盾的是，我们或许需要与极权主义者的经验交锋，唯此方能发现民主制度中自身僵化的倒影。

摆脱魔幻思维的束缚

在西方文明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加剧了集体压力对偏见与理性思考的双重侵蚀。我们身处喧嚣世界，即便浑然不觉，思绪仍被无形桎梏禁锢。

在我们的社会中，孤独而无人倾听的声音早已成为问题。我深信，我们中间有许多智者，他们的见解与学识本可帮助我们纠正那些荒谬的思维。但他们的睿智之

言，却被其他地方过度的喧嚣所淹没。在当今社会，智者无法单纯传递智慧与洞见；为求被听见，他必须借助巨型循环力量与官方标签进行宣传与加固。必须有组织为其背书，确保其发言时机恰当以吸引听众。他必须拥有公认的头衔与官方文凭，否则其声音将湮没无闻。

纠正大众幻觉是民主最艰巨的使命之一。民主倡导思想自由，这意味着它要求所有人都有权检验各种集体情绪和集体思维。这种检验只有在鼓励持续的个人和集体自我批评时才可能实现。民主必须直面这一任务——保持思想的灵活性，从而摆脱盲目的恐惧和迷信。民主特有的各种观点的碰撞与相互影响，或许不会直接产生真理，但它们为真理铺平了道路。

此刻全世界正围绕着一个幻觉起舞——围绕着这样一种魔幻观念：论辩背后的物质与军事力量将使我们更接近真理，更接近安全。然而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原子导弹便可能将我们所有人推向集体毁灭的深渊。

在思想与妄想交战对立的世界里，解决之道在于划定边界，认识彼此的界限。就我们存在分歧之处达成共识，是理解的第一步。

第十二章

技术思维的侵蚀

技术思维的入侵对我们思想的冲击难以言表。这是因为技术具有如此截然不同影响：它既是恩赐，使我们摆脱自然威胁的束缚；也是工具与机器，可能反噬人类。我们必须驾驭技术化的内在矛盾——否则终将被卷入技术发展的漩涡，最终坠入原子灾难的深渊！技术的独特悖论在于：机器（汽车、工厂）的福祉逐渐超越人类福祉，成为更重要的价值所在。

那些服务于我们幻想的多样化机械装置，所形成的技术扩张，将人类抛回了对无限力量的幼稚幻想。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周围环绕着各种小玩意儿。只需按下按钮，世界便为他改变。多么了不起！他还能想象出更强大的力量！然而精神上的危险何其巨大。

技术的进步可能扰乱人类追求精神成熟的进程。科学与工具的实际应用，最初旨在为人类提供抵御外部物理力量的安全保障。它守护着人类的内心世界，释放出用于冥想、专注、游戏和创造性思考的时间与精力。然而，人类创造的工具逐渐反过来掌控了人类，将人类推回奴隶状态而非走向解放。人类沉醉于技术带来的快感，最终沦为技术的成瘾者。技术唤醒了人类内心深处未知的、幼稚而顺从的态度。我们几乎都成了汽车的奴隶。技术保障反而可能滋生怯懦。面对外界自然力量与内心本能力量的挑战几乎不复存在。因为技术世界本身，已取代自然成为我们面前的魔幻挑战。

正是这种对技术的屈从构成了对思考的攻击。自幼年时期起便被所有现代技术设备和工具包围的孩子——收音机、汽车、电视机、电影——这些媒介不知不觉将无数关联、声音、画面、动作灌输给观众，而观众对此无参与感。他无需思考这些内容，它们与感官的联结过于直接。现代科技教导人们将眼前世界视为理所当然；

人们无暇后退沉思。科技不断引诱着人们，将他们卷入其运转的齿轮与运动中。没有休息，没有冥想，没有反思，没有对话——感官持续承受着过载的刺激。孩童不再学会质疑自己的世界；屏幕为他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现成的答案。连书籍也无法提供人际交流——无人能为他朗读；屏幕人物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这种强加的技术知识，从未要求他思考所见所闻。对话正沦为失传的艺术。机器时代疾驰向前，挤压了静心阅读与接触艺术的体验。然而在 DIY 运动中，我们仍能窥见逆流。这或许是创造精神的复苏，是对制造机器人的工程师们的挑战。

在过度技术化的世界里，身心已然消亡。生命沦为庞大技术与化学思维过程的组成部分。数学方程式侵入人际关系——例如通过“连坐罪”学说，我们学会了简单的等式：敌人的敌人必是朋友，敌人的朋友必是敌人。仿佛评判人类只需正负符号的简单加减法。

技术悄然施加胁迫

广播和电视直接占据人的思维，使孩子们无暇与书籍进行平静而辩证的对话。屏幕呈现的景象无法激发自由交流与讨论的互动性。对话这门艺术已然失传。这些发明窃取了时间，也窃取了自我意识。科技一方面给予便利与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却夺走更多。它剥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印着机械签名的圣诞贺卡、格式化的信函、甚至打字机本身，都是机械替代品的例证。技术入侵侵蚀着人际关系，仿佛人们再也不必彼此给予关注与关爱。奶瓶取代了母亲的乳房，自动售货机的五美分硬币取代了母亲准备的三明治。非人格化的机器取代了人类的举止与互惠。受此熏陶的孩子宁愿独处，沉溺于幻想逃避现实，把玩电子设备。机械化将他们推向精神退缩。

技术一方面暗示并制造出人类无所不能的幻觉，另一方面却凸显人类的渺小——相较于机械的威力，人类显得如此脆弱卑微。人类创造性思维的力量，被社会机器与世界机械的梦想所掩盖。机械在政治操纵中被过度夸大，已超出理性范畴。我们运用情报与反情报、诡计与政治机器，却遗忘了人类聪明与愚昧背后的“情感动因”。对技术的盲目信仰与对人类智慧、逻辑及纯真的天真信念之间存在关联——后者曾是十九世纪盛行的乐观自由主义情绪的组成部分。这两种信念都否定了心灵深处的非理性维度。

技术进步的终极结果是什么？它是否将人们日益推向一个充满恐惧与绝望的、缺乏爱的按钮世界？它是否创造了一种通过遥控他人而获得的狂妄自大的幸福？

它是否将人们推入闲暇时光的空虚无趣？最终结果是否沦为代人而活——仅通过电影电视屏幕体验世界，而非亲身经历、劳动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在电视成瘾案例中，我观察到以下要点：

1. 电视的吸引力实为真性瘾癖；换言之，电视能形成依赖性，其影响若无积极治疗干预便无法遏止。
2. 它过早地唤起性与情感的骚动，诱使儿童反复窥探，尽管他们对所见内容感到困惑。
3. 它持续满足攻击性幻想（西部场景、犯罪现场），继而引发罪恶感——因为孩子会不自觉地认同罪犯，尽管画面中充斥着英雄复仇者。
4. 它偷走时间。
5. 沉迷电视阻碍了内在创造力的发展——无论孩童还是成人，都只是坐着观看屏幕上的虚幻世界，而非直面自身困境。当与无暇顾及子女的父母发生冲突时，孩子们便更甘愿投向屏幕的怀抱。屏幕与他们对话，与他们嬉戏，将他们带入充满魔幻的幻想世界。对他们而言，电视取代了成年人的位置，永远充满耐心。孩子将这种特质解读为爱。

如同所有大众传媒，我们必须警惕任何渗透一切形式的沟通所具有的催眠般的、诱惑性的作用。即便不愿观看，人们仍会陷入迷恋。须谨记：个人成长的每个阶段都需要独处，需要内心对话与思辨，需要自我审视。电视阻碍这一过程，更易使思维趋向集体化与陈腐化。它诱使观众以大众价值观代替自我思考，侵入个体家庭生活，切断家庭内细腻的亲情交流。

未来世界将见证科技与心理学的激烈交锋。这将是技术对抗自然、系统化驯服对抗创性自发的较量。对机器的崇拜意味着将机械知识转化为权力——转化为按钮即可操控的权力。氢弹等机械毁灭工具，已将人类原始的破坏冲动转化为大规模科学杀戮。如今这种毁灭性力量，可能成为任何权力狂魔轻易掌控的工具。在技术驱动下，我们的世界日益相互依存，而当我们过度依赖技术知识与设备，我们自身正面临将民众交付给更残暴的极权主义者的危险。这正是我们文明面临的实际困境。这台曾作为人类组织工具、使征服自然成为可能的机器，如今已占据了独裁地位。它迫使人们陷入自动反应模式，固守僵化的行为模式与破坏性习惯。

机器激起了对速度、对疯狂成就的日益增长的渴求。速度狂热（疯狂的迅捷）与冷酷无情之间存在着心理关联。当驾驶者坐在快车的方向盘后，便会沉醉于权力之中。在此我们再次看到对自然稳健成长理念的否定。思想与方法需要时间沉淀。机器却催生过早的成果：进化被轮子转动的革命所取代。机器否定了这样的真理——进步必须先在我们内心成长，才能在外部的世界实现。机械化剥夺了对精神斗争的

信念，否定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与反复尝试的认知。失去这些信念后，陈词滥调便会占据上风——摘要与草率备忘录将取而代之。机械化世界只相信问题的浓缩，而不相信人与其所构思的问题之间持续的辩证斗争。

现代技术的谬误之一在于其追求更高效率的方向。以更少能量创造更多产出——此原则或许适用于机器，却与人类机体相悖。为变得强大并保持强大，人必须学会克服阻力、直面挑战、不断自我检验。奢侈只会导致精神与身体的萎缩。

个人大脑价值的贬损，以及用机械计算机取而代之的趋势，同样暗示着极权体制的形成——其公民被迫日益沦为卑躬屈膝的工具。非人道的“体系”成为终极目标——这个由技术官僚主义与非人化催生的体系，可能催生有组织的暴行，碾碎任何个人道德。在机械化社会中，一套价值观被强行烙印在潜意识里，如同巴甫洛夫对狗进行条件反射训练。我们的头脑不再需要为自身服务或发展思维过程，机器将代劳。技术官僚体制强调行为必须摒弃情感与创造力。我们谈论“电子大脑”时，却忘了这些大脑及其缺陷背后存在着真正的创造性思维。对某些工程师而言，头脑不过是极权实验室里的电灯泡。人与人之间已隔着一道巨大冰冷的纸质力量——那无名的规则与工具构成的官僚体系。机械化催生了人际关系中的神秘“皮条客”——居中斡旋的机械官僚，其权力庞大却毫无个性。此人已成为新的魔性恐惧之源。

在技术官僚世界里，所有道德问题皆遭压制，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或统计评估。严谨高效的数学逻辑正颠覆伦理根基。试想若探究集中营守卫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煎熬，便能理解为何这些狱卒会如此绞尽脑汁解决技术难题——如何尽快将毒气室里的尸体运出。清洁、实用、纯粹这些词汇对他们而言，已超越我们惯常的维度。他们以化学和统计术语思考——并固守其间——只为逃避更深层的道德罪责。

将思维视为计算机器的观念，是人类对世界进行强迫性理性化与概括化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自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时代便已存在。该概念本质上否定或贬低情感生活与边缘体验的价值。在这样的哲学体系中，自发性永远无法被理解——既非创造力与历史的偶然，亦非心灵感应所揭示的人类交流奇迹。基于此理念的技术是冰冷的，它摒弃了道德生活准则，抛弃了信仰，更无视人类对自身世界的归属感。它不断催生新的不满与奢侈品生产，却不知缘由；它助长贪婪与惰性，却忽视节制之道与生活艺术。当技术沦为目的而非手段时，它给予我们的不过是简单平等的幻象，而非对自由、多样性与人类尊严的永恒追求。技术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世界的科学认知，不过是对神话与前科学视角的渐进修正。技术，这个曾经源于勇敢幻想与远见的产物，如今却威胁要扼杀这种远见——而没有远见，人类就不可能进步。技术这个偶像必须重新成为工具，而不是本身就是万能的巫师，把我们拖入

深渊。

西方文化的工业发展催生了新问题：使人类日益远离自然的韵律。最初产业工人被捆绑在工厂与引擎之间，而后技术进步增加了闲暇时间，却引发新问题：闲暇时间用来做什么？

时间与时空的扩张，城镇规模的增长，以及交通工具增多带来的距离缩短，深刻动摇了我们归属感与安全感的根基。家庭——社会的基本单元——常常支离破碎，有时甚至走向衰败。周日家庭轿车狂奔的喧嚣，取代了昔日亲人静坐共处时彼此传递亲情与智慧的温馨时光。

唯有当人类学会在精神上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即学会无所不缺之时——方能避免被技术淹没。人们必须先成为孤独的鲁滨逊，才能真正驾驭并珍视技术的馈赠。

我们的教育必须学会向儿童呈现简单自然的挑战与需求，以此使其免受技术化时代麻痹人心的惰性倾向侵蚀。

技术的悖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技术保障反而可能滋生怯懦。我们亲手创造的技术世界，取代了自然原本赋予人类想象力的真实挑战。人类不再被迫直面体外的自然力量与体内的本能驱力。奢靡的习性与复杂的文明，正逐渐使我们更迎合我们精神上的被动性，而非警觉性。缺乏基本道德和哲学观念的精神被动者，极易被引诱参与自由民主社会伦理相悖的政治冒险。

流水线使人类与其劳动成果割裂。人类不再生产所需之物，机器代人生产。工程师与学家预言，不久的将来自动化——无需人力干预的工厂——将成为现实，人类劳动乃至人类本身将近乎完全多余。当人类沦为自身世界上最可有可无的零件，又如何保有自尊？作为民主社会根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民主社会所根植的伦理道德观，其核心在于视人类生命与福祉为地球至高无上的价值。但在机器全面接管的社会里，所有传统价值都可能被摧毁。当我们崇拜机器时，便贬低了自身价值；我们开始相信强权即公理，认为人类本身毫无内在价值，甚至将生命本身视为更大技术与化学思维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类日益退缩于机械化的按钮世界，最鲜明的例证莫过于对汽车及其他机器的痴迷。当他得以退守车座，通过遥控支配世界时，便重拾了几时久违的全能幻想。人类对汽车等机器的奴性依附，正逐渐剥夺着个体的独特性。遥控概念令我们如痴

如醉。车轮与按钮赋予我们虚假的自由感。然而与此同时，人类创造性的一面正抗拒着机器对内心自由的冰冷机械入侵。

每当驾车途经路旁美景——无论是令人心旷神怡的风光、博物馆、河流或参天古树——刹那间便在我心中激起紧张的冲突：该停车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还是顺从机器继续疾驰？

对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而言，这种行为引发了重大问题：人类日益固化的技术胚胎化趋势终将吞噬自身文明吗？荷兰解剖学家博尔克——我的恩师之一——早曾描述过人类相较于高等灵长类快速发育的退化性发育迟滞特征。正是由于人类胎儿化与解剖学发育迟滞，才获得了直立姿势、灵巧双手的抓握与探索能力，以及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这漫长的青春期使人类得以学习，并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思想世界。

自文艺复兴时期及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家本人被迫日益退守于其技术子宫——他的实验室、书房、扶手椅。他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更强的智力专注力，但结果却结果，他逐渐与现实社会隔绝——这种隔绝悄无声息。直到近几十年，科学家才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社会问题，部分原因是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迫使他们如此。

从他的魔法角落里，科学家学会了用发明和思想指令掌控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被遥控的概念所诱惑。按钮与装置构成的军火库，将我们引入全能力量的魔幻梦境。技术文明赋予我们更多便利，但正是挑战与不安铸就了人格与力量。

工作中反复出现的宣泄渠道——我们不仅通过它升华攻击性，更借此提炼并重塑本能目标——正遭受技术自动化带来的严重威胁。劳动节奏与创造节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若生活仅存闲暇而缺乏劳动纪律，我们释放的本能将再度占据上风。正是劳动与闲暇交替的节奏，才使我们得以精炼对闲暇的享受。

纽黑文市应用人类学学会举办的自动化对工人影响研讨会上指出，工人们最主要的诉求是日益加剧的精神压力取代了肌肉疲劳（《纽约时报》：1955年12月29日）。监控机器所带来的压力使人变神经紧张，他们逐渐产生被机器控制而非控制机器的错觉。我接诊的几位患者将机器视为有生命的存在——危险的生命，因为机器对使用者既无爱意也无其他情感。

生活水平提升的危险悖论在于：它在促进安逸的同时，也滋生了怠惰与懒惰。若心灵未能以新挑战、新追求、新主动性与新活动充实闲暇时光，便会陷入沉睡，沦为行尸走肉。自动化之神终将吞噬自己的子民，它会将我们塑造成高度专业化的原始人。

正如我们正逐步用机器取代人力劳动，我们也在逐步用机械计算机取代人类大脑，从而加剧了人类的自卑感。我们开始将思维本身视为一台计算机，一套由电化学刺激与反应构成的系统。大脑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其结构与运作可研究与检

验的。但心灵却是截然不同的存在——它不仅是脑内生理过程的总和，更是人类人格中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维度。大脑生理过程的简单叠加，而是人类人格中独具创造性的维度。

除非我们保持自我审视，除非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带来的严重问题，否则整个社会都可能沦为某种超级自动化状态。道德意识的崩溃与个体自我价值感的丧失，将使我们更易受精神胁迫。纳粹德国为我们提供了道德评判体系彻底瓦解的恐怖范例——在党卫军社会中，种族迫害与屠杀竟成为某种道德准则。

这一切听起来或许极端。但事实是，任何影响——无论公开或隐蔽，无论善意或恶意——只要削弱我们的警觉性、面对现实的能力、作为积极行动的个体生活、承担责任和直面危险的愿望，就会剥夺我们部分本质的人性，即我们内心追求自由与民主成熟的品质。极权主义者实施的强制性精神干预是蓄意为之且具有政治动机，但即便其目的非政治性，精神干预本身仍是严重威胁。任何企图剥夺人类自由思想的影响力，都可能使人沦为行尸走肉；任何摧毁个体的势力，终将瓦解整个社会。

第十三章

行政思维的侵蚀

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人类与目标之间涌现出新的中介群体。这个群体不再是充当沟通人与神明的古代祭司、人与超自然力量的中介，而是行政体制的管理阶层，他们部分接管了人与政府之间的中介职能。如今存在着各种中介：介于人与上司之间、艺术家与公众之间、农民与市场之间，几乎无所不包。行政思维由此诞生，它常常主宰着人的社会行为与多元交往，将人引入远超自然行为范畴的复杂行动与强制性要求。

无论是僵化的官僚纽带还是实用的行政纽带，这些关系都深刻影响着人类行为，常使人的自由思考陷入迷雾。我在探讨“精神之蹂躏”时着重阐述此主题，另有深意——这种介于人类行为与思想之间的中介问题，在民主体制与极权国家中同样存在。世界两大阵营都在苦苦挣扎于如何管理自身的复杂难题。治理自我与世界的技术手段本身，便可能成为自由发展的威胁——且这种威胁可能独立于执政意识形态而存在。我们选择执政者的自由，远不及我们在商店挑选心仪的商品或选择医生的自由度大。只要官僚掌权，我们便受制于其权力体系。

行政思维

当今管理者若仅凭昔日政府所用的简单认知来处理人际与国际事务，便难以胜任其职。倘若我们的领袖无法洞察自身及他人、他国潜藏的非理性力量，便极易被卷入群体情绪的漩涡。若他们未能学会辨识自身私德或公职行为中常折射出的偏见与非理性，便无力应对他人那些往往出人意料的偏见。例如，若他们对极权主义者那些似是而非的寓言式语言背后隐藏的悖论性策略缺乏敏锐洞察，便无法有

效应对冷战。在当今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心理学知识已成为必备素养。

试问我们的执政者是否真正理解诽谤与肆意指控的挑衅性极权策略？他们能否妥善应对？他们是否意识到，官方的简单否认永远无法比拟最初指控的冲击力，反而往往正中指控者下怀？显然他们尚未领悟，至今仍有人用简单否认来抵御极权主义的指控策略，而唯有反复揭露并嘲弄这种伎俩的本质才能真正瓦解它。

他们是否意识到制造虚假问题的策略所蕴含的深意？极权主义者和煽动家常运用这种混淆视听的伎俩。通过发起煽动性调查、为伪问题博取关注，他们试图转移公众对其真实目的的视线。

例如，他们是否理解利用公众的骑士精神与慷慨胸怀、勒索世界同情的技法背后有何玄机？抱怨与呼吁正义的策略，实则是神经质个体惯用的心理防御手段——借此唤起他人负罪感，掩盖自身潜藏的攻击性。当个人操弄怜悯并高调宣称自身纯洁无辜时，这套伎俩司空见惯；但若将其运用于国际政治，我们往往更难识破其中玄机。

我们的管理者是否意识到，即便是兄弟情谊与世界和平这类浪漫理想，也可能被用来掩盖侵略图谋？一战结束后，我们听到了许多来自战败的中欧国家的鼓舞人心的理想主义口号。他们的媒体和领导人向全世界详细描述了战败民族“通过苦难实现内在净化”的过程。这些国家以此呼吁全世界的良知与同情。但这种转变值得怀疑。每位治疗师都深知，那些喋喋不休宣扬的人，其内心往往毫无改变。华丽辞藻与实际行动常相悖。政治家必须认识到，国家与个人同样如此。切莫忘记：国家不会说话。官方言论皆出自代表之口，而其非正式且多不为人知的内在动机才真正决定一切。

行政官、外交官与政治家构成了民族与国家间的神经中枢与沟通渠道。外交领域的紧张局势映射着世界的政治张力，却也昭示着其他隐秘的真相。政治职业承受着特殊的精神压力。当管理者登上权力顶峰，内心可能发生转变——从此他便能与昔日的领导者产生共鸣。身居要职、肩负领导重任本身，便可能从多方面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他往往逐渐疏离民众关切与所代表的人民，思维仅围绕国家战略、官方意识形态及权力政治目标运转。抑或童年时受挫的野心被重新点燃。他可能沦为膨胀的个人野心与主观责任感的牺牲品，最终丧失对自身人格的掌控。

肩负重任的领袖人物必须格外谨慎；事实上，他们常常不得不以模棱两可的措辞。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此类语言会逐渐重塑其思维方式。最终，他们可能自认掌握了玩弄双关话术的优先权。

另一重困境则源于普遍存在的成功恐惧。当崇高抱负实现之际，童年深埋的恐惧便会苏醒——那源于幼年与父亲及手足竞争的阴影。自此，被超越者的嫉妒与敌

意将开始侵蚀政治家的生命。

承担任何领导职责——甚至任何形式的自我主张——都蕴含危险：它会招致抵抗与敌意、报复与惩罚。管理者深知自己置身公众视野，时刻暴露在批评与政治攻讦之下。若此前未曾如此，此刻他必须筑起防御性外壳以讨好民众与选民。结果可能是：曾经温顺的民主主义者、坚信民治的人，突然显露出威权人格的姿态。他被挫败的婴儿期领导幻想所驱使温和的民主主义者、信奉民治的信徒，突然间便披上了专制者的外衣。他被挫败的幼稚领导幻想所驱使。

行政领域的“智囊团”尽管存在种种内在问题，却依然为我们书写着历史。他们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此同时，我们——广大公众——也在影响着他们：我们的文明动或许能引导他们走上正途，正如我们的原始本能与影响可能驱使他们将所有人推向灾难深渊。当掌权者遵循不受司法与法律约束的程序模式时，行政思维的介入便愈发危险。正如我们从诸多安全条例中目睹的那样，偏见与专断由此滋生。官方保密如同魔法符咒——世间越是密不透风，民主监督便越发匮乏，背叛的恐惧便愈发膨胀。

从技术层面而言，管理任何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本应相当简单。人类无疑具备足够智慧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对历史、社会学、人际关系学及治理学已有深刻认知，至少足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我们生活在技术与经济丰饶的世界，却尚未学会运用所知或整合全资源。某处出了差错，导致局面失控。各国与各民族相互理解的意愿似乎已然瘫痪，相互猜忌与恐惧在相互对抗的神话意识形态幻想中不断滋长。明日或许只剩交战犬只的尾巴残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作为荷兰政府的官方代表出席了一场关于福利与战争救济的国际会议。在此期间，我愈发深刻地意识到，私人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会塑造我们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与会者个个面容冷峻，表情凝滞，俨然在进行着严谨客观的思考，但潜意识里却被其他问题所牵动。福利议题往往引发更多憎恶而非爱与同情。个人尊严与声望的作用，常远胜于对贫困受害者的怜悯。流离失所者与饱受摧残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厌恶命运赋予的角色——既要扮演永恒的受害者，承受政治与战争的摧残，又要屈从于施舍者傲慢的施舍。事实上，作为受援方代表，他对于任何援助提案都心怀愤懑。人人都想成为那个慷慨的“美国大叔”。

公职人员的心理病症

未来随着心理学的深入发展，执政者必须接受更完善的现代心理学教育。正如

军人需精通武器操作，政治家也必须懂得如何面对并驾驭人际关系与外交的心理策略。他必须意识到所有人类交流中的陷阱，以及自身思维的脆弱性。

身体疾病与神经症发展会对在职者产生种种影响。在这些影响下，有些人陷入持续怨恨的生活，仿佛在政治与公务活动中，他们正重演童年时期对抗恶魔、焦虑与内心负罪感的斗争。另一些人则通过痛苦获得净化，变得比从前更睿智、更富同情心。

现代心身医学明确指出：持续的忧虑、永无止境的竞争、被压抑的攻击性、支配他人的欲望、对责任的恐惧、职业选择带来的重担——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身心，形成特定的体反应模式。这些反应可能通过削弱身体机能，实际阻碍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人类竞争日益激烈、对选民群体依赖加深的时代，成为被选中的政治家会使执政者逐渐形成近乎精神病态的特质——恰在我们最需要健康稳健的领导者之时，这些特质却可能摧毁其身心。潜伏的精神病态或人格障碍在众多领袖人物身上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不久前我曾治疗一位大型人道主义协会的领袖，他在同胞中备受尊崇，却在自家圈子里是个病态的暴君。他的孩子们一见到他就浑身发抖，并自然而然地对所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态度。

我怀疑这种病态心理往往源于我们选择领导者的方式。公众偏好常倾向于那些在公开场合表现强势、具有防御性、矫枉过正的性格——在公开场合表现得体。我们过度关注外在表象，却无力洞察内在核心。

1949年，伯内特·赫希撰文发问：我们的命运是否掌握在病弱者手中？这篇文章写于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悲剧性死亡之后——这位部长在绝望与迫害妄想的折磨下自杀身亡。文中详细描述了多位政治家的心身疾病。赫希援引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发言：“胃溃疡对当代历史产生了奇特影响。在华盛顿，我不得不应对诸多问题，包括莫斯科的贝德尔·史密斯、华盛顿的鲍勃·洛维特和迪安·艾奇逊的胃溃疡。”作者进而指出，斯大林、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沃伦·奥斯汀、维辛斯基以及克莱门特·艾德礼同样饱受心身疾病折磨。伊朗前总理摩萨台屡次昏厥的事迹众所周知——这位在半昏迷状态下就可能改变中东力量平衡的人物。备受争议且频登头条的麦卡锡参议员，正是此类病症的典型例证。在他为争夺头条新闻而奋斗的巅峰时期，他患上了需要进行探查性手术的胃部疾病、滑囊炎、频繁的鼻窦头痛以及疲惫不堪的症状——而所有这些都认为是极度紧张引发的心身疾病（《新闻周刊》：1954年4月12日）。

我们同样拥有诸多鼓舞人心的实例，证明身体残疾与神经症发展如何能促进人格成熟与坚韧。身体与职业关系最鲜明的例证当属已故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

——在罹患小儿麻痹症前，他的政治生涯并不显赫。多年的肉体煎熬反而成就了精神上的成熟。战胜病痛的过程改变了他对待自身困境的态度，也重塑了他看待世界问题的视角。他同理心的增长、谦逊的培养、战略直觉的提升，以及对国内力量平衡的深刻洞察，都应部分归功于病痛期间的内在精神成长。

罗斯福永远是心灵如何突破肉体桎梏的典范——当一个人愿意直面内心、战胜自我冲突时，精神便能超越肉体的局限而茁壮成长。

无意识心灵的会议

让我回到之前提到的战时福利会议，再多说几句。

会议主席身体欠佳，每项决议对他而言都如同溃疡般痛苦。他支支吾吾，拒绝承担职位赋予的责任。某东欧国家的代表虽是位迷人女子，却是个厌世者。她每句话都带着怀疑色彩，当某拉丁国家代表试图与她轻微调情时，她竟通过激烈反对对方每项建设性提案来掩饰自己的窘迫。

我们中间还有一位犹豫不决的老派职业政客。尽管措辞温和得体，他发言的目的却只摧毁所有非本派系提出的议案。当被迫倾听时——这令他极其不悦——他便不停摆弄领带或眼镜，时刻打理着自身形象。

拥挤角落里坐着个热切的年轻人，渴望成就大事。他渴望行动，渴望见证成果，而他的激情在他人眼中却成了世故的鄙夷。他不懂会议的潜规则。

会议枯燥乏味。代表们喋喋不休，毫无意义。但某天，整个会议突然被一股无法控制的狂怒所笼罩。每位代表都试图摧毁所有同僚。有人竟用“叛徒”一词指称在欧洲作战的某支游击队，这场原本温和的讨论瞬间演变成激烈碰撞——那些长期隐藏在温文尔雅面具下的叛乱激情，此刻彻底爆发。讨论骤然蜕变为场激烈的碰撞——那些长期隐藏在温文尔雅面具下的叛逆激情终于爆发。

何等骚动！何等狂怒！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怒火很快平息，我们精致的会议精神重新占据上风，众人又归于无所事事。主席发表了客套的总结发言，会议就此散场。我们精心策划的慈善事业至今搁浅，岁月已悄然流逝多年。

政治领袖们仍以顽强的乐观主义精神聚首，试图为世界构筑新和平。我们知道其中许多人将再度饱受胃溃疡之苦，但他们心底深藏的愿望与怨恨，我们又知之几何？

尽管我担心，要让我们的官方代表和行政人员服从于在心理教育与人才选拔过程中，我们必须更加意识到诸多无意识因素对他们及我们的影响。

政治领袖们是否试图理解彼此及其所代表的群体？抑或仅在衡量其政治机器、言辞与选票的力量？他们是被私怨野心驱使，还是秉持着服务社会及其理想的真诚愿望？

我们的管理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心理素质？若未达标，心理洞察力如何逐步完善其心理装备？

他们中有多少人意识到自身私密挫败的程度？那些破坏性冲动是否借政治忠诚之名被合理化？疾病、病症与神经症如何在决策中相互碰撞？观察任何辩论中，彬彬有礼的发言如何被突如其来的抨击打断。

管理者童年教养、固执观念或病态野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着城镇乃至国家的命运？

我们深知理想主义的陈词滥调可能掩盖着不完善的方案，却往往将其视为司空见惯的戏码——政治策略与外交手段。但比这种公开的回避政策更恶劣的，是政客们潜意识与激情之间暗流涌动的政治磋商与交锋。

多少政客及其追随者意识到这种潜伏的暗流？它往往比公开行动更具影响力。管理者之间的个人因素如何阻碍我们的思想自由？某些领导者身上的精神病态特质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提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即便无法立即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提出正确的问题也能为未来带来清晰的视野，为解决之道铺平道路。

官僚思维

在以恐怖手段维系秩序的国家，行政机器可能沦为独裁者的专属工具。然而官僚专制的发展并非极权国家的专利。温和职业绝对主义在每个国家都显而易见——那些充当民众与统治者桥梁的中介阶层公务员便是明证。这般官僚体系既可成为服务对象的助力，亦可能沦为其伤害的利器。

必须认识到，在世界各国——无论何种政体之下——都存在着一场特殊而无声的斗争：这是普通民众与他们自己创造的政府机器之间的较量。在许多地方，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原本旨在服务和协助人类的治理工具，正逐渐获得超出其初衷的权力。

神圣官僚是否如同恶魔，一旦掌权便附身于人？管理者是否染上了营造虚假秩序的病态欲望，渴望在绿色钢制办公桌后操控他人？政府管制技艺与其他心理策略并无二致；若不保持警觉，那些投身其中者便可能被规训的麻木桎梏所精神控

制。这正是介于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各类机构所蕴含的内在危险。人类必须在自身与最高理想之间设置另一个易犯错的中介者，这实乃生命的悲剧性一幕。

在行政机器中，哪些人性弱点最易显现？权力欲望、机械化思维与思想僵化——这些皆滋生猜忌与阴谋。身为高级公务员，人便陷入危险的诱惑，只因其本身就是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他发现自己深陷策略迷宫。成为执行者与战略家的魔力，唤醒了长期压抑的全能感。战略家如同棋手，渴望遥控操纵世界。如今他能让他人久候——正如自己年轻时被迫等待——从而获得优越感。他可躲在规章制度与职责背后筑起堡垒。与此同时，他必须不断向他人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只因不愿让出位置。为抵御自身相对无足轻重的处境，他不得不扩充团队，增设官僚机构。为了成为重要人物需要宽敞的办公室。每位新员工都要求配备新秘书和新打字机。一切开始失控，但所有事务都必须掌控；必须建立更完善的新档案系统，召开新会议，组建新委员会。员工互动委员会连日开会讨论。新设立的监督者负责监管原有监督者，使整个团队陷入幼稚的奴性状态。昔日一人完成的工作，如今需整个团队协作。最终，官僚主义的张力愈发剧烈，管理层的专制冲动终在精神崩溃中寻求解脱。

这种由文案与档案滋生的全面控制主义正蔓延至全球各地。当公务员无法再以人性化方式交流，转而将一切白纸黑字记录在溢满档案的冗长会议纪要中时，行政权力的争夺战便已打响。强迫性秩序、繁文缛节与规章制度的重要性超越了自由与正义，与此同时管理层、雇员与被管理对象间的猜疑日益加深。

书面文件与印刷报告已成为世间危险之物。口头争执纵有激烈言辞，琐碎争执终将淡忘；纸上文字却永存不朽，终将滋养日益膨胀的猜疑体系。

许多人怀着理想主义的服务热忱投身公共事务管理，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加入公务员队伍逃避生活的冒险。这种服务保障了稳定收入、定期晋升和职业安全感。安全感极具诱惑力——繁文缛节世界中流畅的机械运作与光滑的僵化体系，对某些人极具吸引力，却可能扼杀那些仍向往挑战与自由的人。

一个迫切的心理问题是：人类最终能否驾驭自己的制度，使制度为人类服务而非统治人类。在极权国家，人们不被允许自嘲自己的缺点。制度、繁文缛节和堆积如山的档案变得比那个可怜虫更重要——他坐在巨大办公桌后的椅子上，显得重要得与他的精神状态极不相称。

成为卓越行政管理者、真正人民代言人的艺术极为艰深，需具备多重共情能力，深刻理解他人及其动机。

外交官与政客仍信奉言辞说服与辩论策略。这种以官方口号和流行语进行政治操作的策略，实乃古老而迷人的游戏——它精妙地绕开真相服务于党派之争，刻意错位强调重点，在特定论点间游走腾挪，最终达成个人宣传目标或党派诉求。几

乎所有政客终将染上这种病症。在责任重压下，他们屈从于玩弄外交游戏的欲望。思想开始妥协，处处退让又谨小慎微，唯恐言论招致高层批评；或退化为幼稚的魔法万能感，企图左右逢源，事事插手。

这些都是人类精神中危险的倾向，在政客和管理者身上更易滋长，因为现代政府技术日益扩张的影响力正威胁着言论自由。当一个人深陷其中时——在涉及战略与政治的谈话中，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不再直率坦诚，不再表达和传递真实想法，却开始担忧他人伪装面具下的真实想法。他变得过度谨慎，在自身周围筑起层层心理防线与辩解。简言之，他学会了采取战略性姿态——抛弃率真，否认热情；不再要求自己或他人保持内心诚实，永不暴露自我，永不展现本色，扮演战略家角色。谨小慎微，多用“但是、然而”等词，永不承诺。

我记得一位反对派领袖，当他的政党在长期执政后赢得选举，他不得不承担政府责任时，他完全迷失了方向，几乎崩溃。从一个咄咄逼人、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变成了一个犹豫不决、暗示性强的神经质者，扮演着圆滑的战略家，却毫无真正的主动性。

有些政客是傀儡，充当主子的传声筒；有些是玩弄言辞的轻佻杂耍者，将人类的攻击性转化为口号；还有些是高声吹嘘末日的鼓吹者，惯用恐慌论调。现代政治仍沿用过时的对话、沟通和讨论规则，而鲜有政客意识到他们为说服他人所用的言语工具中暗藏的语义陷阱与情感欺瞒的陷阱。

然而相互理解可以成为政治战略的基础。需要的不是靠言辞欺骗和口号标语的权力政治，而是通过思想探询，寻找让提案和建议突破持不同意见和动机者阻力的途径。

v 政客们常常忘记，他们争夺行政权力的斗争，可能演变为针对被迫倾听者思想纯洁性的心理战。选举期间屡见不鲜的相互诽谤，正逐渐侵蚀民主制度，催生对威权控制的渴求。政客们散布的战略性谣言与猜疑，是对人类正直品格的攻击。相互诋毁，在选举期间屡见不鲜，逐渐侵蚀民主制度，催生对威权控制的渴求。政客散布的战略性谣言与猜疑，实则是对人性正直的攻击。

当民众对领袖丧失信心时，便会寻求以蛮力统治者充当领袖。何处有敢于承认对手至少与自己同样有能力的政客？甚至比他更胜一筹？在坦然承认对手能力与智慧的平等时，政治家寻求合作的机会。真正的合作唯有通过相互体谅、同情以及对人性缺陷的理解才能实现。

1951年4月，一群隶属于联合国、世界心理健康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织成员受邀赴纽约参加小约西亚·梅西基金会会议。此次会议深入探讨了政府治理问题及政治体制的

影响，后续成果汇编成报告发布。与会专家日益意识到政府管理者心理素质培养与选拔机制的必要性。

我们的行政人员是否需要接受精神分析？这个近乎乌托邦的问题虽不意味着应立即为政客和管理者开展心理培训，但确实指向这样一个未来时期：届时务实智慧与健全的心理素质将成为基本要求。为政客和管理者提供心理培训，但它确实指向这样一个未来时期：务实智慧与健全的心理知识将引导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将更充分地渗透可靠的心理学知识。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虽属新兴学科，但当今许多政治家已能从中获益。通过深化自我认知，他们将在世界治理战略中更具把握。他们将承担更多责任——不仅为成功负责，也为失败负责。并且他们将以更少内心踌躇的态度，为全人类的福祉承担更多责任。

此刻，我们未能解决政府低效问题政府效率低下与官僚主义干预人类行为的问题，可能阻碍公民思想的发展。人类的顺从需求与独立探索需求始终处于对抗之中。未来心理学必须研究自由思想与保守行政思维的桎梏，并解决由此引发的困境。

第十四章

每个人心中的叛徒 ——叛国与忠诚困境的迷惑性影响

每当提及“叛国”，人类灵魂深处便会激荡。愤怒与鄙夷、猜疑与焦虑随之涌现，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社会对叛徒的反应——即便尚未确证指控是否成立——都极为激烈。被指控为“叛徒”者的旧友纷纷退避，远离这个邪恶的象征。在每场叛徒审判中，我们内心深处都感受到被指控的个人罪责。

叛国审判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且引发最混乱的讨论，原因之一正在于此。独裁者可借此类审判对公众施加精神控制。在这部探讨精神胁迫与精神蹂躏的著作中，有必要深入剖析叛国与忠诚的困境。

非自愿的叛徒

自我背叛从人类的每个毛孔渗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在荷兰我的家乡，政府大楼附近有家小理发店。店主是个留着灰白法式胡须的矮个子。

多年来他为许多国家要员服务过——外交官、内阁部长、骄傲的将军、咄咄逼人的反对派领袖，都慕名而来。这位小理发师始终彬彬有礼，竭力取悦顾客。他用拘谨又谄媚的姿态围绕着他们，一边卷发修须，一边用恭敬的语气询问显赫的顾客：“某某阁下对这项法案有何见解？”“国务大臣对那项提案持什么态度？”其实他根本不关心政治，但小理发师深谙此道——这类问题最能取悦顾客。

然后某天，一位佩戴着缀满缎带的德国将军趾高气扬地走进理发店，径直坐进理发椅——荷兰已被纳粹大军入侵占领。当然，我们的理发师心知肚明，甚至曾怀

着几日的憎恨。但他生性温文尔雅，仍为亲自为将军刮脸，小心翼翼避免弄脏他的军装。此后数日，更多身着奇特制服的男子陆续光顾店铺，小理发师始终周到地为他们服务。军官之后，褐衫党人接踵而至，接着是盖世太保的绿衫党。理发椅的皮革被粗犷的黑色军靴磨得斑驳。但小理发师从不抱怨，很快占领者们便认定他的理发技艺是全城最时髦、最精湛的。

这位理发师并未过分在意自己日益增长的官方地位。他接待新客户时，仍如昔日款待外交官般彬彬有礼。他遗憾老主顾们渐渐消失，但过去他的生意本就随季节起伏——议会休会时店铺便门可罗雀。如今生意却常年兴隆。德国人和傀儡分子都喜欢这家小理发店——喜欢它的香氛，喜欢理发师的手艺。诚然，这位和蔼的朋友深受制服压迫者的青睐。毕竟他们早已不习惯友善对待；相较于大多数荷兰人——那些愚顽的抵抗者——对他们的轻蔑态度，理发师的举止堪称可贵的转变。

某日，理发师受邀购买新成立的通敌组织会员卡。这位朋友对此请求的回应方式，与对待其他慈善募捐并无二致。他虽不愿捐献，却将福利视为对商业征收的特殊税款，遂将缴款视为微不足道却不得不忍受的烦扰。几位旧识警告他后果：他将被指控为通敌叛国。但他安抚道：“我只是个理发师，靠理发谋生。政治与我毫无瓜葛，我只想服务顾客。”

历经苦涩的抗争与压迫岁月，解放终至。这位理发师被正式定性为叛徒与傀儡。当黑靴制服的超人被驱逐时，他们的傀儡同伙尽数入狱，理发师亦在其中。服刑数月后，一位明察秋毫的宽容的法官将理发师遣返小店。解放初期的狂热已退，人们逐渐愿意原谅那些因过去懦弱而妥协的傀儡。

我们的故事远未结束。理发师从监狱回来时已是一副被打垮的模样。他入狱三个月，至今仍无法理解自己遭遇了什么。他不断沉溺于狱中那些耻辱的日子。他遭受了不公对待。作为守法公民，他本应为同胞服务，却被当作罪犯对待。他自认清白无辜，却饱受欺凌、侮辱、虐待与误解。毕竟，他只是想行善助人——他不过是个理发师罢了。

理发师始终无法摆脱心中的苦涩与怨恨。昔日友人无人前来慰问，老主顾也未曾归来。他的悲伤与抑郁日渐加深，数月后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这位对自身合作与背叛毫无觉悟的小理发师，其传奇终告落幕。

我认识这个人。我并不鄙视他——绝非如此。我相信世上曾有许多这般可悲的帮凶。但我始终困惑：为何小理发师如此浑然不觉？是愚昧使然？还是他表面的仁善始终掩盖着对同类的怨恨？抑或他被某种狡黠的暗示浪潮所迷惑，那股力量远超他抵抗的意志？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这场悲剧，或许源于无知，或许源于在冲突忠诚间无力抉择，促使我开始探究

叛徒问题。无论是纳粹占领期间与荷兰地下组织的接触，还是被囚禁于维希拘留营的经历，都为我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契机。1943 年，荷兰政府委托我撰写一份关于关押在马恩岛的背叛荷兰士兵和公民的心理报告。

我乘着小型飞机历经风暴险阻抵达监狱。囚犯们个个凄惨不堪。我本料想会遭遇敌意，却未曾料到竟有这般多弱者，被苦涩与愤怒所吞噬。其中一些人典型地展现出被动、自恋、精神病态的人格特征，他们的信条似乎是：“让世界去见鬼吧！我绝不妥协。”另一些人则似乎是难以承受的内心斗争的牺牲品——他们渴望加入更强大的群体，却又抗拒这种渴望，而这种抗拒只会加剧他们的苦涩与敌意。

这番景象再次印证：某些时刻，逻辑与说理全然无用。我们反复劝说那些半心半意的合作者加入反纳粹斗争，他们却愈发退缩于私怨之中，甚至拒绝我递去的香烟。

前往监狱的旅程已够糟糕，返程却更显艰辛。强风将小型飞机吹离航线。经历这一切令我沮丧又厌恶，当飞机终于抵达英格兰时，飞行员和我都已晕机不适。

此后我多次有机会研究间谍、叛徒和颠覆分子。我最后一次战时官方调查带我来到苏里南荷兰属地的一座战俘营，在那里我对所有战俘撰写了集体报告。在许多人身上，我能辨识出神经症甚至精神病特征。

但或许对叛国问题的最深刻理解，来自我为神经症患者进行的精神治疗工作。这些患者每日都要面对生活中的细微背叛、自我背叛，以及对本应深爱之人产生的矛盾情感。

叛国概念

在深入探讨这个主题之前，让我们先探究“叛国”一词的含义。毕竟，这个词被赋予了多种令人困惑的含义。“叛国”一词具有多重社会和政治含义，其使用的群体习俗、习惯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和改变其含义。

这个词本身源自拉丁语 *tradere* 或 *transdare*，意为不当交付、背叛、传递物品、出卖忠诚与秘密。但由此词根衍生出多种含义。

首先，它具有纯粹情感化的个体含义，与剥夺感与不公感有关。婴儿常将所有迫使其脱离幸福依赖状态的经历——即成长本身——视为背叛，并将父母的拒绝视为叛逆。若成年人仍保留这种婴儿期情感，便可能将每一次想象中的轻视或拒绝都视为叛逆或背叛。

对家族或氏族——即群体内部——缺乏认同，不遵从其仪式与禁忌，常被群体

视为叛逆，即通过异议实现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词蕴含着原始的道德评判，伴随着厌恶与鄙夷。叛国指向某种深层情感、某种禁忌、某种异质或怪诞的存在，例如效忠异端思想、背离传统，或仅仅因为身为外国人。拒绝遵循社群规范与规则，自行评判道德伦理，往往被视为叛国行为。

彻底背弃祖国传统实属极端之举。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简单的异议行为也可能被视为叛国。事实上，在极权体制下，异议与抗争是最严重的反体制罪行，极权主义者往往将诚实的错误或意见分歧都视为蓄意背叛。

由于其深厚的情感内涵，这个词本身就能成为操纵民众的政治工具。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它沦为纯粹的巴甫洛夫式信号，触发不信任与仇恨的连锁反应。每当遭遇军事挫败、外交失利，或民众普遍陷入屈辱与无力感时，将他们的自卑感投射到他人身上便成为有效的策略。此时“叛徒”便成为现成的替罪羊，既满足集体归咎他人的需求，又缓解潜意识中的焦虑。在极权社会里，按我们西方的道德标准，每个公民都不得不成为叛徒——因为向政权告发任何异议或反抗的表达，正是其应尽的义务。孩童必须告发自己的父亲，父亲告发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不告发，立刻就被称为极权意义上的叛徒。

在普遍的政治释义中，叛国是叛乱、煽动叛乱、分裂、异端、阴谋或颠覆的行为。其技术性司法定义众所周知。叛国即投靠敌人并给予援助；在更现代的衍生意义中，亦指参与针对祖国的国际意识形态阴谋。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认为该词与自我背叛这一普遍问题的关联才是理解其本质的关键。叛国罪的萌芽始于个体对其自身原则与信念的妥协。一旦作出最初的妥协，便更容易步步深入，不断作出更多让步，直至最终成为甘愿将自身及服务出卖给最高出价者。在纳粹占领期间，我们目睹了那些被诱使为敌人提供微小帮助的人们。第一步导致第二步，最终走向全面合作。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时常怀疑自己，因为我们不确定若身处考验会如何抉择，因为我们可能在自己身上看到潜在的叛徒，“叛国”一词才具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但自我怀疑与实际叛国相去甚远，真正的叛徒——在病态意义上——绝非仅是自我怀疑者。他只相信超越自身的个人权利，并蔑视集体权益与意愿之人。他甚至对自己的帮派也毫无忠诚可言。希特勒便是典型：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理念——将之当作可随意更换的工具来获取并维持权力——更屡次背叛最亲密的伙伴与同僚。1934年那场被称为“长刀之夜”的清洗中，他出卖并屠杀了众多追随者。真正的叛徒是沉溺于自我中心妄想、坚信唯己独尊之人。他与我们那位小理发师这类无意识的、可悲的、浑然不觉的叛徒截然不同。

自觉选择投靠敌方的叛徒

在研究政治叛徒与傀儡时，我发现他们大多具有两个共同特征：易受比自己更强大思想的影响，且无人承认自己的不忠是叛国行为。受访叛徒总会主动提出无数行为辩解，用复杂的诡辩与合理化说辞为背叛行为编织防护网。实际上，他们无法容忍对自己行为的客观描述。若真如此，他们将自食其言。潜意识里，多数人其实洞悉自身罪行的本质，并深受愧疚折磨。若承认自己行径的恶劣程度——哪怕只是自我承认——这种愧疚感将令人难以承受。

在纳粹占领荷兰期间，我屡屡目睹这些特质的展现。许多本土叛徒都是懦弱之辈，几乎对任何新思想或复杂理论都甘愿接受。易受暗示性是他们最大的致命伤。这些伪纳粹分子大多从未拥有过坚定的个性。他们的人生抱负已然破灭，对生活充满失望，便轻易将挫败感转移到个人渴望沦为政治幻影。德国入侵占领后，这些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战败同胞冷嘲热讽，得意洋洋地宣扬自己押对了宝的“先见之明”。他们膨胀的优越感在敌军武力庇护下愈发猖狂，对同胞变得冷酷轻蔑。

为粉饰自身行径与权力贪婪，他们竭力将他人拉入新生活方式。他们被强迫症驱使着成为侵略者的宣传者——叛徒总试图通过诱使他人共犯来抚慰自己的良心。

当然，他们确实怀有某些真实的怨愤——人人皆然。但这些叛徒受影响的更多是虚构的不公，而非真实的苦难。他们通过背叛行为，将因个人失败遭受的私怨转嫁到社会身上。个人失败所遭受的社会不公。他们言语间处处透着怨恨。

纳粹战略家深谙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的诀窍。他们似乎能凭直觉判断个人能否被纳粹宣传所俘获。我曾在荷兰目睹一例：某大型企业前董事因道德问题遭罢免。占领初期，此人收到加入纳粹组织的邀请，竟在极短时间内成为重要纳粹商业组织的头目。纳粹让他获得了被平反的错觉。

在纳粹占领区招募的警察队伍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叛徒，甚至包括精神病院的罪犯精神病患者。这些人对社会怀有的病态怨恨，恰恰成为纳粹将其塑造成叛徒的绝佳借口。德国人本身也鄙视这些家伙，但他们狡猾地将这些人发挥到了极致。

纳粹还对某些未获足够认可的作家和艺术家玩了一场诡异的把戏。敌人通过购买和赞扬他们的作品来奉承这些人士。起初，艺术家们被告知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无需担心干预。渐渐地，他们被要求提供些微的政治服务——诸如对某次会议的正面报道，或是对某套他们并不认同的哲学理念的赞许提及，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让步。

正是最初微小让步的冲击，引发了内心自我辩解的雪崩，最终导致自我背叛。

首次妥协与自我辩解之后，第二次便接踵而至，且伴随着更狡黠的自我开脱。毕竟此时妥协者已积累了合理化的经验。反复的让步终将演变为屈从与自愿合作。正如我先前所言，一旦有人被诱入微小的意识形态让步，便极难止步。从此他的想象力便能制造出足够的借口，助其维系自尊。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叛徒总渴望认同敌人——那些敌对的入侵者。他从未真正“归属”过，从未与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感，从未体会过这种凝聚力的回报，也从未赢得过同伴的爱戴、同情与尊重。因此他渴望加入“异己”阵营，甚至可能将昔日友人斥为叛徒。英国叛徒霍霍勋爵（威廉·乔伊斯）被本国政府处决时，便曾如此宣称。因此他渴望投向“异己”阵营。甚至可能反过来指控昔日友人为叛徒。英国叛徒霍霍勋爵（威廉·乔伊斯）被本国政府处决前，仍自诩为真正的“雅利安德国人”，以此为其背叛祖国的行为辩护。

在纳粹入侵荷兰后的混乱日子里，我内心也曾偶尔浮现投靠敌方的念头——投向那个有强大组织、随时准备支持庇护的强势阵营。我甚至做过梦，梦见自己拜访希特勒，用幼稚而友善的方式说服他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我并未屈服于这个梦境的诱惑，但确实有人沉溺于此类幼稚幻想，终究未能抗拒屈服的本能。顺从、被接纳、追求安全与体面的需求，深深植根于人类内心。在剖析囚禁与集中营生活如何迫使人们放弃精神独立的内在机制时，我们已见识过这种心理机制的重要作用。生活在敌占区固然远不及战俘营或集中营那般恐怖，却依然令人心生畏惧。在这般惊惶境地中，顺从的本能可能表现为对敌方意识形的屈服。那些虽感此欲却予以抗拒者，往往因背叛冲动引发的罪恶感，反而变得更加狂热地反纳粹。

这场战争经历让我们领悟到另一个真理：集体的压倒性暗示足以造就叛徒。在喧嚣的意识形态与变幻的价值观交织的混沌中，心灵会变得阴郁顽固；当个体尚未成熟且缺乏内在控制力时，其忠诚便可能迷失方向，最终向最强大的群体投降。

纳粹党凭借其扭曲的政治手段，试图向软弱者、野心家、不满者和挫折者兜售现的虚假理想，为投靠他们提供借口。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指出：当失意者获得重要感时，便会以极端顺从的态度吞下任何建议。他深谙人性弱点——甚至善良——都可转化为系统性培养叛变的起点。希特勒同样深谙，无限制的政治恐怖足以将任何人变成叛徒。播撒恐惧、恐怖与饥饿，施加穿透性痛苦，最终在精神胁迫与日益加剧的混乱中，许多人将屈服甚至背叛亲族。在众多集中营里，受害者们被迫掌管毒气室杀戮，直至轮到自己时才终止这份骇人工作。恐惧与恐怖已将他们淬炼成毫无意志的奴隶。

人类还有另一种特质可能导致叛国与背叛。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忠诚该归属何方。克劳斯·富克斯的案例便是生动例证——这位向苏联泄露原子机密的

人正是如此。此人天资聪颖，精通最艰深的理论难题，却在矛盾的忠诚中迷失了方向。因纳粹迫害其贵格会家庭，他选择英国作为新祖国。与此同时，他怀揣着建立理想国度的梦想，却理论难题的专家，却在相互冲突的忠诚中迷失了方向。由于纳粹迫害他的贵格会家庭，他选择了英国作为新祖国。与此同时，他怀揣着对神秘的普世世界，他以为能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找到答案。面对世界问题的困惑，他根本无从确定自己的忠诚该归属何方。

这并非如报刊所言的精神分裂或《化身博士》式人格分裂，而是超智者内心忠诚的剧烈冲突。福克斯在情感层面迷失了归属。

另一些人则被环境逼迫走向叛国与合作——周围无人信任他们。例如一战时期的佛兰德斯地区，许多人被迫再度沦为叛徒。

对导致人们背叛的因素所作的分析，绝非暗示每个人都必须对最初赋予其道德观与理想的群体保持忠诚。更深刻的洞见与更崇高的道德准则，足以超越我们童年时期的忠诚。超越师长、修正传统学派的教条（若有可能），既是人类的宿命，亦是人类的必然需求。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被指控为“叛徒”，罪名是“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然而今日我们深知，苏格拉底绝非思想败坏者。

我们背叛的智慧

最悲剧的背叛莫过于隐匿的自我背叛，源于人类理性的惰性。我们常被自己的思想所背叛——那些想遗忘之事便彻底忘却。为逃避现实困境，我们否认真实问题的存在，沉溺于一厢情愿的幻想。当无法理解问题或论点的深层含义时，我们便如那位过度友善的理发师般，被动屈从于强势一方。人类易受腐蚀的特性，至今仍是我們最严峻的心理与道德困境。内在的混乱会让我们对任何强烈的外部暗示俯首称臣——无论其多么荒谬虚妄。

我们的疑虑是叛徒，它使我们因畏惧尝试而错失本可赢得的美好。

还有更复杂的智力诡计会导致自我背叛。自卑感常使无知者极度渴望理解艰深理念，这类人热衷于投身于伪深奥的思想体系。希特勒及其晦涩著作曾使大多数德国人沦为短暂的伪哲学家与巫师。所有独裁的极权主义者都雇佣学者，为其炮制这套伪哲学的辩护体系。

遗憾的是，某些学者轻易就能被收买。例如在荷兰，曾有一位智力平平的哲学

家，在纳粹展现出压倒性力量后便投身其阵营。此后他便肆无忌惮地撰写晦涩难懂的哲学论著，阐述复杂理论，无非是为了歌颂来自第三帝国的权势朋友及其征服世界的狂妄幻想。与此同时，他用晦涩难懂的词汇构建起自我辩护的体系，试图掩盖内心深处的罪恶感；由于找不到足够有说服力的词语来为背叛自我的行径开脱，他日益与世隔绝。最终他彻底丧失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当然，纳粹分子此时也对他失去了利用价值。

自我背叛

正如我们所见，导致不忠或叛国罪行的内在动机多种多样。有时这些动机运作得极其隐蔽，连当事人自己都浑然不觉；有时叛国不过是向出价最高者粗鄙地出卖灵魂。让我们尝试梳理并归类这些动机，从无意识层面出发，逐步延伸至蓄意背叛。

首先，自我背叛可能始于对迷失与被排斥感的防御。为赢得群体接纳，个体在遭受攻击时可能隐藏并放弃捍卫私密信念。心理学上若此类被动行为形成无意识习惯，可称为对强势者的被动屈从与认同——“敌不过就加入敌阵！”（弗洛伊德语）

尽管我们内心潜藏叛徒的概念不易接受，但通过研究驱动人类行为的对立内在冲动，人们会更确信这种可能性。人类内在矛盾心理的临床概念，正是基于大量心理实践经验。在探究诸多叛徒的深层动机时，我们常发现其背叛行为发生于内心剧烈动荡之际——这种动荡几乎摧毁其精神，使其沦为失控的神经废人。仿佛未来的心理病人宁愿向外部敌人投降，也不愿屈服于疾病与精神崩溃的内在敌人。赫斯违背希特勒指令飞往英国时，正处于精神分裂症崩溃的边缘。

再看英国外交部间谍唐纳德·麦克莱恩与盖伊·伯吉斯。二人均显露出数种精神崩溃前兆——精神崩溃。读者或许知晓，这两位男子于1951年5月离开英国，企图经法国前往俄罗斯。他们都是蓄意逃离本国。两人在剑桥求学时均有共产主义倾向，但后来都放弃了年少时的政治立场。服役期间二人均显露异常征兆：麦克莱恩因过度劳累与酗酒于1950年5月精神崩溃；伯吉斯则因服役期间鲁莽驾驶及工作失职受到训诫。通读报告令人震惊的是，如此敏感政府要职竟容忍如此程度的精神不稳定。两人均存在同性恋倾向，这可归因于他们对母亲（及祖国）压抑的敌意（引自英国《调查报告》，《纽约时报》1955年9月24日；《时代周刊》1955年10月3日）。

有时叛国意味着单方面的正义诉求。这体现在那些要求某种私人保护性正义、拒绝承认权利与义务微妙关联的人身上。此类人总感到持续被剥夺与背叛，正是伯

格勒所称的“不公收集者”。他们在不忠行为中试图扮演私人法官的角色。许多爱抱怨甚至偏执的人都具有这种人格结构。

还有那些失望的伪理想主义者，他们逐渐沦为愤世嫉俗者，用种种自我辩解和开脱来掩盖内心的空虚。这类人通过所有揭穿神话的言论，暴露了其智识层面的幻灭。

父母间的冲突可能使子女产生背叛一方或双方父母的冲动，这种冲动在成年后可能转化为背叛祖国的欲望。我常发现，对父母未解的憎恨与爱恋纠葛，在塑造叛徒人格中起着关键作用。正如我们所见，这个问题往往是极权主义人格结构的根源。尽管极权主义者并非定义上的公开叛徒，其中某些人却极易背叛自由民主的理想——或因对异国意识形态的强迫性效忠，或因反复无常的叛逆心理。

描述政治群体的特殊性时，须谨记所有人的内在都存在基本矛盾。伪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满足了人们对社会生活逻辑阐释与合理组织的需求，却掩盖了极权主义者内心容易被察觉的非理性力量所引发的焦虑。“群众”崇拜往往成为对抗孤独的防御机制。对进步的信仰可能源于模糊的绝望与不安。对“右倾”的恐惧，本质上是对群体统一性瓦解的恐惧。猜疑与自我批判，其首要功能在于维系内群体凝聚力。

若干形式的内心自负足以使人沦为叛徒。前文提及的荷兰哲学家便是例证，那些为极权主义辩护的冗长意识形态说客亦无一例外。

对自身社会指导性传统与目标缺乏信心或信念，同样可能引发敌意，进而导致叛国。失去传统信仰后，人们更易受竞争性意识形态的暗示性和接受性影响。前文提及的克劳斯·富克斯案便是典型例证。

个人对成为先驱或殉道者的渴望——往往源于潜意识中的受难需求——可能催生私密的救世主妄想，进而攻击群体的传统价值观。许多群体将此类极端主义视为背叛行为。

另一种自我背叛可能源于无法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许多人因未能理解这种复杂性，又迫切寻求解决人生难题的简单万能答案，最终被诱入不稳定行为甚至背叛。谁为他们提供了可供信奉的简单神话？纳粹正是以此方式诱使几乎整个德国陷入意识形态叛变！

背叛亦可能是对深层神经质罪恶感的悖论式反应。神经质策略中不断累积罪恶感，加之由此衍生的内在惩罚需求，往往构成犯罪行为的根源。背叛行径恰恰是为了招致惩罚而实施（莱克）。

叛国有时也可能出于冒险心理，正如我们在国际间谍活动中所见。这种生活方式对沉溺于神秘故事与童话世界的幼稚心灵极具诱惑力。金钱或女性的贿赂更使

此类叛国行为魅力倍增——敌人满足其经济与性欲需求，叛徒便甘愿将操守卖给出价最高者。

赤裸裸的恐惧与惊惶同样能催生叛国。极权主义审讯的全部心理机制皆基于此原理——人们可被恐吓与洗脑逼至背叛。

忠诚的形成

由此可见，所谓叛国行为更多发生于情感领域而非理性层面。人类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经历过内心冲突的阶段——必须将爱与忠诚从一人转向另一人：从母亲转向父亲，从父母转向整个家庭，从家庭转向国家，再从国家转向全人类。背叛与自我背叛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一种忠诚被另一种忠诚所取代时，压抑旧有忠诚所产生的困境。

许多人在青春期经历深刻的困惑，因为他们首次必须离开家庭提供的安全感庇护，为自己建立新的忠诚与道德标准。正是这个时期，批判能力得以发展。当青少年质疑父母传承的传统真理时，或许可称其为叛徒；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忠于自我中塑造自己。在青春期的危机中，伴随着对未知幸福的渴望日益强烈，许多年轻人渴望“背叛”父母的家园与父母的标准。但他们同时又不愿放弃家庭提供的庇护。

然而从心理层面看，我们知道这种暂时的不忠是否属正常心理成长。个体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从最初顺从到公开叛逆与不循规蹈矩的进阶阶段。迈向心理成熟与独立的每一步，都意味着与过去的羁绊逐渐消解。这种成长可通过不同方式实现：或显露敌意地背弃过往，或以自我背叛与被动屈从，或通过重新顺从来消解罪恶感，或宣称保守主义立场，或公开叛逆。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青少年尤其容易受到极权主义宣传的侵蚀。

青年在内心成长的冲突中，可能保留着孤独与罪恶感。若能将其转化为建设性力量，他便可能成为我们所称的创造性革命者。开拓者正是如此——他们凭借内在力量驱使自己打破传统。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道德与精神领袖皆属此类。他们之所以成为领袖，恰恰因为他们打破了僵化的传统残余，或是摒弃了当下社会中僵化或不道德的元素。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曾认识这样一位德国精神科医生，他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感使他无法认同纳粹践踏人类价值的行为，最终因参与 1944 年德国反抗希特勒的失败起义而被以叛国罪处决。

赞美不循规蹈矩

如何普遍抵御背叛、不忠与自我背叛？首先，父母与教育者应始终以善意的警惕关注儿童对权威的正常抵触态度及其挣脱束缚的需要。强迫儿童否定自我实在太容易。许多背叛行为实为童年问题处理不当的反应。多数叛徒是后天造就的，而非天生如此。遗憾的是，这一真理常被教育者遗忘。他们因自身受挫的攻击性，往往会强行摧毁青少年对同龄群体怀有的强烈忠诚感。

我们能否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唯有深入洞察其隐秘动机与驱力，理解其潜意识运作机制方能明辨。要获得完整洞察，精神分析不可或缺，但无意识通过性格特征与防御机制的显现，已能提供重要线索。过度依赖者、自我意识薄弱者、易受暗示者往往容易被诱使背叛。自夸自大、言行不一、充满傲慢虚荣之人亦然。物质利己主义、权力欲望与持续敌意同样会导致道德价值的泯灭，忠诚便是其中之一。

正如心理学中常见的情况，描述可靠者不应具备的性格特征往往比勾勒其应有特质更为容易。总体而言，那些对自己诚实、自我欺骗程度最低、展现稳定人格结构、具备真正成熟度的人，最忠于自我，因而也最忠诚于他人。

然而，叛逆的种子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并可能因环境影响而滋长。例如在极权世界，所有人皆被灌输自我否定与自我背叛的理念；当个体成为异见者时，“叛徒”的标签便会加诸其身。在教条与传统窒息的世界中，任何原创性思考都可能被斥为煽动叛乱与叛国。此类情境下，决定叛国行为的并非混乱的内在心理过程，而是环境、社会与政治因素。然而在本章中，我着重探讨了个人因素如何催生叛国——家庭与群体的偏见影响，以及直接环境复杂性引发的内在不稳定。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无数微妙的自我背叛幻想与隐秘攻击向，更存在着报复隐秘怨恨的强烈欲望，任何政府皆可利用这些病态的神经质情绪煽动国民。

忠诚的强制性

近来美国人正以更批判的眼光审视忠诚与颠覆的概念。我们深刻意识到极权主义通过颠覆手段发动攻击的冷酷无情本质，却开始让对内部颠覆的恐惧瘫痪了民主自由。我们对本土潜伏着叛国“第五纵队”的幽灵忧心忡忡，以致变得过度谨慎又充满猜疑（在荷兰历史学家路易斯·德容博士关于德国第五纵队的研究中，他

通过详实考证证明：希特勒所畏惧的叛国与背叛网络，其大部分实为民众恐慌与恐惧所构筑的虚幻怪兽）。我们不断需要确认邻居和同胞的意图是否正当忠诚。这种对安全的狂热追寻，其危险性既体现在政治层面，也体现在心理层面。政治上，当我们试图筑起抵御极权思想蔓延的坚不可摧的屏障时，可能会发现自己正放弃那些区分民主与极权的核心特质：自由与多元。心理层面，我们可能沦为病态猜疑（临床可称为偏执症）的受害者，这种猜忌更可能使我们彻底抛弃人类最珍贵的品质：对同胞的宽容与尊重。

美国社会负责任的领导者们已多次指出这种状况中的政治危险。作为精神科医生，我愿将关注聚焦于心理层面，以及当前局势对自由思想的内在威胁。正如我们所见，所有政治行为本质上都是个人行为延伸，其根源在于构成政治团体个体的心理。

许多集体性猜疑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个人不安全感被无限放大。恐惧与灾难时期，背信弃义的侵略者神话便应运而生——这正是极权主义者最擅长利用的幻觉。我们内心的不安被转移投射到邻里与环境之上。我们开始怀疑和不信任所有人。我们指责他人，实则是害怕自己。我们感到脆弱，便用日益增长的猜疑来掩盖弱点，时刻警惕潜在的叛徒和异议者。

正如先前所见，忠诚问题本身便错综复杂。我们在热衷于建立可信赖性保障时，往往过度简化问题本质，最终可能适得其反——沦为极权主义对手的翻版，而过度简化恰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要求人们宣誓效忠——要求他们通过某种魔法仪式来摒弃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政治罪孽——可能产生悖论效应。仅凭宣誓并不能使人忠诚，尽管这或许能让法官日后以伪证罪起诉他。我们对官方效忠表态的执着，实则贬损了忠诚本质——即个人自愿选择认同社群的基本情感；它既无法创造忠诚，也无法保障忠诚。效忠宣誓极易沦为空洞的公式，宣誓者可能完全遗忘其应有的意义。对许多人而言，它已沦为繁文缛节，不过是那些必须填写的无尽麻烦表格之一。

宣誓强制极易演变为幼稚的魔法策略，成为精神勒索的手段。某些东方宗教通过转经轮进行礼拜：信徒只需手一挥转动经轮，便完成仪式，无需诵经，更亦无需怀抱虔诚。这些宗教的信徒早已遗忘祈祷的真谛，沦为仪式意义的盲从者。效忠宣誓的签署，终将沦为与转经轮同样空洞的仪式。

真正的忠诚并非一成不变；正如我们所见，它随人格成长而发展。它需要每日重新发现与体验，因为本质上，正是通过内心价值观的角逐，人才能确立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与忠诚。当一个人被迫宣誓效忠时——即便他内心早已深藏这份忠诚——这种外部强制意味着他必须搁置个人权衡价值的权利，放弃与自身正直原则商议的自由。无论誓言是否表达真实情感，其背后的强制性要素都会对宣誓者产生

心理削弱效应。乍看或许令人费解，但简单类比便能明晰：真正爱妻之人无需反复宣誓，行动自会证明。倘若妻子执意要求宣誓，这份坚持本身——因暗含对丈夫的怀疑——反而可能引发丈夫的自我质疑，致使他困惑于自己真实的想法。

无论是要求宣誓还是接受宣誓，我们都在延续这样一个荒谬的幻想：仿佛通过这种转经轮式的仪式就能将敌人拒之门外。事实上，那些蓄意背叛和颠覆的人，恰恰是不惧于用固定套话掩饰动机、隐藏意图之辈。他们也不畏惧伪证指控，只要时机合适，便毫不犹豫地签署誓言。对他们而言，言辞与誓言不过是缺乏道德约束力的工具。比起忠诚的要求，更应重视对正直品格、坚毅意志、成熟目标与动机的追求。

自由人首先需要对自我的忠诚，这意味着做自己的权利。自觉渺小、深陷疑虑、内心脆弱之人，极易沦为各种极权政治思潮的猎物。忠诚追捕与效忠宣誓反而会引发对个人操守与自由的背叛——因其在自身及他人心中滋生猜疑。自由正因反对派的存在而得以维系，纵使这意味着不循规蹈矩与零星颠覆的风险。

忠诚源于相互信任，而非强制所能创造。任何强制本质上都是单方面的。忠诚必须通过日常互动、通过领导者与公民之间的接触来赢得。正因建立在信任之上，忠诚是发自内心的自愿奉献。真正的忠诚无法用金钱收买，更不能强求。

在调查那些在朝鲜被洗脑、轻易背弃忠诚的年轻美军士兵时，我们常发现其家庭背景中存在父母对子女的不忠行为。几乎所有所谓亲共案例都涉及心理失调的青年。社会有必要审视自身对这些年轻人的初始忠诚度。

在民主国家，我们应当准备好提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来支持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开发新的方法来揭示任何颠覆性制度的弱点。

对异见思想的迫害，对某种规定公式的忠诚执念——这些使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或许正是拒绝辩论与说服的开端。它们甚至可能催生新的背叛形式：智识疏离的隐秘叛变，逃避责任的懦弱，以及导致消极不作为的怀疑相对主义之叛。它可能退化为危险的精神惰性，轻易演变为无所作为的生活或极权主义的屈从。通向真理的途径千姿百态，唯有在观点碰撞时，这些途径才能被发掘，通往真理的正途方能寻得。

忠诚强迫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在僵化的公式背后掩藏精神上的冷漠，从而忽视心理警觉性的永恒需求，以及忠诚与自由生活方式的真正意义。机械化的效忠誓词公式，因其抑制道德警觉性与伦理澄清，或许正是我们所畏惧的思想控制的开端。真正的忠诚是鲜活而动态的品质。

在对人的忠诚与对原则的忠诚（通常是更模糊的情感）之间，立法者必须尽可能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因为后者建立于前者之上。没有个人忠诚，便无国家忠诚！

此问题尚有另一层面。我们必须学会区分行为上的不忠与思想情感上的背叛。颠覆观点绝非罪行，异议权乃民主之基石。在自由国度，我们必须以更优论据纠正颠覆行为。迫害异见实为思想惰性的体现。从心理层面而言，政府无法探究民众的自觉动机（及其不可分割的潜意识动机），因每个人内心皆存在矛盾动机。1954年格雷委员会公布的奥本海默听证会记录，生动揭示了此类政府将陷入的困境：

我们相信，政府完全能够在充分保障自身及涉事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审视政府自身与公民的灵魂——尤其当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存疑时。我们坚信，忠诚与安全审查完全可在美国司法传统中不可侵犯的原则框架内进行。

这些华美的辞藻中，潜藏着极权思想控制的种种不祥征兆。任何试图窥探个体思想灵魂的政府，总能找到指控的把柄，因为怀疑、矛盾和摸索是人类共有的特质。我们无法凭表面所见的思想情感来衡量任何人的可靠性。首先，看似忠诚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们永远无从知晓。其次，那些为追寻真理而探索诸多异端观点的人，其行动可能最为忠诚。正是这种探索本身，往往能引导他形成深思熟虑的判断——而这恰是真正忠诚的根基。衡量一个人的关键在于其行为的一致性与正直，以及坚持立场的勇气，而非对官方教条的盲从。

而宣称政府能自我审视灵魂，实属空谈。政府终究只是个体的集合体。在忠诚压迫与日益增长的猜疑压力下，这些个体自身或许无法像在平静时期那样坦诚审视灵魂，更遑论以私人身份而非政府代表的身份行事时——政府的官方代表。被官方安全规则束缚的人，实则是焦虑与不安的囚徒——这种情绪在那些企图建立确定性与安全感幻象的人群中肆虐蔓延，实属对价值观的背叛！

政府一旦开始窥探公民的灵魂，便开始侵犯其权利与利益。它在国内攻击民主，在国外削弱自身地位。若我们抱持教条主义的顽固立场，试图将自身正统观念强加于人，便无法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和平共处的道路。极权主义者的标志在于其坚持己见即唯一正途。若欲维系自由世界领袖地位，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思想开放。唯有如此，方能开辟通往和平的新径。

我们现已认识到，背叛问题本质上源于未能理解我们内在的心理过程。每一次背叛，首先是对自我的背叛，是对自身准则的不忠。当人们为图便利而压抑良知、妥协退让时，便已开始背弃自我。在良知本应驱使我们行动之时却选择消极被动——这正是最常见的自我背叛形式。内心深处，一个人或许因目睹不公而怒火中烧，但表面上却无动于衷——这种行为在他看来是对自我的背叛，也正是这种心态使他对他人缺点格外敏感。当消极模式不断重演，个体积压的不公感日益膨胀，对社

会的怨恨也愈发深重。回避问题、巧妙规避原则性议题——这些堪称当代最危险的自我背叛形式。它们之所以危险，在于它们会不自觉地催生虚伪，使权力凌驾于道德价值之上。

任由个人怨恨与不满凝固成对整个社会的永久性愤懑，实属危险。父母与教育者可通过心理洞察力预防此类困境：允许每个个体以文明、非破坏性的方式，自由批判并挑战其所归属的社群。通过帮助孩子培养对自己观点负责的意识——即使这些观点暂时看似颠覆性——父母为他提供了克服孤独感、矛盾心理以及对影响者施暴冲动的机会。忠诚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对家庭、朋友或国家的忠诚必须通过行动赢得。

唯有在法律框架内允许并容忍相互的精神攻击与敌意时，忠诚才得以实现。这种经语表达、升华与文明化的攻击形式，以公平竞争精神为前提。它既是叛逆与颠覆的融合，也是对二者的征服。尽管听来矛盾，民主制度恰恰建立在政治对立群体间的相互忠诚之上！质疑对手的善意动机，无异于动摇合作与成功的政府基础。指责反对党不忠实是最不民主的行为。历史表明，唯有当对立思想得以碰撞融合时，人类才能根除那种逐渐演变为对自我与社群不忠的心理失衡。对颠覆与反对的恐惧，往往是对思想的恐惧，是对与某些不可接受思想产生关联的恐惧，是对自我隐秘部分背叛的恐惧。只要忠诚的反对仍被视为罪行，对叛国的恐惧就将永存。

民主意味着不盲从；它要求相互忠诚，即便我们必须批判彼此的思想——这些思想因其人性本质，永远存在不完善之处。

第四部分

寻求防御之道

当我们意识到特殊的政治现象威胁到我们生存时，相应的内在防御机制便会自动形成。当我们找到应对问题的方法时，内心便会感到安心。本书的最后几章首先探讨了某些官方态度以及为应对洗脑现象——这种危险在历史上出现得相当晚。最后一章则更深入地探讨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如何有效提升军民士气的问题因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而显得尤为紧迫。

第十五章

抵御精神折磨的训练

美国抵抗洗脑准则

1955年8月1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制定了规范美军战斗人员在战场及俘虏状态下行为的新骑士准则。其中阐明了六项作战人员行为准则：

1. 我是一名美国战士。我服役于捍卫祖国与生活方式的军队，愿为保卫祖国献出生命。

2. 我绝不主动投降。若身居指挥之位，在部下尚有抵抗能力时，我绝不令其投降。

3. 若遭俘虏，我将竭尽所能继续抵抗。我将全力逃脱并协助他人逃脱。我绝不接受敌人的保释或特殊优待。

4. 若成为战俘，我将与战友恪守信念。绝不泄露任何可能危害战友的情报，亦不参与任何危害战友的行动。若我资历较深，将承担指挥责任；若非如此，我将服从上级合法命令，并全力支持其决策。

5. 若被俘后接受审讯，我仅提供姓名、军衔、军籍号及出生日期。其余问题将竭力回避。绝不作任何口头或书面陈述损害祖国及其盟友利益。

6. 我永志不忘身为美国战士的责任，为捍卫国家自由之原则而战。我将信奉上帝，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全文见《新时代报》1955年8月18日刊载）。

在关于国防部长建议的补充报告中，承认现代战争已将挑战带到每位公民家门口，冷战战线的最终防线就在每个公民心中。

与此同时，报告为美军战俘制定了明确的行为准则。尽管此前缺乏此类规范，但报告强调：“历经所有战争，美军官兵始终展现出不轻易投降的意志，从未发生大规模投降事件，作为战俘时也普遍为祖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在描述了对囚犯的肉体折磨——死亡行军、饥饿、污秽、严寒、酷刑、疾病和彻底的屈辱之后，报告着重阐述了各种精神胁迫手段。这些手段旨在从士兵身上榨取虚假供词或军事情报，并向他们灌输极权主义思想。首先，敌人瞄准的是瓦解领导层，扰乱那些极易影响士兵的军官。随后所有人逐步被迫接受意识形态灌输的煎熬。敌方宣传攻势全面展开。这种暗示性攻击直指那些不习惯高度专业化讨论、对共产主义及其策略知之甚少且困惑的头脑。通过攻击个人思维中的内在矛盾，便能轻易使其屈服于顺从状态。

该报告呼吁对军人（及公民）进行更深入、更精妙的培训，使其掌握我们的基本信念与责任，为未来“思想”与“意志”的交锋做好心理动员。

在起草该准则的国防部长顾问委会中，严苛的斯巴达式观点与宽容的“任其言论”观点存在显著分歧。前者主张每位士兵必须抗争到底；后者则认为最终任何人都可能屈服。

然而所有士兵都必须接受特殊训练，以确保其抵抗意志不被动摇，永不背叛祖国、军旅与战友。这正是最终制定高标准守则的核心原因——尽管人们承认存在超越抵抗能力的强制手段。但心理学家在此提出附加问题：谁来判定何为超越抵抗能力的强制？

报告最后强调：争夺人心的大战永无休止。后方战线不过是战斗前线的延伸！该守则的重要论点在于，它要求关注更广阔的精神战场。通过充分理解共产党的胁迫手段，使其冷战战略的影响力与意义便被部分削弱。最后，纵使其极权手段在国内宣传中或许奏效，外界无人也相信其宣传。但我们不能仅靠反洗脑来对抗洗脑。

让士兵签署绝不屈服于洗脑的声明，至少能让他们知晓可能面临的状况。然而这种认知无法抵御审讯者精妙的心理操控——那些深谙如何绕过心理防线的审讯者，凭借时间与隐晦的暗示渗透，足以瓦解人的抵抗力。

从心理层面看，效忠宣誓的强制性与书面声明本身并无实质意义。唯有深入培养思想自由与民主意识，方能成为有效的解毒剂。那些要求签署效忠声明的当局者，并未充分意识到：在我们自身社会中，宣传攻势、说服式洗脑及其他精神诱导手段正大行其道；他们正以社会责任与国家责任混为个人责任。正是后方民众背后的道德政治氛围，构筑了他们的精神韧性。在冷战中，国家有责任为士兵锻造并传递精神脊梁！

数名战俘自认被本国政府误导。他们对敌人的认知严重失真，仅停留在非黑即白的简单认知层面。俘虏方只需展现其善意一面，便能轻易引发俘虏对其领导者诚意的怀疑。

从精神病学角度必须重申：无论受过何等教育或反洗脑训练，任何人都可能被

逼至崩溃边缘。当敌人执意实施瓦解士气的手段时，手段总在掌握之中。可惜报告未能充分强调许多普通士兵陷入的艰难辩证困境——多年来他们在社会或军旅中接受的训练遵从法纪、顺应集体习俗的烙印已深深植根于他心中。而此刻他却必须抉择并检验自身的独立性与批判性防线。冷战时期要求极高的政治觉悟。

这又将问题回溯到个体问题上人的心理脆弱性及士气普遍问题。精神勇气不能仅靠体能训练培养，它需要心理韧性的锤炼、基本信念的理解，甚至需要培养非传统思维。我们必须对所捍卫的事业深信不疑，才能抵御敌人的立场。正是信念的力量赋予了精神力量！

反洗脑的洗脑？

一种教育理念认为，通过身体折磨的条件反射训练，能使士兵更不易受洗脑影响。某空军基地曾设立名为“生存学校”的“酷刑学校”，借此引入共产主义者对待俘虏的野蛮手段，旨在让士兵在未来遭遇暴行时保持坚韧（《时代》周刊，1955年9月19日）。受训者对这些骇人听闻的训练表现得相当坚韧。然而此类训练可能使受训者在不知不觉中习得极权主义手段，甚至为敌方战术提供半官方的默许——暗示我们也能采取相同手段。更甚者，此类训练可能在教官与受训者双方激发潜在的施虐倾向。敌方战术的准许可，暗示我们同样可以采取相同手段。更甚者，此类手段可能激发训练者与受训者潜藏的施虐倾向。在严谨训练需求的伪装下，美国青年可能被灌输与敌人相同的施虐思想。

所有形式的严酷强制训练与思想灌输所蕴含的重要心理意义在于，它们都契合极权主义的模式。更甚者，极权主义的审讯者无需施加肉体折磨来揭露人类心灵的秘密——尽管他们可能为私欲而使用这些手段。相反，敌人同样依赖友善姿态和特殊特权来诱使饥饿虚弱的战俘招供。审讯者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敌人必须拥有脆弱人格，如同愚蠢之徒，带着士兵的从众需求，被焦虑缠身且缺乏耐心。洗脑审讯者无需酷刑。肉体折磨往往会增强被审讯者的抵抗力，而单纯的隔离便足以达成目的。那些只传授酷刑与逃避技巧的学校，反而能唤醒潜藏的焦虑，从而形成悖论——被夸大预期削弱的士兵反而更容易向洗脑屈服。校园里的英雄，一旦面对真实考验便可能沦为懦夫。

受训者在体能训练中取得的成就并不重要，体能训练中的表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精神与意志的坚韧。他是否拥有精神脊梁？唯有此才能在囚禁考验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洗脑与精神摧残的精神病学报告

在每份关于战俘洗脑的报告中，都需考量若干必须考虑若干可能导致“与敌人合作”指控的因素，以判定被告的心理责任。

他是否在某种催眠状态下精神投降？能否追究其责任？是否存在将此人变成叛徒的有意识自愿合作？是懦弱还是精神脆弱？

由于这些问题在我们历史中如此新颖，且往往与具体情境密切相关，有必要列举需关注的领域：

1. 指控内容。心理学家需研究定罪事实。例如在签字供词的措辞中，常能发现签名系被迫所为的证据。某些敌方惯用套话，可被视为逐步从受害者脑中套取的产物。我曾为某法庭分析一份书面供词，其内容由如此杂糅的元素构成，以致囚犯在精神角力中逐步屈服的心理挣扎过程清晰可辨。

2. 谣言与群体心理。战俘同伴对战俘的指控并非总是可信——即便多数人不断重复的谣言——或许可以信以为真。在恐怖与恐惧的冲击下，关于特殊人物的传言极易传播。某些人因其特殊性格结构，极易成为谣言的焦点。例如，孤僻的知识分子常被指控与敌人勾结。当他使用敌人的语言并与之交流时，针对他的指控便可能演变成大规模集体幻觉。

调查者必须对战俘营中的群体关系进行调查。战俘营中的群体关系。洗脑敌方首先会攻击领袖，以此打击其余战俘的士气；继而挑选心理脆弱者实施精神压迫与意识形态改造。

3. 被指控者的性格结构。某些人因自我意识薄弱或潜在的神经质焦虑，注定更早屈服于精神压力。为公正评估个体，需实施智力测试与罗夏墨迹测验，并研究其家庭背景及宗教与意识形态根基。

4. 受洗脑者是否经过充分训练以承受审讯？战俘在训练期间接受了何种信息灌输？他是否充分了解意识形态战争及可能遭遇的言语攻势？其训练是否仅侧重纪律服从，抑或兼顾自由思考与非顺从性讨论？训练内容是否仅限于体能，还是包含心理层面的培养？

5. 酷刑的真相。囚犯多久才屈服？是否被注射药物？遭受多少隔离？审讯持续多少小时？是否出现疼痛和身体不适的症状？这些事实能否得到核实？

这仅是对需考虑观点的简要概述。它们旨在说明：当系统性洗脑与思想控制现象呈现在法庭时，司法层面便面临全新挑战。传统关于个人能力、责任与问责的认知框架已无法适用。

在洗脑成功的案例中，国家（敌对的极权体制）已接管甚至占据了心理责任。我们的刑事法庭与军事法庭必须制定新准则，以审判那些落入此类犯罪化体制之手的人。

第十六章

纪律教育或更高的道德教育

教育的角色

孩子的成长岁月先是在父母的引导下度过，继而由教师接手；他们共同塑造着孩子未来的言行举止。教育体系既可能强化也可能纠正父母的错误观念与行为方式，既能激发孩子追求自由与成熟的渴望，也可能扼杀其成长需求，将其扭曲为甘于永久幼稚与依赖的宿命。

自文艺复兴以来，普及学校教育的理想持续推进。但今日我们却不自觉地将思想塑造成预制模式，使学生误以为自己知晓或必须知晓所有答案。这种半吊子教育的谬误在于：所谓识字者——相较于文盲——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追随者，却沦为更差的思考者。例如极权主义者并非反对学校教育；恰恰相反，当你用事实过度压垮心灵时，它反而可能变得更被动。仅凭书本知识与学识渊博并不能塑造坚强人格，而我们对事实教育和测验式考试的痴迷，实则暗藏精神压迫。我们对学校知识积累的敬畏之情，可能抑制思维自主性。我们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体系施加的无形压力，及其对民主社会未来可能产生的危险影响。将人永久置于监督下的学生化策略，实为极权主义灌输的助力。例如某些行政管理者曾认为，反复的比较性考试能提升管理队伍素质。结果却滋生出对这种幼稚评估工具的恐惧——考试本身便成了令人焦虑的根源。如今几乎没有管理者敢于将现实视为衡量人类能力和耐力的最佳试金石。

那种推崇依赖性、过度控制儿童、通过惩罚和煽动罪恶感进行道德说教、过度夸大机械技能与机械化学习，这种教育模式将大脑揉捏成顺从的模式，极易被导向极权主义的轨道。在士兵的纪律训练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如此僵化的教育过度推崇良好行为；模仿与顺从被奉为圭臬，却牺牲了自发创造力、独立思考以及自由

表达和讨论异见的机会。我们对考试的痴迷迫使学生陷入机械思维的思维定式。我们的智力教育与所谓客观教育过度推崇理性主义和技术知识，误以为这能控制情感失误。但其真实效果恰恰相反——它将儿童训练成思维行为的自动模式，这种模式更接近巴甫洛夫学生们热衷的条件反射模式，而非民主教育应追求的自由探索式创造模式。

极权主义深谙青春期存在敏感阶段，此时建立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易如反掌。早教化在儿童心智中铸就近乎不可摧毁的模式，最终取代与生俱来的本能精准性。这种早期建立的生活条件反射自动化，本身可能发展出近乎本能的力量。这正是极权主义社会中真实发生的现象。独裁者尤其热衷于组织青年群体，强迫他们加入纪律严明的青年运动。

全民识字的悖论在于：它可能造就这样一群男女——正因这种新的以知识分子方式看待生活更易接受教师或领导者的灌输。我们需要受制于条件反射的能手，还是自由思考的学生？更甚者，我们的技术传播手段已与识字率同步发展。能识字的眼睛瞬间就被广告与宣传所俘获。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困境。

在许多小学里，学生们在强制性的规训氛围中接受教育，被灌输了一种依赖感和对权威的敬畏，这种心态将伴随他们一生。他们从未真正学会独立思考。这些学究式的知识工厂——学校——让许多学生忙得无暇思考；它们反而可能将学生培养成日益幼稚的个体。只要人们能相互引用他人观点或现成的“专家”意见，就被视为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许多学校推崇所谓“引用狂热”，将引经据典奉为智慧的终极体现。然而任何人只要能以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或援引权威论断佐证立场，便能轻易操控这类思维——它们极易被情感诱导的伪智力思潮所俘获。事实上，洗脑过程中审讯者正是利用受害者陷入困惑的心理——当对方发现自身事实依据存在矛盾、概念体系存在漏洞时，便会产生这种困惑。不懂辩论技巧者往往更早崩溃。

我习惯将知识分子分为量智者与质智者。前者追求知识数量，易受各类新观念塑造；质智者则视智力为人格品质，不被动接受事实，而经审慎权衡与验证。此类智力具有超越学校教育的潜在价值，而教育往往会扼杀它。

我经手过最惊人的案例之一，正是典型的量智者——一位刚完成大学学业的心理学博士，其毕业论文研究心理技术课题。他来找我是因为与女性交往屡屡失败，希望用医学手段治疗这种“阳痿”，起初更拒绝任何心理治疗，声称“那些理论我都懂”。交谈过程中逐渐显现，他的整个学业生涯都与自身脱节。他在学校拿过 A 等成绩，却完全错失了所学知识的精髓。他对心理学毫无实质理解，只是死记硬背却毫无领悟。他能逐页背诵教科书内容，却无法解释其中任何原理。每次他需要设计实验或提供实用建议时，都会陷入恐慌。经过多年的治疗，他才逐渐打破僵化的

强迫性习惯，终于能够像普通人那样思考感受，而非机械运作。治疗结束时，他开始重新学习，以贪婪而热切的态度阅读那些曾经空洞的事实。

但他并非我遇到的唯一行走的知识库。另一位患者是痴迷于囤积所有大学学位的青年。初遇时他已是纳粹组织成员。（这恰印证了学究往往与威权政治体系相投的现象。）即便在这个团体中，他因对事实的执着追寻——纯粹为事实而求索——也招致敌意。连极权主义的同伴都难以忍受他的强迫症。他患有妄想症且完全缺乏情感联结，这两点都表明精神病变正在发生。但他的智力能力完好无损。身为学者之子，他始终与父亲处于竞争状态；少年时便开始研读百科全书，后来在中小学时期，他因惊人的“知识储备”而备受赞誉。诚然，他确实掌握着事实，但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他既不懂如何与自己相处，也不懂如何与他人相处。

这两个案例揭示了机械化教育体系的弊端——它甚至未能察觉到最迫切的需求：情感关系与归属感，而将重点放在学习而非生活上，会培养出完全无法应对生活问题、自身仅半生不熟且完全无力应对现实挑战的成年人。这样的人无法成为优秀的民主公民。

精神自由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是通过培养洞察本质的能力与独立思考的习惯，为儿童迈向成熟的成年期铺路。存在着若干可激发独立思考潜能的领域——例如沟通艺术与抽象思维科学。当儿童开始觉察自身语言体系，审视日常用语时，便开启了自我认知之旅。

若干兴趣领域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例如沟通领域与抽象思维科学。当儿童意识到自身语言、自身使用的词汇是表达工具而非而非语法规则集合的认知，能激发其对其他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好奇心，进而培养抽象思维能力与关系理解力。儿童对外语最敏感的时期约在十岁左右——远早于我们通常教授外语的年龄。此时期儿童也开始对词汇和自我表达产生积极的个人兴趣。这种兴趣可被引导，使语言学习成为激动人心的探索之旅，而非刻板的死记硬背过程。

我们的学校还必须通过木工和设计等科目激发创造力和自主活动能力。运用具体物体的创造性游戏同样能发展儿童抽象思维和概括能力，使他们更容易掌握数学基础中的抽象概念。倘若我们不将孩子抛入日常算术练习中的抽象概念海洋，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步骤引导其理解抽象过程，孩子便能真正吸收并消化所学知识，而非机械复述所闻。例如，我们往往过早教授数学抽象概念的时机过早，正如我们教语言和语言表达又过于迟缓。

历史学科的精髓不在于死记硬背史实与年份，而在于通过互动讨论来学习。教学应从个人生命历程和个人历史的概念开始。与其要求孩子背诵历史事实，不如给他一份昨日历史的印刷报告，征求他的见解和评论；或者更进一步，让他去图书馆

或博物馆搜寻背景资料，以此激发独立思考。这样，学习历史就能成为一场探索之旅。

我们还应改革现行教育体系——它极易培养出墨守成规的平庸之辈。每个孩子都需要差异化的培养方式，他们各有内在的时间表，终将经历独特的人生调整。为何我们对子女强加的束缚，却从不施加于花园里的花草？每株植物都应被允许长成自然的模样。当前的教学实践虽能激发少数孩子的雄心，却扼杀了其他孩子的志向。与其强行灌输僵化的考试规则来防范作弊，为何不允许孩子们在解决共同问题时互相帮助？孩子们常常能教给彼此老师无法传授的知识。

试想那些对当代学校枯燥氛围尤为敏感的孩子。他们要么沦为应声虫——满分成绩却毫无原创思想——要么成为叛逆者——既可能成为当下儿童心理诊所的常客，也可能在未来走向极权主义的深渊。

纪律与精神

良好的士气意味着内在力量与自律，但未必等同于政治或军事意义上的集体纪律。二战期间，地下运动的成功参与者必须具备个人士气与脊梁骨这两项资质。游击队员们秘密行动——时隐时现——在孤军奋战中，他们对个人主动性和士气的依赖，不亚于甚至超过对遥远领导层的纪律要求。这与某种由盲目恐惧驱动、远距离维系的待命士气截然相反——后者常见于监狱、集中营，或极端强调集体参与的部落。前者群体存在无纪律的士气，后者则有无士气的纪律。同理，某些军官也只能培养出缺乏士气的纪律。

然而纪律与士气通常存在内在关联。唯有对青少年或士兵实施一定程度的初始纪律训练，才能使其具备良好条件，使个人内在力量建立在个人自信心、对整个群体的信任以及对权威的信心。紧急纪律通常在压力时期因时间紧迫而启用，导致缺乏足够时间进行自我控制和群体适应。唯有通过自我选择、循序渐进形成的纪律，才能为内在自由与精神力量奠定基础。这条法则已被许多教育者遗忘。唯有这种最初的条件反射模式，才能赋予我们独立自主的信心。

我们最初都是通过内化吸收他人——父母与教育者。个人道德观的根基源于我们从他们身上内化的东西。纪律与自由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始于摇篮时期，在充满爱意、关注且持之以恒的父母照料下萌芽。父母是道德观的最初奠基者。群体中纪律与道德的冲突通常源于成员被强制或必要性所维系。此时的内在凝聚力，与成员自发忠诚于群体的状态截然不同。所有纪律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个体更好地适应

群体。而成功融入群体的过程，反过来又会强化自我意识。自由的萌芽，正始于此。

深入理解这些士气建设原则，对评估不同文化群体的内在韧性或脆弱性至关重要。根据心理治疗经验，我们可预见：过度纪律甚至奴役盛行的群体，其内在凝聚力将与尊重个体、珍视个性的群体截然不同。然而我们发现，即便在极权体制的军队中，仍存在展现高昂士气的典范。我忆起那些日本士兵——战后与祖国断绝联系后，仍孤身坚守岗位数年，仿佛天皇与将军们仍在注视着他们。这昭示着他们在生命最初六年所获得的恒久关爱、安全感与奉献精神。

纪律与洗脑

当我们训练士兵抵御洗脑时，必须赋予他们对抗群体暗示的解药。要教导他们独立思考、质疑教官的指导。必须培养其负面暗示能力，强调勇于拒绝那些看似悦耳却缺乏真实性的说辞。最重要的是，需反复进行这类训练，将新兵锤炼成自信的个体。面对每日铺天盖地的暗示攻势，我们必须激发个体的批判精神。所有这些训练都需在让士兵理解洗脑概念及其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如此，他将潜移默化地学会辨别何为宣传、何为非宣传——正如我们听广播广告时不自觉做到的那样。心理经验告诉我们，某些宣传暗示即便在警觉的心理防线下仍会渗透并影响我们的观点。反洗脑训练必须彻底且反复进行。这看似与严苛纪律相悖；但当教官和军官充分掌握该领域知识时，学员通过认同领导军官反而会增强自尊。诚然，这改变了纪律关系，却为自由民主社会提供了检验纪律的真实试金石。当挑战时刻来临，受过自尊教育与知识熏陶的人必将坚守到底。

武器战争向思想冷战的转变，要求纪律形态随之革新。士兵不仅要精通步枪操作，更需深刻理解自身使命的意义与敌人的荒谬本质。

集体素质与领导者影响力

在任何群体情境中，士气皆指成员凝聚力所获得的力量大小以及对团体成员对其目标的忠诚度。士气可能包含对目标的理解，也可能不包含。在西方文化中，其微妙的利弊权衡暗示着对目标的认知、理解和考量存在更深层次的需求，这种需求远超极权国家的要求。

在崇拜强人领袖的极权国家中，当独裁者或领导集团失势时，凝聚力的崩解将

产生远超民主社会的瓦解效应——后者成员通常具备更高程度的自主决策能力与治理技巧。民主社会总能涌现新领袖承担责任。

士气关乎民众身心承受力的极限与持久度。不同管制模式下，这种承受力的边界各异。基于恐惧的待命士气（如监狱环境），可能因领导者或看守的微弱动摇而崩溃，或当个体尚未接受充分规训时便土崩瓦解。

神风特攻队——这些受过自杀训练的飞行员——被彻底灌输了自我奉献的意识形态；正如对日战争所展现的，他们的士气可谓高昂——具有东方特有的意味。在这里，纪律与忠诚已然成为本能，以致于生命对个人或集体都变得毫无价值。唯一的念头就是持续前进并击败敌人。此类士气往往依赖于追求国家目标时所激发的狂热绝望——一种集体自杀式的狂怒。

我们日益认识到领导力对鼓舞士气的重要性。领袖是珍贵人际关系的化身，我们愿为之奉献精力，必要时甚至献出生命。通过认同领袖，我们借得其坚毅。提振士气者未必是官方领导，有时一名军士或士兵也能承担此职。

官方领导者本人处境更为艰难。他必须兼具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特质：既要代表父权权威，又要体现我们的自我、良知与理想；既要消除我们的罪恶感与焦虑，又要满足我们对力量、情感和奉献的需求——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即我们的移情需求。他既要激发集体行动与动力，又要提升个体自尊。他的疑虑可能成为我们的疑虑；他丧失信心时，我们亦会失去自信。有时我们渴望他成为暴君，好让我们摆脱个人怨恨与责任。有时我们如对抗父亲般与之较劲，有时又渴求他的关怀。领袖既是替罪羊，亦是巨人。我们的内在力量将随领袖鼓舞人心的引导而成长。纵使永永难以全然爱他，我们仍会借由他来提升或消磨自己的士气。

然而个体不仅从群体及其领袖处汲取力量，也向群体注入自身的精神。即便当他被当作替罪羊来宣泄群体敌意时，若能以幽默和哲思应对，反而可能无意间提升群体的士气。他仿佛在向他人传递个人包容力。排里的黑羊往往像备受爱戴的体育英雄一样被接纳。

同样地，群体也会向个体传递各种情绪；士气传染的过程持续不断。其质量取决于相互接纳、友谊、群体中恐惧的传染程度、人际互动的质量、少数人引发抵抗的特质等等。

切莫忘记：提升他人士气的最佳方式，正是为自己注入力量。当人际接触受阻时，士气便迅速消沉。例如，多位逃离铁幕的人士曾坦言，极权体制下最令他们痛苦的正是精神孤立感。个体感到孤独且时刻戒备，彼此间唯有猜疑。对这些逃亡者而言，民主群体中体验到的真诚接纳与互动堪称新福音——这里存在着发自内心的热情与相互接纳，即便存在分歧亦是如此。

影响群体士气的若干因素

下列因素主要源于军事经验可能危及士气：

1. 错误预判危险；关于敌人的幻觉与谣言。严重压力；战斗疲劳。
2. 身心健康恶化（流感！）。
4. 饥饿、睡眠不足；严寒与污秽。
5. 领导不力。
6. 训练不足；技能匮乏；过度训练。
7. 沟通不畅与情报匮乏。
8. 基本价值观崩坏，信仰缺失。
9. 行动混乱、政治纷争、政府选拔失误。
10. 专制与反民主行为；屈辱感。
11. 暴政；纪律过于严苛，亦或纪律涣散。
12. 思乡病与疏离感。
13. 内部敌意、偏见、迫害少数群体。
14. 思想控制与精神摧残；丧失个体权利、正义缺失、上诉无门。
15. 社会环境中功能缺失，责任缺位。
16. 酒精与镇静剂滥用。

而以下因素可能提升士气：

1. 健全的民主领导。
2. 规划周密且允许灵活应变的组织架构；最低限度的官僚主义。
3. 民主自律。我们是否信任自身制度？
4. 信息畅通，沟通无阻。
5. 宗教自由；道德操守。
6. 相互忠诚与成熟责任感；团队精神。
7. 头脑清醒；对当代重大问题的深刻认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8. 归属感与被接纳感。正义感、自由感与隐私感。
9. 对随时准备提供急救的专家的信任（心理卫生专家、神职人员、红十字会、民防组织、医疗急救）。

临界点与挫折承受力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这是个人士气问题中的关键问题。二战期间，我曾治疗过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虽不惧危险的飞行任务，却因人际关系困扰而痛苦。某次伦敦空袭警报期间，他正在休假，突然陷入彻底的恐慌。日常生活中他本是个内向羞怯的青年。当发现自己身处避难所，周围尽是惊惶的人群时，他竟被他人恐惧所感染。突如其来的异样情境令他猝不及防，最终崩溃。提及此事，旨在再次说明战俘营氛围具有何等传染性。

无人能预知危难时刻的真实反应，唯有直面考验方能见分晓。现实的试炼总有不同答案：有人勇于接纳挑战，某些过度防御的强迫型人格甚至欣然拥抱危险，而那些本就心智不稳者，则会借新处境作为借口崩溃并释放情绪。西格尔将最后一类人称为受挫的大人物、隐居者、受骗者、胆怯的孩子、渴求赞美的自恋者——他们都拥有容易被奉承者抬举的自尊心。

心理学界已知精神崩溃由两类决定因素引发：一类是长期因素，导致内在防御机制逐渐瓦解；另一类是短期因素，即触发或诱发因素，造成身心整合的突然崩溃。前者可能包括慢性疾病或生活中诸多长期刺激；后者则通过对潜在敏感性的突然象征性冲击而起作用。一只出现在女生教室的老鼠之所以引发恐慌，并非源于其客观危险性。现代精神病理学研究发现，早期生活中经历的多种致敏事件，会使人产生未知诱因反应。

然而，创伤与挫折在人格发展中的弱化作用常被过度强调。事实上恰恰相反——挑战与抗拒不利影响的过程才塑造了人格。为发展更强大的内在力量与更完善的自我防御机制，个体必须主动暴露并承受创伤。所谓“公平”体育与“公平”竞争，不正是反复进行的意志力训练吗？体能训练不必“温和”。我们在体育活动中无意识经历的试错式自我创伤，实则是自发追求自律的体现。当个体无法从自身汲取力量时，便不得不向邻人借力，寻求代理力量。过度强调依赖或领导力只会强化这种代理机制。领导力并非士气的唯一秘诀。认同领袖有时能强化内在力量，却也可能削弱个体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令人沮丧的领袖会降低我们承受挫折的能力。

生活在过于安逸的环境中或许会削弱人的意志；近期一项关于男性在战斗压力下表现的研究（里希特），以及后续对实验室老鼠的实验均证实：奢华环境普遍会削弱人的承受能力。

在某个层面上，良好的士气意味着不再畏惧死亡；意味着化解那种将死亡视为黑暗而晦涩之物的迷信焦虑；意味着甘愿接受命运。接受命运、职责与责任，意味

着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带着道德勇气捍卫你毕生积淀的道德准则——没有这些准则，生命便失去价值。

对厄运的预期可能产生瘫痪效应。若预判人们会崩溃，他们要么更易屈从于那些伪先知，要么因愤懑而斗志昂扬。新闻媒体、广播电视必须意识到自身作为影响士气的媒介所肩负的微妙责任。

必须认识到，当精神先知自身感到惶惶不安时，他们往往会预料他人产生更多恐慌。上场战争中曾出现许多耸人听闻的恐慌预言，所幸并未成真——例如敦刻尔克战役。人类的精神韧性常远超我们的预期。在所有动物中，人类承受痛苦的能力最强，应对危险的本领最优——前提是他们不因迷信超自然恐怖故事而削弱自身，也不在冷战中丧失胆魄。

第十七章

从旧勇气到新勇气

谁能坚持更久？为何？

那么，究竟是什么赋予人类抵御精神摧残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让成千上万的人得以在纳粹集中营和共产主义战俘营的恐怖中身心俱存？

答案其实很简单。人们之所以屈服，主要是因为在某个时刻，他们被潜意识的冲突所压倒。这些冲突在正常情况下受到控制，但在精神压力的重压下便会浮出水面。内在冲突越强烈、压力越大，屈服的倾向就越显著。当这些冲突不易被激起或已被内在克服时，人们便能承受压力。

这个简单的答案本身蕴含着临床悖论。严重神经症及某些病理性人格结构的特征之一在于：无意识冲突如此激烈，要么被压抑至患者甚至模糊意识不到其存在，要么转化为一套更易被个体接受、因而更易应对的显性态度。若重度神经症患者允许自己感知真实冲突，这些冲突将彻底主宰其生活；因此他们会竭力压制这爆炸性物质。那些始终叛逆、从未能将健康叛逆转化为成熟的人，可能已将人格中某些基本而深刻的冲突转化为对任何社会要求的慢性抵抗。对朝鲜战争归国战俘的精神病学检查表明，那些最强烈抵制敌方宣传的士兵，往往是终生反抗所有权威者——从父母到教师再到军官。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是惹事生非者，在朋友和敌人中间皆是如此（塞格尔）。

这枚硬币的阴暗面仅是冰山一角。一个具备深刻自我认知的人，既能觉察内心冲突，又能洞悉敌人的意图，方能做好准备——迎击并抵抗这场攻击。我审讯过许多经历过纳粹监狱和集中营酷刑的人。其中有些是毫无政治背景和普通百姓，有些是抵抗组织的成员，还有少数是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那些了解自我、愿意接受危险与挑战、甚至隐约意识到人类可能变得多么野蛮的人，才能承受集中营的残

酷折磨。他们没有被自己天真的困惑和对自我及他人的无知所击垮，而是凭借知识和探究性的警觉性获得了保护。

其他因素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的研究让我深刻认识到：那些能在极限环境中保持抵抗力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孤立无援。只要他们能想起家中的亲人，只要怀揣重逢的期待，只要确信家人始终忠诚守候，就能维持生命力，阻止潜意识的屈服冲动主宰人生。我们心中积蓄的爱与温情，是支撑坚韧的最大动力。它不仅为生命指引方向，更赋予我们内在的信念与价值感，使我们得以驾驭那些自我毁灭的内心冲突。

这种爱与被爱的认知不仅限于亲友之爱。那些将宗教信仰或政治信念视为根深蒂固、鲜活存在的人们，同样拥有归属感、被需要感与被爱感。他们的忠诚对象是整个群体或一套理想体系，而非个体人物。对这类人而言，信念是真实而具体的，如同活生生的人或实物般真实具体。它们构筑起抵御孤独、恐惧、潜意识幻象以及深层冲突爆发的心灵堡垒，其坚固程度不亚于爱的记忆。然而在充满冲突的社会中，这类精神坚韧者实属少数。

经验表明，强壮的运动员在集中营或战俘营的煎熬中，其承受力并不比体弱者更强。单凭智力也无法真正抵御意志遭受的日常侵蚀。相反，它反而可能为屈服提供合理的借口。精神脊梁与道德勇气比智力更深沉。坚韧并非某种身体或智力特质，而是源自摇篮的馈赠——来自父母行为的一贯性，来自他们的信念与信仰。在这个价值观动荡、信仰匮乏的世界里，它正变得愈发稀缺。

勇气的幻觉

在力量与勇气的辉煌神话中，存在着令我们困惑的某些东西。人们常常将身体力量与精神力量混为一谈。诚然，在战场上，勇敢与英雄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品质。然而对作战士兵的分析表明，每个人都必须持续与自身的恐惧作斗争。真正的勇士是那些能抑制恐惧之人，能应对恐惧催生的瘫痪性幻想之人，能控制退缩至幼稚逃避倾向之人。英雄无法被强迫诞生，惩罚未能成为英雄者实属荒谬——这如同因流血或昏厥而惩罚他人般毫无意义。

为他人赴死的英雄，更多存在于神话而非现实。心理学与人类学揭示，英雄神话与永恒的梦境意象相连。英雄象征着叛逆的新生代，象征着强大的儿子超越父亲。他同样象征着我们渴望成熟、渴望亲手承担责任的愿望。

我们需要神话带来的启迪。我们以追封的荣光纪念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战友

或社会献身的少数英雄壮举。然而，我们对他们的真实动机究竟知晓多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为许多士兵提供精神治疗。在与他们交谈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日益意识到给任何人简单贴上“英雄”或“懦夫”标签是多么危险。例如，我的一个病人是个少年，他因坚守阵地而获得高级军事勋章因坚守孤立阵地持机枪自动射击直至敌军被迫撤退而获得。在整个过程中在接受治疗时，男孩坦白道，他看似英勇的行为实则是瘫痪性恐惧的结果——正是这种恐惧使他无法遵从指挥官撤退的命令。

无人能预知危难时刻的真实反应。每个人都会以独特方式应对现实抛出的惊悚考验：有人勇于接受挑战挺身而出，某些过度防御、强迫症倾向者甚至会视此重担为力量试金石。而另一些人——其内心动荡的根源深植于过往——则会无意识地借危局彻底崩溃，任泪水与情绪奔涌而出。

弗洛伊德曾指出外部危险与内部危险、骇人的现实与同等骇人的幻想之间奇特的互动关系。客观可识别的危险常能激发心灵警觉，促使内心筑起防御。但主观的恐慌制造者同样存在——挫败感、罪恶感、童年恐怖幻想——其效应往往足以摧毁所有文化防御机制。许多面对现实考验时展现刚毅勇气的男子汉，却可能因看似微不足道的琐事触及脆弱神经而崩溃。

我之前提到的另一位战时患者就呈现出这种模式。这位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曾执行过四十次战斗任务，从未显露丝毫恐惧或惊慌，却在伦敦某防空洞里突然彻底崩溃。治疗过程中逐渐明晰的是，这位年轻人因个人关系问题深陷痛苦。他与指挥官关系恶劣；崩溃前夜刚与女友发生激烈争吵。这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人，当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惊恐的避难者之中时，便被周围弥漫的恐惧所感染。近期遭遇的不幸削弱了他的心理防线，使他完全无法建立起在残酷战争中屡试不爽的内心防御机制。

难道我们该说他不如那位屡获殊荣的机枪手更像英雄吗？

我们内心深处仍存敬佩——敬佩那种夸张的勇气表演，敬佩那种视死如归的冒险姿态。毁灭的狂妄姿态。如今我们开始认识到真正的勇气截然不同：它既是对生命的信念，亦是对死亡的坦然。勇气无法由外力强加于人，它必须源自内心深处。

在现代战争的现实中——这个冷酷无情的摩洛神——人很容易陷入无助与依赖的境地。在白刃搏杀中，个人勇气或许能扭转战局，但面对炸弹与机枪，个人勇气毫无用武之地。如今，我们曾歌颂的鲁莽勇气，已不如个人士气、信念、决心、知识与充分准备重要。

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应征入伍。他的一生都在德克萨斯州的小镇度过。他接受了军队日常训练和武器操作训练。不久后被派往朝鲜战场，几乎立刻就沦为战俘。

如今这孩子不得不抵御训练有素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每日向他倾泻的宣传攻势。他的教育有限，背景狭隘，政治训练不足。他甚至试图逃离战俘营却被抓获。结果，敌人的精神控制愈发牢固。巨大的失望使他感到身陷囹圄。最终他选择投降并成为叛徒。军事法庭怎能因他最终屈服于敌方宣传而追究其责任，甚至予以惩罚？

这正是克劳德·巴切勒下士的故事片段——他因通敌行为刚被判处二十年监禁。我敢断言，这本可能是任何背景相似的美国青年遭遇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多个欧洲国家面临棘手难题：如何处置那些在纳粹酷刑下供认不讳、出卖同胞的地下抵抗成员。荷兰为此设立荣誉法庭审理此类特殊案件，该法庭得出如下结论：

无人能断言自己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认罪”、“合作”或“出卖”祖国。凡未亲历过共产主义者与纳粹精心构筑的地狱之人，皆无权评判经历过此劫者的行为。

在许多情况下，心理折磨比肉体折磨更有效力。对那些智力水平超过普通大众的受害者更是如此。似乎正是智慧使身体折磨更易承受，却也使其更易受精神折磨的侵蚀。任何人在此情境下向敌人“屈服”——即便此前已证明其忠诚、爱国与勇气——都将承受巨大痛苦，因为自我谴责永远比任何法官的判决更为严苛。

然而，这绝非可耻之事，更不应因此否定其领导能力。相反，比起局外人，他更清楚抵抗精神折磨需要何等超凡的意志力，也更能帮助他人尽可能做好承受磨难的准备（摘自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荷兰荣誉法庭主席 G·范·赫文·戈德哈特于 1954 年 3 月 15 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信函）。

鼓舞士气的理念

当我们审视人类在极端紧迫境遇中的种种行为时，既能看到人何其容易被征服，同时也发现某些因素似乎能对人的士气产生积极影响，使其免于绝望与崩溃。当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时，精神便得以复苏，人们便能在危难处境中保持正直地活下去。此类鼓舞士气的因素不胜枚举——宗教信仰或政治理念皆属其列。其中最有效的或许是肩负使命与内心目标的信念。这种个人认同的理想可以是热爱故土、追求自由正义，甚至包含仇恨与复仇的念头。无论具体形态如何，在灾难降临的时刻，指引方向的信念与肉体力量和耐力同样不可或缺。所有案例中当个体学会在匮乏、困苦与暴虐环境中抵御危险并保持基本精神状态时，必然存在一种或多种提振士气的因素。

我并不认为内心追求提振士气的再生性理念是心灵的有意识功能。这种心理再生与我们观察到的身体再生过程相仿。身体几乎从未放弃其再生能力。即便癌症患者临终之际，手术创口仍会愈合，局部再生力量依然存在。同样的机制似乎也作用于精神层面：在混乱、压力与疲惫的时刻，人类的心理自愈与再生力量始终在运作。这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群体——尽管在群体中，由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抑制力量始终存在。

我对极端危险环境中幸存者的观察表明：经历最初的茫然后，个体很快会产生一种内在需求，可称之为“心理预算”。他们均显现出可观察的临床症状，表明这种重建自我抗争力的过程正在进行。例如当他们初抵战俘营时，表现出完全的被动、屈服和人格消解，但很快一种指导性思想便开始萌芽——源于他们理解命运的渴望，源于寻求庇护的相互交流与对某种共同信念的依附，源于为自我构筑某种归属的迫切。这种积极的情绪转变可从每个囚犯对角落的改造中窥见——即便只是肮脏的木板铺，他们仍将其打造成安全港湾。他们开始整理稀少的物品，筑起自己的巢穴，并由此向外凝望那凄凉的边缘世界。

当劳改营囚徒遇见比自己更坚韧的信仰者与意志者，生活便变得可忍受。仅凭与他人的相伴，他就能更好地直面外界的恐怖。相互的热爱与共同的憎恨，皆能同样激发斗志。重获的人际联结将他与生俱来的恐惧转化为对至少一个人的信任。当这种信任演变为对某个积极行动团队的认同时，暂时的内心力量丧失便烟消云散。若未能找到这样的群体或人格标杆，狱卒及其异国意识形态便可能占据上风。

必须指出，这种激励士气的思想几乎总是道德理念，一种伦理评价——对善良、正义、自由、和平与未来和谐的信念。即便是最愤世嫉俗的独裁者，也需要借助道德理念来鼓舞臣民的士气。若他无法在财富前景之外，至少给予民众和平与自由的幻觉，这些人终将沦为麻木不仁的追随者。纳粹集中营入口处悬挂着巨型标语，刻着冷酷的口号：“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这或许骗不了囚徒，却为营外德国民众提供了为非人行径开脱的借口。连最残暴的暴君都渴求道德正当性，恰恰证明道德理念在人类心中根深蒂固。人越是生活在在边缘性与折磨性的处境中，人对支持性道德价值观及其激励作用的需求就越强烈。

概括而言，有三种力量能使难以承受之事变得可承受。首先，必须怀有信念——这可以是对宗教或伦理价值的单纯信仰，对人性的信任，对自身社会稳定性的信心，或是对个人目标的坚守。其次，受害者必须感受到：尽管灾难降临使他沦为弃儿，这世上仍有需要他、渴望他存在的地方。第三，必须具备理解力——不是高深的书本知识，而是对敌方动机及其迷妄驱力的简单甚至直觉性的心理洞察。那些无法理解、陷入困惑的人往往最先崩溃。

反洗脑训练必须极其彻底。确实，人们能建立内在防御机制来抵御思想控制和日常的暗示轰炸。通过优质且反复的指导，人们可熟悉相关概念，进而建立感知防御：学会识别虚假宣传并拒绝倾听。即便部分宣传暗示能渗透感知防线悄然渗入我们的观点（所有广告都基于这种渗透），但必须强调：彻底了解敌人的手段能赋予我们更强大的抵抗力量。

几位心理学家曾向我讲述，在纳粹集中营的恐怖环境中，正是他们的科学知识支撑着他们。这使他们获得超然视角，得以从更远的距离审视自身苦难。正是这种探究精神的哲学态度，强化了他们的内在力量。

然而，那些经受住共产主义洗脑过程而未被击垮的故事寥寥无几。西班牙人埃尔·坎佩西诺便是其中一位坚韧不拔的革命者，他成功挺过了洗脑（冈萨雷斯与戈尔金著）。他深谙极权主义者的伎俩。也可能当局认为他不足挂齿，不值得耗费过多精力——毕竟随时可将他送进集中营任其消亡。

必须重申：集中营中任何非法团体组织——无论多么危险——都会立即赋予个体一种被保护的感受。那些拒绝合作、拒绝加入团体而独自行动的抵抗者，大多最终陷入绝望与失败。背叛战友者通常经历了漫长的孤立期，这种孤立未必是强制施加的，往往源于其自身特有的性格结构。

维系自由精神与归属感，人际间的信任纽带比面包更重要。二战期间，反纳粹地下组织靠自由英格兰的每日广播新闻维持生存。时至今日，仍有身陷奴役与苦难的人们，依靠我们传递的寥寥通讯支撑生命。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播送下，极权主义笼罩下的国家得以获得巨大的精神鼓舞。

在现今对抗洗脑的斗争中，对囚犯可能遭遇的状况进行明智的准备，以及对敌方战术的简单理解，是最有效的帮助。首先，这将瓦解敌人的政治策略；无人会相信其欺骗性的指控。其次，洗脑受害者将不再陷入突遭陌生处境时的瘫痪性茫然。或许我们还应建议遭受胁迫的士兵主动多作供述，以此迷惑审讯者，将敌人的混乱、谎言与欺骗策略反制于己，使其陷入挫败境地。此建议亦为美国海军少将D·V·加利利所提出（《星期六晚邮报》，1955年1月22日）。当精神灭绝的受害者采取此类行动时，审讯者常会哀求他们恢复理智；施虐者自身反而被受害者伪装的疯狂所扰乱。最关键的是让受害者确信：外界知晓并理解其遭遇，后方战线清楚他的孤身抗争与受难。

倘若他终究屈服，也应当明白他人理解他无法为自身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他的大脑渴望抵抗，他的意志欲说不言，但最终全身机能都背叛了他。这是一种诡异而奇特的体验——清醒意识到自己违背意志，丧失了精神行动的自由。当压力足够巨大时，大多数人都可能经历这种体验。

洗脑的影响是否仅是暂时的？年轻人思想仍易被塑造成永久思维模式，而成年人思维模式已由自由教育所塑造，两者存在差异。对成熟个体而言，洗脑不过是人为制造的噩梦，一旦重返自由之地便能摆脱。对某些人而言，它或许会留下抑郁与屈辱的持久创伤，但在自由氛围中，这种魔咒终将逐渐消散。

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那些在纳粹恐怖统治下迷失方向的抵抗运动成员，迫使精神病学家面对一个新课题——暂时性人格改变。显然，监狱和集中营的恐怖不仅使少数人沦为温顺的帮凶，更使他们历经磨难后沦为迷失的灵魂——满怀罪恶感与悔恨，无法以合格公民的身份面对自我。即便特别法庭给予的官方责任豁免，也并非总能修复他们的自尊。在接纳自我之前，他们必须经历漫长而艰难的心理过程，逐步化解那场噩梦般的精神混乱。在心理治疗中，部分患者不得不重新唤起并亲历那些曾遭受的恐怖：最初抵抗审讯者精神轰炸的挣扎，意志逐渐瘫痪的过程，直至最终的屈服。这是内疚感与自我重申愿望之间微妙的内心博弈。情绪爆发之后，他们常萌生以自杀作为逃避耻辱的最终出路。在他们宣泄完积压的情绪后，治疗师成功说服他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身心承受力的极限。从此，他们得以作为兼具积极与消极特质的独立个体自由表达自我。

在一名青年案例中，他经纳粹彻底洗脑后在集中营度过多年，康复过程历时近两年。受害者最终未留心理创伤，反而因这段苦难经历而变得更加强大。

我深信，对于那些在极权监狱中被长期政治洗脑的囚犯，宣泄式心理治疗能帮助他们重新找回本真自我。威胁与激烈的争论只会延续看守者曾施加的强制洗脑手段。正如众多极权体制前囚徒的案例所证实，与自由民主世界的日常接触与交流才是最佳疗法。自由的空气才是他们最好的疗愈良方！

对于数百万自襁褓起就被塞进思维自动化框架的孩子们而言，自由的选择根本不存在。他们眼中没有其他世界，没有其他信仰；唯有吞噬一切的极权魔鬼，为其效劳的任何手段和行为都理所当然。

洗脑者天真地以为，强行改造思想——将资本主义囚徒变成共产主义宣传员——能永久奏效。但当囚徒重返正常环境后的最初几周，他仍会说出被“教导”的语言，背诵指定台词，但随后——往往突然而意外地——旧我便会复苏。若受害者有机会探究共产主义宣传与指控的真相，这整场人为制造的噩梦便会土崩瓦解。正因如此，狱卒们从不一次性释放所有“皈依者”。必须留几人作为人质，以确保获释者不会揭露整个阴谋，从而危及狱中同伙。那些回家后说出真相的人会感到内疚，因为他们的揭露可能使人质遭受更残酷的折磨。

我一直着迷于一种能催生勇气与坚韧的独特性格特质。在探讨时间问题的著作中，我将其称为“连续性意识”——即对自身经历具有延续性的觉知。如今我们

不仅被过去的经历所束缚，更被对未来的想象与幻想所桎梏。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接受现实发生的世界，却从不追问这一切为何发生、为之何为。那些谋划未来者被讥讽为乌托邦主义者，仿佛乌托邦的构想从未源于人类的渴望。我们的祖先坚信未来——基督的降临、救世主的到来、上帝之国的降临。他们期待并为更美好的时代而奋斗。集中营里那些坚信未来的人们，那些怀揣计划的人们，那些能将眼前灾难视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微小组带的人们，更能承受暂时的苦难。

我有幸结识过这样的人，他们属于少数坚韧不拔的群体，能够超越被动生存的状态，不必依赖他人力量。在纳粹集中营的极端压力下，他们依然能够勇敢地生活。他们将集中营和迫害视为对心灵的挑战。肉体之痛无法撼动他们。非同寻常的环境反而激发了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超越了环境的桎梏。这些人的意志力激励着他人，他们通过坚强他人、帮助他人来维系生命。他们秉持斯宾诺莎式的“命运之爱”——即对命运的接纳与热爱。他们用生命证明：精神的力量可以超越肉体。

新勇气

哲学与心理学让我们意识到新的挑战与新的勇气。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便认为，勇气是一种精神力量，远超肉体搏杀的胆识。战士可以嚣张跋扈、视死如归，却未必勇敢。他的鲁莽或许只是集体冲动催生的自杀式鲁莽。这或许是我们内心未觉醒的原始婴儿所展现的惊慌勇气。

另有一种精神勇气，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它为理念而生，不仅追问生命的代价，更追问代价的意义所在。它要求对自我作为思考精神实体的超意识觉醒。

精神勇气获得推崇实属近世之事。苏格拉底的理念历经漫长岁月才渗透进我们的思维。直到宗教改革之后，孤独斗士的英勇抗争才获得价值认同。勇敢捍卫异见——即便面对多数意见的压力——也染上了英雄色彩，尤其在非正统思想与异端被严禁的时代。甘地那场静默而顽强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如今被视为比士兵投身战火狂热更具勇气。精神勇气不会出现在盲从者、鼓吹统一者或呼吁社会顺从者之中。它需要持续的精神警觉与内在力量，才能抵御顺从思想的惰性洪流。人必须超越单纯的自我保护与自我主张的意志；必须能为崇高理念超越自我，更需在发现更高价值时坦然承认自身谬误。

确实存在超越本能反应的精神勇气。人不仅是群体中的一粒沙、一块可塑的泥团，更是独立的个体。他敢于直面人类群体，正如他直面整个世界——以思考者的姿态。清醒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是孤独的探索与价值的较量。这种勇气敢于

打破陈规、禁忌与偏见，敢于质疑教条。思想的英雄不屑于号角齐鸣、煽情表演、狂热与荣耀的伪勇气；这些真正的勇士在内心深处与僵化、怯懦抗争，拒绝为安逸出卖信念。这种勇气如同当众人沉溺于睡眠与遗忘时，依然保持清醒。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利用人的内心怯懦进行胁迫——以虚荣、接纳、英雄崇拜、荣誉与认可为诱饵，迫使人们出卖最深层的信念。而真正的英雄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

唯有当人们学会承担个人责任，众人的合力才能造福世界。莫盲从导师，莫仅认同领袖，若选择追随，须在充分认知自身责任的前提下接受引领。这种精神上的英雄主义，唯有当你掌控情绪、驾驭攻击性时方能实现。

新英雄的卓越不在于肌肉或攻击性力量，而在于品格、智慧与精神境界。

对勇气的深刻认知，将颠覆世人对其崇高魅力的普遍想象。心理学的洞见催生出崭新的勇气形态，它要求的是耗尽心力的思考劳动，而非轻率鲁莽的轻松之举。

我别无选择，只能拥抱这种持久的生命勇气——它不再承载自杀与衰亡的魔性诱惑。真正的勇气应当是对生命律动鲜活的信仰，是清醒的觉知，更是审慎的思量。

这般勇气接纳生命奥秘背后的巨大恐惧，并敢于与之共生。

纳粹深知受害者中存在着不可弯折的英雄，他们的面容无法被扭曲，思想无法被胁迫。他们将这些人的沉着与顽强意志称为“面相叛逆”，一旦发现便试图立即处决。所幸狱卒们在辨识精神伟力时存在诸多盲区。

战争结束后，这些英雄大多在完成使命后悄然隐入人群，将领导权交给了更精明的政治家。

第十八章

自由——我们精神的脊梁

极权国家不断驱逐人的私人意见与信念。对警察国家而言，思考即行动。试探性行动所体现的内在行动准备——即思想——不被接纳。与生俱来的怀疑以及思想适应过程中的磨难皆遭否定。滋生破坏性思想是瓦解社群的途径之一；而对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不信任更为危险——自然的破坏性欲望被压抑至心灵的失控领域，反而更易爆发为行动。然而破坏性思想的言语表达往往能部分征服该思想，削弱其威力。此处恰是真正的悖论所在！谴责反社会思想——尚未付诸行动的思想——反而会引发爆炸性行动的短路！

任何逻辑推演都可能暗藏危险：宗教裁判所的谋杀曾以崇高理想之名行凶。若我们不敢赌上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自由与和平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道德文化始于个体，终于个体。唯有崇尚个人自由、个人所有权和个人创造力，才能使人甘愿抑制本能欲望，压制破坏性冲动。人不仅是社会性动物。在远离人群喧嚣的某处，他必须直面自我，与上帝和自然对话。为了成长，他需要静谧、孤独与寂静。除机械装置与机器外，他需要回归自然，独自在户外露营。人生某个阶段，他必须亲手打造工具——成为制鞋匠、医者或教师。若未曾经历独处与孤独，人便会萎缩，在汹涌的人际洪流与胁迫的可能性海洋中迷失方向。

心理学民主化行动

我对心理理解力量最深的信念，源于与一名纳粹占领荷兰期间，一位极权组织成员前来寻求心理咨询。我深知必须避免与他讨论政治——彼时言论自由可能招致严惩，若我提及任何“可疑”内容，患者定会举报我。

然而，当我以被动倾听的疗法缓解其内心压力后，这位患者逐渐展现出人性光辉。他开始珍视个体人格本身，有时甚至对纳粹践踏生命尊严的行径提出尖锐批判。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与极权主义政治圈的朋友划清界限。这确实需要勇气——尤其在当时，从合作转向非主流立场往往会被视为叛国罪。在他最后几次就诊时（我们最终认定他已康复），我们谈及对个体尊严的共同信念，以及对成熟成年人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坚定信任。

心理学是否真能对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精神产生民主化影响？我刚才引用的案例似乎表明确实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戈培尔的宣传机器运用心理原则催眠德国民众使其屈服。希特勒同样部署心理炮火，在欧洲各地散播恐慌。

在纳粹德国，所有精神分析治疗都由心理学界的元首——戈林的兄弟掌控。无疑，暗示术、催眠术和巴甫洛夫式训练等心理科学手段，确实能为专制计划招募懦弱顺从的追随者。这些对心理知识的滥用，既违背了心理学原理，也背离了心理学宗旨。心理学的核心方法，尤其是精神分析治疗中，蕴含着与极权主义截然相反的重要特质。

心理学真正的宗旨——尤其是心理健康领域——在于通过帮助人们理解内心紧张的根源，从而释放其内在压力。心理学致力于解放人类精神摆脱对不成熟思维的依赖，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身潜能。它致力于帮助人类直面现实中的诸多难题，既认识自身局限，亦把握成长可能。其终极目标是培育成熟个体——既能自由生活，又能在必要时为公共利益主动约束自由。其核心理念在于：当人真正认识自我，方能成为生命的主人，而非沦为潜意识驱力的傀儡，或被扭曲权力欲望的暴君所操控。

正如我们先前所言，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对极权主义更易受影响的阶段。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当发育中的青少年开始意识到自身个性——即内在的权威时。若不愿承担这份责任，他可能会在家庭之外寻求强势领袖。更早的婴儿期，那些无意识的强制模式与自动服从机制便已奠定根基。当青年期的新自我意识萌发时，他们便开始反抗曾经主宰其生活的成人权威。

觉察到自我或本我的实体是一个痛苦的精神历程。无尽的渴望感、世界悲怆感传统上与青春期紧密相连，绝非偶然。成为独立自主、自我成长的个体，必然意味着脱离家庭的安全庇护。为实现内在民主，青少年必须割裂保护性环境的束缚。在此过程中，他不仅沉醉于成长与解放的快感，更被恐惧与孤独感所充斥。他正步入一个全新世界，从此必须为自身行为承担成熟的责任。此时他极易沦为极权主义宣传的猎物，对成长的个人怨恨可能使他放弃追求个人成熟的奋斗。

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尤为突出，不仅因为我们面临着真实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更因为我们的育儿方式可能加剧了这一矛盾。原始群体会在孩童早期便赋予

其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并逐步加重，而我们的中产阶级文化却将孩子彻底隔离在童年、托儿所和教室的世界里，随后又将其骤然抛入成人社会自生自灭。在这个转折点上，许多年轻人畏缩不前。他们不愿承受伴随自由而来的沉重负担与孤独感，宁可放弃自由以换取父母的庇护，或将其献祭给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父母形象的替代品。

可悲的是，青年放弃个性并不能免除恐惧与孤独。真实的外部世界绝不会因其内心选择而改变。因此，那些放弃自由的青年寻求新出现的家长式人物，对他产生了对所有权威既爱又恨的矛盾情感。顺从与叛逆、屈服与憎恨在他内心并存。有时他会完全屈从于权威或暴政；有时，往往毫无预兆地，他全身心反抗自己选择的领袖。这种双重性永无止境，因为他本性中的一面不断试图突破另一面——即顺从的一面——所设定的界限。未能获得自由的人只知两种极端：不加质疑的顺从与冲动的叛逆。

反之，足够强大以拥抱成熟成年期的个体，将进入一种全新的自由境界。诚然，这种自由是模糊的概念——它意味着承担新抉择的责任，直面新的不确定性。自由的疆界一端是无政府与任性妄为，另一端则是规条束缚与窒息压迫。

若能找到成熟人生态度的简易公式该多好！即便称之为民主精神，我们仍更容易阐释民主的反面而非其本质。可以说，我们这种强调个体化的民主制度，是盲目权威的对立面。若需更详尽的心理层面的解释，就必须将其与极权主义相对照。我们的民主反对对个体的全面规训与同质化。它不追求均质化整合与丝滑的社会性调适。相较于这些目标，民主意味着对自发性与个体成长的信任。它能够假定进步与恶的纠正，在防范人类错误时无需诉诸威吓。民主制度能纠正自身的错误；极权主义则自诩无懈可击。极权主义凭一己私欲操控舆论实施统治，民主制度则致力于依法规范社会，尊重人性本质，既防范个人暴政，又抵御权力狂热的多数派专制。民主永远在打一场双重战役。一方面，它必须遏制个人内心反社会冲动的复苏；另一方面，它必须保护个人免受外部敌对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侵蚀——这些力量与意识形态都与民主生活方式背道而驰。

双重战线之战

社会适应与自我主张的内在平衡，需在每个新环境中重新建立。每个个体都必须反复打赢这场始于婴幼儿期和儿童期的微妙战争。自我通过与现实的对抗而形成——顺从与独创性相抗衡，依赖与独立性相抗衡，外部纪律与内在道德相抗衡。

尽管不同文化、社会乃至家庭对此侧重有别，但人类内在的这场斗争无一文化能幸免。

内外斗争的交织，这场双线并行的精神冲突，使西方个体化民主的理想显得格外脆弱——尤其当信奉者未察觉其中内在矛盾时。民主本质上永远要对抗外部的独裁与内部的破坏性力量。民主自由既要对抗个体内心对权力的渴求，也要抵御其向他人屈从的冲动。它还必须对抗那股跨越疆界、常以军队为后盾的、具有传染性的权力驱动力。

民主所追求的自由，并非青春期梦想中的浪漫自由，而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要求人们作出必要的牺牲以维护自由。它试图消除人们面对民主制度看似无限的自由时产生的恐惧。这种缺乏约束的自由可能被滥用，以满足纯粹的本能驱动力。然而，正因民主制度不借助神话、原始魔法、群体催眠或其他心理诱导手段，对未成熟个体而言，其吸引力远不及专制控制更缺乏吸引力。当民主制度未陷入生死存亡的激烈斗争时，它可能显得平淡乏味。它仅要求人们独立思考与判断；要求每个个体在适应变化世界时充分运用自觉能力；并让真实的公众舆论塑造治理社会的法律。本质上，民主意味着自我发展的权利而非被他人塑造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如同其他权利，必须以责任为平衡。若不承担为他人发展贡献精力与关注的责任，自我发展的权利便无从谈起。民主不仅植根于普通人的个人权利，更深植于普通民众的个人利益与责任。当他丧失对政治与政府的关注时，便为权力政治铺平了道路。民主制度要求普通民众具备相当高的思维活动能力。

在大众传播的新时代，公众所吸收和内化的思想，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专家们的论断。若后者提出的理念超出大众理解范围，其言论便会沦为空谈。如此一来，更简单甚至虚假的意识形态便可能趁虚而入。仅仅提出并印刷理念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确保公众能够参与新概念的形。

自由的神秘之处，在于那份对自由的伟大热爱！品尝过自由滋味者永不退缩。人类抗拒不公的压迫，当压力积聚时默默反抗，直至临界点爆发为公开反抗。经历过这种爆发的人们，将自由视为生命本身。我们在迫害与占领的岁月里、在地下活动时、在集中营中、在煽动主义的威胁下，尤其深刻领悟了这一点。即便在极权国家，我们也能发现这种真理——尽管恐怖笼罩，抵抗从未停止。

自由与对个体的尊重植根于《旧约》，它使人类确信：历史由人自己创造，人对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负有责任。这种自由意味着人必须摆脱惰性，不盲目固守传统，追求知识并承担道德责任。对自由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承担责任的恐惧。

自由绝非仅靠规章律法就能完全保障。它既取决于执政者的勇气、正直与责任感，同样依赖于每个公民的这些品质。我们与领袖身上任何指向被动屈从权力的特

质，都在背叛民主自由。在美国民主政府体系中，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强权相互制衡。然而当任何一方缺乏阻止权力侵蚀的意志时，这种制衡机制同样会走向堕落。

如同青少年宁愿躲在父母权威的裙带之下，也不愿面对成熟的成年生活，民主国家的个体成员也可能逃避民主制度所要求的思维活动。他们渴望逃入一种无需思考的安全状态。他们常希望政府或某种国家拟人化形象代为解决问题。正是这种渴望催生了极权主义者与顺从者。顺从者如同婴儿般安然入睡，将所有忧虑转嫁给“父亲国家”。当知识分子丧失自制与勇气，仅被恐惧与情绪支配时，偏见与愚昧便会壮大势力。

由于民主与极权的种子皆潜藏于每个人内心，民主与极权的观念斗争在每个个体一生中反复上演。他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将决定其政治信仰。与人类对自由与成熟的渴望并存的，是破坏性、仇恨、权力欲望、对独立的抗拒，以及退缩至无责任感的童年的愿望。民主只吸引人的成熟面；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则诱惑其幼稚欲望。

极权主义建立在机械化的狭隘人类观之上。它否认个体复杂性，否认意识与潜意识动机的冲突，否定怀疑、矛盾心理与情感冲突。它将人简化为可被政府润滑油驱动机器。

在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中，都会迎来这样一个时刻：患者必须决定是否要真正成长。他所获得的认知与洞察力必须转化为行动。此时他已更了解自己，人生如同摊开的书页。尽管对自我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却难以告别童年的梦幻世界——那里充满幻想、英雄崇拜与圆满结局。但凭借对内在动机更深的理解，他跨入了自我选择的责任与有限自由的世界。由于世界观不再被幼稚的渴望所扭曲，他如今能够以成熟成人的姿态在其中运作。

系统性的自由教育是可行的。当对破坏性内在冲动的控制内化于心，不再依赖父母权威的外在约束时，自由便随之生长。

关键在于塑造人格与良知——即自我与超我。这种发展绝不能像暴君独裁者那样靠强制手段实现。我们必须通过自由接纳或拒绝现有道德价值来培育它，直至内在的道德人格足够强大，能够超越既有价值体系，立足于自身道德基石之上。选择自由意味着在两种状态间作出抉择：自主设限——即从混沌中解放——与无意识混沌的伪自由。对许多人而言，自由是放纵自我的情感概念，实则沦为黑暗本能驱力的独裁统治。自由亦存在理性概念，意指对束缚与不自由的限制。

要获得自由，必须防止某些外部条件阻碍这种自我约束的道德发展。我们必须日益警觉民主制度的内在危险：松懈、怠惰与麻木。人们必须警惕技术对思维的自动化倾向，必须意识到大众传媒与现代通讯能向大脑植入各类暗示，必须明白教育

既能造就软弱的事实工厂，也能塑造坚韧的独立人格。自由民主必须对抗平庸之气，以免被肤浅的自动投票的数量所窒息。民主自由需要对民主制度本身进行高度理性的评估与理解。正是这个事实使得我们难以宣传或“推广”它。更何况，灌输民主与灌输极权主义同样危险。民主的本质在于它必须是自主选择的，无法强加于人。

自由的悖论

自由与规划并非本质对立。为使自由茁壮成长，我们必须规划对限制自由力量的管控。更进一步，我们需怀抱激情与内在自由，以追究滥用自由者的责任。我们必须具备攻击那些通过滥用自由实施精神自杀与心理谋杀之人的活力——这些人拖垮他人，自取灭亡。自杀式屈从是来自内部的颠覆；是对个性缺失的机械化世界的被动投降；是对人格的否定。我们必须怀抱热忱坚定捍卫个人自由、相互宽容与尊严，并学会绝不容忍这些价值的毁灭。我们绝不能纵容那些利用崇高理念与价值观，却在掌权后立即摧毁它们的人。只要精神领域的生死之战仍在继续，我们就必须对这些滥用行为保持零容忍。

必须反复强调：唯有坚定的信念体系与道德准则才能保障自由。这意味着人类必须恪守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方能维系自由。当因教育缺失或僵化教育导致内在约束缺失时，外部压力乃至暴政便成为遏制反社会冲动的必要手段。此时自由沦为人类无法在自由与自律中生存的牺牲品。

人类应当享有拒绝聆听、拒绝顺从的权利，享有抵御心理攻击的权利，抵御那些以扭曲的群众宣传、极权压迫和精神折磨为形式的干预。面对此类态度，绝不容许妥协或姑息。我们必须警惕，以免自身在捍卫个人自由时犯下的错误，反倒成为极权主义者的磨坊之粮。甚至我们的谴责也可能产生反效果。恐惧与歇斯底里只会助长极权主义。我们需要的是对这类现象的审慎分析与理解。民主是彰显人类尊严的政体，它保障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持有个人观点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保障人们主张自身观点的权利，以及抵御精神入侵与胁迫的权利。

当联合国制定出限制思想杀戮与心理侵扰的规则时，它便保障了一项与肉体生存同样珍贵的人权——不循规蹈矩的自由个体之权利：异议权，做自己的权利。宽容批评与异端，乃自由之基石。

此处涉及治理技艺的另一关键要点：政府过度集权、群众参与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若缺乏强调差异与个性价值的权力下放机制，且无法实现领导者的合理遴选，

民众参与政府事务便易催生独裁者。此时民众将权力欲望转移至其身上，奴隶以某种魔幻方式分享着主人的荣光。

民主自治的本质在于克制与自我约束，在于体育精神与公平竞争，在于自愿遵守社会规则并积极协作。这些品质需经训练方能养成。在民主政府中，当选担任要职者会主动要求对自身进行制约与限制，因为他们深知无人能免于过失。民主并非争取独立的斗争，而是相互约束的依存关系。民主意味着遏制人类无限聚权的倾向，意味着纠正每个人身上的缺陷，它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人类局限性带来的后果。

心理学的新纪元

容我重申本书开篇之言：现代洗脑与精神灭绝技术——这些心理学的扭曲产物——几乎能令任何人屈服投降。我们讨论过的思想控制、洗脑与精神灭绝受害者中，许多本是意志坚毅之人，却终遭精神摧残与人格贬损。尽管极权主义者为了恶毒而毫无忌惮的目标而利用心理知识实施精神迫害，我们的民主社会能够也必须运用其知识来帮助人类成长、守护自由并理解自我。

心理知识与心理治疗本身便能孕育民主精神；因为心理学本质上是研究恰当平衡的科学，是在个人与社会约束框架内实现自由选择的科学。相较于人类百万年的生存与进化历程，文明仍处于襁褓之中。尽管历史充满起伏，人类仍在持续成长，而心理学——无论当下多么不完善——终将成为人类争取自由与成熟过程中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参考文献

- “Admissibility of Results of Lie-Detector and Truth Serum Tests” (Oklahoma Court),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133, 1951.
- Ahrendt, H.,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 Almond, G. A., and others,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 Asch, S. E.,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193, 1955.
- Ashby, W. R., *Design for a Brai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2.
- Aspaturian, V., “What Do the Communists Mean by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Reporter*, 1955.
- “Automation Is Here,” *Democratic Digest*, 1955.
- Baschwitz, K., *Du Und Die Masse*. Amsterdam, Elsevier, 1937.
- Bauer, R. A., *The New Man in Soviet Psych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Beck, F., and Godin, W., *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Inc., 1950.
- Beer, M., “The Battle for Man’s Rights,” *United Nations World*, 1950.
- Bergler, E., *The Battle of the Conscience*. Washington, D. C., Washington Institute of Medicine, 1948.
- The Superego—Unconscious Conscience*.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Inc., 1952.
- Boeree, T. A., *The Sinister History of Christiaan Lindemans, Alias, King Ko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Bonhoeffer, W., and Zutt, G., “Über den Geisteszustand des Reichstagsbrandstifters Marinus Van Der Lubbe,” *Monatschrift für Psychiatrie*, Vol. 89, 1934.
- Burney, C., *The Dungeon Democracy*.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1.
- Byfield, R. S., Logocide, *The Fifth Weapon*.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1954.
- Cantril, H., Gaudet, H., and Herzog, H., *The Invasion from M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0.
- Commager, H. S., “The Real Danger—Fear of Idea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26, 1949.
-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Lake Success, N. Y.,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1949.

Dicks, H. V., "Observations on Contemporary Russian Behavior," *Human Relations*, Vol. 5, 1952.

Dobrogaev, S. M., *Speech Reflexes* (translated and digested from the Russian).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 1953.

"Document on Terror," *News fro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Vol. 1, 1952.

Dooren, L., Dr. *Johannes Wier*. Salten, Holland, De Graafschap, 1940.

Ferenczi, S.,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25

Frazer, J. G., *The Golden Boug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Freud, A.,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46.

Freud, S.,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6.

Fried, J. H. E., *Les Méthodes et les procédés du fascisme*.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49.

Fromm, E.,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Inc., 1941.

Gallery, D. V., "We Can Baffle the Brainwashers!"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55.

Gilbert, G. M., *The Psychology of Dictatorship*.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0.

Gonzales, V., and Gorkin, J., *El Campesino: Life and Death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52.

Haggerty, J. J., Jr., "Think or Die," *Collier's*, 1955.

Heiden, K., "Why They Confess," *Life Magazine*, 1949.

Heller, E. L., "Thought I'd Never Get Home," *Saturday Evening Post*, 1955.

Herling, G., *A World Apart*.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52.

Heron, W. *Time*, 1954.

Hershey, B., "The Sick Men Who Rule the World," *The Nation*, 1949.

Hill, G., "Brain-Washing: Time for a Policy," *Atlantic Monthly*, 1955.

Hitler, A., *Mein Kampf*.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3.

Hook, S., "Why They Switch Loyalt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 26, 1950.

Horsley, Gantt W., "Bolshevik Principles and Russian Physiolog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VIII, 1952.

Hsu, F. L. K., "Suppression Versus Repression," *Psychiatry*, Vol. XII, 1949.

Hunter, E.,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s*.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1951. From

---“Government by the Insane,” *The Freeman*, 1953.

Huxley, A., *The Devils of Loudu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2.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4

Jong, L. de, *The German Fifth Colum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Kafka, F., *The Tria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37.

Kalme, A., *Total Terror*.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50.

Karp, D., *One*.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1953.

Kayman, G., “Forensic Psychiat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Vol. VIII, 1954.

Kisker, G. W., *World Tension: The Psychopath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50.

Krugman, H. E., “The Role of Hostility in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sychiatry*, Vol. I, 1953.

Lassio, S., “La Verite sur la condamnation du Cardinal Mindszenty,” *Le Figaro*, 1950.

Lasswell, H. D., “The Strategy of Soviet Propaganda,”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Vol. XXIV, 1951.

Lea, C. H.,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54.

Lehmann-Haupt, H., *Art Under a Dictato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Leites, N., and Barnart, E., *Ritual of Liquid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4.

Little, A. M. G., “Pavlov and Propaganda,”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II, 1953.

London, T. D., “The Scientific Council on Problems of the Physiological Theory of Academician I. P. Pavlov: A Study in Control,” *Science*, Vol. 116, 1952.

Luther, R. H., *American Demagogues—Twentie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4.

MacDonald, D., “The Lie-Detector Era,” *The Reporter*, 1954.

MacDonald, J. M., “Narcoanalysis and Crimi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11, 1954.

Malinowski, B.,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4.

Mayo, C. W., Speech before the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Oct. 26, 1953.

“Medecine, quatrieme pouvoir?” *Esprit*, 1950.

Meerloo, J. A. M., “Die Abwehrreaktionen des Angstgeföhls,” *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Vol 133, 1931.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52.

---"The Crime of Menticid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07, 1951.

---*Delusion and Mass-Delusion*. New York,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s, 1949.

---"Democracy and Fascism Within Us," in *Total War and the Human Min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45.

---"International Law and Morality," *New Europe*, 1945.

---"Living by Prox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Vol. 11, 1953.

---"The Monument as a Delusional Token," *American Imago*, 1954.

---"Morale," *Military Review*, 1954.

---"The Psychology of Treason and Loyalt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Vol. VIII, 1954.

---Television Addiction and Reactive Apathy,"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Vol. 120, 1954.

---"Thought Control and Confession Compulsion," in *Exploration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Julian Press, Inc., 1953.

---"Treason and Traitors," in *Aftermath of Pea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46.

---The Two Faces of Ma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54.

Miller, W. L., "Can Government be Merchandised?" *The Reporter*, 1953.

Mitscherlich, A., and others, *Doctors of Infamy: The Story of the Nazi Medical Crimes*. New York, Henry Schuman, Inc., 1949.

Moloney, J. C., "Psychic Self-Abandon and Extortion of Confes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36, 1955.

---"A Study in Neurotic Conformity: The Japanese," *Complex*, 1951.

---*Understanding the Japanese Mind*.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4.

Newman, C. L., "Trial by Jury Outmoded," *Science News Letter*, 1955.

"No Bands Playing: Colonel Arnold's Story," *Time*, 1955.

Pavlov, I. P., *Conditioned Reflexes and Psychiatr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mpany, 1941.

Peck, D. W., "Do Juries Delay Justic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 25, 1955.

"People v. Leyra," *North Eastern Reporter*, Second Series, 1951.

Piaget, J.,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55.

Prychodke, N., *One of the Fifteen Mill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2.

Razran, G. *Science News Letter*, 1954.

Reik, T., *Gestandniszwang und Strafbedurfnis*. Zurich,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25.

---The Unknown Murdere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49.

"Report on Vogeler,"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51.

Richter, C. P., "Civilized Life Affects Combat Stress," *Science News Letter*, 1954.

Ross, L., "Red China's Dope Peddlers," *The New Leader*, 1954.

Rostow, W. W., and other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4.

Rousset, D., *The Other Kingdom*.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7.

Rud, F., "The Social Psychopathology of Schizophrenic States,"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sychopathology*, Vol. 12, 1951.

Samuels, G., "American Traitor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22, 1949.

Santucci, P. S., and Winokur, G., "Brainwashing as a Factor in Psychiatric Illness: An Heuristic Approach,"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Vol. 74, 1955.

Schultz, H. H., *Das Autogene Training*. Stuttgart, Georg Thieme Verlag, 1934.

"The Schwable Cas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0-11, 1954.

"The Schwable Case," *The Reporter*, 1954.

Segal, H. A., "Initial Psychiatric Findings of Recently Repatriated Prisoners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11, 1954.

Shipkov, M., Bulleti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1950.

Siegel, V., "College Freedoms Being Stifled by Students' Fear of Red Label,"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0, 1951.

"Soviet Expunging West's Psychiatry,"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6, 1951.

Spence, K. W., and Farber, I. E., "Conditioning and Extinction as a Function of Anxie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45, 1953.

Sperling, G. 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uma as a Command,"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Vol. 19, 1950.

Strassman, H. D., and others, "A Prisoner of War Syndrome: Apathy as a Reaction to Severe Stress," Paper read at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May 9-13, 1955.

- Swift, S. K., *The Cardinal's 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9.
- Taylor, A. J. P., "The Judgment of the Diplomats," *The Saturday Review*, 1954.
- Taylor, E., *The Strategy of Terro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2.
- Tyler, D. B.,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Experimental Sleep Deprivation,"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Vol. 16, 1955.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Lake Success, N. Y.,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1949.
- Vogeler, R. A., *I Was Stalin's Prison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Inc., 1952.
- Waelder, R., "Authoritarianism and Totalitarianism," in *Psychoanalysis and Cultu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1951.
- Walker, R. L.,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China Under Commu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Weissberg, A., *The Accus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51.
- West, R., *The Meaning of Treas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Inc., 1947.
- Weyl, N., *Treason*. Washington, D. C., The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0.
- Wier, Johannes, *De Praestigiis Daemonum*. Basel, Per J Oporinum, 1563.
- Winokur, G., "Brainwashing, A Social Phenomenon of Our Time," *Human Organization*, Vol. 13, 1955.
- "The Germ Warfare Statement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Vol. 122, 1955.
- Wortis, J.,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sychiatr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09, 1953.
- Yen, M., *The Umbrella Garde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4.
- Zimmering, P., and others, "Heroin Addiction in Adolescent Boy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Vol. 114, 1951.